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左舜生先生紀念冊

周寶三編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聖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台北蘇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六五九號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左舜生先生遺像

谷山同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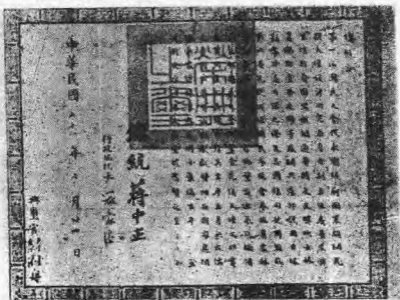


總統特頒額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碩望嘉謨

總統特頒褒揚令





左舜生先生家庭照之一



左舜生先生家庭照之二



情才鄧興（右）生先生舜左秋年五十國民
歲四十二年時城瑰攻鄧南黎巴於影合



國民二十三年於上海時二十四歲



→

民國三十一年攝於重慶
時年五十歲



←

民國三十六年任農林部部長
時攝時年五十五歲

民國四十五年攝於香港
時年六十四歲



民國四十三年春攝於台北
時年六十二歲





民國十五年由港來東台出席青年
黨全國大會於松山機場

集念紀念先生群左



民國十五年左先生身穿
與女左大器合影

靈堂



左時生先生紀念堂



嚴副總統獻花致祭

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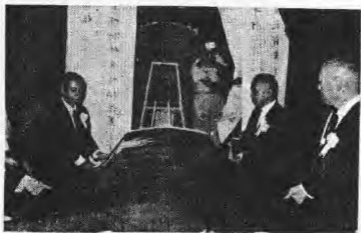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李瑛先生在港九追悼會上致詞





容遠仰瞻屬家



旗國蓋覆後殮大

持主生先四夫亞孫、澄郭、驥郭、天啓陳由

左舜生先生遺墨之一

一之同志

吾民主奮鬥為自由

努力力

胡國偉識

上面是五年前左先生寫給我的一張小條幅，上下款稱謂，均用「黨號」，彌覺親切。所謂「黨號」，即秘密的隱號，也可說是代號，因為青年黨在革命組織時期，黨員身份絕對保密，所有黨員均以「黨號」代替其真姓名。就黨的立場而言，這一條幅實有共勉的意義，固不僅作為紀念已也。

胡國偉識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目次

- 一、遺像及遺墨
- 二、左舜生先生行狀
- 三、左舜生先生遺言
- 四、我的少年時期……………左舜生遺作
- 五、壽 介公總統八十……………左舜生遺作
- 六、苦憶左舜生先生……………方東美
- 七、悼念左舜生先生……………梁實秋
- 八、記左舜生先生……………陶希聖
- 九、左舜生先生轍詞並序……………陶希聖
- 十、悼念左舜生先生……………程滄波
- 一一、追念左舜生先生……………阮毅成
- 一二、敬悼左舜生先生……………周鯨文
- 一三、回憶左舜生兄……………李璜
- 一四、左舜生先生的生平……………陳啓天
- 一五、悼念政治家史學家左舜生先生……………胡國偉
- 一六、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劉紹唐

- 一七、敬悼左舜生先生……………岳 爽
- 一八、左舜生先生對日本的最後看法……………岳 爽
- 一九、記左舜生先生……………吳 文 蔚
- 二〇、反共陣營失一老將……………趙 聰
- 二一、悼念左舜老……………徐 速
- 二二、我所見晚年的左舜生先生……………陳 鳳 翔
- 二三、弔左舜老 憶何魯翁……………陳 再 思
- 二四、書生政治家左舜生……………魏 翰
- 二五、愛國書生左舜生……………張 作 錦
- 二六、訪近代史學家左舜生先生……………鮑 亞 琪
- 二七、永遠年青……………賈 禮
- 二八、我所認識的舜生……………張 夢 九
- 二九、十年長我氣如虹……………周 謙 冲
- 三〇、述往事 悼舜老……………沈 雲 龍
- 三一、左舜生先生臨終美德……………王 嵐 僧
- 三二、弔左舜生先生……………劉 鵬 九
- 三三、長夜漫漫失明燈……………潘 再 中
- 三四、悼念民主鬥士左舜生先生……………朱 文 伯
- 三五、敬悼左舜生先生……………宋 益 潛

- 三六、憶左公及籌備港九追悼會……………王世昭
 三七、悼念左舜生先生……………徐漢豪
 三八、揮淚弔舜師……………朱祖貽
 三九、悼懷左舜生先生……………劉東巖
 四〇、敬悼左舜生先生……………張伯倫
 四一、左舜生在農林部長任內……………冷 彭
 四二、聖誕前夕悼舜老……………周劉敦勳
 四三、敬悼本黨左故主席舜生先生……………陳善新
 四四、敬悼左舜生先生……………陸崇仁
 四五、悼念左舜生先生……………李詠南
 四六、本黨應以精誠團結來紀念左舜生先生……………關德辛
 四七、左先生在農林部……………趙葵生
 四八、敬悼左舜生先生……………黃欣周
 四九、左舜生先生遺言讀後……………黃欣周
 五〇、悼念舜師……………周寶三
 五一、悼念舜生……………左黃竹生
 五二、憶慈父……………左宗華
 五三、慈愛的爸爸永別了……………左宗權
 五四、追憶慈父……………左宗權

- 五五、哭我未謀面的公公……………左劉慈恩
- 五六、懷念爸爸……………左宗機
- 五七、懷念我的叔祖……………左光華
- 五八、懷念祖父……………左大詒
- 五九、左舜生先生治喪紀要……………周劍南
- 六〇、左舜生先生追悼會記實……………岳 鶯
- 六一、左舜生先生紀念集書後……………王師曾

左舜生先生行狀

先生姓左，諱名學訓，字舜生，別號仙平，以字行。湖南長沙人。生於清光緒十九年癸巳九月初四日（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三日）。祖父莘農公，爲邑之舉人，任教諭多年，以經學名於時。莘農公有三子，長松年公（曾任湖北知縣），次子春公，三子立公，即先生之父也。子立公亦有三子，長學古，次學萬，三即先生；嘗在家館教授，兼業中醫，不收診金。母吳氏，湖北蒲圻人，工刺繡，一家生活賴以維持。先生上有二兄四姊，下有二妹，食糧浩繁，生計不易，故少年時代即在清苦中度過。

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四歲時開始認字，五六歲時讀詩，八歲入塾，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左傳」及「詩經」，暇則閱讀流行木刻唱本，如歌謠、彈詞、戲曲之類，興趣盎然。其愛好文藝，出自天性，終其身未變。光緒三十一年，先生十二歲，始入「長沙官立第十八初等小學」，常利用假日，博覽各種小說劇本至三百種之多，對於演戲、說書、講平，尤爲喜愛。光緒三十四年春，考入「長邑高等小學」，校長余子照，教員唐濟渠、曹孟其等，俱一時名師，對先生之學問思想影響甚大。自第三學年起，先生開始瀏覽新出書報，如「時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欽定自由書」、「國風報」、「民立報」及有關鼓吹革命之小冊，涉獵殆遍，對於「立憲」、「革命」兩派思想，均有所體會，時有問題提出，使老師窘於作答。黃花崗之役，予先生之刺激至深，激烈士慷慨激昂之供辭，不禁痛哭流涕，悲憤萬狀。民國元年春，先生入「長沙縣立師範」肄業，其秋轉入「外國語專門學校」，選習日文。

民國二年夏，先生束裝赴滬，入震旦學院攻讀，與曾琦、李璜、黃仲蘇等同學。畢業後，赴南京黃仲蘇家任教席。民國八年初，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曾先後介紹東大、金大、及河海工程學校之優秀青年多人入會。不久，

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生代表抵京，運動罷課，賴先生與各大學學生聯絡，始得與對擊。民國八年冬，先生由京赴滬。翌年春，入中華書局編譯所任新書部主任，曾陸續出版新文化叢書、教育叢書、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並主編「中華教育界」、「少年中國」月刊及「少年世界」月刊，自此名重海內，士林爭相結納。時「少中」會友紛紛出國留學，先生繼任學會執行部主任，獨負處理會務之重責，舉凡出國船票之洽購，稿件之投遞，報社通訊之接洽，書籍之出版，乃至一切收款匯款之瑣務，悉賴先生為之代辦，其篤於友情，樂於助人，誠足以動後進而勸末偕。不料民十以後，會中發生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慶復又演為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至十四年雙方正式決裂，會務亦由此停頓。先生於歷次年會上均站在反共立場，予共產分子以嚴正之駁斥。民國十三年秋，青年黨之機關報「醒獅週報」在滬發刊，先生任總經理，自校勘以至發行，皆親任其勞。對外則與孤軍社及商報負責人如陳布雷、陶希聖、薩孟武、何公政等相往還，形成聯合反共之局。十四年，正式加入中國青年黨。按先生自民九起，即致力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迄民十五止，已出版「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辛亥革命小史」等數種，以後又發表「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及續篇，實開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先河。十五年秋，由書局資助，赴法留學，除每週至巴黎大學上課外，曾遍訪巴黎附近之勝蹟及博物館，藉以了解法國之歷史文化與藝術。其後「法蘭西史」之出版，殆此行之結果也。十六年秋返國，仍任書局編輯，益埋頭於史籍之鑽研。十七年至十九年間，先生在滬除經常為「醒獅」寫時評外，並為「長夜」及「長風」月刊撰論，襄辦「知行學院」以訓練幹部人才。在共黨長沙暴動後，又與陳啓天等創辦「劍共半月刊」，報導湘鄂贛三省共黨燒殺之慘狀，以警醒國人。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先生與陳啓天等創辦「民聲週報」，主張對日作戰，並發起「抗日急進會」，以利抗日行動之推進。次年「一二八」淞滬戰起，先生乃辭去書局職務，雖在復旦、大夏兼課，尚有充裕時間，奔走國事。主辦「申江日報」，鼓勵民心士氣，備極辛勞。曾被上海四十公團推為代表，前往北平，勸說張學良、吳佩孚出兵抗日。時先生已與章太炎相識，每週必往長談，縱論時局及革命史事，頗多為前人之所未發，對先生之

近代史研究裨益良多。二十三年七月，先生赴廬山晉謁蔣委員長，開國、青兩黨聯合抗日之先聲。在廬山前，先生曾分訪蔣百里及黃膺白，以求對委員長有深一層之了解，具見先生臨事之不苟。先生嘗告其同志曰：「余代表青年黨與蔣先生見面，但求團體不失立場，個人不失身分。」其光風霽月之襟抱類如此。二十四年春夏之交，先生應邀至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教書。七月，被推為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於其實所闢室成立「現代研究室」，附設圖書部，「國論月刊」亦於是時發刊。秋後某日，蔣委員長約談，先生以其時抗日輿論漸趨激烈，乃建議成立一類似民黨機關之「國民參政會」，以加強團結。二十五年夏，先生首次赴日考察，但與日朝野接觸之結果，深信中日一戰，決無可免，返國後力促國人全力備戰。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先生應邀參加「廬山談話會」。「八一三」滬戰爆發，倡導成立「上海教育界救時服務團」，發動大上海之人力物力，支援前線將士。旋赴京參加「國防參議會」。十一月下浣，南京告急，搭江輪抵武漢。是時先生已有一種極端，即戰爭前途，無論勝敗誰屬，必然兩敗俱傷，易為野心的第三者所乘。二十七年春，在長沙創辦「國光旬刊」，鼓勵國人敵愾同仇，為國犧牲之決心，後遂武昌出版。四月，先生正式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蔣公交換函件，重申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信念，是為我國政黨關係步入民主正軌之始。六月，創辦「新中國日報」於漢口，親自主持編輯事宜，恆至深夜始歸。七月，經推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並推為社會委員會委員。按國民參政會為抗戰期間之民意機關，對監督政府有相當作用。自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共舉行四屆十三次大會，先生始終參與其事，貢獻甚多。八九月間，隨政府撤至重慶。二十八年，「國論」在渝復刊，改為週刊。九月，在參政會一屆四次大會中，與張君勱等提案，要求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發揮民力，而利抗戰。三十年十一月，先生曾起草一重要提案：「促進民治，加強抗戰力案」，經參政會二屆二次大會通過，其要點為：（一）抗戰終了後，即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二）增強戰時民意機關組織與職權；（三）延擱各方人才，實踐「天下為公」之遺訓；（四）人民合法自由予以保障。三十年，先生與張君勱、梁漱溟等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曾一度任秘書長，並主編「

民憲」半月刊，後因該同盟為共黨所滲透，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先生乃與青年黨同志全體退出。三十四年七月，先生與傅斯年、褚輔成等有延安之行，其動機在對中共求得進一步之了解，或於解決戰後問題，不無裨益。但此行結果，發覺毛朱等孤陋寡聞，野心勃勃，而且根本不要民主，知其必為禍於國家，絕無妥協之可能。此先生之所以拒絕參加「政協」，即對調停處共軍事衝突之工作亦認為多事也。

三十五年一月，先生復員返滬，籌辦「中華時報」及「中國人文研究所」，其後又恢復「青年生活」月刊，青年黨在戰後即憑此基礎與共黨展開思想競爭。十一月，制憲國民大會揭幕，先生代表青年黨發表談話，嚴申參加制憲國大之理由與立場。在預備會議中，先生當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三十六年春，青年黨中常會推舉先生出任行政院農林部部長，在其一年又八個月之任內，對散佈各地之附屬機構，隨時前往視察，不斷予以鼓勵，並多方解除其困難。計已完成一全國性之「糧食增產計劃」，部分且已付諸實施；若干重要農產品如桐油、茶葉、蠶絲、繭絲等，均訂有獨立發展計劃，棉花的增產與改進，已有顯著成績；土壤調查與肥料運用，亦在積極進行；在南京建一「首都農具製造廠」，已開始出品；對若干研究實驗機構，更設法增加其設備，充實其內容。惜為時太短，不獲施展抱負。三十七年春，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三十八年四月，先生自滬來臺，九月赴港，籌辦「自由陣線」週刊，在港九重樹反共旗幟，並經常為「自由人」撰論。四十三年春，由港返國，出席國大第二次會議，當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旋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多，出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四十五年四月，任中華民國各界日本親善訪問團團員，赴日訪問。四十六年，受聘新亞書院講學。翌年，與港九反共人士創辦「聯合評論」。五十一年九月，先生離港飛美，作為期四月之訪問；由舊金山而紐約、波士頓、華盛頓，遍訪各地之著名大學、圖書館、博物館，與留美學人、僑胞，及美國文教界人士，交換有關反共復國及學術研究上種種問題之意見。於五十二年一月下旬始由美返港。五十四年，應邀在清華書院講授中國近代史，並為高年級學生主講史記及漢書。五十五年，先生擬定讀書五年計劃，重點在治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每年出書一種。自該年起，每逢夏秋之際，輒有晝日

之行。來臺目的之一為促成青年黨之團結；至歷次訪日之動機，乃有遙於彼邦復興之速，欲了解其今後動向，究於吾人之反攻復國利害何如耳。

先生自去年以來，即感易於疲勞，體重銳減。今年五月忽小便出血，且發高燒，經送入香港法國醫院檢查結果，知其左腎已壞，肝亦有病。七月十六日力疾來臺，於促成青年黨團結後即返港。八月十一日舊病復發，再入法國醫院治療。後因各方之敦促，乃於九月十四日來臺，入榮民總醫院診治。終以年邁力衰，不能動手術，病況日趨沉重，延至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廿五分，油然長逝。享壽七十七歲。

先生於民國五年與劉名聖女士在長沙結婚，民國二十七年與黃竹生女士在重慶結婚；共有六子二女，長子宗矩（留港），次宗惠（在臺，媳趙明麗女士），三宗志（旱夫），四宗明（留大陸），五宗楷（留港），六宗權（留美，媳劉雅惠女士）；長女宗華（留港，適張），次宗機（留港）。

綜先生一生為反共救國、民主憲政、弘揚學術而奮鬥，五十年如一日，從未稍懈其努力。為人則氣魄沉雄，剛正不阿；治事則條理細密，貫徹始終；好讀書，勤寫作，雖在顛沛流離之中，仍坐擁書城，怡然自得，向當今之書生政治家也。其文一如其人，簡潔精練，敏氣於骨，奔放而有力，自然而壯麗，蓋深得陽剛之美者。二十年來在港臺出版之新書，有「反共政治論集」、「近三十年見聞雜記」、「萬竹樓隨筆」、「中國近代史四講」、「中國近代史話初集」、「文藝史話及批評」、「黃興評傳」、「中國名人軼事」、「遊記六篇」等十餘種，未出版者尚有「宋教仁評傳」、「梁啟超的生平及其思想與著作」等數種。

嗚呼！一代學人，從此長眠，然國土未復，國仇未報，國恥未雪，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知先生必難於瞑目也。後死者其念諸！

左舜生先生遺言

舜生先生自民八以後，即奔走國事，不遺餘力。後加入中國青年黨，更畢生爲民主反共而奮鬥，同時亦不忘學術研究工作之推進。茲將先生近年言論中有關國是及政黨問題之意見，摘錄於后，

以供國人及本黨同志今後努力的參考。

一、抗戰時期，舉國對外，團結抗日，經過八年的艱苦奮鬥，始獲勝利。今天局面之艱難，超過抗戰時期，爲歷史所未有，抗戰時期能該團結，難道今天還不能團結嗎？面對當前的敵人，團結還不一定有效，何況不團結。

二、過去每逢大陸上有什麼變動，有些人就責備政府又失去了一次反攻的機會，我個人從來沒有作過這種責備，因爲反攻復國是需要許多條件配合的，這是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豈能放言高論。我們應該共同努力，造成可救之勢，至於何日開始反攻行動，應聽候最高統帥的決定。

三、毛共最大的弱點，乃是一個「弱」字。他們的一切措施，均有如坐井觀天，不知天高地厚，以僅有的一點微薄力量與淺陋見識，企圖搖世界革命，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四、毛共政權已經不能領導知識分子，所以只好來領導小孩子胡同，因之，毛共的失敗乃爲必然之事，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但毛共政權的失敗，並不等於我們的成功，這中間並沒有一個等號。我們的將來，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五、真正的建設，是應作廣義的解釋，譬如經濟、社會、倫理、心理等等。假使這些建設不是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上，不是爲人民着想的，那麼這種建設便會經不起考驗。相反的，要是我們的建設是處處以人民利益爲前提的，人民便會歸向於你；民心的向背，是勝敗關鍵所在，即使洪水猛獸如毛共者，我們也可兵不血刃，戰勝他們。

六、政黨的結合，應以政治主張爲本，沒有政治主張的，不成其爲政黨。一個政黨內部有意見，如果是政治主張的不同，那不要緊，即使分道揚鑣，仍不失爲光明磊落。

七、一個黨的團結，形式上比較容易，精神上則比較困難。在形式上的團結成功以後，必須繼續致力於精神上的團結工作。

八、一個政黨應隨時培植繼起接棒的人，以促進新陳代謝的作用，永保黨的新鮮活潑的生命。

九、我時常有幾句話向朋友們說起：「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爲之，小人因緣以爲利。」我們人人應該關心政治，但決不需要人人都去從事實際政治。我們要有所不爲，要能甘寂寞，要耐得窮，要不畏強禦。

十、我們以書生集團起家，希望同志們要勤於閱讀，研究各項問題，須知救國建國之道多端，無一不需要高深的學術基礎。我們上了年紀的人，不得不特別愛惜時間，加倍用功讀書，充實自己，一天至少要當一天半來用。但願天假以年，使我能實現預定的計劃，再完成幾部歷史著作，有機會還想到東南亞各國及日本去看看，希望對國家和黨作一番最後的努力。

我的少年時期

左舜生遺作

「湘江一點不容俗，岳麓四時皆是秋。」

這是晚宋詩人點石屏（復古，字式之，浙江黃巖）兩句有名的句子。假如我不出生在湖南，又在長沙度過了我最早二十年花一般的時代，我對這兩句詩，便不會有這樣的親切之感。

原來，湘江經過我們長沙的一段，水面已經很寬，而且中間長出一個頗長的洲，俗名水陸洲，以產橘有名。因

又名橋洲。長沙另有一個名稱叫「橋洲」，大致即由此而得。

清末民初，湖南有一個著名的詩僧寄禪，他是以「洞庭波送一僧來」這樣一句詩，被湘綺先生賞識而收他為詩弟子的。大致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高小還不會畢業，便在長沙定王台圖書館，讀過寄禪的詩集，木刻，甚精，卷首有湘綺一篇序。集中寄禪有遊杭州的一首七絕：

「直把杭州作橋州，問身到處即勾留，此生不作還鄉夢，飽看湖山到白頭。」

其時某者另有一名寄禪的和尙，也祇當有名，他覺得與湖南的寄禪重了名，不好，因為信給後者，說明他準備改名之意，但後者認為不必，乃寫了一首小時為對方解釋，有句云：

「西方自古三迦葉，東土何妨兩寄禪。」

凡此，都可看出我們這位和尙的雅人深致。

寄禪把長沙與杭州相提並論，也許太過，但長沙的山水不像我後來在江浙所見的那樣瀟灑，那樣蘊藉而另成一格，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因為有一個水陸洲把長沙附近這段湘江中分為二，我們由省城去遊岳置，便須經過兩次擺渡的手續：先渡過接近城邊邊的大河，再渡過洲那邊的小河，然後才能直達山地，而小河景色尤美。

記得，有一次，一位在我家作客的小姑娘——我三姐丈的姪女，忽然從專足得着她母親急病的消息，非立即回到對河王家港去看媽媽不可。我家燒飯的老馮很忙，而且老氣橫秋的愛說囉嗦話，小姑娘也似乎沒有希望老馮送她的意思。這一天是星期日，我正闲着沒事，這一趟送客的差事，乃自然落到我的頭上。小姑娘比我稍大一點，大致十三四；我讀小學三年級，只十二三。時候已經是午後三點，母親看見我們兩個小孩這樣慢還要過河，我其勢不能回來，她沒有阻止我去，但頗躊躇。我對她說明：「今晚我就在三姐夫家裡住，明天起個絕早，趕回來上課還來得及。」聽我這樣一說，她才欣然同意，把我們倆放行。

出南門，步行到河邊，風颯得不大不小，同時還疏疏落落飄來幾顆雨點。我們只有一把傘，小姑娘衣服樸素，但着了一雙新鞋，有一條烏黑柔軟的褲子。我們鼓足勇氣跳上划子，穿過幾排小船，划子稍稍有點顛簸。雨沒有加大，我們的傘也沒有撐開，對面坐着，看見她額前的短髮，已被風吹亂了。

小河的划子比大河的更窄，風不大，浪小船平，雨點慢慢的密了。我們改變坐位，各以一手，緊握着傘柄；怕船一偏，落下水去，乃各出一臂，相互的維護着，兩個頭縮在傘下。可是，雨還是從後面吹來，雨水從頭後流到了我們的背上。

從下船到王家港，有十來里水程，河身曲折，到達目的地，要轉不少的灣，愈轉而河愈窄。其時已是午後的五六點，雨聲雲開，斜陽掛在雨過的樹杪；從兩岸農家的茅屋，捲出了一抹一抹的炊煙。隨着船身的移動，前面展開着不同的山色，有如各種設色和結構不同的畫圖，幻燈似的不停的變換。船行本來很慢，但我們仍微嫌太快。其時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雨後晚晴，已感到絲絲的涼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領略到多變的山光水色之美。第二次大概要數三十年後和幼樺在斜風細雨中坐木船同遊富春江的一回了。

我在十四五歲以後，每到春秋佳日，一個人，或隨着三五同學，上岳麓山玩上半年是有過多回的。山不太高，大致有一點半鐘便可跑上山頂。山上不少三五百年的老樹，樹幹都是筆挺的。廬山被葦茸參差的草所掩蓋，很少露出石頭。秋天坐在半山「愛晚亭」看紅葉，秋陽為高枝的枝椏葉片所遮蔽，濃蔭而涼爽，時時透出一股股的花香草香，環境格外恬靜。據說「愛晚亭」最初原叫「楓葉亭」，袁枚來遊，以楓葉兩字直說不好，他建議：杜牧有兩句現成的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為什麼不改作「愛晚亭」呢？湖南人接受了他這份美意，乃改如今名，這個故事可算不可算，不必管，但改總是改得好的。

山上的「嶽麓書院」，為中國有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曾有不少的著名學者，來這裡講過學，做過院長。我知道最後一次的院長，便是我們長沙的大師王益吾（先謙）先生。書院大門有一幅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進

門大廳的兩壁，有石刻朱子寫的四個大字：「忠、孝、廉、節」，字體剛健有力，刻工也古意盎然，氣象非常肅穆。我遊廬山，不會到過「白鹿書院」的故址，不知氣象又是怎樣？「嶽麓書院」清末改爲高等學堂，符定一任總監督，他編有一部十大本的「聯綿字典」，出版時，他把這部字典的原稿疊得高高的，自己站在這堆稿子旁邊，拍了一張照片，表示「著作等身」之意，自命學人而惡俗至此，宜乎袁世凱民四準備做皇帝，他乃搶先的簽名勸進了。

民國以前，陳天華、姚宏烈兩烈士，便葬在岳麓山。發動上千的學生、工友爲陳、姚督葬的萬之讓，後爲岑春煊所殺，也卜葬於此。辛亥湖南首義的焦達濠、陳作新兩都督，爲亂兵所殺，都葬在這裡。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黃克強先生與，驅血卒於上海，年四十三；同年十一月七日，蔡松坡先生歸，積勞病歿於日本福岡大學醫院，年三十五；也同以此名山爲他們的國葬墳地。「青山有幸埋忠骨」，岳麓山殆與黃花崗同爲中華民國的革命聖地了。

二

我出生於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三，即光緒十九年癸巳九月初四。第二年乃爆發了有名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近七十多年來的一切動亂，便從這一幕開始。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吶。

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我們古代的詩人，生逢亂世，還能抱着一個長眠不醒的願望，好像至少還沒有人給他以干擾的樣子。

「尙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祇空枝，莫嗟身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作此詩的王安石，自然也想勉強的睡睡，但他對當時的政情看得很明白，知道前途的危險很多，可能還要遭遇外敵入侵的打擊，因而奮起革命，一旦失意，不免牢愁抑鬱，即睡也未見睡得安穩。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東坡一生，以文字買禍，既遭貶竄，還能睡得很美，也就罷了，何必更要作詩？結果被反對者所忌，乃把他貶得更遠一些，這豈不是自討沒趣？

我們生的時代不同，所受教育不同，世亂荒荒，五十年也不會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仍得掙扎着活下去，不要說「白日之夢」足以使我們精神粉廢，即睡中也不免惡夢重重。幸而少年時代，還胡亂涉獵過幾本道家書，所謂「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睡不能空，然心嚮往之」，因此，我居然活到了七十三歲。

當我出生伊始，中國的大家族制已在開始動搖，等到我稍稍有一點知識，便懶得去留意我的家世。我只知道我生長在一個歷代做八設文的家庭，十歲以前，父親攜帶我至與過家祠的祭祀，在家祠的門前，所懸舉人進士的匾額，可真不少。是我祖父辛農先生一個最小的孫子，我祖父便是長沙一個有名氣的舉人。他在外縣任過幾任教諭，在長沙教過多年的書。當時在省城有兩位以教經書、教八股著名的老師：「長沙左辛農，善化楊墨農」，我在童年時，還聽到這兩句流行的口語。我祖父對學問的造詣究竟如何，因為我不曾見過他片紙隻字的遺著，可以說全不知曉。他大致活了七十四五歲，其逝世的時期，在我出生前的一兩年。三年前，我在紐約何粹遠先生的客廳，見到何紹基寫給我祖父的一幅單條，所錄是東坡的一首詞。上款稱我祖父為「前輩」，下款自稱「侍晚」，這大致只是一種客氣，論年輩，他們是相差不遠的。

還在我呱呱墮地以前，祖母早已去世。民國十五年，我決定到法國一遊，可能短期內不得回來，因從上海把我妻送回長沙她的娘家安頓；知道祖母葬在隔我岳家住的東鄉沙坪只有十五六里，去上了一次墳；墓草荒煙，一塊刻着「左母郭孀人之墓」的石碑，還屹立完好。從我祖母的女兒大姑母的神態，參照我祖母本人的畫像，我在她的墓前留連了好一會，還能想像她的慈祥，可惜我不及得着她的愛撫。

我祖父母共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大伯父松年先生，由舉人大挑一等，在湖北以知縣候補，做過兩任實缺，

他留在湖北的時間，大致有七八年。二伯父子春先生，中年即開始墮落，染上嗜好，晚年窮愁潦倒以死。他有一個兒子，我見過，後來也不知所終。

三

關於我的父親子立先生，我不能不有較詳的敘述；自從他們三兄弟分居以後，我家中除幾箱舊書以外，別無長物。有一段時期，我父親在家中設館課徒。他也是一位不掛牌的中醫，平均每天有三五人來家看病，多數不收診金，但每逢端午，中秋，或陰曆過年的前夕，所受的藥子，月餅，鹹蛋，魚肉及其他點心等等，却為數不少。家事由我母親主持，乃至兒女婚嫁，我父親也不大理會。

因為我父親自己講究吃，因而他也成了一位烹調的好手。我家裡儘管一無恒產，有時候而且非常拮据，但每年總要藉着種種題目，例如我父母五十以後的生日，聚會親戚、本家、朋友、鄰居大吃大喝一頓。少則三五桌，多則十桌八桌。每桌八碟八碗，有時加上一大盆麵，冬天則加一火籠。在每次請客前的三四天，即開始籌備：開菜單、購材料、租用食具桌椅，都分別開出單子，忙個不了，但無不井井有條。到了請客的前一天，便在我父親的指揮之下，除我母親和兩個哥哥不多參與以外，我的三個姐姐兩個妹妹和我，加上燒飯的老馮，一個乳過我妹妹的馮奶媽，便全體動員。我在七八歲的時候，已能共同操作，至少剝荀子，削荸薺，拔韭黃，擠蝦仁，都能勝任愉快。後來學校的先生們，為我們講「論語」，講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一章，以及「鄉黨」篇記孔子吃東西那樣考究，回憶我童年的生活，乃感到非常的親切有味。客來的這一天，確實表現一種熱鬧的氣氛，我母親和我大伯一個幕居在我家裡的女兒三姐，算是招待的正副主任。客人入座後，知道滿桌的菜，都出自我父親之手，當他們吃得津津有味之餘，不免對他讚賞一番，他也好像顧而樂之，以此作為他幾天來忙忙碌碌的一種酬報。我二十歲以後所到過國內的地方，不算太少，覺得每一地方的菜，都各有特長，但在漢口，在上海，在南京，乃至近來在臺灣所吃到的

湖南菜，因適應環境，總多少有些變化，遠不及我父親所弄的那樣純粹，有真味。只有成都的小吃，差可與長沙相提並論。但冬天的寒團麵，外面黑而脆，裡面白而軟的油炸臭豆腐，松泉茶室的鮮肉火燒餅，飽香齋的雞湯煮饅頭加紫菜，玉環東的麻糍捲，再加上徐長興的烤鴨，李合盛三四十種不同做法的牛肉，却還是例外。其時長沙的風氣，凡坐轎子來的女客，照習慣要開發回程的轎錢，五十文，八十文，或一百至兩百文，按照路程的遠近，數目都有一定，絕少聽見轎伙們爭多論少。我想，請一次客，這筆開支也是頗可觀的。

我父親對於男女生計，相當浪漫，但我母親總是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即偶有小小暗潮，却從未擴大到不可收拾。我父親天然有一種歡喜做事的習慣，凡親友有婚喪大事，他必以全力幫忙；每年家祠或文昌閣舉行祀典，他總以主辦的姿態出現。凡這類事，在我進小學以前，他往往帶我同去見習。記得有一次，他在祀文昌的時候陳列蓮豆，他指示我：木的名「豆」，細麻織成的名「蓬」，祭品有流汁的入「豆」，乾的藥品之類則入「蓬」。殺牛，須先殺香案，將牛牽到案前，由主祭及贊禮生舉行一簡單的祭牛禮，主祭者向牛一揖，由牽牛者灌牛以白酒一大杯，牛則淚光盈然，若有靈感，好像知道牠的死期就在眼前了。次日，全部祀典結束，與祭者舉行宴會，各分得牛、羊、豬肉各若干，謂之「炸肉」。凡此，對我一個八九歲的小孩，所留下的印象都很深刻。

長沙雖不是一個交通要道，但外縣或外省的商人來往於長沙的却很多；尤其舉台或主考在省城考秀才和舉人的時候，更顯得一片繁榮，客棧也有人滿之患（其時長沙還沒有旅館的名稱）。我父親每年總有三兩次住在客棧，每次三五天或十天八天不等。他住客棧是爲了和朋友談天的方便，或者厭倦於家庭生活，要到這種地方去換換空氣或口味？我不明白。但他偶然帶我到客棧住上一兩晚的事確曾有過，我覺得變換變換生活方式，倒是蠻有趣的。有一次，我父親和同桌吃飯的朋友，談到果台衙門一位姓李的師爺，前幾天在瀾陽門外殺頭（當時長沙的刑場，在瀾陽門外，隔城門幾十步），據說是爲了「富有罪」一案。抬去殺的時候，坐一乘兩人的肩輿，但撤去了轎頂。他們有人看見，這位李師爺年約五十左右，好像在轎內已入昏迷狀態。當他們交換這段新聞的時候，語焉不詳，其時我只

八歲，更莫名其妙，後來我翻閱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與「自立軍」一事的史料，才知道這位李師憲名運航，應利縣人黃生，供選訓導，曾在臬台衙門裏辦刑名，即在湖北與唐才常、林圭同時被張之洞所殺李虎生（一作虎村）的卷。虎生家真漢口，即「自立軍」的總機關。他的父親留在長沙，在他的家裡搜出虎生與乃父的密信多件，知道這航也與「自立軍」有關，因被捕殺。馮自由所著「革命逸史」指李虎生為會黨，不知其人即長沙時務學堂的高材生李炳寰；指李運航為教員，更不知即李炳寰之父。我從我父親和他的朋友聽到這個不完全的故事，還聽我三姐講過與「自立軍」一案有關的舒蘭群（若生，當時長沙的一位詩人，成同名將劉培元的女婿，我同祖兄子尹三嫂的姑丈）吞金自殺的經過。這些都是我近三十年研究中圖近代史一個最早影子。

我父親也到外縣做過事，但每次不到半年或一年他便跑了回來，只有一次在岳州稍稍留得久一點，但也不到兩年。我從來沒有看見我父親以一筆錢交給我母親養家，一個十五六口的家庭（包括一個燒飯的傭工，一個張奶媽，有時還多請了一個女工）究竟如何活，好像只是我母親的專責。他絕對不聞不問。可是對於子女，他畢竟不失為一個慈父，尤其像我這個小兒子，如果沒有我母親和我三姐的領導，也許在我童年時期便被她寵壞了。

四

我母親姓吳，湖北蒲圻人。我外祖父在湖南做官多年，由知縣做到知府，大概和我的祖父是朋友，才結成連門親戚。我不及見我的祖父，也不及見我的外祖父。我三四歲時見過外婆，但也印象不深。我外家事，我母親從沒有向我作過具體說明，故不能詳述。惟有兩個舅父，都是我母親的弟弟，對我的關係頗密，一直到我二十以後，始先後去世。大舅名學詩，字麓生，讀書頗多，居恒鬱鬱，未得一展其懷抱。二舅名學龍，字煥卿，能詩文，工書畫，且精賞鑑，曾在長沙的商務印書館任事多年。我的二舅母是我童年時代所見的美人之一。我四五歲時，我母親帶我到她住的鄉下小住，她隨時把我撲在懷裡，問這樣，問那樣，還要把我帶去溫習的一盒方塊字紙給她看。紙鋪

的不少，一定要誇獎一番，給我洗臉，洗手，拿出剪子給我的小手剪指甲，然後給我點心吃。因為她待我這樣好，我對二舅和表姐，也更感親切。不幸我這位舅母三十以後便已去世，二舅孀母的母姓張，係曾任湖南勸業道張鴻年的妹妹，小姐氣稍重，其時我已住在學校，僅星期日回家一次，和她見面的機會便不多了。不過，因二舅很喜歡我，她待我也不錯。光緒三十年前，張之洞在湖北發行一種彩票，也推銷到了湖南，張鴻年中了頭獎四萬元，才由知府遞班為候補道，大家因此都叫他「彩票大人」。這也是清末湖南人在茶餘酒後所常談的一個故事。

以我母親在我們那樣一個落後讀書人家所處的地位，真好比古代的所謂「社稷之臣」。假如沒有她，這個王朝便必然歸於落莫，乃至不能存在。在我母親身邊，在湖南和江蘇前後凡三十年，我知道她有一個牢不可破的宗旨，便是：「不問如何困難，我的兒子一定要讀書。」我從來沒有見過我母親一次疾言遽色，也從沒有一次聽到我母親向人高聲說話，更不要說與人爭吵。此外，我母親一輩子不會進過廚房，也不會親自洗過一小方手帕，這不是說明她有什麼小姐架子，更不是說明她懶，剛剛相反，在她六十歲以前，除非作客與生病，我便不會看見我母親有過一天的休息。

張季直為吳縣沈壽寫過一部「繡譜」，看「張季子九錄」的人多不甚留意；我仔細看過兩遍，乃極感興趣，認此書在張氏著述中為必傳之作。其原因即由於我母親是一位湘繡專家，我對刺繡也稍稍懂得一點。可惜在六七十年前，我母親還不曾見過西洋的油畫與鉛筆畫，攝影術也只在中國初步流行，因而當時的湘繡仍以舊法為限。蘇繡與湘繡雖有不同，懂得鑑別的人，一見便可明白。可是所用的工具與材料如綉子、針、剪、絨線之類；所用的基本方法如運針、劈線之類；則蘇繡與湘繡大抵一致。但據沈壽所述，蘇繡在完成一段繡件以後，要使得線不起毛而又勻整密緻，須將殘線搓成的小團漬以口津，普遍輕塗於繡面，然後轉軸壓之使平，乃能發出光彩。湘繡對這一段過程也非常注意，但所用不是口津，乃取於皂莢子內的一層薄膜，以水泡發，裹於寸許的洋布或麻布，以針引線透過所裹之皂膜，則繡成之件自然發光，而手續也較為簡便。

我父親在同祖兄弟中排行十八，因而親友呼我母親爲「左八太太」，左八太太的刺繡，在親友中有名；凡他們的女孩子有願學繡的，大半送我家來向我母親學習。久之，因展轉介紹，來學的乃不以親友爲限。我家中除大嫂以外，我的姐姐妹妹和二嫂都能繡，加上我母親所收的學徒，尋常總有十五六人至二十以上同時工作，我的家庭乃儼然成了一個手工業的小工廠。

凡學徒初入學，須交學費膳宿費及雜費若干，數字視其家庭經濟情況而定，非一成不變；進步快的，第二年即可全免，但也很少學到三年以上的。

我的兩個三姐（大伯父的女兒我們叫「大三姐」，我同胞的三姐叫「細三姐」）擅長繡花卉和名家所寫的對聯或屏條。以文畫明、董其昌、鄭板橋、何紹基的字最常見。二嫂則花、鳥、走獸無不能繡，而我的五妹更是後起之秀。凡人像的衣服部份，大家都能繡，人像的面部和飛禽走獸中貓和兔子的眼睛，以及鷄腳和其他鳥類的腳，則須由我母親動手，以人面和兔兔的眼睛重在傳神，繡翎毛的腳須用短針、聚針，始能表現有力，固非我母親莫辦也。

因湘繡特別發達，長沙城內的絨線店也特別多，但遜於高等刺繡和配色齊全的，在當時也不過三五家。我們要繡的時候，便通知一家絨線店配齊各種顏色大包送來選擇，一花一葉所表現的顏色，深深淺淺可多到十幾種。刺繡所用的小剪，宜鋼火好而鋒利，她以一剪使線立斷者爲佳，以蘇杭北京所產的爲最有名，長沙產的也通用。洋毛針則大抵爲舶來品。繡件所用的綢、緞、紗、絹之類，均來自江浙，當地不產。以用線多，我童年所見長沙的雙鳳人家也不少。但桑樹稍高，葉不肥嫩，「詩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東坡舉「沃若」兩字，證詩人體物之精，湖南所產的桑葉，「沃若」是缺不到的，不知近年已改良否？前年香港會舉行刺繡展覽，蘇、湘、浙、粵出品頗多，似以湘繡進步爲快，其受油畫與攝影術精進的影響，顯然可見。一幅繡品的定價，有高到港幣一萬四五千元的，萬元以下遞減到四五百元的，更不可勝數，購者仍甚踴躍。中國刺繡已列入世界美術品之林，殆無疑義。

我家所出的繡件，有以成品直接出售者，而以代繡館包繡但取工值者爲多。光緒二十年至三十年之交，長沙的

生活費甚低；糧米不過三四千錢，肉一斤只一百錢左右，銅錢四文，可購包子兩個或油條兩根，可供早餐一頓。總之，我一家近二十口，生活得以維持，費用的十之六七，大抵仰賴我母親以雙手領導家人工作所得。父親的收入，則僅足供他個人之需。

五

我母親誠然很忙，但她却能以從容出之，針線一停，她便靜坐下來看小說。我在三歲左右，已開始認方塊字，裁紙寫字，都由我母親一手處理。我認過的字，分別放在大小兩個紙盒，熟字日積日多，歸入大盒；生字尚待反覆溫習的，則歸入小盒。大致第一年所認的，她在一千字左右，都是一個或兩個字有實物或景象可指的名詞，我對記憶沒有困難，因而進度頗快。有時我母親有雜件要做趕工，她便把這份教我認字的工作派我大三姐代課。大三姐是我葉家二姑母的媳婦，親上加親，十八九歲便已過門。結婚四五年，無出，而我們這位表哥早抽上了鴉片，以致蕩產傾家，一直墮落到不可救藥而沉淪以死，於是她才回到我們這邊長住。她的年齡比我大哥大一兩歲，不僅我父母待她與親生的兒女毫無區別，而且是我兄弟姊妹一個最所敬愛的姐姐，同時也是我母親一個最有力的幫手。原來我母親能識字看書還是由於自學，我這位姐姐當我大伯父在湖北服官的時候，便和我的堂兄子尹三哥，一同過了五六年的正式書房生活，全部「左傳」她大體能背，一部「紅樓夢」更讀得爛熟，對「紅學」的研究且遠出我母親和我二哥之上（我大哥是不大看這類書的），此外她還看了不少的書。因為她有這樣深厚的修養，她教我認字的方法，乃和我母親的截然不同。第一步，她教我已經認得的字分別歸類：一、書房用品有關的字如「紙」「筆」「墨」「硯」等歸入一類，連缺少什麼，便另寫補入。二、廚房常見的東西，如「煤」、「米」、「油」、「糖」等字另歸一類，「鹽」字、「醬」字、「醋」字筆劃較多，我的字盒裡還沒有，她也照補。自然景象的字如「風」「雲」「雷」「雨」之類，我自然了解，可是像「海」字、「湖」字，我小腦子裡却没有這種觀念，她便為我解釋：「一條河或

幾條河，流到一處而水面很寬的地方，就是「湖」，好比我六七歲到湖北去，後來十四五歲由湖北回湖南，船都要經過洞庭湖，這便是一個最大最有名的湖了。「海」我也沒有見過，那是四面八方的水所會合的地方，風浪特別大。像我們河裡這種小木船都不能走，您將來自然會看到的。」經她這樣一解釋，我雖然還不能完全想像，但一個初步的觀念却已有了。三、屬於房屋、廟宇、衙門這一類的字，我已積有不少，但「磚」字，「簾」字，「殿」字以及桅竿的「桅」，欄杆的「欄」等等，都是三姐最早替我加上去的。母親偶然檢查我的生字，知道我的進步比單獨由她教的時候更快，她便索性把這件事的全權交給了三姐，於是我就成了我三姐唯一的學生，同時也就是她唯一的徒弟。

在我四歲五歲的時候，記字日課仍在加速進行，方法也在不斷變化：一、三姐教過我正反面字對舉。如「黑白」、「長短」、「老少」、「快慢」、「美醜」、「強弱」、「緩急」、「輕重」之類。二、她說：在一個單字上面或下面加一個字或兩個字，意義便不同。如「風」字上面可以加東、南、西、北、春、秋等字，也可以加「東南」、「西北」等字；如大字，微字，狂字，飄字，吹字可以加在風字上面，也可以加在下面；但停字，息字，轉字便只能加在下面，不好搬到上面。三、她又說：兩個單字中間加「字」，可以表示一個完全的意思。好比狗、雞兩字，貓、鼠兩字，都不表示完全意思，但在狗雞兩字中間加個「咬」字，變成「狗咬雞」，貓鼠兩字中間加個「捕」字，變成「貓捕鼠」，意義便完全出來了。四、她還教我：說話要使人一聽就懂，不可把字用錯。筆要說「一支筆」，書只能說「一本书」，紙說「一張紙」，硯台說「一個硯台」，如果說「一支書」，「一本筆」，「一張硯台」，「一個紙」，別人就完全不懂了。像這類的例子，在兩三個月之間，她舉過多多少少，不僅使我認得的字逐漸加多，字的意義和運用也漸漸明白。她在這個時候，並不曉得什麼名詞、代名詞、形容詞、動詞這類名稱，但自然暗合，真使我得益不少，而且覺得很有趣味。

她又不單舉例子，也隨時給我考試。一次，她要我舉相反的字：她說大，我說小；她說先，我說後；她說軟，我說硬；她說苦，我說甜；……都答得很快，她很滿意。另一次，她問我：筆，我說「一支筆」，書，我說「一本

書」，這個桌子，椅子，我們怎麼說呢？我說：「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把椅子」。她再問：我們可不可以說「一把桌子」呢？我說：不可以。她說：對。又指着旁邊的書櫃書箱對我說：譬如這個書櫃，我可以說「一張書櫃」；這個書箱，我們就不能說「一張書箱」，只能說「一口書箱」。我說：爲什麼呢？她說這是大家說話的習慣，別人這樣說，您不這樣說，別人就要笑您。這個時候，我大概快到六歲了。我不但會認字，許多字我也懂得是什麼意思，而且我會寫的字已經不少。有一天，她在另一張紙上分開寫兩個天字，兩個土字，兩個雨字，要我在每個字上面或下面各加一個字；而且對我說，要寫您自己想出來的，我講過的不要寫。她走開了好一會，回頭看見我加在天字上面寫了晴、雨、冷……幾個字；下面寫了光、亮、明、陰……幾個字；土字上我想了好久，一個字也沒有想出，只在下面寫了地、牛、肥、偶幾個字；雨字上還只寫了落、風三個字，雨字下只想出大、小、點、花幾個字。她望着我笑了一笑，拿起筆在晴、雨、冷三字上各打一個圈；光、亮、明、陰三字也各打一圈；明字上却打了兩個圈；地字沒有圈，大、小兩字也沒有圈，牛字上打了三個圈，偶字最多，一串五個圈，點字兩個圈，花字四個圈。她問我：牛怎麼可以說「土牛」呢？我說：六妹有一隻牛，牛背上爬着一個小孩吹笛子，泥巴做的，不是「土牛」嗎？她又問：「雨花」兩個字很好，您那裡舉來的？我說：媽有一本書叫「天雨花」嘛！她還對我講過左羅明哩！她又說：偶字太好，您怎樣想來的？我說：張奶媽帶我着過木頭人戲，您不是說這叫「木偶戲」，還把這三個字寫給我認過嗎？六妹有個洋娃娃，也是泥做的，我想，這也可以叫「土偶」吧？我說到這裡，她高興極了，叫我站起，把我坐的椅子向她身邊一拖，「靠我坐下」，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兩行字：「牧童騎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在我臉上捏一下，咬着我的耳朵低低的對我說：「明天我就教您讀詩」！她拿了這張紙把我母親看，並加以說明，母親把我扯到懷裡揉了一會，在她放點心的磁缸子裡拿出一塊炒米糕給我吃。這是我最快樂的一天，現在想來，已經是六十六年前的事了！

第二天，她並沒有教我讀詩，只在紙上寫了十六個字，斷了句，叫我唸：

「霧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我把「降」字唸錯了，她說：這個字不能讀成投降的降，應該唸作降落的降。又問我懂不懂？我說：懂。要我解釋，大致解得不錯，然後她再對我說：「我明天一定教您讀詩」。從此以後，她每天誦一首，如「林前明月光」，「春眠不覺曉」，「美人捲珠簾」，「綠地新澗酒」，「打起黃鸝兒」這類的詩，在我父親和兩個哥哥教我讀「四書」「詩經」以前，我已經熟讀四五十首了。

在我剛進入七歲時，除我母親和三姐繼續教我認字造句和讀詩以外，我便正式加入了我父親所設的私塾讀書。第一個半年，我只讀了「三字經」和「千字文」，到下半年便讀「四書」了。三姐教我認字必講明字義，教詩也必講明每一首詩的大意，而且必選擇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所能接受得了的。我父親教我讀經却絕對不講，只要我熟讀和背誦。我讀「四書」的次序是先「大學」，次「論語」「孟子」，最後「中庸」。不僅要背白文，同時也背朱註（後來我知道這是考秀才不可少的）。我父親的學生，大的十七八歲，其餘的十歲左右，我最小。現在想來，幸而我父親還只教我讀，要我背，假如他要認真講解的話，我不能想像「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乃至「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如何講得好，而我這個剛到七歲的孩子，又如何懂得了。

我父親本來是把我這個小兒子逼瘋了。他大概知道，如果整天把我關在學堂裡死背死讀，我一定吃不消，因而他每天只要我午前留在他身邊兩三小時，其餘大部分時間，便聽我自由活動。

綜計從七歲到十歲，差不多四年的時間，我讀過背過的經書，只有一部「四書」，一部「詩經」，「左傳」五分之二。一到光緒三十年春天，我剛到十一歲的時候，我便進了長沙縣第十八初等小學，開始我的正式學校生活了。

從三四歲發蒙到十一歲進初小，我在家庭受過認字和讀書的教育在七年以上。這一期我一共有五個教師——我母親和三姐，我的父親和兩個哥哥（他們常為我父親代課）。給我益處最多的是我的姐姐，其次是我母親，一直到

現在，我依然保持了女子最遲於作兒童教師的這個信念；不過我現在不主張兒童及青年太偏重書本上的知識就是了。

六

從家庭走進學校，耳目一新，我很歡喜。

其時我家住在南門外沿湘街，進城只須一刻鐘，學校在城內，靠近城牆，入城五分鐘即到。從此我每天來回家庭與學校之間四趟（因中午須回家吃飯）；歷時四年，從來不曾缺課。校址為真西山先生（德秀）祠堂，未經改建，不大。進門經天井為一大廳，可容學生五十人休息、體操。天井右手為廚房，廳兩側即三位教員的書房兼臥室。廳對面為講堂，祀有西山先生神位。神龕猶在，遮以竹簾。神龕上有一塊「立三不朽」四個大字的橫匾，假如即以此作為我們這五十個小學生的「校訓」，未免期望過奢了吧！講堂地勢稍高，堂與廳之間有兩個小天井，各有花數盆，按季節更換。兩天井中隔以甬道，長可丈餘，寬七八尺，為進入講堂的道路。堂內設學生坐位五十個，加教員的講台，陳地尚多。講堂正面有橫門十餘扇，上課時橫門大開，空氣光線充足，偶聞花香，頗益人神智。

學校共有功課八門，以讀經、國文、算術為主課。郭先生麗仙，年約四十，創長，兩鬚稍高，目炯炯有神，講「四書」，教國文，算術，兼改作文，學生得益最多。他有一個弟弟在長郡中學讀書，他每次在自己房裡為他弟弟講「左傳」，許我傾聽。羅先生年近六十，已呈衰態，教修身兼講「孝經」，我不大歡迎，連他的名字也忘了。徐先生定夫，年最輕，不到三十，白皙，教國畫、習字、音樂、體操，能寫一筆娟秀的行書，頗嚴厲，同學都有些怕他。這四年中，始終是這三位先生。我畢業考試第五，成績僅國文、算術較佳，其他平平而已。

我在八九歲未進學校以前，已聽我母親和姐姐講過小說故事不少，早已歡喜看戲，進學校後，因為功課容易對付，凡星期日和寒暑假，我仍看戲看小說不斷，有時我還模仿着唱幾句。四五年中，我搜集的劇本、小調、以及各色各樣的小說，乃至「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這類較高深的戲曲，大致不會少於三百種。把我祖父一

口塵封已久的楠木書箱打開，將原藏經他手抄的名家八股文，全部取出，代以我的這類雜書。這是我藏書習慣的開始，也是我自動讀書的初步。現在想來，合計在私塾四年，初小四年，所給我的影響並不太大；反而是這一堆並非高文典冊的東西，却至今還在我的腦子裡留着清晰的殘影。

光緒三十四年春到宣統三年冬，我在長邑高等小學受了第二個四的學校教育，也是我所受最基本的教育。校址在城北「古荷花池」，校舍由「勸善寺」改建，規模與初小迥然不同。中學一班，高小兩班，共有學生一百五十人左右。小學同學年齡，有靠近二十者，有十一二歲者，其時我剛滿十四歲，進入十五。中小學全體住宿，從此我十四年的純粹家庭生活，便告一段落。

全校計有課室四大間，中學佔兩間，一間上課，一間供理科實驗。其餘兩間，兩班小學，各佔其一。中學與小學隔開，兩方同學，頗少接近。小學自修室面對面四大間，甲乙班各佔一面的兩間，中間隔以一長形天井，有梧桐七八株。夜間室內燃火油斗笠燈六盞，每四人合用一盞。監學、齋務及經學、國文教員的住房接近自修室，管理相當嚴格；向教員質疑，也很方便。

我所進的初小不收費，且供給課本、文具，每年發制服一套。此校則每期收膳宿及制服費二十元，書籍用品自理。校長余子昭先生（肇升）很少見面。國文教員唐先生（濟渠），是我生平所從得益最多的先生之一。同學背後叫他「唐胖子」，這不是表示對他不敬，只是對他親熱。他寫一筆何紹基的字，改國文，打批字，用松烟墨，好看了，給我們以無形鼓勵。八個學期，我們選讀了古文三百篇左右，以選自「史記」者佔十分之二，八家以韓柳文居多，柳文中山水記幾全讀。畢業時，我能背誦長短短的古文六十二篇。背古文並非強迫，全係自動。作文每星期一次，史論題太多，記敘文太少，是一缺點。本班中有七八人的國文基礎，都是這四年中奠定的。

我從第三學年起，才開始看日報，其時學校有報紙兩份：一份上海的「時報」，一份當地的某報，湖南是參與近代維新、革命兩派政治活動最早的省分之一，到宣統元二年，湖南人辦報已有了十年以上的經驗（我假定長沙有

日報以光緒二十三年的「湘報」爲最早），以湖南地方報與外省比較，絕無遜色。我看報的習慣一經養成，從第三學年的暑假，到省立圖書館看報（地點在東城定王台），乃成了我每天的常課。

我在校內自動看書，也從第三年開始。袁了凡王鳳洲的「綱鑑合編」，便是我所看書歷史書的第一部。梁任公因爲有戊戌前在長沙講學的一段因緣，他初期的著作，也以湖南翻印得最爲完備。凡「清議報」、「新民叢報」，單行本如「飲冰室文集」、「詩話」、「自由書」、「變法通議」、「中國之武士道」等等，我都一一搜集看過。宣統二年出版的「國風報」，却不是翻印本而是原版，記得某一個晚上，我和同學易克禮（萬之）在自修室看「國風報」，其他同學都已就寢，我們依然欲罷不能；正看到任公（筆名滄江）一萬長文，內容是他和明水（即湯覺頓）辯論一個中國究竟會亡不會亡的問題。明水提出一段中國非亡不可的理由，滄江便發揮他一段「中國不亡論」，一任一復，至十餘次，明水的理由愈強，滄江的答辯也愈有力，把我們兩個青年簡直弄得熱淚長流。剛剛在這個時候，蕭燕姚先生的一副老光眼鏡和兩撇小鬍子，便在我們的窗前出現：

「又在看小說？十二點打過了，還不去睡？」

我們的神經相當緊張，沒有答覆，只把雜誌封面上三個大字「國風報」給他看了一眼。姚先生是一個不讀書的老年人，知道我們是平日最守規矩的學生，沒有再說什麼，便拖着他遲重的步子在窗外燈光所不及的黑暗中消逝了。光宣之交，是中國君主立憲與革命兩派運動到達高潮的時候，但在我們這班的同學，還只有三五人知道康有爲、梁啟超、譚嗣同的簡單經歷，歷史教員曹秩庸先生，也只把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和唐才常執副同一首沈痛的戰聯寫在黑板上給我們解釋過，至於孫文、黃興是怎樣一種人，乃至黃先生所領導的「華興會」曾在長沙發動過一次革命，我們還不會知道，可是一經進入第四學年，我們這班的空氣便大起變化了。

原來在第三學年快要結束的時候，校長余先生已去職，新校長換了一位姓黃的舉人，他不會和我們談過話，也不會和我們正式見過一次面，因此，我便連他的名字也不記得。同時，教經學的鄭先生，也因事離校，代他的是一

位曹惠先生。曹先生字孟其，初來時，年二十九，但已疏疏落落蓄有幾根鬍子，瘦削，中等身材，後來我知道，他是秀才，長沙一位名士，能寫生動簡峭的古文，偶然也作駢文，字也怪模怪樣。他是葉德輝的弟子，間時又嘗把他作的古文向王先謙請教。可是我默察他的言論和行動，思想却很新，過去曾在廣益中學任教，廣益便是一個革命空氣濃厚的學校。他在學校佔了一間最大的住房，把他的三四十口書箱都搬了來，線裝書很多，洋裝書也不少，我暗暗吃驚，已存了一個要和他接近的打算。

第一次上課堂，他便問我們：「你們已讀過『四書』、『孝經』、『詩經』、『書經』、『易經』、『儀禮』，能懂嗎？」有幾個同學答應：「懂。」他低着頭，兩隻銳利的眼鏡上面望出，向我們掃了一下，表示懷疑的樣子。於是他便把經如何難讀和應該怎樣讀的道理，足足爲我們講了兩點鐘。在他演講中，曾提到當時的經師皮錫瑞、章炳麟、王闈運，王先謙諸人的名字，同學們張開眼睛望着他，表示似懂非懂的樣子。第三次，他把「易經」帶來了，問我們鄭先生已經講到什麼地方。我告訴他「現在應從『漸卦』講起。」於是他把漸卦這一段翻出，將全文唸了一遍，嘴裡連連的說：「你們不懂，你們不懂。」又繼續翻下去好幾十葉，一直翻到「繫辭上傳」的第九章，他又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他憤慨的說：「胡塗思想，胡塗思想！」便把書對桌上一丟，很鄭重的告訴我們：「看相，算八字，占課，我也研究過，毫無道理，完全是騙人混飯吃的把戲。你們以後不要再讀『易經』，從今天起，每天寫日記，看見報上有重要的事，不論是發生在北京，外省，本地，你們可就每件事摘要記下三兩句。你們總講書有高興或懷疑的，也可寫下幾句感想，不要怕，儘管直說。你們到街上走路，看見什麼事有動於中，也可寫下你們所要寫的。看過一本課外的書，你們認爲有什麼好處，也可記下。再過兩星期，我準備帶你們出去旅行，城外十五里以內的地方，我都打算帶你們看看，還可參觀幾個學校，如明德、修業、楚伯等等，凡你們所看見的都可以記，但要紀實，不許說空話；也可批評，但要大膽說，不許模

幾兩可。每天寫三五十個字或一百兩百字都可以，不要貪多，貪多便不能有恆。不要寫在本子上，就用作文的紙寫，上了一千字，便交給我看，各人分別交，不要一次交。積有兩三萬字，便可釘成一本，自己比較前後所寫的，看看有沒有進步。」這便是我學着寫日記的開始，每天寫一兩百字，積一學期，居然釘了厚厚的一冊。有的曹先生用紅筆給我勾出，這是表示他認為不好的；有的却又圈點點點，似乎表示很高興；他確實是花過不少時間的。

有一次，曹先生在黑板上寫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問我們：「你們看，孔子站在一條流着不停的小河邊上在想什麼？」一位平日不大用功而頗聰明的同學易克慎，起立回答：「孔子說過：『知者樂水』，孔子對於水是很歡喜的。有一回，孔子和幾個學生在一塊兒談天，問他們各人的志願。有一位比較年長的學生對他說：『我願意在春二三月，穿着剛做好的新衣服，帶着一羣青年人和小孩子，到外面走走，大家跳到沂水裡洗澡，跑到高地上兜風，然後一同唱着歌，踏着緩緩步子走回去。』大概孔子想着這種生活很舒服吧！」

曹先生笑笑：「你的意思很不錯，但孔子說這兩句話，也許還有別的意思。」於是他又寫着：

「大字長宙，方挾萬象而趨，若驟若馳，而所遇無故物。」

「斯賓塞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整個宇宙是活的，一分一秒，都在變，都在新陳代謝，人不也應該像宇宙這樣活潑潑地活着而日新又新嗎？你們再想想，孔子的話是不是與斯賓塞說的可以相通呢？」

另一次，我和其他兩個同學找曹先生談話，順便向他借書。曹先生的書是肯借給我借看的，但叫我們自己把書名寫在他的簿子上，記明借出日期，簽名，還的時候，再記明係那一天歸還。我看見他桌上有一部新出版的「章誦合鈔」，我問：「章炳麟、譚嗣同兩人的學問，那個比較好？」「哦，譚的學問如何趕得上章。」我又問：「康有為和梁啟超又怎樣呢？」「曹學梁不如康，新學康不如梁。」曹先生回答後反問我：「你覺得革命好，君主立憲好

？」其時我腦子裡充滿了梁啟超的說法，答：「立憲好。」「你錯了，革命好，革命好！」

有一天，曹先生剛從外面回到學校，我和同學王廷蘭，又追到他房裡問長問短。他脫下長衫，把袋子裡一把零錢都攤在桌上，有銀元，有銅板，還有小錢。我問：「錢怎麼雜是國的？鑄錢的材料為什麼不是銀就是銅？」「哦，這是貨幣學上的問題，你們還不懂。」我第一次聽到「貨幣學」三個字，希望他說下去，但他不說，還做出一個神秘的樣子，使我頗感失望。第二天星期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跑到南陽街華益圖書公司買了一本陳家瑛譯的「貨幣學」，還買了一本康有為的「金主幣教國論」，花了三天的課餘時間，一氣把這兩本書看完，而且在日記上寫了五六百字。曹先生看了這段日記，心裡大概很明白：這個跳皮的學生相當麻煩，以後他和我談話的時間便花得更多了。我記得：在這一年武昌起義前的幾個月，他陸陸續續把中國革命活動的情況，革命領導人物的歷史，對我說得很多，尤其是有關黃興、陳天華、劉揆一、道一兩兄弟、馬福益、禹之謨、姚宏烈、沈蕙……諸人的許多事實，他更加數家珍，說了又說。本年三月，有廣州黃花崗一役的失敗，六月，楊篤生又蹈海死於利物浦，他更不勝悲憤。他對我說：「楊篤生名毓麟，後改名守仁，長沙人，戊戌以前，他已是舉人，以會任時務學堂教習，維新失敗，幾及於難。光緒二十八年，赴日留學，著『新湖南』，主張湖南獨立，更手製炸彈，回國參加直接行動。見革命運道頓挫，乃轉學英國。初聞廣州失敗，友好死者甚多，以為他的摯友黃興也不免，深受刺激，神經失常，以致無法支持，因蹈海而死，年齡剛到四十，真是太可惜了。」因為曹先生是這樣不斷的對我說，從這一年暑假開始，我才定王台圖書館，把近年所出有關革命的書籍，全部涉獵了一遍（全部也不過三四十種，而且小冊子居多），與曹先生對我所說的相印證，這便是在武昌起義以前對中國革命運動一點僅有的認識。定王台圖書館，本來是省立的，可是對於革命書報，並未加以取締，這不能說明當時的文網甚疏，只能說明滿清地方官吏的麻木。

第四年上學期開學不久，我們湖南所推出的實政議員羅傑（時鑿）先生（當時長沙青年所崇拜的人物之一，憲政運動的有力分子，後來曾在上海任過軍治政學校校長。）在北京把辮子剪了，而且做了一首告別辮子的詩，我

們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有三個年紀最輕的同學——柳大純、曹應生、舒之璋，也就把他們的三條小辮子剪去，於是學校當局，大為緊張，校長黃先生已懸牌將三個同學開除學籍，他們三位也已收拾行李回家。舒住在城裡，柳、曹住在東鄉的崩梨市（去城三十里，黃克強先生的家鄉）。於是我們發動如何挽救。我事前預備了一把頗鋒利的大剪子，在晚上大家進寢室以後，便將寢室的總門關閉，把四十幾個同學集中在一間房裡開會，我事前未說明任何理由，首先把自己的辮子剪下。然後對大家說：「我們今年就要畢業，校長如果把我们全體開除，他很難交代，我們只有全班同學同時把辮子剪去，才可能把三個同學的學籍保全。」說完，便將剪子交給幾個事前約好同剪的同學，也繼續剪了，有三五個同學的態度，相當遲疑，看見大家都剪，也只好忍痛照辦，於是四十幾條辮子，乃無一例外的全部剪了。然後將寢室總門打開，立即報告齊務姚先生，請他轉告校長，慎重考慮，如果他堅持非將三同學開除不可，我們準備採取第二步辦法。校長嚇慌了，第二天下午，把長沙勸學所所長左學謙（字益齋，湖南獨立初期，任過短時期的民政長，後來遷任過長沙總商會會長，是當時的有名紳士之一）請來，向我們演說。我在學校的名字叫學訓，益齋是我遠房的堂兄。他這一天穿着長袍馬褂，一走進講堂，便對我們四十幾個沒有辮子的學生望了一望，態度雍容，然後說：「羅時整先生，是我最敬重的朋友，辮子不是可剪不可剪的問題，只是遲剪早剪的問題。我自己便也對這條辮子非常討厭，可是目前的時局非常不安，沒有辮子，很容易被官方誤會為革命黨，頗妨礙我們的工作。聽說你們這班的成績很好，希望你們好好用功，不要看見報上什麼消息，隨便亂動，尤其不要沒有辮子在街上亂跑。三位已開除的同學，可以叫他們回校，繼續上課，等到你們畢業的時候，我再來和你們見面。」說完他便退出，我們知道這次風潮，總算和平解決。第三天，我們推了幾個同學，將柳、曹、舒三位同學找回。一直到九月初一，湖南響應湖北獨立，我們全體教員學生都把辮子剪了，但黃校長依然把辮子盤在頭頂，戴上一頂高高的帽子，我們實在不勝憤慨，再推舉幾個同學，硬逼他剪掉，這才是我們最後的勝利。我生平最不會搞軍家運動，對軍家也不信任，尤其不歡喜那般自命不凡，認為自己可以領導別人的人們，但這一回我總算小小的試驗了一次。

統計這四年中，所有教育過我們的先生們，包括前校長俞先生，我們都從他們得了不少益處，但啓發我最多的，仍推曹孟其先生第一，因此我在畢業後三十年，依然和他保持了不斷的聯繫。有幾件與他有關的事，我必須在這裡附帶一提，以盡免下面行文的支蔓。

辛亥湖南獨立後十天，譚延闓繼熊，陳做了湖南都督（這件事內容複雜，我準備在下篇詳述），曹先生任了譚的機要秘書，參與省政。民國三年，章行嚴辦了一本反袁的雜誌叫「甲寅」，曹先生曾在上面發表過許多筆記。迨清末民初故事，文字清新簡練，大受讀者歡迎。後來行嚴在重慶告我：「孟其絕頂聰明。」

曹先生在學校會對我說，他有三大決心：一、絕嗣，即不要兒女；二、不喜私財；三、下半年擬在長沙辦一孤兒院。民國二十七年，「國民參政會」在漢口開幕，我任駐會委員，曾抽暇回長沙一次，其時他的孤兒院已創建多年。我去看他，他高興極了，向在座的客人介紹：「這是我在清朝最後一年的學生，其時先生二十九，學生十八；現在他已四十五，我五十六了。」又對我說：「今天你來得很好，我燒了牛肉，你在這裡吃中飯，我們多談談，我有許多事要問你。」又把師母叫出來和我見面，已是五十以上的人，果然沒有兒女。他們在院內右邊佔了四間房子：一間客廳，一間辦公室兼書房，一間臥室，一間廚房。簡單樸素，可是清潔整齊。燒飯和料理家務，由師母包辦，有時實在忙不過來，也找兩個孤兒來相幫。於是我們邊吃邊談，對抗戰前途，我說了許多樂觀的預測。飯後他帶我參觀全院，計有孤兒一百二十人，全體住院，半天上課，以書算為主，筆算外還有珠算，學生能寫簡單信件的不不少。半天工作，有木工、金工、藤工、和簡單的化工，還準備製造有教育意義的兒童玩具。教員兩人，技師四人。藤椅、藤牀、藤茶檯、藤沙發，嬰兒用的藤搖籃，出品頗多。我看見粉條、黑板刷、拖把、雞毛帚、牙粉、牙刷、殺蟲粉、蚊烟香、肥皂、洗衣刷、洗衣板等等的成品不少。工作室能容五六十人同時工作，工具櫃有五六部，其他工作器具也應有盡有。儲藏室一大間，所藏的原料甚為豐富，一切都表現欣欣向榮的樣子。曹先生告我：「本院的產品，暢銷省城和四鄉，附近的外縣也批購不少，學生的伙食、衣服、零用滿可維持，還可供給教員和技師部

分的薪水。開辦費用了一萬六七千元，現在已經是十萬元的規模了。三年前，每月須贈千元以上，現在每年贈四千元便够了，我認識的朋友都幫了不少的忙。」他又說：「這輩孤兒真把我看成他們的老子，而且多數進步很快，現在四個技師中的一個，便是由一個領班擔任的，到外面任技師和自開小工廠的也有七八個。」抗戰中張治中火燒長沙，該院倖未波及，仍得繼續維持。勝利後我在農林部服務，曹先生曾寄我他的自傳一冊，名「孟父春秋」，約十五六萬字，全用明淨純粹的白話。我以兩夜看完，認定他是近百餘年來湖南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中共佔領大陸，他仍死守那所孤兒院未走，中共似乎也沒有清查這輩孤兒的階級成分，不久他即去世，年已七十。

湖南獨立後不久，我們便匆匆畢業，一位楊幹邦同學，平均分數比我高，考了第一。後來這位楊同學在長郡中學，及高等實業學校先後畢業，曾任水口山礦師，是湖南實業界一似有地位的人物。抗戰中我回長沙，曾和他見過面。

我十八歲高小畢業，仍以算術國文成績較佳，對理化博物也極感興趣。畢業後，如果我家經濟情況許可，我大可和楊同學走同一的路子，搞科學。但高小第三年開學，還是由我母親在春寒側側的季節，將我大哥從南京寄給她的一件狐皮襖子脫下，當了三十餘元，交足學費，才繼續讀下去。假如我依然要一步一步由中學而大學一直讀上去，已勢不可能，於是我只好進入一個不要錢且供伙食的長沙縣立師範，由此而我五十多年以來生活變得相當複雜，而且有機會見過許多的賢豪長德。接觸了不少的牛鬼蛇神，參與過千波諸要隘的事實，也身受了無數酸甜苦辣的遭遇以迄今日，因而我這篇自傳，才有許多材料可寫。其重點不在敘述我自己的生平，而在從我的觀點，描繪這一時代的一個輪廓。

長沙縣立師範在湖南獨立後由徐特立（懋恂）創辦。徐以清末新指請開國會出名，當時我們的師範代表羅傑，曾做了一首七律送他，有一聯警句：

「指瑕送別杜兩八，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才氣逼人求李雙。」

頗傳誦一時。徐平日無論做事，教書，說話，走路，都可以從他的臉上看出他具有十足的決心。就做事說，或涉嫌「包攬」，有時不免無以善後；以教書說，他自己造詣不深，難免熱炒熱賣，然頗好學；說話斬釘截鐵，自信頗強。但時或不免武斷。可是話雖如此，以我所見當時長沙的新人物，他畢竟是關足馬力的一個火車頭，因此能博得許多青年對他崇拜，所以我走進他創辦的這間學校，大部分原因雖由於交不起學費，小部分原因還是由於對他的印象不壞。入校以後，因為功課無法使我滿意（徐自己講「國文典」，便很膚淺），只住一學期便已退出。但在這短期內，我認識了一位後來和我做過三十年朋友的田壽昌。

田壽昌就是田漢，他在中國做了五十年的戲劇運動，可以說是對他所志所學一個始終不會懈怠的人物。我最初同他混得很熟，並不是由於一學期在長沙師範同學，而是由於我們兩人同為定王台圖書館經常的讀者。這個圖書館雖是舊式的，規模不算大，但也藏有舊書近十萬冊，凡清末所譯所編的新書，也有數千冊之多，日報、雜誌更為數不少。可惜地點稍偏，看報的每天還有一二十人，看書的却經常不超過五六人，有時遇着下雨的天氣，三大間的閱書室，便往往由我和壽昌兩人獨佔。閱書室的玻璃窗子很大，窗外有芭蕉十幾棵，晴天綠蔭滿室，雨天則雨打芭蕉，清脆可聽，真是一個理想的讀書所在。其時壽昌年十六，我十九，他讀書已經以文學為主，我還在一個亂看亂翻的時代。關於文學部門的新書，我只在這裡看過幾部初期的林譯小說（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於宣統元年）。其時「長沙日報」的總編輯為傅熊湘（字君劍，一字鈞根，南社有名的社員之一，光緒三十二年他在上海編「競業旬報」，胡適之便在上面發表文字甚多），我在該報寫過幾篇論文，壽昌却在第四版寫他的改良湘劇，記得他寫的「新三娘教子」，便給我的印象甚好，這是我與壽昌以文字相見之始，也是我投稿生涯的發軔新試。後來他到日本留學，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到中華書局任編輯。在上海搞「南國社」，出「南國特刊」，乃至他私人的結婚與戀愛生活，一直到他民國二十一年加入共產黨以前，我和他關係都很密切。可以說看見他長大，看見他苦劇，

看見他成名，看見他加入共產黨，到今天他已經是七十高齡，連要看見他爲一個「謝瑤環」劇本，被一羣小孩子清算，真令我感慨不置。

我退出長沙師範後，民元秋季如某即改入一新成立的「外國語專門學校」。該校爲幾個留日及上海南洋公學學生所創辦，並有在長沙教英文有多受經驗的兩人加入，美教會所辦的「雅禮學校」教員，則居於贊助地位。先招募修英文的一班，計有七十餘人，經甄別後，分英文程度較優者爲甲組，可選修法文或日文爲副課；英文程度較差者爲乙組，副課選修與否，聽學生自決。我入乙組，選修日文。此時我大哥在江蘇做事已三年，學費書籍費，每月五十元，全部由他供給。

暑假中，學校在陰曆元宵節舉行師生聯歡，有各種餘興，出有燈謎幾十個，一一寫於紗燈上面，猜中者有獎。其一，謎面「八代子孫」，打「老子」一句；其一，謎面「周公」，打「西廂」一句；久久無人猜着。「老子」我讀過，但僅有第一章能背，我從「道可道」背到「微妙之門」，乃問出謎者這一條的謎底是不是「玄之又玄」？日文教員黃先生益感詫異，不料他們的學生中竟有讀過「老子」者。「西廂」一條，我在某筆記中曾見過類似的一則，謎面原爲「周公名」(且)，出謎者故弄狡獪，將「名」字略去，僅用「周公」，我問黃先生這一條是不是「寺警」一折中的「袒下了偏衫」那一句？黃先生更大詫不止，很客氣的將兩包獎品送給了我。我乃老實告訴他們：「老子」我並不能全背，剛好讀熟了第一章，不算什麼；「西廂」這一條，係從某筆記看來，更不足道；但他們仍嘖嘖稱讚，並未說明出謎者原係就舊有者改造。我生平得過若干次「不虞之譽」，這算是「敬題兒第一遭」了。

民二暑假經我大哥決定，我即東裝赴上海，其時去宋教仁被刺不久，「二次革命」的呼聲，已甚囂塵上。動身這一天，母親和姐妹們送我到大門以外，我不禁泫然。初不料愛我教我多年的三姐，竟於我離家後第二年去世(年三十九)，這是我畢生最大的憾事之一。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於香港

壽 介公總統八十

左舜生遺作

述我與 蔣先生之間的幾件小事

總統蔣先生，生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公曆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年他滿七十九，晉八十。國內國外許多報紙，都決定在 蔣先生生日這一天，特別發行專刊，爲他祝壽。臺北的中央日報和徵信新聞，都會向我徵文，給了我參加這一盛典的機會，但我只能寫一篇。我和 蔣先生第一次見面，還在民國二十三年的暑假，到現在已經是三十二年了。據我所知道， 蔣先生平日和他的同志們討論一個問題，如果他無特殊意見，他當然服從多數；如果他所見不同，而又事關重大，他當仁不讓，必本其所見，以期以爲不可，不惜以去就力爭，甚至開罪老同志也在所不顧。這種例子，我從國民黨黨史上不難找到。至於教訓他的學生或部下，他確已做到了「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程度，這一層我更有親見的事實可指。再說到他對待黨外人士，或無黨派的社會賢達，如果他有事要徵詢大家的意見，他一定是聽聽可親，您就不願多說，他也一定多方誘導，使您得盡所言。您的意見果於國家有益，而於他的政治立場又無所損，他自然是欣然接受；在他未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以前，如果您的意見又與他的暗合，他便執行更勇；即令您所說的無關宏旨，或顯與事實不合，他也決不採取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惟有姑且放下，更端再及其他。關於最後這幾點，我自己更積有不少的親切經驗，尤其以八年抗戰中常有機會和他見面的時候爲然。實言之，在這三十幾年中，我從來沒有過一度因與 蔣先生談話，而引起我的任何不快之感。確係事實。近年在香港，在日本，在美國，我曾聽到好幾度有人批評蔣先生，認爲他最不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我每次聽到這類的話，一定根據我自身親歷的事實而力證其不然，其目的即在減少大家對他的誤解，俾得共同盡力，以出

國家於艱險的窘境。現值 蔣先生已屆八十高齡，朋友們要我說幾句話，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我是一個研究現代史的人，自 蔣先生這五十餘年以來，凡參與與主持有關國家的大事，當然都在我注意之列。可是這幾十年中國現代史的演變，以首思想與行動之波瀾變詭，國際環境之微妙險惡，內憂外患之層出不窮，所承襲前代遺留下來的包袱之沉重而難於負荷，與中國全部歷史任何一期比較，可以說無一可同日而語。操一葉扁舟，放於這樣波濤洶湧的中流，且須隨時出入於無數險灘與暗礁之間，即有萬能的天人出現，以為可以不必冒險犯大難，便可布帆無恙，平平安安到達彼岸，這豈不是一種不合於事實的奢望？而且任事與做文章不同：做文章是坐在書房裡，高談「日近長安遠，長安遠日近」，只要您能說得出理由便可自成一說。任事却要面對現實，不容絲毫躲閃，有時一個重大問題發生，內迫於紛歧意見的難於一致，外逼於所謂清議的多方責難，硬既不可，軟又不能，真可以令人繞室傍徨，不知所可。蔣先生在過去的四十三年，便日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大家只看見他升降周旋，雍容雅步，好像是行所無事，實際他的心志之苦，可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可是儘管如此，蔣先生在民國三十三年以後以迄今日，依然交出了他三篇精心結構的傑作：

一、黃埔建軍，首定粵局，僅以數年時間，乃得削平與安撫南北軍閥，造成全國一時的統一。

二、二十年「九一八」國難發生，首則堅持隱忍，繼乃奮起抵抗，卒以八年的苦戰，乃得戰敗日本軍閥，更以寬大態度對待戰敗的日本，造成中日關係有返於正常的可能。（這一層依於部分日本人的先天性格，和少數野心者的故態復萌，尙有待於繼續努力。）

三、大陸淪陷以後，坐鎮臺灣，以十餘年的積極建設，造成了一個家給人足的小康局面；無論社會秩序、文教、農業、工商、醫藥衛生、人民的康樂，以及軍事、財政，……都出現了空前的進步，這十足證明中國人確有建設能力，最足加強我們的自信。如再配合以開明良好的政治，對頑感抑鬱的優秀青年，能採取領導、疏導、普導、誘導的方針，避免不必要的壓抑，則不出三年，反攻復國的基礎，便可完全奠定。

蔣先生完成這三篇傑作的過程，不知道遇了多少拂逆，更不知道嘗到幾許辛酸，有的我大概知道，有的我還在搜集資料，繼續研究。假如現在便要我對上舉三件大事加以闡發，以證明蔣先生的成就並非偶然，我却不願貿然從事；這因為每一件事各有其複雜的內容或內幕，有一部分還不到發表的時期，我沒有確實的資料可憑，說來一定掛一漏萬，或不免雜以主觀的推測，還是很不好的。無已，我惟有就我個人與蔣先生直接有關的幾件小事來敘述一下，或許可幫助世人對他的了解。

有一件事實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民國二十二年之交，蔣先生曾兩度託人轉達他的意見，希望我有機會能和他見面談談，當時我因為在清共絕以後，國民黨與青年黨，仍有相當距離，我怕引起同志的誤會；再加上蔣先生所託的這位朋友，我儘管很熟，可是並無深交，我不能十分信賴，所以遲遲未便作答。二十三年春天，我接着蔣先生從杭州發出一封電報，約我本年暑假，到廬山和他見面，我才正式把經過告訴會裏韓（琦），並徵求他的意見。慕韓說：「一個在野黨人和執政黨的當局見面，這是再尋常沒有的，您儘管可以去。」我說：「萬一因我和蔣先生見面，演變到青年黨與國民黨合作，您的態度怎樣呢？」慕韓答復得更乾脆，他說：「現在國難如此嚴重，日本軍閥發動對中國全面侵略，為時必不在遠，最後我們除抵抗以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到那時候，全國無論任何黨派或個人，都非與國民黨共赴國難不可，我們是一個國家主義的黨，當然必須與國民黨一致，您先去做一個底子當然更好。」我說：「您既贊成我去，而且主張與國民黨合作，我便有三個原則必須堅持：一、我們信仰國家主義，愛國第一；我們主張民主憲政，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這個基本立場，不容動搖。二、我自己是一個書局的編輯員，同時在大學教書，對實際政治無經驗，也無興趣，假定蔣先生要我擔任什麼純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謝，這是我的身分，必須保持。三、聽說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們真要走上與國民黨合作的路子，我主張只能以整個國民黨為對象，決不參加他們派系的角逐，以避免無謂的糾紛。您對我這三個原則，即團體不失立場，個人不失身份，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系角逐——的看法又怎樣呢？」慕韓考慮了一下，答復我說：「您這三點

大體妥當，我完全同意。」這是我在見 蔣先生以前對青年黨內的一個交代。我與慕韓的這段談話，除我們黨內中央幾個人知道以外，用文字記錄發表，這還是第一次。

我與 蔣先生從來不曾見過， 蔣先生的行事，只是從旁觀察， 蔣先生爲人如何，也僅得之傳聞，要和他去作第一度談話，我認爲還有多了詳他一點的必要。於是我更訪問了他的兩位朋友：

第一、我到上海國富門去向蔣百里（方鏡）先生請教。百里我很熟，對他說話，可以開門見山。我說：「我不久要去江西看 蔣先生，他向來對您很尊重，不過因爲您與全國軍人往還甚多，您和吳子玉（佩孚）的一段關係，會引起過他的疑慮，在一個時期，關係並不圓滿，您能不能把個人的恩怨拋開，就您所知道的 蔣先生，很客觀的對我說一大概？」百里燃了一支烟，從口里吐出一串的團團，很從容的對我說：「您這個問題很好，我從來不講所謂個人恩怨，您知道我認識南北的高級軍人很多，有少數而且是我的學生。以我觀察，在今天全國高級軍人中，遇着一個相當嚴重或複雜的問題，能以快刀斬亂麻的精神當機立斷，似無一人能出 蔣先生之右者，今後只看他統籌全局的方略如何。」他說完這幾句話停了一會，繼續說：「一個人很容易爲歷史所支配，尤其容易爲自己成功的歷史所支配。 蔣先生引起黃埔，黃埔生在北伐一幕，因爲主義的薰陶與精神教育的收效，表現很不錯，但這究竟是打國內戰爭，今天一個現代的強國，對軍事教育的水準，提得很高，日本一個師團長，除必須在陸軍大學畢業以外，還要積有長期的實歷，才能得到這樣的高級軍職。以黃埔的課程而論，要學生指揮一個師或一個師以上的軍，甚至十萬二十萬的方面軍去從事國際戰爭，我還是希望 蔣先生出以審慎。」

百里的話，要點到此爲止，我了解他的意思，而且了解他完全出於善意。我們還說了一些正文以外的話，乃興辭而退。

第二、我邀請教了黃廣白（鄂）先生，這便完全是得自偶然。原來二十二年五月，日軍進襲華北，迫通州，平津危在旦夕，廣白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

綏遠五省，北平、青島兩特別市。廣白留萬餘於五月十七日到達北平，在日軍直接威脅之下，以壯士斷腕的精神，親與日方交涉，草訂「塘沽協定」，使平津暫得保全，全國多出四年的準備時間，其功誠不可沒。可是當時有若干唱高調的人們，或拘於派系觀念，總覺得這一協定損失太大，且後患無窮，對廣白多方非難。二十三年春天，廣白南下回莫千山休息，在津浦路火車上讀到上海時事新報「時局評言」一篇短論，署名「仲平」，則對此次交涉的經過頗表同情，認非難者不明當時情況，近於不負責任。廣白沿路打聽「仲平」何人，無人知曉，一直在上海見着他的內弟沈君怡（怡），才知道「仲平」即我的簽名，因託君怡勸我赴莫千山一遊，藉圖良晤。我與廣白原無一面之雅，僅看過他所著的「歐戰之教訓」與「戰後之世界」兩書，頗想見其人；又知道他與蔣先生為昆季之交，也想從他增加對蔣先生的了解，因約廣白友人黃仲霖偕同前往。

廣白健談，自午前九時，談到下午四時以後，始行下山。凡他生平所經歷的大事，從他在日本留學，參加同盟會，加入「丈夫團」，參與辛亥上海起義開始，一直談到民十三年在北平發動一次不流血的首都革命，出任內閣總理兼攝臨時大總統，其後南下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與日本多度交涉，包括民十七的「五三慘案」，以迄這次的「塘沽協定」，好像是他自述的一篇自傳一樣。當蔣先生所統率的北伐軍正在前線之際，廣白原在軍中，及將吳佩孚、孫傳芳兩大勁敵擊敗後，清共絕俄的政策也大體確定，廣白乃辭歸莫千山，臨別，蔣先生曾單獨問廣白：「今後我所應持的態度？」廣白曾對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老弟於『毅』之一字，已足夠了，今後只當在『弘』字上多下工夫。」我不能確指廣白這幾句話是那一月那一天對蔣先生說的，但我總得非常明白，連語氣也沒有走樣；而且我當即覺得這幾句話，確不失為一個好友對蔣先生最有益的贈言，所以我至今還清清楚楚的記得。

以上記我對蔣百里、黃廣白兩先生的訪問，可見我準備與蔣先生見面的一幕，態度是十分鄭重的。

經過這兩幕，加上前述與蔡韓一度的討論，在二十三年暑假快要結束以前，我便與蔣先生見面了。其時蔣

先生小病新愈，我們的談話並不多；但我增加多少對蔣先生的認識，對百里與廣白對我所談的，也得了一度的印證。蔣先生除過去與共產黨人交過手以外，與另一黨派的人見面，我也許是較早的一人。蔣先生問我過去的經歷，我告訴他：我在中華書局任過十年編輯，在上海復旦大學教過四年書。諷刺，蔣先生似乎覺得意猶未盡，很懇切的表示，希望我和他通信。這一次，何魯之兄是和我一陣去逛過廬山的。以我後來遊山的經驗，我覺得峨眉之秀，青城之幽，廬山似乎是兼而有之。

回上海後，慕韓問我見過蔣先生的感想；又問我蔣先生身邊有什麼人才？我答，蔣先生病後精神已很好，他正以全神貫注在國家的大問題，無疑是當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山居的生活簡單樸素，待人很親切，看不出有什麼難於接近的架子。在廬山第二次見了黃膺白，又談了一點鐘，他確實是一個能考慮問題的人。楊楊卿僅一面，據聞他頗勇於任事。陳布雷勤慎，於蔣先生必有助力。此外，我並沒有看見其他的任何人。

大致經過一個月，我對蔣先生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其時起草憲法之說甚囂塵上，而廣西與政府有違言。我向蔣先生建議：不頒憲法，不辭總統，勸他即以現有地位，埋頭苦幹。對廣西宜用和平方法解決，不宜用兵，這一部分力量，應保留將來共同對外。此外，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也會略略一提。蔣先生對這封信似乎頗感興趣，回答很快，再問我對宣傳的意見，我因為考慮並不周詳，便一直沒有答復。

蔣先生要我到中央政校教書，可能在二十三年冬即已通知學校（時蔣先生任政校校長）；但延至第二年春末夏初，學校當局才有電要我去南京一談。這裡面有什麼曲折，我懶得過問。或許他們因周恩來等過去在黃埔軍校任教官，會引出不好的後果。他們對請一位黨外的人到黨校教書不無戒心，或者是有可能的。我根據他們的來電到南京以後，說明本學期已為日無多，從下學期秋季開學再正式上課如何？學校當局說，不好，必須從這一學期就開始，即令暫不正式開課，便作幾次臨時講演也未嘗不可。於是我便在政校的大禮堂講了六、七次的「近代中日關係史」，每次兩小時，這是針對當時的一種需要。聽講的大致有三百人至四百人左右。我在任何大學教書，上課前總有

充分準備，因此頗能深入淺出，講來還有條理。看學生們的面孔，大致都頗用心，每一個都在忙忙碌碌的記下要點。以我三十幾年以來在上海、南京、香港八九個大學教書的經驗說，仍以政校學生成績的平均分數較高，教室秩序，以及對教師的禮貌，也以政校的情況為較好。因此，我在南京紅紙廠整整教了三年，後來遷往重慶小溫泉。因周枚霖（炳琳）到政校負責，拉我又教了一年，頗感愉快。但我有一大弱點，即學生歡喜和我接近，對好學生我當然也歡喜他們，卒引起學校某先生的不安，四年以後，便沒有繼續請我再教。我在青年黨有四十年的歷史，且負過相當重要的責任，但從來沒有由我主動拉過任何朋友或學生入黨，這是青年黨的同志們所知道的；像這樣一種怪脾氣，根本不像一個黨人，本來不容易了解。因而我對某先生的態度，絲毫不覺難過。其所以還要在這裡略略一提，意在說明知人不易，教育難辦，固持黨見，有時不免誤事，且可能為自己的集團召致無形的損失。

關於對日態度，我對 蔣先生「暫時避免正式決裂以爭取準備時間」這一原則，是相當理解的，而且是支持的。「九一八」以後，除政府對軍事、經濟、財政以及由 蔣先生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等等，都在加緊進行，均有不少的具體事實可指以外，他也開始了政治的推動。首先留意到對黨外知識分子的團結，黨在有一黨內外交換意見的機構，以求得對日步驟的一致。二十五年的春天，他約我討論這件事，並希望就我所知，擬一可參加此一機構的名單，我表示恐有不便；但他說不妨姑試為之。後來要布雷向我催促，不得已我開了三十九人，其分配國民黨的約佔三分之一，無黨派者三分之一，有黨派的也佔三分之一。除國民黨外，我在每一人名後面，均附有簡單的說明，即託布雷轉達。過了兩個星期，我遇見布雷，問及此事究竟怎樣？ 蔣先生乃約我在「勵志社」面談。他告我胡展堂先生不久要來，他對憲法也有意見。我說胡先生既然要來，我上次所擬的那個名單便當然作罷。我了解胡先生對黨治持之甚力，另創機構與黨外人交換意見，胡先生來後，便決無可能，因而我對 蔣先生有這一表示。（按胡先生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在廣州以腦溢血去世，年五十七，卒未再到南京。）但 蔣先生的意思還是要做，請我先約會慕韓、余家菊、王造時三位到南京和他個別談談。我答慕韓現在北方，隨時生病，暫時能不能來不可知；但我可

寫信轉告。余家菊現在湖北楊鵬卿主席處任有地方工作，蔣先生去一電與楊卿，他一定可來。王造時在上海，與我鄰居。本星期我回上海即可轉達。我辦這件事的結果，蔣韓有信答我，說年內可以南來；但希望蔣先生有一信給他，比較合式。某一天，我在蔣先生處催他寫這封信，他立即上樓，匆匆寫了兩紙交我，「書被催成墨未乾」，語意甚為隆重，我即掛號焚寄蔣韓。在蔣韓二十六年春到奉化與蔣先生見面以前，這封信便已發生作用；蔣韓在北方聽說蔣先生有前往西安與張楊開會之說，他知道北方的空氣，東北軍的心情，關心蔣先生的安全，即有一函託李幼樺到洛陽轉達蔣先生，勸不必前往。可惜幼樺到洛陽時，蔣先生已動身前去，致使命未及完成。這件事我以前未曾談過，現在事過境遷，已成陳跡，我想公開也不妨了。西安事件結束後，蔣先生回奉化休息，我和幼樺即陪同蔣韓到奉化與蔣先生見了面。余家菊由楊鵬卿轉告，廿五年初夏也到過南京。自抗戰以迄今日，國共兩黨的合作，大體良好，這些都是基礎工作。王造時經我轉告，他推三阻四不肯去南京，後來乃有蘇州所謂「七君子」的一幕。一直到抗戰前夕，他們才恢復自由。主張抗戰，又不肯與有權領導抗戰的人面談，對造時這種態度，我總覺得欠妥。

到抗戰以迄勝利，我因為始終參加國民參政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的關係，與蔣先生見面的機會更多，其間可述的事自然不少，但因這篇文字已經拉得太長，我只再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說一說，即作為本文最後的結束。

其一，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召集以後，章伯鈞及幾位「救國會」的分子均已除名。張君勱、梁漱溟、黃任之、羅隆基和我幾個人商量的結果，覺得這件事不妥，恐怕等不到抗戰終了，團結便要破裂，甚至還要給共產黨一個挑撥構煽的機會。因而我們有一「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其目的在立於國共兩黨之間作一緩衝，期待兩黨能在抗戰中不各走極端，保持對外統一的局面。漱溟個人的希望更為遠大，他認為即在抗戰結束以後，中國也不容再有內戰，要使得國共兩黨和平相處，不以兵戎相見，也還有待於我們共同努力（這一點我與漱溟的看法不同）。我們自

開動機是純潔的，既沒有藉此來從事漢縱的企圖，更不帶藉此來分取政權的意味，因此我們把章程和宣言草定以後，都曾由梁漱溟交給國民黨方面的重要人物看過，即在他们充分明瞭我們的立場，而且使他們知道我們是左祖國民黨的。我們其所以加上「政團」兩字，目的在使參加的分子，必須經過某團體的介紹，以避免共產黨以個人僞裝來滲透搗亂。但我們十分強調「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當時的情勢論，却依然是格格不入的。其時，我任「民盟」的秘書長，一切重要文件都是我起草的。在我們開始活動不久，有一天，蔣先生要雷敬寰（慶）陪我到黃山（在重慶對岸）談天，他的目的在明瞭「民盟」的真實情況。我們的行動，本來就是公開的，原無半點秘密，因此我把「民盟」成立的經過，原原本本坦率的告訴了他。他頗注意「民盟」的幾個重要分子。他首先問：「您的曾慕韓先生是怎樣一個人呢？」我答：「慕韓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他雖然留學日本多年，也久居過法國，但他的思想相當保守。他對「五四」以來新思潮不重視；連白話文運動他也不理會，他依然寫古文，做舊詩。他以一個不名一錢的窮書生，居然創建了一個黨，已有兩三萬個黨員，凡經他訓練過的同志，決不會有一人和共產黨妥協。他有一個特長，便是「長於組織」，他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他又問：「張君勱先生呢？」我答：「他出身於上海同文書院，少年時即在我們湖南經正學堂教英文，後來留學日本。他與梁啟超並無師生關係；但感情在師友之間。再後他留學德國，治哲學有心得。第一次大戰後，他和丁在君、蔣百里、徐新六等隨同梁先生對巴黎和會進行側面的國民外交，頗便在歐洲考察；他自己更遊歷過許多國家。對國際問題很留意。他的治學工具，遠在梁啟超之上；但他談學問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響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張民主憲政，最能「堅守原則」，以我所認識的朋友來說，他的主張是最不容易動搖的。至今他依然好學不倦。」

他再問：「梁漱溟先生又怎樣呢？」我答：「漱溟先生的個性很強，能刻苦，二十六歲在北京大學講印度哲學，研究主題為中西文化之比較，我最早看見他的著作為『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他認定建設中國應從改造農村做

起。他有一個特點，即不尚空談。「凡他所見到的，便要自己去做了」，為實現他的主張，即與韓復榘那樣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最後，蔣先生更問：「責任之又如何呢？」我答：「任之是前清的舉人，與邵力子同年，也加入過同盟會，且曾一度被捕。他自來熱心教育，活動的範圍以上海、南京為基本；近年提倡職業教育甚力。為維持他的教育事業，與李純、齊燮元、孫傳芳都處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親密的朋友。他對中外的學問無深造，「但辦事有條理」，不能說他對教育無貢獻。」

這一番話談得很长，超過一點鐘以上，我幾次告辭，蔣先生要我談下去。我知道外面彭真沛次長已久等，頗為不安。我覺得，蔣先生現在領導全國，我們便應該把國家有關係的人物使他詳細知道。

其二、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到達重慶，當時全國人民真是歡喜若狂；當晚重慶市民在滿街燃放鞭炮，提燈大舉遊行，美國人也爬到汽車頂上，翹起大拇指，高呼：「要得」！「要得」！我沒有參加遊行；但一直看到半夜。到冷飲店喝了一杯汽水，然回家休息。可是痛定思痛，思潮起伏，到底不能入睡，依然爬了起來，扭大油燈，寫了一封近兩千字的長信，於第二天早晨，派人送給張岳軍先生。這封信的大意說：

「日本是一個壓不死的民族，他們的復興決不在遠，我們對日本不宜採取過分的報復手段，尤其不可參與動搖他們的國本，以保留將來合作反共的餘地。」

這封信的內容，岳軍先生是否轉告了蔣先生，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不過以一個在野黨領導人之一的資格，表示我個人的意見而已。後來，蔣先生對日本所持的寬大態度，當然出自他自己的英斷，可能與我所說的全不相干。我這篇文字要這樣寫，意在懲前毖後，供大家考慮中華民國的命運問題。蔣先生不需要我們歌功頌德，我也不會作駢四儷六之文，寫黑大圓光的字，更不願說不痛不癢的話。我確信這一點是可能得到蔣先生的諒解的。

十月二十六日晚一點三十五分，香港。（原載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

苦憶左舜生先生

方東美

——因及少年中國學會二三事

民國六年冬，初次獲交左舜生先生，其事委宛曲折，殊偶然也。先是余入金陵大學，一日步出教室，忽聞有追聲呼者，回陣諦視，乃黃仲蘇從背影誤判余爲其舊友鄭伯奇也。兩人驟相遇，原不相識，及交談後，意興盎然，竟成好友。且因之而結納多少良朋，亦異數也。

渺在童年，余即酷嗜莊子書，頗愜桐城文章長於敘事言情，而短於談玄說理。每爲仲蘇道及之，仲蘇故愛桐城文體者，聞言乃驚爲怪事。余因告以近因瀏覽莊子各注本而知王先謙有新刊莊子集解一書，嘗從金陵書肆覓而不獲。仲蘇微笑曰，是易事耳，曷不「前來東魯盜文章」耶？一日余以姪輩禮贈拜其尊人黃時青老先生，仲蘇隨又導余入內室，禮拜黃伯母。老人往往愛少子，因亦推恩惠及其子之友也。談次，堅留余久坐，意欲飽啖以肥甘。俄頃從書齋中又輿出副副一少年，蓋即舜生也。舜生善與仲蘇同窗爲密友，曾就學於上海震旦大學者也。時老賞識其學殖，特延爲西席以教授仲蘇諸妹者。飯後將辭去，舜生囊回書齋，袖出線裝書三冊以授余，展觀之，蓋即思賢堂刊本莊子集解。余因求莊生書而再得一好友，內心狂喜可知矣。

舜生少年時，貌清癯而俊逸，每側坐傾談天下事，描繪湘淮軍風雲人物，評議海岳間騷人墨客，如發寶庫而數藏珍，語音常帶磁性而沁人心魂。友朋中見聞廣博記誦綿密者，前有左舜生，後有陳登恪；登恪冷峭而依諧，舜生熱烈而真摯，要之皆莊生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之奇人也。

世界幻變，國家多難。民國七、八年間，歐戰告終而巴黎和會隨即揭幕，竟允許日本非法攫取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因之激起海內外愛國青年之奔走呼號以抗爭。國父及今總統蔣公在南方驅離醫師北伐，而少年中國學會及五四

(四)少年中國學會之發起，推動主力厥在王光祈先生。光祈性格，高超純潔，其律己之嚴同人中無有出其右者，惟情之所鍾，獨在一晚輩如花之美媛。當時少同人輩以未來中國文化創造力之一半應由全國婦女負荷之，故極力倡導婦女運動，苟因發起者一人私情溺愛之故，致令婦女運動遭受疑難挫折，將何以見諒於國人。據舜生爲余言，舜生在滬，會盡一日夜之力，苦勸此一對愛人分赴美洲及歐洲留學，已成定計矣，詎知啓航之日，兩人竟又同舟過港赴歐矣。舜生由滬回報此信，極首不知所措。余時年甫二十，於光祈爲小弱弟，而友誼又不及舜生與光祈之久且厚，一聞此訊，乃與李儁勳露夜合草一長函，詞嚴義正，大陳其「七不可」，寄請新加坡船公司妥交。光祈旋途得此函，於抵達馬賽港時，覆我一明信片，直云：函悉，此心已明，此計已決，迨抵巴黎後，孑然一身，遁赴德國學習音樂以終了此生。言短而哀怨之情如泣如訴矣。其後悠悠十六年中光祈宅神音樂，講魂藝術，竟成一代完人而窮愁客死異域，可敬亦復可哀也矣。扼殺伯仁，我固不能辭其罪也。抗戰初期，會慕韓先生延重慶，爲宮某女士別光祈後久久，亂髮素裝，不似當年之明艷矣。余亦轉告慕韓，北伐後女士歸國，據我舊日同僚某教授，某次余游西湖過澹趨訪某教授，其新婦猶避不一見，後數年隨夫留京，已淡忘從前，頗相過從，時余長子適在襁褓中，且擁抱之極親切。前此一腔幽怨，怨我拆散光祈，乃又化爲晚照晴霞矣。後此一段曲折，始終未及與舜生一言之，光祈靈靈恐亦未嘗料及如此結束也。

(四)「本科學情」，爲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是少年中國學會之宗旨。同人各本其知能材性，力求此宗旨之實現。惜乎五四以後，至於民國三十四年，國情愈急惡化，北方軍閥愈益猖狂，全國青年革命情緒激昂，已有操刀立割，仗劍揮霍之勢，於是各依其所見所信，轉求效率最快之政治路線，期以達成救國之目的，大勢所趨，有如決川赴海，莫之能遏矣。余以十年夏去國，十三年夏歸來，舜生仲蘇所主編之「少年中國」，余書所主編之「少年世界」均已停刊，年會所討論之問題，大都側重實際政治信念之爭辯，純粹學術問題，自由思想氣氛，業已運跡不見。十四年夏重在南京召開第五屆年會，參加者寥寥二十許人，僅憑國家主義派與共產主義者分陣對峙，各不相下

，其餘主張學術獨立與中立者惟有建議調查改組或停止活動矣。

舜生於民國八九年之交，已離南京赴滬，主持中華書局編譯所，曾與王崇植分住哈同路民厚北里樓上下。猶憶十三年冬，李幼樁（瑛）及余各乘武昌師大寒假之便赴滬訪舜生。一日舜生約集少中同人於其寓，意在諮詢如何重振少年中國學會之旗鼓。孰料「醜獅」（當時國家主義派已刊佈醜獅小型報）與猛虎相值，初時尚作客氣姿態，辯論政策問題，隨即野性發作，各自張牙舞爪，直欲攫取對方皮肉骨體吞嚥之以為快。是日共產黨員參加者有傅代英、張聞天、沈澤民、楊賢江等，國家主義派則有曾慕韓、李幼樁、陳啓天、張夢九諸人，舜生為主人，意猶平和。雙方爭至激烈時，拳不停揮，口沫四濺，各以投頭相威脅，當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在座者王崇植與余向主少中係一學會，其根本立場應超然獨立於一切政治權力鬭爭範圍之外，目觀此情此景，心已破碎，因起坐哀求雙方平心靜氣，暫時恢復友悌情分，握手言和，了却少年中國一段公案。至於日後戰場相見，已非少中份子，勝敗隨人，無情可言，無理可喻矣。遲之又久，雙方始悻悻散去，只餘舜生崇植及余相對歎歎而已。

歷時二十年至於抗戰末期，毛澤東應邀來陪都重慶，與政府接洽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日忽大發請帖，分致舊日少中同人於在重慶者，內附另紙，說明此乃僅係預約，至於何日集宴，再行通知。事隔數月，方始正式邀請少中同人在上清寺滄園杯酒聯歡，屆時毛澤東出席，舉目流眄來賓，一若大黨魁之視群眾，少中同人多係飽經憂患者，何能服此氣勢，乃齊聲呼曰「毛大哥到矣」。詎知一聲毛大哥竟將其氣壓壓下，暮然顯露異年初滬南京時之鄉曲情態，吳云：憶昔初到南京，一切茫無所知，於是從下關獨上城頭，窮一日之力，遍行全城周圍九十餘里。同人相顧失笑曰，此乃萬里長征之初步練習，今日仍有此與否？毛見大家詞鋒犀利，遂轉請尚恩來報告國共政治協商之初步經過與結果，歷時甚久始畢。此次集會乃少年中國學會解體後之一段插曲也。

十五年國民革命軍督師北伐，聲勢浩大，驟收軍閥，有如秋風之掃落葉。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是一番蓬勃新國氣象，文化界著人各自奮發奔赴事業前程，因之每隔多年，始能謀面。洎乎抗日戰爭初起，各方人物應召

與樂廬山會議，共赴滬。余之再見舜生乃在此時。抗戰期間，復在陪都偶相過從，日本投降後，昔時少年憂患餘生，鬢髮已霜，感慨多矣。三十八年春，舜生來滬，寄寓溫州街中華總商會，余勸其定居此地，舜生則謂近代史籍繁多，在香港搜求較易爲力，不久遂前往定居。再冉十餘年未嘗通音問。五十四年夏，余從美國講學歸來，赴港爲中文大學學位考試閱卷，乃在劉百閱先生寓廬及旅舍中暢談兩次，嗣後余又匆匆赴美，垂老之年，晤聚不常，係念實多。最近數年，舜生頗回自由祖國，每次必相見，相見必長談。今年初夏，余適赴美參加東西哲學家會議，舜生重回故國，尙辱枉駕過訪數萬，徘徊失望中猶殷動垂問何日歸來，心中似有無限情意待吐者。上月杪晨起展閱「中央日報」，忽見舜生已墜入榮民醫院就醫，急驅車前往問疾，至則已被某監護先生喊拒見面，經婉言懇求，乃啓門令我輕步躡聲遙視片刻。最近余亦懷小疾，來寓診斷者卽爲主治舜生病痛之鄭不非大夫，爲言左先生就醫太晚，所摩病徵已成絕症，無復痊愈希望。退聽之後，涕泗滂沱，悠悠昊天，胡奪我良朋如斯之遽耶？

五十二年前，初以莊子集解一書獲交於舜生，中經北伐時之兵燹，此書獨得保存。迨倭寇陷京師，佔我寓廬，並此書亦論斤兩，隨其他典籍作柴火被賣出去。二十二年前返後回京，巡視狀元殿破爛書肆，見余書藏之十三經注疏，汲古閣本宋六十家詞，及莊子集解赫然在架上，乃急以數百萬貶值之法幣購回，珍同拱璧。如今觀舊物，懷故人，只合無語問蒼天也。

悼念左舜生先生

梁實秋

青年黨人才濟濟，其中有「曾、左、李」。曾是曾慕韓，左是左舜生，李是李幼樺。慕韓先生於民國四十年歸道山，不意舜生先生亦作了九泉之客！老成彫謝，傷如之何！

我認識舜生先生是在民國十七年左右，那時候我在上海教書，他在中華書局任編輯。有一天，我與羅勞生和幼

椿先生閒談，我們認為中國青年黨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發表「中國青年黨建黨宣言」，明言其建黨之宗旨：「誓平對外，則以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為謀，……至於對內，則以推倒禍國殃民之軍閥，實現全民政治為信條」，言簡而該，甚為得體，但是後來時勢變化，除軍閥以外又有共產黨的崛起，實為世界上一大變局，青年黨的信條財有重加檢討補充的必要了。十六年五月曾慕韓先生撰「共產黨撲滅國家主義者之策略」一文，獨在聲稱「始終抱定『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宗旨」。「國賊」二字固然可以包括共產黨在內，但是共產黨的行徑不是這兩個字所能形容淨盡的。我們以為，為青年黨借箸代籌，應該制定黨綱，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提出更詳盡明確的主張。幼椿先生深韙此言，擇日約我們兩個到舜生先生家裡去長談，他家在哈同路民厚里，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四壁蕭然。當時在座的還有陳啓天先生，慕韓先生不在上海。長談竟日，我只提出所謂「廢除私有財產」乃是共產黨基本信仰，絕對不可作任何形式的附和，此外我沒有多參加意見。舜生尤主等則議論滔滔，均能老成持重。後來青年黨黨綱是否制定，如何制定，我就不甚清楚了。

十八年，幼椿先生邀我每星期到「知行學院」教一小時的英文，這個學院是青年黨的訓練學校，規模很小，生徒四五十人，但是他們精神很好。因為這個關係，我經常和舜生先生見面，海闊天空，無所不談，而主要話題則是反共。如今回想當年一些反共的人竟是只會空談的書生，焉能不令共黨坐大。張君勱先生也在知行授課，一日步行回家途中被綁，我從那時起也不再去做授課了。

抗戰軍興，我和舜生先生同在國民參政會，又多了往還的機會。那時候的延安是個神秘的地方，有不少所謂左傾知識分子目之為國家希望所寄的聖地，聽說年輕的學生也有兼程前往投效的。對這現象我採懸疑的態度，一定要我親眼考察過才能算數。參政會派遣華北觀察團，我之樂於參加也是一部分為了要去延安看看，不料到了西安就遭受攔阻，關家主權派的余家菊先生和我也成了不受延安歡迎的人。我失去了實地考察共黨施政的機會，自然是恨失望。舜生先生，和余家菊先生同樣的是關家主義派，和我同樣的是反共分子，不知為什麼後來獨家他的湘潭老

鄉優惠，歡迎他去。這。我想也許是因為他不是用觀察慰勞的名義，而是負了某種政治協調的使命罷？他從延安歸來，倉卒中我問他印象如何，他說「一言難盡」，其實是盡在不言之中。他沉吟了許久，告訴我一件小事，他說在延安的各級政治機關門口沒有警衛，任何老百姓都可隨時排闥直入。我想這當然是一件可稱道的事，但若可稱道之事僅此一端，則其一般狀況也就可想而知，其言蓋有風焉。

行憲後，政府以農林部長一席昇青年黨人，初屬意於李幼樞，幼樞先生不肯拜命，乃由舜生先生出任。其實徵政黨合作之事，人人皆優爲之，政績如何原不必論，惟文書樞密，在讀書人看來總是犧牲不小。舜生先生曾說：「政治乃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爲之，小人因緣以爲利。」有政治抱負的人可以爲官，不爲官如何展其抱負？爲官者未必皆有政治抱負，往往但求抱負登場顯其妻妾耳。舜生先生學生熱心政治，終於踏上仕途，蓋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他究竟不是俗人，看他二十年來閉居香港，一面治學，一面論政，特立獨行，風骨凜然！

最近他兩度來臺，百忙中均來舍下話舊，風神蕭散，曠備本色。我們由往事談到舊遊，由羅野生之抑鬱以終談到王右軍之深倒病死，由胡適之先生的水經注談到常燕生先生所作「玩物喪志」之批評，由某些學者之不知觀拙妄論中西文化談到某些不善詞章的人之吟風弄月附庸風雅，由我們的日常起居談到寫作計劃，他氣飛揚，聲震不絕。最後一次臨行時他說：「以後我每次來臺必定要來看你——不過恐怕也沒有幾次了！」相對黯然。不覺那竟是最後一晤，哀哉！

記左舜生先生

陶希聖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左舜生先生病逝於臺北榮民建醫院。十月二十六日，各界人士舉行公祭，備極哀榮。希聖既挽以一聯，茲略記數事於此，以爲紀念。

一、上海初相遇

民國九年，舜生先生由南京轉上海，進中華書局，任新書部主任。在他的主持之下，出版新文化叢書，教育叢書以及少年中國叢書，並自行主編少年中國月刊。這個雜誌可以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刊。舜生主編一個時期之後，復由王光祈先生接辦。國家主義諸君子之結合與興起，這個雜誌是有力的樞紐。十三年十月十日，醒獅週刊創刊，舜生為其經理，為之推行。於是國家主義的旗幟飄揚於社會。

我辭去了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的教席，在湖北黃岡故里小住半年，然後到上海，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為法制經濟部編輯。這是民國十三年七月的事。至十月，經同鄉嚴峻之介紹，每值醒獅出版之日，適逢星期日，在永安公司屋頂花園，與曾慕韓、李幼樺、陳修平諸先生相見並交談。其時，嚴不過是浦東中學學生，以何因緣介紹醒獅諸友，今已不復記憶。

前此在安慶時，法政專門的同事胡幼吾（家學）先生，與我同鄉，亦為同學。每與我談及余景陶（家菊）先生。景陶在武昌與幼吾同學。幼吾往北京進北大，學法律，而景陶往倫敦，學心理學。比及醒獅諸友與我晤談於上海，我始知少年中國學會的概略，更得知曾、左、李、陳、余皆為其會員。景陶不在上海，此時未得相見。

少年中國學會以留歐學生居多。我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於投稿學生雜誌及婦女雜誌之外，並被邀為學藝雜誌撰稿，且加入學藝社。這個學術團體是以留日學生為主要社員。由於學藝社友之展轉介紹，漸次為孤軍雜誌寫時事論文。

商務與中華是上海兩大書局。這兩大書局各自成為學術思想界之中心驛站。學術思想界有許多社團及刊物。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散佈海外，而少年中國月刊實為其在上海者之聯舟。至於孤軍不過是上海的一個雜誌，其社友亦不多，但在五卅慘案以後之新思潮中之作用，仍有一提之價值。

二、五卅慘案之後

五四運動是北京的大專學生自發的運動，其影響及於全國，而北京成爲這一青年運動激起的新思潮之中心。五卅慘案引發了上海的羣衆運動，其影響亦遠播於全國，而上海遂成爲這一羣衆運動激起的新思潮之中心。如果五四運動是個人覺醒的契機，則五卅運動是社會覺醒的發軔。

中國共產黨成立是在民國九年。由京漢鐵路的二七工潮，至北京的反治安警察法運動，皆是中共乘機發展的羣衆事件。其時北京是中國的首都，而北京仍然是新思潮的中心地點。至五卅慘案及其後的社會運動，更是中共的羣衆工作大爲發展的機緣。於是這一道新思潮的中心便由北京移至上海。

五卅以後，中共有組織的宣傳工作交勢甚猛，而其對於學術思想界的滲透與組織亦飛躍進行。於是少年中國學會發生分化而有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孤軍社亦起分化。即如郭沫若的創造社就是分裂孤軍社而另行組織的。

適逢廣州中山大學的左派學生起風潮。鄰校長海濱（魯）先生由廣州來上海。周佛海及郭心崧亦相隨到上海來。於是主辦孤軍雜誌之何公政及林樂諸人與周郭等發起獨立青年社，創辦獨立青年月刊。我亦入社，並主辦獨立評論週刊。這個組織的政治主張是民族主義、民主政治與工會主義。在獨立評論更鼓吹「民族自決、國民自決與勞工自決」之論。

我住在實通路途源坊，一樓一底的房子。有時在家中叫一塊銀元的合菜，招待國家主義派會李陳諸友會聚。我們交換意見，在反對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論」與「無產階級專政說」乃至「第四階級革命論」的思想上是是一致的。但我所說的「民族自決」還是與國家主義有些差異。

羅斯大張旗鼓，「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獨立青年與獨立評論亦反軍閥割據，並反列強侵略。當時「帝國主義」這名詞既不統一，又不普遍使用。但是這兩個社團的政治主張有其共通之點，尤其是兩方皆是反對中共，而皆

在極力與中共作思想戰。兩方一度擬議合組「反赤同盟」。這一提議尙未具體化而兩方分手。

民國十四年五月至九月，我患傷寒，病勢甚重。獨立青年社在姑嶺召開全體大會，討論參加北伐的問題，所得結論是社員自由決定，而社團亦即宣告解散。公敢及佛海等從姑嶺回上海，在我的病榻之前，諮詢我的意見。我亦贊成這一決定。

此時中國青年黨已告成立。舜生加入青年黨，之後，離滬遊歐。我病稍愈，即接受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派令，自往武漢去了。

三、武漢之行

蔣校長的聲威這時震撼全國。北伐之師以破竹之勢直抵長江，而國民革命的潮流已漲漫全國。

武昌之中華大學是黃陂陳叔澄（時）先生獨立創辦的。武漢大學雖屢有創辦之議，迄未成立。中華大學便是武昌唯一的大學。至於武昌之文華書院與博文書院，以及漢口之博學書院，皆是教會學校。除了文華書院的格致室即是大學部之外，三座書院均未能達到大學的程度。

北伐之師未到武漢之前，中華大學師生已有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即如陳修平（啓天）就是國家主義派的領導人，而傅代英則爲共產主義的中堅份子。兩派不僅筆戰，並有武鬥。

比及國民革命軍進駐武漢，中共乘勢在武漢大肆活動。陳叔澄校長與嚴士嘉教務長爲左派學生所驅逐。中華大學遂以關閉。至於文華、博文與博學三座書院亦皆查封。

我接受了武漢分校的派令，立刻準備西行。我聽說陳叔澄與嚴士嘉由武漢到上海，急往法租界朱葆三路平安旅社，看望他們。他們談到武漢的事業運動與恐怖狀態，並談到國家主義派受到左派份子迫害的事件。他們這次就是被左派指爲國家主義派而受其壓制，不得不逃避到此。這次晤談使我對於武漢之行，懷抱嚴重的警惕。

四、由剿匪至抗戰

北伐之役在實質上是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潮流。這洶湧澎湃的怒潮之中，上海是中共發展的源頭，也是清共決定的關鍵。在中共發展的階段，受共黨壓迫的各黨派人士避居上海者頗多。在國民政府全面清共之後，各黨派人士活躍於上海者亦盛極一時。或者可以說，上海從前是黨派的逍遙洲，此後一轉而為黨派的政治講臺。政團的紛紜與舊局的林立，可以說是由北伐至抗戰這個時代上海的特徵。

這就是今日毛共所畏忌的「三十年代」。在這個時代，舜生由法國回上海，仍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同時致力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許為史學界有數的著作家之一人。我亦展轉於上海與北平，對中國社會史下了一番工夫。但彼此各有所事，未通音訊。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蔣委員長駐節廬山，分別邀請各黨派領導者及無黨派名流晤談。舜生亦應邀上山晉見。稍後，委員長自南昌行營致電南京，指示陳布雷，分電舜生與希聖，聘為中央政治學校研究教授。其時我在北平，收到布雷先生電報，大吃一驚。我又接到布雷的信，說研究教授不必擔任課程，只是作研究並指導研究工作。我這纔對此一聘約，略有解悟。

北伐之師統一全國之後，國民政府依據建國大綱，實施訓政。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以明文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在此時期，中國國民黨之外，各黨派皆未能取得合法地位。

中央政治學校原名中央黨務學校，為中國國民黨所創立。左舜生是中國青年黨領導者之一人，却受聘為黨校研究教授，此其意義決不很小。至於我呢？我雖於民國十五年在武漢入黨，更於十七年在南京參加總登記，一直保持

中國國民黨的黨籍。但是民國十七年之後，我加入了改組同志會，至民國二十年春季，在中央大學教書，秋季轉北京大學講學，停止了黨派活動。至此乃得與左舜生同受政校之聘，亦非無政治意識，可以推知。

舜生上廬山，進政校，實質上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青年黨共赴國難之先聲。此時五次圍剿之役是在達成勝利的途中。日本軍閥侵華行動着着進逼，抗日之戰無可避免。蔣委員長力謀全民團結禦侮之意，於此可見一斑。

五、廬山茶話會至國民參政會

二十四年夏季，中國青年黨推舜生先生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同時，他在中央政治學校教書。二十五年夏季，他赴日本考察，與日本明野人士會晤，深知中日勢必一戰。回國後，呼籲國人積極準備。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其時，蔣委員長早已發出請柬，邀請各黨派領導者，無黨派名流，教育界及學術界代表人士，在廬山集會。會、左、李、陳諸先生均被邀。國社黨之張君勱與軍事學及哲學家蔣百里諸先生亦在被邀之列。（蔣百里似未及出席。）此外則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沈鈞儒等皆在內。平津教育及學術界人士在茶話會上，最為一般人所重視。北平之蔣夢麟、胡適之、傅斯年、梅貽琦諸先生及希聖、天津之張伯苓先生等，無論其在會場或會外，均為訪問之目標，皆有應接不暇之勢。

中共之林祖涵、周恩來及秦邦憲皆在牯嶺，但未出面參加會議。

蔣委員長在會議上宣佈長期全面抗戰之方針。第一次會議即將閉會，第二次會議參加人士陸續報到。而平津陷落。蔣委員長下山回京。第一次會議既散，第二次會議匆匆集會，隨即結束。

牯嶺會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集國防參議會於南京。前述各黨派無黨派人士皆即為國防參議員，每週開會一次，聽取政府當局的軍事外交報告，並陳述各自的意見。中共代表林展業等雖在名單之內，亦停留南京，仍未出面與會。

其時一度有大本營之設置。大本營分設六部。舜生與我皆為第六部顧問。大本營名義撤銷，第六部自亦不復存在。但國防參議會繼續舉行會議，且由南京移武漢，至國民參政會成立。「丁項」參政員數十人，即是國防參議會之擴大。

國民參政員名單有甲乙丙丁四項。前三項或由各省參議會選舉，或由各職業團體選舉。其丁項則由中央遴選。我在此特為指出了項之重要性。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國民參政會成立之前的國防參議會，乃至國民參政會結束之後的政治協商會議，其人選皆不出於丁項名單之外。而中共諸人之統戰工作，無論其裝腔做勢，縱橫捭闔，離合聚散，亦可以丁項參政員之動向為推求之憑證。

國民參政會成立於武漢，復遷移至重慶。民國三十年，張君勱、梁漢溟、沈鈞儒、羅隆基等發起「民主政團同盟」，推舜生為秘書長。後來青年黨代表們發現其為中共及左派份子所操縱，遂全體退出。這時「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民主同盟」，實際構成共產黨的外圍團體。

六、由政治協商會議至國民大會

青年黨退出民主同盟，可以說是中共的統一戰線之重大挫折。這一件大事，對於戰時的國民參政會，尤其對於戰後的政治協商會議，始終一貫，發生了重大的關鍵性的影響。

中國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告結束。於是先有毛澤東來到重慶，經過四十一天的會談，發表「會談公報」，預定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這四十一天的會談，雖其談判的主要當事者是國共雙方，實則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均在中共統戰活動的範圍之內。中共統戰活動之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孤立國民政府，瓦解國民黨，並進一步要施展其「聯合政府」的策略，以達成其奪取政權之目的。聯合政府的策略乃是史達林指示東歐各國共產黨與中共之統戰公式。毛澤東執行這一公式是在東歐各國共產黨之先。各方人士不但不能洞悉此中的陰謀，而且誤認聯邦制纔是民主

，聯合政府才是民主。中共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所持的策略，就是要孤立國民政府，瓦解國民黨，而施展其聯合政府的策略，以達成其奪取政權之目的。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並派馬歇爾特使來華，執行聲明賦予的調處國共衝突，促成聯合政府的使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國民政府頒發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亦於同日開幕。

當政治協商會議之日，蔣主席在開幕致詞之中，宣佈了國民政府改組的主張與釋放政治犯的決定。這一聲明將中共的孤立戰術打得粉碎。

政協二十一天會議，達成了五項協議案。其中一項是預定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到了四月底，中共與民主同盟拒絕其提出代表名單，意圖阻撓國大。於是蔣主席召開國防最高委員會與立法院聯席會議，宣佈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的決定。共黨與民盟大譁，認為國大召開日期應該經由政治協商，才可決定。但是青年黨與民社黨對於國民政府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之決定，不表異議。

政協的協議案之一項是指定憲法小組，修訂憲法草案。自五月以後，我奔走京滬之間，與青民兩黨領導人士密切聯絡，就國大制憲問題交換意見。我們得到一項結論，即是兩黨參加國大，應以政協憲法草案為基礎。七月間，我上廬山，將這一項結論報告蔣主席。至八月十四日，蔣主席發表八項聲明，第一項即採取這一項結論。

國民大會召開的日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中共對各黨派的聯絡與鬭爭的活動是一天一天加緊了。九月下旬，張家口事件竟成爲中共對國民政府全面決裂的藉口。我亦由南京趕往上海，重新確認青民兩黨參加國大的決定。

十月底與十一月初之間，南京交通銀行樓上有一談話會。參加者就是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周匪恩來逗留上海，表示其拒絕提出代表名單之堅決態度。民盟諸人雖參加這次會談，而其態度猶移不定。左舜生先生堅持參加國大，義正辭嚴，四坐震驚。

至十一月十二日，各黨派無黨派之國大代表如期出席。於是預備會決定大會延期兩天，等待中共與民盟提出代

表名單，參加大會，再行開議。但是中共從此全面叛亂而去，民盟也就追隨去了。

國民政府咨送國民大會之憲法草案，即是依據政協草案再加修訂而成，以此實踐八一四聲明所作的成績。於是舉國一致的國民大會，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咨復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六年元旦公佈。

「記左舜生先生」至此為止。憲法頒行之後，本黨與青年黨的關係以及我與舜生先生的往來，容另為文記述。

左舜生先生輓詞並序

陶希聖

滬濱反赤之盟，牯嶺抗戰之會，重慶之政治協商，南京之制憲戡亂。際此半世紀中，安危休戚，互濟平行。如今光復已可期，更寄望法家獨士；

丁年冠劍之豪，盛年舉比之重，中年之國事奔走，近年之患難憂勞。在這一時代裡，志趣行蹤，

殊途同嚮。詎料敵虜殘肆，忽過赴白馬生祠。

左舜生先生與希聖為四十五年知交。今年七月中旬，中國青年黨全國代表大會促成全黨團結，舜生回國與有力焉。會後特來蘭雅舍下告別，隨即返港。不料其病發體弱，再來臺北就醫，遽爾謝世。

民國九年，舜生先生在上海，任中華書局新書部主任，兼主編「少年中國月刊」，並出版少年中國學會叢書。民國十三年，國家主義派機關報「醒獅」創行，倡「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論。政治主張，文章辭藻，皆發穎暨，風行一時，舜生實為其經理。是年七月，希聖辭安徽法政專門學校教席，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為編輯，於業餘投稿「孤軍」雜誌，偶作政論。每週之假日，醒獅週刊出版之期，常與魯燕韓、李幼樁、陳修平諸先生晤談，並得識左舜生其人。

民九之後，中國共產黨以其有組織之各種活動，來勢殊猛。於是少年中國學會有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孤

軍社亦分化，或加入創造社，或另組獨立青年社。我加入後者，且自編「獨立評論」週刊，鼓吹一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勞工自決」之說。此時對共產主義思想之鬥爭，尤以創造社及太陽社為目標。在這一條思想戰線上，羅荊社與獨立青年社一度有同盟反赤之議。至十五年，舜生遊歐，我亦往武漢加入北伐陣營。此後雖未得交往之機緣。然青年黨創黨諸先生之友誼固不減於同在上海時期。

國民政府於北伐成功，國家統一之後，繼之以剿匪之役。民國二十三年，五次圍剿有破竹之勢，而抗日戰爭復無可避免。是年夏季，蔣委員長分途邀請各黨派領導者及無黨派名流至牯嶺晤談。左舜生先生亦上廬山，為國民黨與青年黨團結抗日之先聲。蔣委員長又自南昌行營電示南京陳布雷，囑其分電舜生與希聖，皆謂為中央政治學校研究教授。布雷先生另函告希聖，研究教授不必講課，唯從事研究與指導研究，實為委員長之創意。舜生由是在政校講學。但此到我在北京大學及清華燕京諸校教書，勢難入京，只一度應政校之邀，南下作四次演講。

至剿匪之役全面勝利，抗日之戰即將開端。華北形勢危急，蘆溝橋事變發生，於是二十六年七月有廬山茶話會，蔣委員長在會上宣佈長期全面抗戰之方針。隨即成立大本營，並召開國防參議會於南京。曾李陳左諸先生與希聖同在會中，每週一次相值於議席。而舜生與我又同為大本營第六部顧問。顧問只備諮詢，並無同坐辦公廳之必要。

嗣後，國民參政會成立於武漢。國防參議會原有之各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皆被遴選為國民參政員。所謂「丁項」即是此諸人士再加擴充而成。南京與武漢先後撤守，而國民參政會形勢重慶。在抗戰八年之中，國青兩黨開誠合作，至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兩黨之關係依然如此共濟艱難。

政府還都之後，國民政府決定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制頒憲法。希聖經常奔走京滬之間，周旋各方，每與會、左、陳、李諸先生傾談，雖立場各自不同，而見解每趨一致。比及國民大會行將集會之前夕，中共之決裂，民主同盟之觀望，均覺隱阻。青年黨領導諸公力主參加。南京交通銀行樓上之會，舜生先生正色嚴詞，語驚四坐，

至今記憶猶新。

憲法既得制頒，國民政府改組。在共匪全面叛亂之中，政府動員戡亂之際，各黨派是否參加政府之問題，仍有論爭。而舜生與修平兩先生皆參加行政院，為中國青年黨全力支持政府之表徵。

自行憲與戡亂並行，以至於今，又二十餘年。老友望或滯香港，或留臺北，共患難，歷艱危，公廬私交，千言萬語，此中艱苦備嘗，難於筆述。

昔范巨卿弔張元伯，素車白馬，不製葬期。徐孺子唁郭林宗，生獨一束，親置廬前。今舜生先生病逝矣，我之所以弔其喪而唁其家者，唯此一聯，藉抒悼念之微忱，未勝所懷於尺素。

悼念左舜生先生

程滄波

談笑論英雄，將相帝王，誰是健者？

淒涼感身世，山林鐵鼎，巨本在衣！

聽到舜生先生凶耗的當天深夜，我在枕上做了上面引載的一幅輓聯。這二十六個字的輓聯，好像把他的學問、抱負和身世都包括了。「傳記文學」雜誌主編劉紹唐先生在短促的時間中，要我寫一篇悼念的文字，據我知道，受他委託而屬筆的人，已經不少，劉先生既然堅持要我隨便寫出一點感想，我就就匹十餘年前的舊事，記出一點鱗爪。

大概在民國十三年秋冬間，我開始認識舜生先生，那時候我正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讀書，因為我是讀的文科，而且是主修政治與歷史，所以對當時流行的刊物，相當注意。不知由於什麼因緣，「醒獅」週刊的創刊號及初期幾張刊物，流傳到我們宿舍中，更不知在什麼情勢督促下，使我去訪問上海民厚里會慕韓先生的住處——當時便是「醒獅」的發行編輯處所。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在滬西梵王渡，禮拜六下午，我們照例可以自由出外。當時由梵王

渡坐人力車經曹家渡至靜安寺，方能搭到電車，靜安寺的電車，經過靜安寺路直達黃浦灘。民厚里在哈同路，靜安寺站登車後幾站就可到達。所以在地理上，聖約翰的學生到民厚里，交通方面不算太困難。

上面所述民國十三年秋冬間某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到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去訪問，訪問的對象是曾慕韓（琦）先生，當時還不知道有左先生。我進門去要訪曾先生，好像不久便有一位中年矮身材的人從樓上下來，問明是一個大學生，曾先生很謙和熱誠地請我坐下來。問明我的籍貫姓名，再問我所專習的什麼功課。曾先生欣然的說：「你是一個洋學堂的學生。」當時曾先生還不過三十三、四歲，但他已蓄了短鬍子，穿着長袍，已是一個半老人物。他談起發行刊物之目的，並且說「醒獅」同人多半是留法回來的。民厚里的房子，是上海所謂弄堂房子，他們住的是兩上兩下的房子，客堂兼做餐室，牆角四壁，堆滿了印好的「醒獅」週刊，曾先生很謙和的請我有暇寫幾篇文章，大概談話不到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從那次以後，我曾經寫過幾篇文章送去，醒獅報也源源寄來。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出外時，有便也去民厚里坐坐。在民厚里醒獅社認識的人，慕韓先生以外，便是左舜生及李幼樞、陳啓天、張夢九諸位。左先生當時住在樓下，上海人所謂統廂房，慕韓先生住在樓上統廂房，所以到那裡去，必先看見左先生，不知為什麼原因，當時我和左先生的接觸不多，也很少深談。他那時在中華書局任職，看上去很忙的樣子。而與曾李兩位先生比較接近。當時民厚里的情況，可以說是艱苦、愉快而上進。一羣初回國的留學生，抱着共同理想，向着一個崇高目標而團結努力。雖然物質生活是艱苦，而精神上卻是愉快的。今天閉目懸想，一座兩上兩下的弄堂房子，裡面住着那麼多的人，環境衛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曾慕韓先生慷慨談天下事，有時再論論詩文，他的涵養氣概，在當時民厚里的環境中，却是一個領袖人物。我與民厚里來往的時間，大概前後不過一年多，後來因為轉學到復旦大學，江灣出來到民厚里不甚方便，而且復旦大學的空氣是與聖約翰完全不同。在思想方面，聖約翰可以說是一個真空地帶。復旦大學早瀰漫着國民黨的氣氛。到了復旦纔知道共產黨的禍患，又纔把象牙塔中的視線，大大擴展到深處與遠處。

醒獅社到青年黨，其中的經過，不是青年黨的人是不太清楚的，總之在北伐後，青年黨許多朋友都不見了。直到「九一八」以後，在南京再重見左舜生先生，他那時在中央政治學校擔任一點功課，住家還在上海，所以見面的時間不多。直到抗戰開始前，在廬山談話會時，再和曾、左、李幾位天天見面。抗戰第二年政府已遷武漢，國民參政會初成立，我方從海外歸來，在漢口逗留的短時間中，與左先生重得暢談的機會。

我和左先生晤聚最多的時期，要算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撤退到香港，左先生住在九龍鑽石山，那是九龍變相的難民區。當時劉百閱住在那裡養雞，成舍我、李中襄、易君左幾位先生住在那裡，一到鑽石山，東家西家一走，可以消磨整天時間。三十九年我們在香港創辦「自由人」報，第一個誓約，大家用真姓名署名發表反共的文章。「自由人」是當時在港反共人士的大集合。記得發刊前大家討論要寫一篇發刊辭，我提議請左先生寫，但他堅持要我寫，寫好後提出大家討論，他看了兩遍，連聲說不必再更改了。他爽朗的性格，隨時充分流露出來。

近代只是左先生數十年專治的學問。他個人充滿了風趣，他筆下也富具激盪的感情。文字技術更是熟練，所以他的著作，看了使人深為感動。我看左先生，他是一位通才，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而且是清末民初式的中國士大夫。集合士大夫組織的政黨，被黨境逼迫走着犧牲奮鬥的路。其中的磨練閱歷，都是十分可以珍貴的。記得抗戰勝利後，有一天早晨曾慕韓先生偕同劉東巖先生到上海監察使公署來看我。互道闊別想念以後，我問慕韓先生，多年來有什麼重大的感想，他喑然歎息，說做這一時代的讀書人大不易。他這一句話，包含無窮的意義。我對慕韓先生有極深厚的友誼，也有早年知己之感，他早年逝世，在我心中是永遠的創痛。最近二十年中，左先生間或到滬，見面談話時，談到反共，是大家興奮有信心。除此以外，看他有許多痛苦，有許多不能暢說的話。這是士大夫從政的一個最後啓示。這回到我聽他的聯語，「淒涼感身世，山林鐘鼎，臣本布衣。」山林鐘鼎，對一個讀書人而言，到頭來是無關宏旨的，數十年的奮鬥，千萬言的著作，最後要保持我們的本來面目，還我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是士大夫立身大節的第一義諦。左先生今天是歷史上的人物了。左先生一生是努力想保持着讀書人的本來面目，他還

是一個布衣。他還是一個湖南的好漢。左先生地下有知，對我這幾句話，或將莞爾一笑罷！

追念左舜生先生

阮毅成

民國二十四五年間，左舜生先生應中央政治學校校長蔣先生之聘，來校擔任教授。這是中國國民黨黨辦的學校，又在訓政時期，左先生以中國青年黨的領導人物，而應聘執教，自為各方面所注意。蓋其時正為九一八之後，各黨人士團結禦侮，為舉國一致的嚮望。左先生到校任教，自是團結的象徵，也是合作的先河。

我於民國二十年秋季，開始在校中任兼任教授。二十一年春季，改為專任，後又兼任法律系主任。左先生是我久仰的歷史學者，我曾在「少年中國學報」及「醒獅」週刊上，讀過他寫的文章。他的政治主張，不一定和我相同。但是他的治學態度，我却至為欽佩。左先生到校之後，我在教員休息室遇到他，不須任何介紹，我便自動地向他通名。於是我們談起盡在五卅運動時期的民國八年，我在杭州任學生聯合會的幹事，凡是對各省學生聯合會的去信，都是由我出面寫的。左先生其時在長沙的學生聯合會，看到過我寫的信，依稀記得我的名字。這真是神交已久了。

左先生長我十二歲，我有兩位在中學時代的老師，——舒新城先生與常乃惠先生，都是他的好友。此後我們常在教員休息室見面，也常談到我的這兩位老師。左先生於是乎談到他和舒先生一同在上海中華書局編輯部任職的情形，他說那時候住在靜安寺路民厚里。這是鄰近哈同花園幾排弄堂房子，已經靠近海格路。我說到在民國十四年春季，正在大學讀書，學生宿舍也就在民厚里。可惜未有機會與他見面，但也可以說是老鄰居。左先生每次說到民厚里的弄堂生活，還極有餘味。使我這個會做他鄰居的當年大學生，也引起了不少的回憶。

左先生在校教課，甚為認真，也甚得學生的敬仰。有一次左先生來臺灣，曾在當年親受他課業的學生，請他吃

飯，也邀我作陪。席間師生互談當年在紅紙廊校中的教學生活，這些已屆中年的弟子，選極佩服這位已邁古稀之年的老師的淵博與風趣。

我再看到左先生，已經在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其時，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我奉派為特務秘書。參政員三百人，屬於中國青年黨的六位，是左先生、曾琦、李璜、陳啓天、余家菊、常乃惠。我的工作任議事組，又被指定負責接待各黨各派的參政員。在青年黨的六位之中，只有左先生曾在南京共過事，常乃惠先生曾是我的老師，都較為熟悉，其他四位皆為初識。但是常先生尚來沉默寡言，所以有許多事，我只有找左先生商談。我發覺左先生的愛國熱誠與正義感，極為濃厚。而是非與義利之辨，也極為強烈。

此後我奉命到浙江省政府任事，左先生一直在大後方。我因事去過重慶三次，只有一次見到他，彼此匆匆，未得多談。抗戰勝利之後，同盟國民大會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召開，我也是制憲的國大代表，並出席綜合審查組會議，在會場內外，與左先生及常先生曾有多次的談話。我們談的並不限於制憲，而多半偏於學術。常先生也是治史學的，我在中學時，他教我西洋史。左先生也是治史學的，我雖則不治史學，但也對歷史有興趣，尤其是近代史。左先生對史料的搜染很勤，分析很明，立論更是很公正。我常懷疑許多史料的正確性，尤其是若干史話，得之於輾轉流傳，未盡可靠。而左先生却常給我一些批判，說何者應該是真的，何者應該是假的。凡他所說，他皆有堅強的立論根據。我不得不推崇他的博識與他的能信其所信。

行憲之後，左先生參加政府，出任農林部部長，這當非他的素志。在他從政的這一段時期之內，我雖則也常到南京，却從未與他謀面。我重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是大陸淪陷，左先生退居在香港的鑽石山，開設一個小的士多(即雜貨店，自英文 STORE 譯名而來)。我會到他店中去拜訪，他自己管進貨，也管店面，這當然更非他的所長，也更非他的所志。但他以青年黨的領袖，退職的部長，而竟不能不藉此謀生，使賢者餓漢，這又是誰的責任？三十九年三月，港地的反共友人發起創辦「自由人」三日刊，左先生和我都參加發起人。每次在銅鑼灣的高

士威這二十二號四樓集合，他都親自出席。其時大家約定標以真姓名寫稿，左先生寫得很多，第一版的第一篇，多出其手筆。他的愛國與反共，始終如一，真是夠有熱力，夠有信心，也夠有閱志。「自由人」並無任何固定的組織，在臺灣的同仁，曾推王雲五先生任董事長，我為總幹事。我們二人都不在香港，故在港則由左先生代理董事長。在這一時期中，左先生和我通信較多，有時商量社務，有時討論問題。

在四十年八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人」第四十四期上，左先生寫了一篇時局罪言之，他說：

「在勝利之後，實行憲政，這原是根据國民黨的既定政策，一種進步的現象。我們並不是不該行憲，只是我們沒有把憲行得好好。有人以為這次大失敗的原因，就在行憲，這是倒果為因，因喻廢食。今天我們應該準備的，是如何來修改這部憲法。爲了中山先生手創的中華民國，免於滅亡，即中山先生所留下來的遺教，我們也受到東的義務。老實說：以中國實際的情形而論，中國還不能有一個超過五百人的國民大會（今後更是如此）。而且國大代表必須有資格的限制，無所謂不能限制。可是有了這樣一個小型的國民大會，便必得年年開會，無所謂幾年一次，而且除開會以外，還得有常設的機關。換言之，就是要以人民天天來監督政府，鞭策政府；也隨時研討國家的重大問題。同時，進退政府人員之權，更必須完全操在人民代表的手裡。是之謂民主。否則不是民主。」

我對於左先生的修憲之議，不敢贊同，當晚即致左先生一信，由臺北用航空寄香港：

「今日諷大作，語重心長，不勝仰敬。惟其中有一段，主張修改憲法，則未敢苟同。我國憲法得來不易。內容雖不無可議之處，而大體妥貼。誠如先生所云，將今日大失敗原因，歸諸行憲，係屬倒果為因。但如將民主未能完全實現原因，歸諸憲法，亦非合理。中山先生遺教中之國民大會應如何組織爲一事，然決不可以之設常設機關，進退人事。蓋憲法上尙另有立法院，人數雖有八百人，較先生之不超過五百人之限額略多，惟如確切行使憲法上所賦予之職權，本已可收民主政治之效。弟意在未收復大陸以前，憲法不宜作任何內容上之修改，況

修改憲法，亦必須仍照憲法上所規定之程序，否則即為違憲。以先生之聲望，而為他人所引用曰：某某亦對憲法不滿而主張修改之矣，似非先生公忠謀國之原旨也。夙承厚愛，故敢直陳。」

後來聽說他的十多關了，這是必然的結果。左先生就以教書與寫作維持生計。「自由人」在四十八年九月，也停刊了。我們就少有書信上的往還，但是我每次去香港，必仍然去拜訪他，常常談得很久，他對於若干傳聞，總是將信將疑，我均就我的所知，詳予說明。我說：「現在是輪到我向你分析，何者應該是真的，何者應該是假的了！」左先生近年也常來臺灣，每次我們也談得很多。但是他每來一次，精神體力就差一次。而他的忠於國家與憲法，愛戴總統與政府，關懷臺灣的建設與進步，反共的堅定與奮鬥，都是始終不渝的。

前幾年，因中國青年黨內部發生歧見，我應約擔任調解與促成團結的工作。我建議請王雲五于斌兩位先生一同參加。我得到他們兩位同意，於是我們三個人約定在當時在新莊新建的輔仁大學的校長室，先行交談意見。于校長備了簡單的午餐，我們談了三個多小時，一致認為中國青年黨的朋友們，一向抱着書生報國的素願，他們之間的歧見，只是偶發的私人的感情上的不調協，只要大家開誠佈公，見面談談，必可以消除意見，重新回到一起。

在我們三位調人的來往奔走期間，左先生在香港，常託人來表示謝意。他說：「爲了我們黨內的事，有勞你們三位，真是感禱。」代他表達此項意思最多的，也就是經常來臺北的劉子驥與馬漢嶽兩兄。陶希聖先生曾爲此事，對我引了一句基督教聖經上的話：「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我會經將這句話寫信告知左先生，他回信說，他雖則不是基督徒，但他很欣賞陶先生的措詞。

今年夏季，中國青年黨的團結終於實現，左先生與李璜先生都來臺北出席全國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開會的前夕，我到自由之家去看左先生。他說：「你們三位名醫都沒有醫好的病，我這個土郎中，也未必一定能有效。」我說：「我們三人並不是名醫，何況向有單方氣死名醫的說法，你囊中有特效的單方，必可生效。」左先生聽了大笑，笑得很爽朗。但是我同時也看到他面容比上次來臺時更爲憔悴，體力也更爲衰弱。因之，我不敢和他談健康與生

活的問題，我只是勸他在臺灣定居，不必急於回香港去。

但是，左先生在中國青年黨全國代表大會圓滿閉幕之後，還是決定要回香港。他說：那邊有許多事要做。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他由趙純孝先生陪同，到我家中辭行，談了半小時。憂時傷世，說了許多感慨的話，與他平素樂觀積極的口吻，不盡相同。換言之，有些反常。他出門的時候，我看他的背影，就有來日無多的感覺，心中爲之慨然，但又不能出口。

左先生回港不久，病了，再回臺灣醫治，終於不走，時爲五十八年重陽節前三日。他的一生是中國典型的亂世書生的遭遇，治喪之日，敬挽以聯：

論交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平生道義兼師友！

斯人竟憔悴而憂傷至死，滿城風雨近重陽。

敬悼左舜生先生

周鯨文

九月十九日左舜生先生由港赴台就醫，事前我不知道，未得送行。後來朋友告訴我：左先生在機場流着眼淚向親友話別，自知這次分別可能就是最後的訣別。我聽到這話十分難過，以未能親自送行話別爲憾！但還希望他能有康復的機會，以資老餘年給國家社會作出更多而有價值的貢獻。

我這一希望終成泡影，十月十七日報載：左舜生先生於十六日晨八時廿五分病逝於榮民醫院。留給我的是一片哀思，痛惜「老成凋謝」！

左先生是我們早期民主同盟的老同志，他擔任過秘書長。於抗日戰爭末期，我由桂林路過重慶轉程北上，在重慶初次和左舜生先生會見。這是廿五年前的事。那時他正是年富力強，談話時中氣十足，並拿出他主編的「民憲

一月刊雜誌給我看，記得似乎其中轉載我的一篇文章。一年後我從北方回到重慶，正是政協即將開幕的前夕。這時青年黨已退出民盟。據傳在青年黨退盟前，左先生和羅隆基先生因民盟秘書長問題有過相當爭執，許多人參與其事，以至彼此情感有些不快。因我被時不在重慶，故我回來後，左先生與我的關係仍如年前那樣，遇事還可商談，有說有笑。

我於一九五六年由大陸出來後，在香港與左先生見面的機會較多，也有幾次深刻的談話。我很敬佩他老成謀國的見識。不過，也有一次發生了不大不小的誤會，那是有關蔣總統第三次連任的問題。左先生和其他七十二人聯名反對連任，他們的理由是爭的法理。我婉拒簽名其上，並寫文章擁護連任，我的理由是側重於實際問題和國家的需要。這時流言蜚語，說「此後不能和周某人共事了」。我聽到這種流言，也並不在意，只是說：「該共事的時候還不是共事！」不久以後，左先生和我還是時常見面，並沒有什麼感情上的隔閡，反正我們所謀的是國事，而不是私人間什麼意見。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從美國回來，携來由張君勛先生、××先生、董時進先生和我共同簽名的一份政治性文件，他們委託我回港後，請左舜生先生、張××先生和張××先生簽名。左先生和張××先生看過文件之後，立刻簽名。張××先生以退休的心情不願參與其事。這個文件後因各種關係，大家同意暫不發表。在張君勛先生逝世之後，我於悼念詞中本擬提到這件事，後以聯名的朋友多不在港，臨時聯繫也來不及，故隻字未提。現在左先生也去世了，五個人簽名的文件，其中有兩位可敬的先生已經作了古人，使我不能不提起這件事，這也是他們最後的「國是意見」。我提到這件事，祇是補上一點真空，盡我敬愛朋友的誠意。

在香港舉行追悼張君勛先生大會上，各方朋友於哀悼、回憶、敬佩張先生之餘，復擬繼續刊行張君勛先生生前所主編的刊物。我當時有兩種感想，一則是感到君勛先生在朋友心目中的偉大；同時，我也感到偌大一個中國，產生過這樣的偉大的「學者和政治家」，而這個年過八十的「學者和政治家」，在美國依靠女兒收入過生活，自己終

日開在一個不滿二百尺的小屋，飲食多親自操理，刊物上的文章三分之一是自己寫的，還得兼任校對。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當我想到這個偉大的中國時，連張君勳先生這樣的「學者和政治家」都養不活，或過得生活不舒適，中國的前途也實在可悲。

我為什麼要敬悼左舜生先生之時，而提到張君勳先生，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同是「學者和政治家」，如果我未弄錯，左先生的晚年生活清苦情況，恐怕還不如張君勳先生的好，這就令人「不勝感慨繫之矣」！讀書人、謀國的政治家，對於衣食本不重視，而且馬虎，他們是恥於爭衣食；而就一個國家情況而論，使國家碩果僅存的「元老」、政治家、學者，處於這樣的清貧地位，也就可哀了。我之爲此言，不是爲作古的左先生發牢騷，也不是借過世的人責備任何人，我祇感到像左先生這樣年老多病而且積蓄不多的學者，對國家社會盡過力量的人，應當得到照顧。

去年春李，左先生和張向華將軍住在我家以便飯，他那時雖已年老多病，而精神奕奕，談笑風生，並尤爲孟英題畫。當我以哀哀痛的心情寫此悼文時，孟英在旁連連嘆左先生音容，很感傷的說：「連國追念左先生紀念物都未留下，真是遺憾！」而我驚歎和他們同拍的有色影片，也因失光作廢。天地間連這點小事都不能如人意，寧不令人感傷！

回憶左舜生兄

李璜

左舜生兄久病不治，逝世臺北，吾黨健者，又剩一個，已足令人傷感！況舜生與我，少年同學共讀一校，中年同黨共事幾五十年，以至於老而流亡海外，相聚尤頻，故當其死訊傳來，悲悼之餘，引起我對於他的生平爲人行事的回憶不少。適傳記文學社劉紹唐兄拍來一電，說要爲舜生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出一紀念特輯，盼我即寫一篇文字

；在私交公誼上，我雖仍在寫書教書百忙中，也都無法推卸之。

不過我要在這裡寫左舜生兄，不寫他的生平大體大節，如像為國家主義及民主政治如何的艱苦奮鬥，至死不悔，等等，而我想特別寫出他生平做人行事的一些小節目來；雖並無關於天下蒼生，然而要真正認識一個朋友的本來面目，以至其不可及的地方，就在這一類平素對為學，對作事，對父母，對朋友，對生活趣味，為大家所認為最平凡處，可看出有其不平凡者在。因此臺北同志有電信盼我從學人及政治家的方面來寫一篇舜生的行述，我便推辭了。因為從少年中國學會、中國青年黨、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各個大學教授、國民參政會、農林部、以至於國民大會等等，中間經過可以紀念的事情，在舜生表現他的長處上，內容真是不少——這要相當的時間去搜集相當的資料後才寫得像樣；而且無法一個人去寫得恰到好處，雖則舜生與我同學共有五十多年（從民國三年至民國五十八年），但有些重要場合或我不在，有些重要事件我又記不清楚的，故我不如以朋友的身份，來寫左舜生兄「這個人」。在多年的私人交誼上這樣寫法比較合適，而且在我這幾天的傷感的回憶中，也多是下面這類事情。

書生畧帶名士派

舜生是生於民前十九年（一八九三）的農曆九月初四日，照十足算法是七十七歲。他與我相識，是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秋季上海震旦大學開學之頃。那時他的學名叫左學訓，年正二十一歲；我小他兩歲，年十九歲。都是初次從家鄉跑到上海這十里洋場來求學，土頭土腦，穿着既不入時，而又不懂得上海話，因此開學後便一見如故的大談起來。當時在震旦大學非教徒的宿舍裡，學生中江浙人算是一大幫，廣東人另成一小幫，少數長江上游與北方佬，則形成一幫雜牌隊伍；故分配寢室，四人一室，學校特別安排一番，就把我同會裏韓兄、左舜生兄與陳登格兄（我們都叫他「陳八」，詩人陳啟原先生的少子）規定住在一個寢室裡，會、左、李三人相熟，就從此時開始。慕韓更大舜生兩歲，他們兩人是新班生（我因法文早有根底考入為插班生），以年齡而言，二十歲以上才開始唸A B

C D，不免遲了一點，故他們兩人對於練習英法兩語（英文在農且算第二外國語），都不大能適應當時洋教授那種要死唸死背的教法。但他們兩人讀中國書史，唱中國詩歌，則有同好焉！一下課，闖起寢室門來，不是會唱村詩，便是左讀史記，並喜談論孫中山先生及梁任公的掌故及他們的初期文字與活動。我的功課比他們兩位多，要每週都應付一回考試，在這臥室裡，我簡直有點受不了，常常起書本跑到飯廳裡去。不過我也很羨慕會能將「社律」全部背唱出來，而左以他的長沙腔朗誦「項羽本記」，甚為有味。

當民初的教會學校，不大注重中國國文；農且大學只請了一位蘇州老秀才在教國文，我們一個字都聽不懂他的講授。每月出一考試題目，三班合試，限時當場交卷，則舜生必大出風頭一番，因為他每次考第一名，貼在課堂中。記得有一次這位八股學究出「一道國文題，叫作「白魚躍於王舟」。像這樣究應從何說起，我下筆實感困難，而舜生竟寫得大有意思，得了一百分。舜生的國學根底好，據他著的「萬竹樓隨筆」裡「關於田漢」的一節中，可以略窺其自幼即有修養：

「……記得我在高小剛剛畢業轉入到長沙師範的時候，同時開始了圖書館生活，學校功課在我只是次要，圖書館才是我的根本。長沙定王臺有一個省立圖書館，雖說不上怎樣完備，但書卷不少；辛亥前後所出版的新書，總算是應有盡有；即英文日文的書籍，也有一部份；而日報則在十種以上。定王臺這個地點是相當偏僻而且幽靜的，尤其是開窗窗外那幾棵芭蕉，遇着風風雨雨的天氣，更足以增加讀書的興會。其時熱心看報的人，每天還有十來個，經常在那裡看書的，則往往不出三五人，而壽昌（田漢的號）和我，却常有機會在那裡見面。……像這樣一種生活，大致經過了兩年之久。」

這種中小學生即如此愛好讀書生活，固然半由於舜生的天稟，也半由當時長沙的名流學者如皮鹿門、胡子靖等先生努力創辦中小學，誘獎青年，不遺餘力之故。

民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甚為流行。宿舍隔室的同學有江北籍能語言與我們外江佬相通者，看不懂其中的古典

語句，常來向慕韓、舜生請教，因為聽見他兩人讀書唱詩，成爲習慣，必能了解。慕韓還不惜精神，有問必爲之解說一番；問及舜生，則一律不加理睬，因爲江浙幫的同學平時很少與我們打招呼，而又好詼弄，舜生或認爲孺子不可教也。放假日子，舜生不願意與同學們鬼混，則喜歡一個人去看京戲，這是當其時慕韓與我都不能領會的。只有梅蘭芳初到上海，哄動一時，我們三人特同往一觀，這在慕韓，算得其對於娛樂的異數了！此外舜生也穿得壞，深灰長衫兩件而已。因爲舜生讀書費用全靠他在江都縣政府當師爺的一位胞兄寄有限的錢與他，非省用不可！

不過對於吃，我們是不惜「孤注一擲」的。我們與相距不遠的同濟大學中幾個同鄉學生，如魏琦珍、胡澗之等相約每半月一個週日去吃一次四川館子，每人出一元錢，號曰「一元會」，舜生也常常參加，每次必酒醉飯飽而歸。因爲學校伙食，兩三元錢大洋一月，其價雖廉，實在太壞。即使無「一元會」的時候，有時舜生也拉着我走路跑到三馬路老半齋，一人出兩毫錢，去合吃一盆麵粉之類。舜生喜歡這類小吃，自年青時即已習慣，或者是他獲致胃病的原因。除吃之外，則上課後，朗誦書史與高談濶論，旁若無人，也無怪同宿舍的少數同學要暗中譏評我們爲怪物！

對親查孝對友誠

舜生在滬且只住了兩年多，因其胞兄病故揚州，無款接濟而只得廢學（慕韓則只住一年便去日本留學去了）。我於民七（一九一八）年底，由北京轉上海搭船去法國留學時，已與舜生相別兩年有多。但因我上船期迫，只在上海與舜生匆匆一面。但其時少年中國學會已經發起，慕韓在上海辦「留日學生救國團」與救國日報；慕韓好結交朋友，因之舜生的朋友也比較多了起來。其時舜生是否還在黃伯度先生家教私館，或已進入上海中華書局當編輯，我也記不清楚，但舜生的隨筆裡是有記載的。

在民十三（一九二四）之秋，慕韓與我感到反共抗俄的工作十分緊迫，剛於九月從法國回到上海，立刻在那年

雙十節便出版了「醒獅週報」，但如果沒有舜生、啓天及少數「少中」好友的助力，「醒獅週報」是無法出得那樣快而且好的。因為我自法回國住上海不幾天，便去國立武昌大學教書去了。蔡韓從來不長於料理瑣務。因此舜生不但爲醒獅做文章（舜生每期都作短評，別號「黑頭」，筆力鋒銳，胡適之在「蔡韓逝世十週年紀念號」曾提到「黑頭」的文章，但適之誤會這別號是蔡韓筆名），而且包辦交涉印刷，最末一校，以及發行寄出等等麻煩工作。

我雖在武大教書，年暑假總是要到上海來過的。我感到的最難得的是，蔡韓、啓天及其家眷都與舜生家眷同住。在上海靜安寺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兩樓兩底的弄堂房子裡，還要拿下面的一廳來作醒獅週報的發行處，又要招待其朋友。蔡韓登報請贊成者與投稿人都可以約期在發行處相晤，因此分別接見的青年朋友相當的多，而三家人大大小小又都擠住在這一所房子裡，真够繁忙了！舜生時於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似是戶主，而蔡韓、啓天兩家似是分租。如果舜生不忍耐着他與我在曠且同學時那種獨來獨往的名士派頭，而對朋友，從交情到事業，都未具足相當的誠意，則他們三家人不會擠着住上兩年之久的！那時舜生、啓天兩人在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立定了腳，而且還教了幾點鐘的書，蔡韓也在大夏大學教書；分開來住，也各有餘力去租一小房子的。但大家教書、賣文、當編輯所賺來的錢，除供家用外，初而津貼辦報，繼而津貼辦黨，廣交朋友，也是要用錢的。所以我在那時從武昌到上海來臨時幫同他們做一點打雜工作，我感到他們三人爲事業對朋友的誠實，都是難能而可貴的！

等到我於民十六年（一九二七）以國家主義反革命派的罪名而被通緝，在國立四川大學不能再教下去，於是年秋間關逃到上海；則蔡韓早幾月在上海被捕一次，由王亮鳴先生設法保釋，而避往日本；至舜生則由中華書局資助他去了法國。上海也成恐怖世界，友朋星散，我爲支撐中國青年黨總部這個地下組織，以便暗中與各地支部發號令，遞消息，晝伏夜動，相當辛苦。幸而「清黨」以後，上海漸漸安定下來，舜生也於民十八年（一九二九）春從法國仍回到上海，在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仍舊作事，而且地位更見重要。因爲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鑒於商務印書館搜古版書，在出逃芬樓藏書，而他要起而與商務競爭，特請舜生爲之搜買舊書。舜生一向本爲中華編輯新書，並

出版新文化一類的叢書，所以他曾拉「少中」會友田漢、張聞天等當過一時中華的助理編輯，啓天除專爲中華編輯「中華教育界」雜誌外，也有時幫助舜生拉新文化叢書一類的稿子，我在法及回國後所寫的書近七八種，都交與上海中華書局印行，也是這個原因。這一搜買舊書，以舜生既好讀書，又辦事認真，乃一部一部的細看，把舜生的中國近代史的學問工夫助長得與日俱增了，而養成舜生以一窮書生的買書之癖，也在這一個好與舊書商打交道的機緣上。

這時起，舜生大概已是中華書局總編輯的地位，月薪較前略豐，於是他把老父母都迎養到上海與之同居了。但以上海的生活日高，收入所得，對於仰事俯畜，仍只得省吃儉用。舜生住的仍是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這種房子，進大門一個小天井，前進一樓一底多半只是十尺乘十尺方，後面則又一更小的天井，背後即是一個小廚房，廚房頂上一小屋，稱爲「亭子間」。（廚房例過後巷，可以進出，故這種房舍的構造，雖小而光線並不錯，每房都有前後窗，空氣流通。）舜生夫婦帶着小兒女住前進樓上，看書作事都在其中；其老父母則住在亭子間。前進樓下當然非作客廳不可。但是這個小客廳，常常被我們少數窮朋友霸佔爲臨時打鋪夜睡之用！

有一個時期，中宵的黨務較忙，我要隨時奔走於南北之間，連在上海教幾點鐘書的工作都放下了。回到上海，則往往弄一個行軍牀，夜間便在舜生的客廳攤開，作爲臨時客棧。本來客廳裡還有一張長藤椅，也可以用來過夜，但每爲張夢九兄所獨據；跑進來，倒下去便已呼呼大睡；我只好自備一個行軍牀；擺地舖，在客廳磚地上不大相宜。要吃飯，則交錢與左大嫂與我們這班惡客做。舜生一早向老父母問安後，則從廚房後門溜去辦公，怕驚擾我們惡客之夢。

這大概是在民十八之冬至十九之秋，有近一年時期的中間，地點記得是靜安寺路底右側一個叫「隨雲里」的弄堂裡。其時他的老父還在，已不大健康，老母則甚健，也愛打幾圈麻將牌。其老父所最重視的，是他從家鄉帶出來的一個長形立座木盒裝的「左氏堂上祖先神位」木牌，他把這神位牌供奉在前面小客廳裡靠壁的一個長捲几上，每早

必來燒香作揖。他每一拿着三根香，咳上一聲，進小客廳來，就不管我們這少數惡客的起床鈴響了，大家趕快爬起來跑到廚房裡去洗臉！

舜生既喜歡戲劇，當時他有兩位湖南同鄉好朋友，田漢與唐槐秋，都在搞新劇，各有各的劇團組織，各唱各的本手好戲，我不大能欣賞，舜生則特別起勁，常與周旋。田漢的南國劇團人馬尤多，男女青年不少，有時便免不了要到舜生的小客廳來玩玩。舜生既白日有定時的工作，而田漢或唐槐秋帶着他們各認爲自己的名腳兒便多半是晚飯後來舜生家坐坐，談得甚爲高興，深夜才散。這一來，把舜生的老太爺對於他所供的祖先神位引起恐懼心理來了！他老人家夜裡九點鐘便睡了，不知道這班朋友至遲也玩到十點鐘就走了。老人家平日對於我與夢九在神位前高臥不起，覺得這是男人尚無所謂。及至看見少男少女，嘻笑聚談，至於深宵，在這小客廳裡究竟有無異動，污及神位，那就有點不放心。因之，有一天，他忽然將這個木盒神座搬往廚房間的高碗櫃上面去放着，早晚在廚房燒香。從此，我有時在小客廳裡可以睡一次懶覺。

一生愛作名山游

舜生與我的生活興趣都是多方面的，不像慕韓念茲在茲的以政治爲唯一生命。舜生除文藝外又喜遊山。在抗戰之前，只要我在上海，每逢假日，舜生總要拉着我離上海去遊江南北的名勝之地。或去鄞尉觀梅，或往嘉興遊湖，或特別跑到焦山去吃鱖魚，或冷清清的去揚州遊瘦西湖平山堂。因之舜生每遊偶有小詩，但不存稿。如遊揚州，我還記得他兩句詩是：

春盡江聲又江北 我來猶及杜鵑紅

但舜生爬山的體力並沒有受過鍛鍊，不像我十五六歲便年年趁暑假爬青城山，比較操之有素。一次，我們兩人從西湖遊罷，乘公路車，以半日程到了黃山去遊覽，因爲那詩許世英先生等正在宣傳黃山朱砂泉及新設旅社，引人

入勝。黃山的高峯奇石，固然美觀，然而把舜生却上下得很吃力；一返到杭州，便入澡堂叫茶房捶腿，說是簡直走不動了！後來抗日戰中，三十一年秋八月，他一來成都，便約我去遊青城。我那時料理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川西辦事處徵糧的工作甚忙，一時無法抽身。只是楊叔明、夏濤聲陪他先行上山。我笑他，你不怕腿痛又走不動。他說：「你們四川這種滑竿的教法及驢夫的技巧，對於腳力不強而喜遊山者，真是大有幫助。」他堅持要在青城第一峯等我快遊一日，我只得於八月二十日，用黃包車與滑竿加速進行，以大半日行七十里，傍晚趕上了青城第一峯。我記得甚清楚，因為我有詩一首為證（我寫回憶錄的年時，如果沒有備忘筆記，我便在我的詩抄上查），證明我們當時雖在應付戰事甚忙，而遊山的興趣仍很高：

朝發成都，夕登青城第一峯，追陪舜生、叔明、濤聲諸兄峯前觀落日

不負追陪憶，峯前落日遊。霞光明滅幻，樹影淺深移。鳥響因林靜，蟲繁覺露滋。頓忘塵世熱，秋思滿山

睡
可惜第二天，我只能留連半日，又須下山趕返成都辦公，未能盡興。但可喜的是下山半途遇見易君左兄，他們兩位湖南朋友得在中途暢談，讓我溜走了！茲遊雖短暫而興會特高，以後殊少有了！回憶起來，叔明至今生死未卜，而濤聲與舜生相繼下世，言之惘然！

三十三年夏，舜生到了樂山，又來信約我去游峨嵋山。我適因事要去重慶，特繞途自成都南下眉州，沿南甯江而止於樂山，同舜生自西線入峨嵋山，經過普賢寺，而第一日宿於華嚴頂。是處正是不久時詩人趙堯生與陳石遠兩先生來遊宿此，大徵其詩的一個僧寺，其客室尚懸有趙堯老的一首五律。次晨又經洗象池，攢天拔，而止宿於猴巖的金頂寺，猴子、佛燈、佛光等大家特別來看的，舜生都認為平常者也，值不得大驚小怪，而他特對峯巒之秀，白雲之多，大為讚美。在金頂臥雲菴中，一開房舍的窗子，則白雲好像棉花或輕烟樣遠遠湧擠而來，攢入窗內，裝滿一屋，真臥雲也！

歸路從「錦屏」下山，山路甚險，下坡時，滑竿快子真有大傾；但滑竿做法雖能適應上坡下坡，如果坡路太斜，則坐客坐在兜內的斜度過大，人亦不大舒適。下錦屏入九老洞廟宇，時間雖只過午，然滑竿快子與客人都有倦意，不想再前行了。九老洞廟甚修整，其待客的設備也較我們來時所經各寺為整潔。安排臥處既定，舜生便打主意要吃和尙一頓像樣的晚餐。因為我們經行止宿的廟宇，照一般辦法，並不驚動大和尙，而一任「知客」安排，平常待遇，吃得當然甚為粗糙。尤其在峨嵋臥雲庵所吃之飯，完全是生飯（空氣稀薄，飯更不熟）；下山到洗象池，那裡完全是猴子世界，我們午飯時，猴子跑來正與和尙搗亂，舜生與我又未吃飽。因之舜生破例去告「知客」要大和尙來招待李主席。我聽見不以為然。他說：「你本是國民黨政會的李主席，並非冒充主席，有甚麼叫不得？」等大和尙來歡迎你時，叫你主席，你只是答應着，而不要說你這個參政會的主席並不值錢。和尙也不敢問你是那種主席的。林森主席就在下面洪椿寺隨時住着，這裡和尙必更能感到「主席」兩字威風的。」

果然，舜生開玩笑的做法有效。大和尙請我們兩人到方丈室去「坐上坐」與「泡好茶」。夜間一席素餐，四菜一湯，做得特別合口味。而且次晨隨行，既不敢收房飯錢，大和尙看我們上了滑竿，還說「招待不週，多多原諒。」恭送如儀。我在途中笑問舜生道：「你在那裡學來這一套騙和尙好東西吃的本領？」舜生笑道：「這是人人都在如此說法，我無非對俗僧如法泡製而已。」我詢以如何預知九老洞的大和尙是俗僧。舜生道：「你沒有看見該寺第二殿中間供的是財神菩薩趙公明嗎？」

十幾年來，偏居香港。在這小島之中，也還是開門見山，舜生住在鑽石山，可以說在獅子山山腳下。然而香港雖羈島皆山，但比之於青城、峨嵋，則舜生殊打不起從前那種興會，特別跑來約我遊山了。只有一次，在十五年前，他初搬到鑽石山，我同着妻子兒女去看望他；他約我們出來在附近的華清池花園小遊了一會兒，那是一個已半荒廢的人工園亭，中間全無邱壑（我們留有一影，我至今珍存之）。這算是舜生與我在山水之間的最後一次，以後便只是上課或應酬在鬧市隨時點頭談談，毫無雅趣。然而我們偶然談到昔日之遊，他心目中是永忘不了幾次名山之

遊的。故他在十四年前，我六十歲生日，他贈我一絕句，頭兩句是：「談笑居然六十翁，名山無份霸圖空，」雖云壽我，亦夫子自道也！

不信醫藥足為戒

瑣瑣寫來，已盡十五張紙。今天二十四日，再不航空寄出，就趕不上十一月一號「傳記文學」紀念舜生的特輯了，故只好就此把這一回憶錄停下。因為我與舜生長期同學共事，在我的「雜館室回憶錄」長篇裡還是寫得不少，將來仍舊要發表的。不過我要添上幾句話，就是舜生一生仗恃體力強，興趣高，任情直往，不信醫藥，以致把他的病體就壞了！這一點，我不能不寫出來，以為任情浪用老年的精神，不知息氣惜力，且把醫藥不當一回事的這種朋友作為戒。

記得在民十九年（一九三〇）之多，舜生到天津來開青年黨大會，那時北方猩紅熱流行，舜生不幸也被傳染上了！大會剛開畢，他住在日本租界一個旅館裡，我去看他，見其熱度高得特別，倒牀呻吟不已。我立命某房立刻請一個西醫來。請來是一日本人。他一加檢查，立刻證明為猩紅熱。這日醫中國語說得很好，他說：「這在中國人叫『爛喉症』，拿鏡子一照便知。」我一照舜生喉頭，果然不錯。日醫主張非立刻送傳染病醫院不可！不然病人既危險，而傳染別人也容易。舜生堅決反對，說他明後天就要回上海的。日醫只好與舜生打了一長管特效藥（大約是五十CC），並囑多買蘆竹根，用大碗泡水，不斷的喝。並且日醫再三說：「我醫過，而不去報警送傳染病醫院，我是有罪的。最好早點搬出旅店，你照料他，要當心傳染！」我只好多給日醫十元大洋，以免他去報告警局。但我仍舊勸舜生入醫院。那時他打針之處漸漸發痛起來。我將蘆竹根買來，用大碗泡了兩碗，給他喝以外，並用絲毛巾不斷敷着他的疼痛之處。蘆竹根水喝了四五大碗，熱手巾不斷熱敷，痛也漸減；鬧了一夜，舜生於晨間睡去，我也倒在沙發上睡去。到了午間，舜生之熱果然大退。我親自再去請這日醫，他不來了，他還是主張快送醫院，否則趕快搬

出旅店。他說：「燒一退，傳染別人更容易啊！」舜生還是不聽醫生之言，第二天，便擰住病體自天津上車回上海。我送他上車，還再三囑咐要信醫生之言。但舜生不以為意，回到上海以後，他倒慢慢爾養好了，不過把他全家大小都染上猩紅熱症！

舜生在美國四個月連發兩次胃出血。醫生勸他割治，他不願意。這是不信醫藥的一個大錯誤！舜生胃病是十二指腸潰瘍，最普通而一割便無事的。但他要留著這個刺處，回港後隨時作痛並出血。經年大便常有黑血塊塞住，要叫池正兄（這位醫生老朋友很難得）去用手挖了出來，而他不肯去早加根治，以致愈拖愈衰頹，後來百病叢生，便終於不治了！不勝痛惜之至！

左舜生先生的生平

陳啓天

五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在左先生治喪委員會報告

左舜生先生，原名學訓，字舜生，中年以後以字行，筆名仲平，黨號勝公，湖南長沙人。於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四日，即西曆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三日生於長沙。八歲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四年。十二歲入長沙官立第十八初等小學肄業四年，除注意正課外，並特別歡喜看戲、看小說、聽說書、聽講平（話），養成一種欣賞文藝的興趣。十六歲入長邑高等小學，四年畢業。民國元年入長沙縣立師範肄業半年，嗣入外國語專門學校肄業一年。民國二年由長沙赴上海入震旦大學肄業三年，與同學會琦、李璜、黃仲蘇諸先生相友善。後來會琦先生邀請舜生先生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及中國青年黨，即由於他們曾在震旦同學頗有交情。民國七、八年間，舜生先生在黃仲蘇先生南京家中教讀黃東生女士等。

民國七、八年之交，左先生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從此交遊徧於海內外。民國九年，是左先生一生事業發軔之年

，有兩件大事，值得一提：其一、為左先生接替王光祈先生擔任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兼編少年中國月刊，（上海泰東書局出版）聯絡散居國內外的一百餘會友，照料會友的往來、通信、匯款、以及著作出版事宜。當時左先生為會友熱誠服務，頗為全體會友所推重。其二、為出任中華書局編輯，主持新書部，兼編中華教育界月刊，陸續引用少中會友陳啓天、余家菊、田漢、張聞天、曹錕、金海觀、舒新城等人入中華書局任編輯，先後編印新文化叢書、教育叢書、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以及王光祈著音樂叢書等數百種，頗能銷行一時，深得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及翁繼廬所長戴克敦先生的信任與嘉許。

民國十三年秋，曾慕韓先生由歐歸國，下榻上海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與左先生和我同住。曾先生提議聯合少中會友十餘人發起創辦醒獅週報，鼓吹國家主義，反對共產黨，由曾任編輯，左任經理，負責校對與發行，經費由發起人共同擔負，稿件亦多由發起人供給。醒獅印刷之精良，校對之無誤與推銷之廣泛，皆得力於左先生之切實負責。在醒獅週報出版前後五、六年間，即自民國十年至十五年間，我們曾與共產黨在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及醒獅週報上爭論多次，左先生皆曾參加。原來少年中國學會自民國七年發起以來，即着重文化學術方面的社會活動。不料共產黨於民國十年成立以後，已有少數會友，如李大釗、鄧中夏、恽代英、毛澤東等，暗中參加了共產黨。這些共產黨利用會友關係，企圖赤化少中學會。於是在學會內部，始而引起社會活動與政治活動之爭，繼而引起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在這兩次連續爭論中，左先生始而贊成社會活動，繼而贊成國家主義，而於民國十四年春加入了中國青年黨，開始走上政治活動之路。我們與共產黨爭論到民國十四年夏的南京年會，激烈達於極點，不能再開年會了。從此少中會務亦陷於停頓，無法恢復。不過共產黨最怕我們公開批評他們篡奪國民黨的陰謀，希望我們停止公開批評。於是鄧中夏、恽代英、楊賢江等於民國十四年冬某日同來上海左先生寓所商談，由左先生與會聚斝、楊效椿、陳啓天四人與他們對辯，另外尚有會友方東美、謝澐初兩先生在座觀戰。鄧中夏等提議彼此停止公開批評。我們則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需要，共產黨不是純粹的中國政黨，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掛羊頭

賣狗肉，太不道德。因此種種理由，我們不得不公開批評。這次辯論，由早晨到深夜，沒有得到任何結果。野中夏等乃決快而去。從此我們便與共產黨完全決絕了。

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醒獅社同人曾與商報主筆陳布雷先生、孤軍社負責人何公敢、陶希聖、薩孟武諸先生聯合舉行座談會多次，交換救國反共的意見，左先生均曾參加。

民國九年至十五年間，左先生除努力以上所說各事外，並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寫有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及辛亥革命小史，編有中國百年史資料初編及續編等書，均由中華書局出版。這幾種書的出版，確立了左先生終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礎，也引起了我國學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興趣。

民國十五年八月，左先生赴法留學，翌年八月返國，仍在中華書局編輯，至二十一年始離職，前後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共有十一年多。在左先生出國的一年中，中國政局已發生大變化，國民革命軍已由廣東發展到長江流域，國民黨已於民國十六年四月開始清黨反共，共產黨已於民國十六年八月以後實行暴動政策與土地革命政策，醒獅週報不能再在上海公開出版，青年黨已由公開活動轉入地下活動，我已於十五年底離開中華書局，過了流亡生活十餘年。左先生由法返國後，雖仍在中華書局任職，然因有以上所說種種新情況，只好暫且埋頭看書校書。

民國十九年共產黨在長沙暴動以後，左先生常在劉共半月刊上以筆名發表主張，提醒朝野各方注意共黨復活的危機。九一八事變後，左先生又常在民聲週報上鼓吹「停止內爭，一致對外」的主張。一二八事變起時，左先生曾在上海協助十九路軍抗戰。及滬滬協定與塘沽協定相繼締結以後，左先生深感到日問題之嚴重，乃於二十三年七月應蔣委員長電邀，赴廬山貢獻意見。二十四年七月左先生出任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以求一面促成國青兩黨合作，一面準備全面抗戰。同年四月，左先生應聘為政治大學教授，主講近代中國史，至三十年才解職。左先生認為當時我國抗戰準備尚不足，宜多方設法延緩日本的繼續侵略。乃於二十五年夏，以私人資格訪問日本，希服脫服日本軍人稍安勿躁。不料日本軍人氣憤萬丈，毫無通見，不聽左先生的勸說。左先生只好想歸國，請政府

從速準備抗戰。七月，變前夕，左先生出席廬山談話會，擁護政府全面抗戰決東。二十七年四月左先生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交換信件，公開發表。青年黨由民國十二年奮鬥到此時，始得到朝野的公認。二十七年八月，青年黨在漢口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本黨時局方針，為「擁護政府抗戰，促進民主政治。」並改選左舜生為本黨委員長，左先生為本黨常務委員，主持宣傳。本年左先生曾在漢口創辦國光旬刊及新中國日報，以擴大抗戰宣傳。漢口撤退後，新中國日報遷至成都，改由宋達波同志負責，發行至民國三十八年。左先生則留在重慶，改國光旬刊為國論週刊，發行一年。

自七七事變到勝利復員十年間，政府為團結全國一致抗戰建國起見，初設國防參議會。（二十六年冬）繼設國民參政會（二十七年七月至三十六年），左先生均曾參加，並曾任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及駐會委員。國民參政會是戰時民意機構，包含有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二百人至二百九十人。左先生在參政會時期，特別注意以下兩大事：其一、為協調國共兩黨關係，以求保持全國團結。經過數年努力，毫無結果。三十四年七月，左先生曾與五個參政員同赴延安作最後努力，乃更徹底了解共產黨別有企圖，無法協調。其二、為促進民主，以求中國早日實行憲政。左先生除在參政會會提促進民主案外，並於民國三十年，與張君勱梁漱溟先生發起「民主政團同盟」，創辦「民憲半月刊」，以擴大民主憲政運動。三十三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為民主同盟，致令共產黨得有機會滲透。民主政團同盟，原來不收左傾份子，今竟為共產份子所滲透，左先生只好於民國三十四年秋斷然退出民主同盟。從此以後，左先生與民主同盟在政治上背道而馳，各不相干了。

左先生經過過去七八年的努力，對於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深感失望。乃轉移努力的方向，重新注意青年黨的重建工作，而不願參加行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要在戰後重建青年黨，首須召開全代會。於是左先生發起並參加三十四年十一月在重慶召開的全代會。選舉結果，左先生仍任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會後新中央黨部派定老同志分赴全國各地辦理黨務復員工作。左先生任本黨東南黨務復員委員會主任委員，於三十五年一月偕同委員二人，由渝飛

滬，辦理東南黨務復員工作。經過五六個月的努力，租定中央黨部辦公處，創辦中華時報，設立人文研究所，恢復京滬市黨部及蘇浙皖省黨部。本黨中央黨部乃得於三十五年五月由重慶遷至上海海格路辦公。

三十五年一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雖有五項決議，但以共黨毫無誠意，遲遲不能實施。政府不得已，乃決定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於事前派人赴滬接洽，希望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一致參加國民大會。於是左先生與各方人士於十月二十一日同赴京奔走調停。共產黨拒絕調停以後，左先生即主張國民大會開幕延期三天，以便各方提出代表名單。青年黨於十一月十五日提出代表名單一百人後，由左先生代表青年黨發表聲明，決定參加國民大會。民社黨及社會賢達亦相繼參加。於是國民大會成爲國青民三黨與社會賢達共同制憲的局面，而不再受共產黨糾纏的影響。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五日開幕以後，左先生當選主席團主席，力主大體維持政協憲草，以求確立民主憲政規模。

三十六年四月，左先生出任行政院農林部部長，至三十七年底始解職。三十七年，左先生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席該會第一次會議，當選主席團主席。

三十八年四月，左先生由上海來臺，九月赴香港。左先生旅居香港二十年中，除繼續努力愛國反共宣傳，撰述近三十年見聞雜記、近代中國史四講、黃興評傳等書多種外，曾先後訪問日本數次，赴美講學一次，致力於國民外交工作。又會先後來臺數次，以與此間保持聯絡。四十三年來臺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當選主席團主席。旋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至今。五十七年九月來臺，遵蔣總統的叮囑，促成青年黨的團結商談。五十八年七月抱病來臺出席青年黨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本黨主席，完成全黨團結。會後返港，舊病復發。乃於本年九月十四日來臺，入榮民總醫院治療無效。而一代舉人兼政治家的左舜生先生，竟於本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溘然長逝。這不但是青年黨的大損失，也是國家的大損失。

自民國九年迄今五十年間，我與左先生爲愛國民主反共運動而共同奮鬥，關係密切，甘苦與共。而今而後，不

克再見着左舜生先生，中心至為悲傷。所有左先生生前的好友，也必定一致悼念。我為悼念左先生，寫就輓聯一副，如下：

綉交五十年，切磋琢磨，共矢艱貞圖報國。

遠難千萬里，造次顛沛，惟餘忠憤望收京。

悼念政治家史學家左舜生先生

胡國偉

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青年黨主席左舜生先生，不幸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這不僅是青年黨的損失，同時也是國家的損失，朝野人士，同深哀悼！左先生寄居香港九龍鑽石山大觀路惠和園，與香港萬頌園為鄰，平日過從甚密，站在青年黨同志的立場，筆者尤其不勝悼念，而不能已於言。

左先生從政清廉，治學勤謹，是一位有主張、有氣節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有修養、有品格的學人。現在就政治與學問方面，根據若干事實，來談談左先生的生平。與他相識的，或許於此可增加一點了解，與他不相識的，也可從文字裏面想見其為人。

民國三十六年，行政院改組，中國青年黨決定參政，推舉左舜生先生出任農林部長，陳啓天先生出任經濟部長，另推舉振文、楊水浚同志為政務委員，組成聯合內閣。青年黨之所以決定參加政府，惟一的理由，是與執政黨衷誠合作，敞開民主的局勢，表示訓政時期已經過去，憲政時期正在開始。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左先生正好在這一大事上承擔了一個主要角色。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余從廣州到南京，參加青年黨中全會，左舜生先生在紀念冊上寫余題字留念，寫的是論略

兩句話：「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時左先生在農林部長任內，由農事而連想到「足食」，乃是很自然的理念，也可說是他從政的抱負，但最主要的還是一個「信」字。「民信之矣」的意義，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全民愛戴。立信是為政之道，也是治民的基本條件，政府固要立信，作為一個政治家也要立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輮，小事無輮，其何以行之哉？」凡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政府和政治家。左先生重言諾，從不失信於人，如呆講話不算數，便不成其為政治家。左先生為我寫紀念冊所用的雖是聖人之言，但徵諸他生平言行，也未嘗不可當作他的心聲看待。我記得很清楚，那本紀念冊是在南京曾故主席蔣先生的公館寫的，曾先生也有留言，並錄詩兩首贈勉，現在，墨澤如新，而會在二公已先後作古，京華迥夢，無限感傷！左先生在紀念冊上，對我以「學兄」相稱呼，儘管我們都是留法同學，但真正的意義是同志，因為青年黨在秘密時代，以學校為黨的代號，所以稱同志為同學，或稱學兄、學長。在紀念冊留言的，均屬二十年黨齡以上的青年黨老同志，所以我願之曰「老青一色紀念冊」。而今，披冊細看，有的在大陸被中共殺害，有的飄魂海外，像左先生這樣回到祖國懷抱，安詳遠逝，可說是懸天之惠。故交凋零，痛不絕於余心，固不僅為左先生哀，且亦為吾黨哭也！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左先生連難到港，在九龍鑽石山租屋而居，其間搬遷一次，就一直住到現在。十餘年來，左先生在港以教書寫稿為活，相當清苦，但絕不因窮困而動搖他反共救國的意志，對共匪暴政，口誅筆伐，不遺餘力，在反共宣傳上，收效甚大。約在五六年前，靠攤份子程思遠，到港進行統戰工作，專程拜訪左先生，兼欲勸左先生回大陸，因大義難犯，不得要領而退。左先生送他出門，被守候在門外的紅色小鬼攔取了一個鏡頭。事後，我問左先生：「萬一那張照片流傳出去，會不會引起麻煩？」左先生說：「我左某反共，人所共知，政府也相信，誰也沒法把紅帽子戴在我頭上。那照片頂多是帶回大陸去，為他們的差事報銷，此外別無作用。」以後左先生亦慮之泰然，若無其事。這正合諸語說的：「人窮志不窮。」窮且益堅，正是書生本色。

左先生一到香港就同窮，他從宣海中所贏得的只有兩袖清風，此外別無長物。他生平最大的財產，就是藏書。

從書房到客廳，四壁都是書冊；坐擁書城，治學不倦，寫作不厭，這便是他旅港十餘年來的生活寫照。然而，有時窮起來，就連他自己心愛的書，也不能不賣。大約是十年前的事，左先生賣掉一部原版古書，價值港幣二千元，買主是美國某大學，原因是屋租到期，不願失信。我對他說：「賣掉這樣珍本的古籍，未免太可惜了！」他用兩句警噱宮詞作答：「英雄賣馬，壯士賣劍。」說完搖頭一笑。學人賣書，豈甘願哉？不得已也！

儘管因窮賣書，但手上一旦有錢，却又盡量買書。前年左先生在東京買了一批有關日本文化的書籍帶回香港，並請一位日籍太太教授日文，以便自己直接閱讀。年逾七十老翁，尚如此勤奮，真令人敬佩！左先生曾對我說過，準備以三年時間，對中日兩國受之西洋文化的得失，作比較的研究，要寫一部有份量的書。只可惜這部巨著尚未完成，左先生便溘然長逝，就學術方面說，真是沒法補償的損失。

綜合上述若干事實來說，可用孟子的話來作為左先生的蓋棺定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所謂大丈夫，在政治上便是有主張有氣節的政治家，在學術上便是有修養有品格的學人。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劉紹唐

——寫在左舜生先生逝世紀念特輯的後面

左舜生先生不幸於本年十月十六日病逝臺北，本刊（傳記文學）倉促間編印「紀念特輯」，用以追悼這位曾為本刊撰寫「黃興評傳」長稿的作者。

本期「紀念特輯」，從編輯到排印，雖僅一週多的時間，但內容却極為充實。「特輯」包括了七篇大作，遠在香港的李幼樁先生與近幾年不常動筆的方東美教授都為我們寫了文章。我們毋須一一介紹，讀者自可欣賞。我們深

信這七篇文章，都將是左先生傳記中最重要的材料。

近幾年來，左先生以治近代史的前輩，對於爲中國近代史而工作的本刊，有一份極爲深厚的情感。無論是與編者通信或臨面談話，都隨時流露出他那份愛護、關懷與支持的誠意，非常令人感動。這份誠意正足以代表左先生的書生本色，也是在許多政治家的面孔上所不易看得到的。

在出版界，左先生也是前輩，他做過書局的編輯，做過報館的工作，他自己最津津樂道的是他辦過集寫稿、編輯、經理、發行、跑印刷廠、跑郵局於一身的雜誌。此中甘苦他最清楚，體會也最深。因此他同情搞出版事業的朋友。左先生固窮，但此間某出版社未徵得他同意，同時也沒有付他分文版稅，竟擅自編了一套「左舜生選集」出售，他知道了並不以爲忤，反而說：「這一定是些窮朋友們搞的，讓他們賣幾個錢算了。」同時他還稱讚這套選集「花過功夫」、「選得不錯」哩！這種幽默與氣度絕不是一般拿筆桿的人所能做到的。

日本問題是左先生晚年最感興趣也是最爲憂心的一個問題。他的見解與以前經常爲本刊執筆的已故金問泗先生頗多相類，他們認爲日本雖受戰敗的創傷，但二十年來又變成亞洲甚至世界上最有力的國家，而中日問題將來如處理不善，早則三五年，遲亦不出十年，必再趨尖銳化。左先生懷着這種憂國憂世的心情，一直在日本問題上下苦功夫。去年此時，他在的一封信中告訴編者說，他正在從頭學習日文，並且準備有計劃的看日本通史、文化史、外交史與經濟史等。他說每個月要耗費八十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在日文的書刊上，這是他的興趣所在，也是他此次致病之由。他明知「工作已非我的年齡體力所能勝任」，仍想「就此一大題目作一澈底探討」，「假我三年至五年，必能得一結論。」誠如他信中所說：「生年不滿百，常憂千歲憂」，左先生還殫不知「老之將至」、「死之將至」的精神，實足令人欽佩，也是最值得年青朋友們學習的地方。

爲了悼念這位治近代史最有功績而又兼出版界的前輩，編者特將上面所引述的一封信製版刊出，公開給愛護本刊與左先生的讀者。

左先生原信如下：

網唐兄：

上月二日信收到已一月，今始作復，甚以爲歉。

弟上月病了兩次，經醫診治，刻已痊好。現決定本月十四日乘中華航空機飛臺，以往榮民醫院檢查身體爲主。如醫生認爲尚可支持，便於十月一日飛日。以第三數年來有一問題，不斷在繼續研究，非着一部分日文的日本通史，文化史，外交史，經濟史……不可，而本年十月，他們大開明治一百年紀念會，有許多文獻，過去從未以原件發表，也很想順便一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過去一百年，我國殆無時不受日本困擾，今次亞洲有力的國家仍推日本第一，快則三五年，遲亦不出十年，中日問題依然要趨於尖銳化。過去造成兩國必以兵戎相見，結果則兩敗俱傷，實由雙方處理不善，其咎不全在一方。弟不揣冒昧，擬就此一大題目作一澈底探討，假我三年至五年，必能得一結論，此不僅爲目前計，實爲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作想也。弟正式學習日文已滿一年，（過去學過兩次均無成績）合上課、預習、複習計之，每月殆耗費八十小時以上，而其他書籍的瀏覽，仍不能廢。工作實已非我的年齡體力所能勝任，致病之由，原因在此。此次如旅費充裕，擬住在一日本友人家中兩月，看書疑義可向他們請教。語言也非被迫練習不可，但事實目前還不能確定。

再爲弟出一本小冊，實際上出兩冊亦有可能，但須經過一番訂正補充，出版或須待至明年暑假前也。此事弟原則贊同，俟見面時再作具體決定。此復即頌 文祉

弟舜生字上 九月二日（五十七年）

信末所寫「再爲弟出一本小冊，實際上出兩冊，亦有可能。」係指本刊計劃編一本正式的「左舜生選集」而言。左先生原則上已同意。可是今年暑假他爲青年黨團結事，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待他九月間再度來臺，下機後即入榮民醫院，本刊所編選各文，他已不及「經過一番訂正補充」，就與世長辭了。

敬悼左舜生先生

吳 壽

左舜生先生病逝於臺北榮民醫院消息傳出後，海內外無論熟與不識，同聲嘆息。左先生一生

功業留在當時，學問垂諸後世，不待蓋棺已有定論，何待我來多說。不過，近十年來我與左先生

遇從甚密，對左先生爲人也了解較深，謹就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簡略寫出，以誌哀思。

在香港流亡二十年，其中有十年時間我同左先生是近隣。他住鑽石山，我住大喇村，中間只隔一個小山坡，三分鐘可達。在那十年的時間，每星期最少總有一個晚上，我要去看左先生，在他那間書房裏，上天下地談天。我對左先生雖然事以師禮，但我畢竟未聽過左先生的課，所以他也不以門弟子待我，因此談話沒有什麼拘束，莊諧雜陳，往往談到深夜都不感到疲倦。

回憶那一段時間談話內容，大體可分爲三點，第一是國家世界大事，左先生的看法確爲人所不及，十年前他對世事所下的判斷，對共產黨的批評，到今天皆若合符節。第二點是談近代史，左先生是近代史權威，我也喜歡研究近代史，所以我們所談問題，以這方面佔的最多，我得到左先生的教益，也比在學校讀書時爲多，所以在左先生逝世次日，我去探望左師母，曾經向左師母親說：「左先生逝世，在國家社會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但在問生後輩中間，受損失最大的可能是我。」第三點是談女人，本來這一點不應當在此時說，但爲了寫出完整的左先生，我覺得沒有爲賢者諱的必要，而且左先生只是愛談，其私生活卻是相當嚴肅的。

大概每在談完正事之後，一定要加揮這一段，以作餘興。左先生每次談女人，我只有聽，因爲他談的都是名女人，我從未見過，也無法接腔。此處隨便舉兩個例子。一次大約是在七八年前了，剛剛辭職的聯合書院歷史系主任李定一教授當時尚在台大教書，路過香港，要我陪他去看左先生。定一兄當時帶着朝聖的心情，十分虔誠的說道

：「我若在香港，左先生講課，我一定去聽，因為我們是研究近代史，而左先生本身就是近代史。」左先生當時也容氣兩句，接着就言歸正傳，開始談些什麼記不起了，後來左先生提到民國十二年毛澤東在上海同他見面，勸他和少年中國一批朋友大家都去廣東，毛澤東說：「我們都去加入國民黨，孫先生的病已復重，一旦逝世，內爭必起，我們的機會就來了。」

左先生說到這裏，我插一句問道：「孫先生的病，毛澤東都知道，孫先生本身又是名醫，怎麼會不知道呢？」定一兄也接着說：「孫先生死得這麼早，真是奇怪。」

左先生點着烟抽了一口，慢條斯理說道：「一點也不奇怪，是死在宋慶齡手上。」

我是見慣不怪當時大笑，定一怔了一下，也跟着笑起來。左先生倒不笑，用手指着我說道：「你沒有見過年輕時的宋慶齡，真是美絕人寰，現在的一些電影明星給她提鞋也不配。」

出了門，定一兄說：「左先生很風趣。」

我笑說：「今天對老兄可以說是特別客氣，談了三十分鐘才談到女人，平時同我談話，只要五分鐘就扯到女人了。」

再說另一件事，因為左先生愛談女人，也就成爲晚餐取笑的資料。當他七十歲生日時，我們幾個朋友同他的女兒宗華，女婿張煥華兄請他吃飯，飯後偶然談起他同毛澤東同庚，大毛澤東兩個多月，左先生忽然嘆口氣：「我也不希望活到八十九十，只求比毛澤東多活一天，我要看看這個混賬東西怎麼死。」

我當時說道：「你老放心，毛澤東一定活不過你。」

左先生瞪起眼睛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說：「老而多情是壽徵，你老人家三句話不離女人，起碼也要活一百歲。」

左先生可能顧忌到座中有幾位晚輩女賓，俯在我耳邊說道：「這件事可拿不準的，你要知道毛澤東也好色呀！

「找一口茶差點噴出來。」

以上是說的左先生平時言行，現在再談談近一年來他臥病期間，我們談話的片斷。在左先生逝世後，臺北青年黨總部整理左先生遺言，其中第二項是：「過去每逢大陸上有什麼變動，有些人就責備政府又失去了一次反攻的機會，我個人從來沒有作過這種責備。因為反攻復國是需要許多條件配合的，這是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豈能放言高論。我們應該共同努力，造成可戰之勢，至於何日開始反攻行動，應聽候最高統帥的決定。」使我想起他另外的一段話，那是在本年二月間，國民黨召開十全大會時，左先生恰臥病在法國醫院，我去探病，閒聊一陣，不免扯到國家大事上去。

左先生說：「目前外交方面雖然仍有逆流，但就整個大局而言，對我們是絕對有利的。不過，反攻復國的戰爭仍是長期的，艱巨的，必須有一個全盤的打算。」

左先生頓了一頓說：「國家事經緯萬端，非三言兩句說得完，現在就從軍事方面說，翻開戰史看看，歷代戰爭都是打的資源，名將用兵，首先要足食足兵，沒有足夠的糧食，任你有多強的兵力，皆不能持久，諸葛武侯六出祁山，不是戰不勝，而是糧食不繼，不得不退兵，司馬懿看透此點，無論武侯怎樣叫陣、侮辱，一味深溝高壘不與戰，等待漢軍食盡，不戰自退。這一段史實，很值得我們參考。」

左先生停了一下，又說：「我們要作一較長期打算，先立於不敗之地，足食足兵爲上着，古人寓兵於農，我們不妨加以變通，改爲『寓兵於漁』。」

「寓兵於漁」這個名詞以前倒未聽說過，我當請左先生說明真義。

左先生說道：「我們看得清楚，一旦反攻開始，打頭陣的必然是海軍，目前限於經濟，海軍的擴展自有其限度，而且海軍官兵皆脫離生產，要國家養活，數目過大，亦非國家所能負擔。補救之方，應當是盡力發展漁業，以九艘機動漁船爲一中隊，十八艘爲一大隊，平日在海上操作、捕魚，不惟不需國家負擔，反而可以替國家增加財富。」

一旦有事，大陸內部有變，以漁船馳援，較兵艦要容易。初步若能有五百艘機動漁船，臨事可以派大大用場。因為未來的反攻戰爭與盟軍登陸諾曼第不同，不必要集中火力突破一點，而在使敵備多兵分，千里沿海處處皆我登陸之地，只要有一處突破，就可導致全局改觀。因此，打這種戰爭，軍艦不如機動漁船，海軍就不如蛙人。」

說到蛙人，左先生又說道：「我國海軍部隊蛙人，成績冠於世界，但全靠海軍訓練，數目一定不會太多，必須由民間普遍訓練，養成一種風氣，最直截了當之法，在沿海遍設泳場，每年定期集訓青年，異日游泳比賽，使每一個青年皆對游泳有興趣，成為游泳健將，再進一步訓練，就可成為蛙人，然後再重輪漁業知識，使之成為新式漁民，駕船出海，既可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又可增加國家財富，一旦大局有變，皆是海軍健兒，此寓兵於漁之法也。」

左先生又說道：「要實現此項計劃須有兩個前提：第一、提倡體育運動，鍛鍊青年身體，而政府對此並不注意。楊傳廣、紀政所提倡一元運動，法良意美，我就捐了三百元臺幣。但各方反應不熱烈，至今距原預算尚遠，這是不對的。第二、要集中漁業人才，教授青年漁業知識，應設立大規模海洋專科學校，目前我國不乏漁業專家，如執政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先生就是漁業專家，若由他主持一個海洋學校，相信比現在的貢獻還要大。」

左先生這段話議論精闢，得未曾有，直到今天尚未見政論家、軍事家提出過如此具體的計劃。

到了最近左先生去臺北主持青年黨全代會回港，又病倒在法國醫院時，精神就差得多了，談話不似過去的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說話要時斷時續，但是，談話與紙依然很好，我問到青年黨團結情況，站在一個青年黨友人立場，致予賀意。左先生頗為感傷的說：「形式上團結易，精神上團結難。完全恢復在大陸時代的精神，還要等待一個時期。」

我當時轉變話題問道：「你老在臺北見到蔣先生了。」

左先生伸出兩個手指頭說道：「見過兩次。」

我又問道：「精神如何。」

左先生擺下手：「好得很，五年以內我可以寫包票。」停一停又說：「十年以內也沒有問題。」

接着是左先生自己斷斷續續地說：「精明不減當年，你說上一句，他就猜到下一句，這些地方非常人可及，個人天資，加上幾十年的閱歷，造成今天的地位，不簡單。」接着又說道：「青年黨團結大會開成，他比我還高興，真是想不到。」

這次談話後，過了幾天左先生就出院回到家中，左先生在法國醫院時，我每天早上總要去一趟，幾回鑽石山之後，就未能天天去。大概是九月十二日晚上，我又去看他，這次精神好過在醫院時，能在房內行動。在兩年前我就告訴他，有意編一部「民國名人生卒年表」，左先生也提了許多指示，希望書中能收進萬人，我告訴他最多不會超過三千，左先生則認為不應少於五千人，以後我們每次見面他總要問一句：「你編的書如何？」我也照例答一句：「早得很哩！」這次他又問一句，我仍然說：「早得很哩！」

左先生長嘆一口氣：「等到你的書編成，我也上書了。」我確實聽得心裡一寒，連忙說道：「我的書編成，還請你老人家寫篇序哩！」他搖搖頭，未再接腔。辭出後，我一直難過，感覺到這個倔強的老人，第一次在病魔面前屈服了，在過去他每次害病時，也有傳說他已死的謠言，性總是斬釘截鐵的說：「我那裡會死呢？」只有這一次，他露出要死的口風，但是也只有這一次。據左師母說，他在家裡從未說過自己要死的話，當然也從未安排過後事。左先生去臺北看病，是親戚朋友一致勸告，我也說了不少好話，在他動身那一天，九月十四日，許多人都到飛機場送行，我在兩點鐘接到左師母電話，叫我到鑽石山陪左先生去飛機場。到了左先生府上，煥華兄同博文毅先生均在，左先生坐在藤椅上，精神很差，與我早一天晚上同他談天時大不相同，左師母坐到旁邊，大家相對無言，我爲了打破岑寂，故意說道：「你老人家到臺北，起碼又有兩個乾女兒來接。」左先生抬抬頭：「那兩個。」我說道：「一個是空中小姐張小姐，一個是名作家瓊瑤小姐。」果然左先生臉上浮了一絲笑意，但又嘆口氣說道：「瓊瑤頗蠻很聰明，婚姻太糊塗。」說過又不肯停了。不久汽車來了，我過去扶他上車，才知道他兩腳已不能着地，當時確

實使我吃一大驚，從他的坐處到汽車，最少也有二十步，怎麼辦呢？我說：「我背你老人家上車吧！」左先生用手攤下腹部，說道：「肝痛得很，碰不得。」最後沒有辦法，我因張、樓二位連綿椅把他抬上汽車，汽車開到飛機場，再用轉椅接進去，轉椅又由電梯送下去，當他上電梯時，我同他最後拉手，知道這次不僅是生離而實在是死別了。

最後我再說說我對左先生的觀感。本來中國人的習慣，人死了樣樣都是好的，所以寫追悼文字總是諛詞，但本文却不在此例。就左先生來說，他除去性情有時過於固執外，其人格實在是完美無疵的，尤其是他的愛國情緒，更非常人所及。本來青年黨人皆是愛國分子，最低限度也可以說第一代、第二代的青年黨人是如此；我嘗論近代幾大政黨，國民黨人為救國而創黨，孫黃二公在創立同盟會起，對治國就擬訂了一套辦法；共產黨人為賣國而創黨，所以毛澤東、董必武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成立大會時，就通過黨章，規定中共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青年黨人則為愛國而創黨，他們創黨在五四運動之後，國勢岌岌，不可終日，一羣熱血青年打出了「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所以青年黨人沒有不愛國的。但左先生愛國心之強，尤在一般人之上，他在港二十年，可說又老又窮，中間有幾年靠賣書為生（是我經手），有時只能吃粥（也是我親見），但是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從未變更。我同他談天的時數加在一起，十年中間不會少於一千小時，沒有聽到他有一句話談到柴米油鹽，去年日本明治維新百年紀念，他一定要去日本看看，我會再三勸他不要跋涉，他慨然說道：「你不明白，我這大年紀還去日本玩耍嗎？我要看看日本到底是什麼情況，無論為友為敵，日本將來還是我們第一個對手，我們應當切實了解它。」結果他終於去了日本。回來之後，對日本情況有很詳盡的分析，說來話太長，此處打住了。

左先生在世七十七歲，為國家社會貢獻精力達五十年以上，去世之後朝野同悲，生榮死哀，感無遺餘。獨獨值得惋惜的他老人家未比毛澤東多活一天，但是毛澤東伏法之日已不在遠，到了那一天，就我來說，一定要親到臺北祭告左先生墳前，以報二十年教誨之恩，老人家泉下有知，也當莞爾呢！

左舜生先生對日本的最後看法

岳 壽

筆者前發表「敬悼左舜生先生」文中說到左先生去日本，回港後對日本問題有深刻分析。當時因爲文字拖得太長，故略而未提，不覺引起讀者注意，連經編者轉來一位老讀者黃新先生一函，函中祇有三句：「請即續寫（左舜生先生）東遊分析，至所切要，以導後輩參考。」這封信雖然短，看出黃先生的意思倒是十分誠懇。左先生是歷史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關乎大局，但是有些話在談天時說出，他自己並未寫下來；而且有些話對我說過的，未必也同別人說，因爲許多話與別人沒有太大關係，例如日本問題就是。由於這些原因，我很樂意接受黃新先生的要求，把左先生最後對日本的想法寫出來，對於關心中日問題的人，確實可作參考。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必須要從頭說起，因爲其中有許多史實，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我在上篇拙文中曾提到青年黨人皆是愛國分子，左先生之愛國尤甚於任何人。抗戰開始，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交換函件，共同抗日的是左先生。此函之後始有民社黨張君勱與蔣總裁交換函件之舉；以後再有共產黨輸誠，共軍接受招安的事。左先生的愛國思想與行爲，確過於時流。但左先生內心，却對日本有相當好感，此點不能名之爲親日，因爲他同日本朝野均無半點瓜葛，日本所有當政人物中，也沒有一個人把他當作日本的朋友，祇能說是左先生個人的想法。他爲了愛中國，進而愛東亞，自然也就愛及日本。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發表廣播，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出，舉國騰歡，當天晚上的重慶，鞭炮劈劈拍拍響了一夜，全市市民都興奮得一夜未能入睡。左先生一夜也沒有睡，連夜寫了一封信託陳布雷呈交蔣委員長，信寫得很長，中心意思祇有一句：「不可讓日本倒下去。」次日蔣委員長廣播，呼籲國民對日本

以德報怨。雖然未必全部是受了左先生的影響，相信也有一部份採納了左先生的意見。這段事，到今天日本人還不知道，足見左先生對日本存有一番善意。

在香港，我追隨左先生杖履將近二十年，平日談起世界事、國家事，我們之間從未有半點歧見，即使有些話他的意見我並不贊同，但是我總在想「大概是我看錯了」，從不提出反駁。只有談到日本問題，我們不但發生爭執，有時甚至發生爭吵。說來十分有趣，左先生是老輩中間最愛日本的人，我可能是在同輩中間最恨日本的人。此時心情比起蘆溝橋事變時，絲毫未變。朋友談話時提到日本人，我仍然稱日本鬼子。我所以恨日本人，基於兩點：第一、我們抗戰八年，損失人命過千萬，財產過千億美元，日本雖然戰敗却一文未賠，就這樣算了；而且在許多方面，日本朝野的表現，好似我們中國還欠他一些什麼似的，此仇此恨安能忘掉。第二、沒有日本侵華，毛澤東一批人恐怕早餓了陝北的野狗，何至有後來的大劫；中國人死於毛澤東手上的，估計不會少於五千萬。這幾千萬同胞，直接為毛澤東所殺，間接又何嘗不是死於日本人之手。因此，我對日本的仇恨，有生之日皆不能釋然。

但左先生的看法與我不同，他認為中日之間由小衝突引起大戰，責任並不完全在日本，中國方面也有責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方面的責任更大。我對左先生這段話大不服氣，認為中國並未打到日本去，中國有什麼責任？左先生總是笑笑說：「你多看點書就明白了。」以後真的多看了一些書，尤其是近人的回憶錄，才知道左先生的話不錯。九一八事變前如果張作霖不死，九一八事變不會發生；九一八事變後，如果中國當朝有個李鴻章（爲了國家民族利益不惜留千古罵名的人），也許可以得到解決，不致拖到後來的大戰。

不過，這段史實我雖然承認，却不能改變我對日本人的反感，因爲不論當初錯誤在那一方面（當然大部份還是在日本方面），以後日本人在中國殺人放火，導致大陸陷共這總是事實。說到最後，我同左先生把問題歸結到一點上，究竟日本將來是中國之友？還是中國之敵？「皇軍」會不會有一天再到中國殺人放火？左先生對日本是看好的，認為日本受了上次的教訓，再侵華中國的膽是應該沒有了。既然不是敵人，自然就是朋友，因爲自由世界無論內

部怎樣不和，大前提總是一樣的。我則認為中國未來大敵還是日本而不是俄國，因為俄國地方太大，西伯利亞自己已消化不了，還要借重日本，未必有胃口再吞中國。日本不然，日本地太少，人太多，不向外侵略沒有生路；向外侵略，最方便無過於侵略中國了。這點我同左先生之間始終存有歧見。

到了左先生最後一次去日參觀「明治百年展」回來之後，同我談起日本情況，除去對籌辦明治百年展的人仍然贊不絕口外，對日本的前途，左先生的觀感變了。他當時以十分不願的精神說道：「對日本的想法，我覺得你看得比較正確，但是你也祇看對一半，大體上說，日本人是不能作我們的朋友。我多去一次日本，對日本的觀感就壞一分；因為他們國力充實一分，日本人的態度就驕傲一分。除非將來我們的國力能蓋過他，否則麻煩還是有的，這是你看對的一面。但是你認定日本將來還有力侵略中國，我看也是很蠢的事。因為我接觸到日本各個階層，特別注意日本的青年，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學生，這批人將來必是日本社會的中堅，無論為善為惡，都決定在他們身上。可是這批青年，目前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紅衛兵，一類是嬉皮士，這兩類人雖然立場作風都不同，但是皆不能派用場則是一定的，你以為紅衛兵與嬉皮士能侵略外國嗎？」

這是左先生最後對日本所下的定論。當茲日本重吞琉球時，特錄出以供關心中日前途的朋友們參考，並答覆黃新生先生的下問。

記左舜生先生

吳文蔚

在近代學者羣中，我最佩服的是左舜生先生。

左舜生先生這次由香港回國就醫時，不幸逝世了，悲痛之餘，似覺有點詫異，但平心一想，左先生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在我國故舊中，「人生七十古來稀」，左先生有這樣高壽，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在爾湖的農村中，有

一種習俗，是子孫對於父母去世的孝服，都是麻衣與白衣，惟獨對七十以上的人去世，卻要在孝服上繫一紅帶，孝帽上繫一紅布，這表示長壽高壽，在哀悼中予以慶壽的意思，像左先生這樣的年紀去世，的確也值得繫紅布予以慶壽的啊！

自來搞政黨的人物，很少係屬學者，因為搞政黨的人多半是權勢黨心，官癮重重的，而左先生卻是二者兼有，然而對於權勢與官氣，看得如流水一樣的淡薄。本他在農林部長一任內來說，他對這個「部長」的看法，只是淡淡熱鬧，點綴點綴門面而已。所以他在停官之後，不作他想，還是做他的書生學者本位，搖搖筆桿，寫文章去了。

左先生於大陸淪陷之後，寓居香港，教書為文，遲遲不肯回國，其主要原因，並不是他逃避責任，委實說，也就是他對於政治，對於做官，實在不感興趣。任憑給他什麼名義，他總是受面弗就，依然住在香港，去寫他的文章，憑良心說，如果要給左先生寫傳記，恐怕這二十年的光景，要算是在學術上最輝煌的時期。另一方面，在這一時期裡，也可以說是表現盡了他的愛國熱，已達到了沸點和高潮，這在他這二十年的寫作著述中，到處都可以看到的事實，所以也用不着在此細說了。

我與左舜生先生並無深厚的交情，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面之緣而已，但在這一面之緣中，即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永遠不能忘記。

一面緣的交情，說起來，我與雷嘯岑先生接觸比左舜生先生要略微多一點，這兩位學者同是湖南人，在湖南人的學者中，我就佩服這兩個，另外還有一位是已故的羅敦偉先生，但羅敦偉先生，卻和我這一面之緣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在此不談了。

說起左舜生先生這二十年來的學術生涯，就不能不順便提一下「自由人」報。「自由人」報是一張小報，但其特具學術權威，它在反共文化鬥爭中，算得上是一個堅強的大兵團，雷嘯岑先生和左舜生先生，還有其他幾位先生，都是這個大兵團裡的主將，像筆者個人，只不過是這個大兵團中的幹部之一罷了。各位主將是輪流着寫專論文章

，隔上幾天，便會看到有左先生一篇專論出現，以後，「自由人」的各位主將先後分散了，雷先生和我，依然在堅持苦戰中，直至由「自由人」報，改成了「自由報」，雷先生和我仍然在愈戰愈痛中苦幹，這情形好像和三十七、八年賊亂匪匪的各大戰役一樣，雷先生和我總是戰至最後，且又移陣再戰，不肯罷休，硬要堅持到把共匪的那隊完全打垮。

到「自由報」時期，左先生便很少寫文章了，這時候左先生已教了書，所寫的文章，多半都在別的報章雜誌發表，所以說，論一面之緣的交情，雷先生和我要比左先生和我的關係長一點，但是大家都是文字交，私人的接觸，也不過都是一面之緣而已！

我對左舜生先生的深刻印象，還是在抗戰初期的重慶時代，記得是在民國二十八年冬天的冬天，那時我剛在軍事學校受訓完畢，同學們都到了重慶等候分發工作。終日閒暇無事，都在欣賞戰時首都重慶的市容，而重慶既是抗戰的軍事中心，和政治、經濟中心，同時也是戰時的文化中心，當時文化發達的盛況，可以說是任何時期無與倫比的。重慶各處都有學術講演，最多的地方要首推棗子嵐垵旁邊的張家花園內「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的文化講座了。該社社長是江恒源先生。那裡面場地很寬，一座大禮堂，足足可以容納一千多人以上，我在該社一共聽了三次名人講演，一次是投匪的老作家老舍講的，題目是「西北觀感」，這是老舍講他到西北勞軍的情形，故事非常的生動；一次是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講的，題目是「職業教育」。吳先生講的重點是指責我國的教育是文憑教育，讀書人都拿文憑當職業的敲門磚，而忽略了智能與技術，真正的職業教育，要有智能與技術，才算是名符其實的職業教育。讀書人有了智能與技術，離開校門，走入社會，才能把門敲得響，敲得開，比那文憑教育製造出來的人，去敲門而敲不響敲不開的笨笨頭要有力得多，可得多。吳先生這話，到現在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時隔三十年，到了現在，我們的教育首長們，換了一個又一個，一個要比一個強，但事實證明，似乎仍然重做官，重文憑，拿這個空玩藝的肉拳頭，要和美蘇列強的核子武器比高低呢！第三次便是左舜生先生講的，題目是「實行憲政問題」。那時還是

訓政時期，但在先生主張馬上實行憲政，寧可把訓政時期跳過，也要提早把憲政實行！左先生在講演中，提出一件極有力的比喻說：「有的人認為我們國民，知識未開，文盲太多，實行憲政，未免為時過早，我認為這是片面的講法。」他說到此地，忽然停了片刻，沉默了一會，忽而伸出手勢，有力的說：「像汪精衛，不能說他不認識字吧？但他卻投降敵人，去當漢奸！」接着他又肯定的說：「我認為實行憲政，還政於民，是政府的抉擇問題，而對民智開不開，過早與不過早，並無關係！」從這裡我們可以說左舜生先生是第一個提倡實行憲政與擁護憲法的人物！

經過漫長的抗戰八年和戡亂四年的艱苦歲月，想不到大陸淪陷逃到香港之後，又遇見了左舜生先生，那次在重慶只是見了左先生的面，而這次到香港，不特與左先生見了面，交了談，而且變成文字交，編在一個大兵團裡，跟兵匪打起文化鬥爭的仗來了。真是有緣！真是有緣！

記得那天是易君左先生邀我談話，易先生跟左先生住在一個房間裡，見了易先生，自然也見了左先生。易先生當時給我介紹說：「認識嗎？這就是左舜生先生。」我隨口便說：「我認識左先生，左先生不認識我。民國二十八年，在重慶聽過左先生的講演，左先生在臺上，我在臺下，臺下人多，左先生看不清，臺上人少，只有左先生一個人，所以我認識了左先生。」

由這段話，我們便談起興趣來了。當時易先生穿的一件黃色的麻呢西裝，而左先生穿的是一件藍色絨面的皮袍，我隨便打趣着向易先生說：「左先生真有辦法，還有這件皮袍子沒被共產黨共掉。」易先生說：「左先生的東西，統統都被共匪共掉了，就剩下這件皮袍子。」說着，他也指着自已：「我也就只剩下這套西裝了！」當時左先生打趣的問我：「我和易先生還有很多財產沒被共匪共到，你猜是甚麼呢？」他不待我回答便自己先說：「是我們的思想！」

從這次以後，我們在香港，便天天在一起操練，天天在一起作戰，與共匪展開文化鬥爭了！

當我第一次在重慶聽過左先生的講演時，腦筋裡只知道左先生是一個政客——一個政黨的領袖，同時又是青年

黨，便不能不有一點戒心。誰知他除了政黨之外，卻還是一位學者，一個熱愛國家民族的學者，憑着他的書生本色，在國破家亡的悲慘途中，拿起他那一枝筆，和共匪展開鬥爭，永遠戰鬥不休呢？

左舜生先生還有一點超人的地方，就是他有一雙銳利的眼睛和溫厚的氣質。如他在對郁達夫的觀感中，道出了他的誠摯的心聲說：

「在五四以來的作家中，我最欣賞郁達夫先生。達夫本來是東京帝大政治經濟學部畢業的，假定他有機會去參加政治，我想他也並不會拒絕，而且在抗戰前的福建，抗戰起來以後的武漢，似乎他還是非正式的參加過來的。可是，他所特別愛好的，畢竟是文學。他的英、德、日文都有根底，讀過不少的歐美文學書；更難得的是他對於中國文學的修養頗深，乃至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因此，郁達夫乃成功了一個郁達夫。」

很多人都放棄了郁達夫的文學才華，去在顛覆上找郁達夫的痛處，甚至還有人懷疑郁達夫含有左傾問題的。但左舜生先生有銳眼，他能真知道了郁達夫，他知道郁達夫是一個熱情奔放的文學大家，而卻沒有思想的偏差。這是左先生的最能知人之處，我所以最佩服左先生的，其原因也就在此。

左舜生先生是死了，死了就了了一切，但他的精神和人格卻永遠活在人間。他回國到臺灣，見了總統，他病了入院。總統又多次關照，以他這樣有氣質的人，照理講應該活到八十、九十，甚至一百歲也不會死的，然而畢竟他是死了，我說，左先生應該能夠看到光復大陸故土，能跟總統多談談反攻的大計，勝利以後復員的大計，把他那學者的才華，用到建設大同社會上面去；但誰能料到，他這一病，就此長去了呢？

反共陣營失一老將

趙 聰

這位享譽國際的學者，於今年十月逝世，實在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左先生是中國近代史的權威，在這裡的大專院校講授此科，一登講台，口沫橫飛，滔滔不絕，諳熟得如數家珍。這樣的教授，求之今日，已不多見。每逢友朋相聚閒話，只要談到近代人物，左先生所知特詳，對其思想背景，大都了如指掌地解說，頗具深度，聽者聞所未聞，無不驚佩其淵博。幸而他留下一部「中國近代史四講」（友聯版），使廣大讀者獲讀其有系統的講稿。

在下十年前為友聯出版社主編「友聯活葉文選」時，曾教請左先生為做審校工作，亦曾請其為注釋翻譯文選單篇。今檢六百餘篇活葉文選中，為左先生親筆注譯者，計有王榮「登樓賦」、劉勰「情采」、張岱「金乳生草花」三篇，注釋精審，譯筆信實，為讀者稱譽。其注「情采」時，曾親到馮平山圖書館、樂海書樓借閱「文心雕龍」各種版本及參考書，可見其治學之認真，一丝不苟。他會說，為了考證王榮之籍貫，翻閱了很多正史上的地理志，才查到後漢山陽高平，在山東省魚台縣境。這在文選上只不過一句話而已，他就費了如許功夫，使在下感歎之外，還了悟到老一代的前輩治學是怎樣的謹嚴。他注張宗子時，我到書店裡去買書，在那裡僅見他，他說宗子的文章真寫得好，他要再多搜集一點宗子的著作讀讀。老人如此好學不倦，真令後輩汗顏。

某次在一次宴會上，某君大談某人好哥，直把那人的缺點說成那人的優點，譽為當世卓立特行之士，左先生聽完，即當眾斥之曰：「這簡直是一個半吊子！」寫至此，當日他這句湖南語言很重的話，又琅琅在耳。這可以見出他是怎麼嚴是非之辨，對不合理、及顛倒黑白之論，決不予以寬假。先生雖氏左，卻是終生反左，每論天下大事，矢言共黨必亡，可惜他未親光復，遽爾撒手塵寰，反共陣營，不能不說失去一員老將。

悼念左舜老

徐 達

在報紙上看到左舜生先生病逝台北的消息，不禁熱淚盈眶，感慨萬端的低吟起：「書生空懷報國志，屢渡點點

淚斑斑！」

我記不清這是誰寫的詩意，也許是我信口胡謔，但它很能表達我的心情和哀思。

電訊中特別強調「書生從政，文人辦黨」的字眼，乍一看很像是對他死後的「美諡」，想一下就感覺不是味道！在我們的國度裡，這些理想從何談起，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都一個個費志而歿，舜老又怎能例外？

舜老是以治現代史聞名於世的，他應該比我們清楚中國政治舞台是怎麼一回事。「民主政治」距離我們多麼遙遠，知識分子在槍桿下多麼忍辱求全！民國以來，挾地統而令羣「雄」的豕狗政，活活氣死了中山先生；綠林出身的張大帥，差一點兒就要黃袍加身；馬二將軍在中原逐不到鹿，本錢輸光了就在大海洋裡不明不白的葬身火窟。這些都看在毛澤東的眼中，於是，「小米加步槍」，成爲真正指導革命思想的活教條；「不熟話，不開飯」，將千萬萬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弄得服服貼貼。中國近數十年的所謂政治、政黨，實際是新式幫會加權術，書生文人懂得這些麼？

舜老如果在生，他一定不同意我這種謬論，說不定還要斥責我不應該有這種消沉的想法；可是，他這一輩子對國家究竟有多少貢獻，他自己何嘗不心知肚明；雖然在他遺言中還是那麼諷諷的勉勵後進，期許他的黨人；可是事實上他在晚年却服膺了末路英雄石達開的思想路線：「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

我認識舜老大概快有二十年了。那時，我是大陸逃港的青年難民，在香港舉目無親，賣稿搵食，幸虧鄉賢丁廷樞先生將我收容到「自由陣線」週刊做一名助理編輯，幫着主編張深恩先生看文稿稿子。這個刊物是綜合性的，偏重政論、時評、以及學術性文章，文藝作品只是個點綴（拙著「星星月亮太陽」的初稿就是在這個雜誌上發表的），幾個小時就可以編好了，倒是校對和開會佔了很多時間。

「自陣」擁有一個龐大的編委會，每逢星期一舉行座談會，與會的倒不限於編委，幾乎每次都邀請一些政治名流參加。例如坐過中共第二把交椅的張國燾，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民社黨孫氏兄弟，……舜老也常來，所以沒

有人介紹就認識了。

因為這個刊物是青年黨少壯派主持的，舜老是該黨元老，也就以「家長」的姿態招待客人。另一元老李璜先生倒不會來過，後來還是在另一場合認識的。

論編輯這一行，舜老很有資格稱爲我們的老前輩，他出身中華書局，編「壁報」週刊時大概我還沒有出世，所以對他總是執以弟子禮。起初，我稱他左先生，後來也就跟着大家左公、舜老的叫開了。其實，那時的舜老還不算老，也不過五十出頭的樣子，可能因爲他經常穿一襲灰布長衫，顯得很老氣。

抗戰時，我在大後方讀書時，就時常看到左舜生這個名字；尤其是青年黨的曾左三大領袖，恰好與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同姓，更教人容易記憶。曾襄韓先生早死，我沒有見過；倒是仔細讀過他的遺著，（從他的詩文日記看起來，其人確爲愛國志士，近日曹聚仁先生批評他是「政客」，似乎有欠公允。）這三大巨頭的氣質很相近，書卷氣都很重，李璜先生比舜老更富學究氣，態度也比較嚴謹，舉力也較深湛；如果不知道他們的底細，怎樣也猜不到他們的政治興趣是這麼濃厚。其實，青年黨的高層人士這種人物很多，不大爲世人所知的常燕生與何魯之都是標準的書獃子，王光祈是學藝術的；少壯派的夏爾康、史深之、左幹忱、張琛、廖踏先生，也都是飽學之士；詩人易君左與他們通從甚密，當時，我也以爲是他們的同路人，後來才知道這個左公却是道地的國民黨員。

一九五二年前後，流亡香港的政黨人物，在美國政團的資助下，活動得很厲害，詳細情形並非我這小僱員所能洞悉的；但我了解「自陣」的理想，希望在國共兩黨中間成立一個新生力量（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第三勢力」），等待政局變化。

舜老對這個運動似乎不大熱心，但每種宣言他都帶頭簽名；可是，因他常常風塵僕僕於港台之間，以致引起他的部屬不滿；也許他有先見之明，看到這個大拼盤遠不如當年民盟的基礎紮實，果然，這個「勢力」連團結的形式

也沒有搞成，也等不到國共兩大勢力動手，就自己吵翻了。

最可悲的，二十年風雲變幻，臺灣海峽却是水波不興，政治型態也從量變到質變了。現在還有些青年朋友問起當年第三勢力的盛況，我只有苦笑搖頭，黯然長嘆，但它在我的的人生歷程中，總算做了一次阿Q式的政治夢，現在說起來倒是名副其實的「第五勢力」，人家四家打牌，輪流換位，我們却永遠「做夢」。

在座談會中，舜老與張國老一肥一瘦，相映成趣，當年以領導紅四方面軍縱橫大別山的風雲人物，却令人很失望，那時他已老態畢露，面團團如彌勒佛，說話也有氣無力；而舜老則清瘦如鶴，目光炯炯，雄辯滔滔，和他那口長沙國語配合得恰到好处，在他身上還能嗅到點「少年中國學會」的氣味。

其實，舜老的口才更適合清談，談起來亦莊亦諧，沒完沒了。因此我發覺他對現實政治遠不如對近代史料研究的興趣高，他老是喜歡說研究近代史要注重第一手資料，也喜歡將他的第一手資料說給別人聽。他跟當代政壇人物多少都有點關係，許多珍聞秘事，說來如數家珍，他生平最得意的要算是「訪問延安」，那些材料在他的「萬竹樓隨筆」沒有出版以前，我們都聽得爛熟了。

舜老筆下出現的人物，遠不如他平時「娓娓道來」的精彩；他常常在許多嚴肅、驚險而勾心鬥角的政壇掌故中，夾雜些風趣的「特寫」。例如他談宋慶齡和中山先生在東京戀愛的風波，吳國楨夫人的美艷，金大校長吳貽芳的打扮……都很有趣，尤其對於我們這些入世不深的毛頭小伙子。

那時我也住在鑽石山，和他的寓所惠和園比鄰而居，晚上散步去看他，等於上了一堂「近代史」；我沒有聽過他的課，在想像中一定很得到學生的歡迎，我相信他的高足一定沒有我聽得多，尤其是許多不能在課堂講出來的文章上寫出來的秘聞。所以現在我時常鼓勵珠海同學多和他們的教授接近，從側面去吸收書本以外的知識。

舜老對近代史確有相當功力，而且記憶力驚人。記得有一次去看中共拍攝的海戰片——「甲午風雲」，爲了多瞭解內容，我在入場前就讀了一段與電影情節有關的清代選史，散場後恰恰碰見舜老，我請他到對面的一家小餐館

去休息，一杯紅茶，兩片蛋糕，他就大談其影評，令人吃驚的他對公元紀年背得很熟，我的一些現實買賣的知識更挑起他的興趣，這一談就到紅日西沉，華燈初上，只好再請他吃一客常餐。

離開「自碑」後，我對政治運動頗有大徹大悟之感，因此對政治人物也盡量避免。因為搬了家，本身的出版業務也繁忙，很少再有機會跟他大擺龍門陣，但每年春節總要去向他拜年，也順便聽聽他對時事的看法，所以給他拜年的時間很費思量，總要找出大半天的時間才够應付，而每次拜年中却發覺他蒼老一些；記得有一年他剛從東京回來，胃病很嚴重，只能吃點蘇打餅乾，他嚼着餅乾，不禁嘆息地說：「我君有點不妙，怕這七十大關很難闖過了！」我勸他多多保重，正要起立告辭，不知怎麼又問了一句日本作家的近況，這又引起他的談鋒，他希望能成立一個研究日本的資料室。

又有一次去拜年，這一年我却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六四年的春節。我告訴他想辦一個文藝刊物，他立即表示沒有大量資金切不可冒險，教我不要胡思亂想，還是老老實實從事寫作的好。我沒有聽他的話，回家後仍然積極籌備；我總覺得寫作是個人事業，很難說有多大成就，辦刊物却是從事文藝運動，說不定能培養出幾個青年作家，成功的公算也比較大；說來近乎唱高調，但我無法壓抑這個高調的誘惑。

「當代文藝」出版後，每期都寄一份給他，卻沒有勇氣請他指教；銷數雖說不錯，但實在沒有把握能辦多久，萬一他提出這個問題，可不是「不聽老人言，大禍在眼前。」

於是，我只有去找同輩的朋友們討論，有許多熱心讀者也來信指教，其中有一位隱名讀者，信寫得很長，足足有四五千字，而且毀多譽少，但意見却很中肯。

許多朋友都很關心「當文」，只有舜老沒有提過半個字，我以為拗逆了他的勸告而使他不高興，也就沒有再去找他。

過了半年，在中國文化協會主辦的書法展覽中，真是狹路相逢，不得不硬着頭皮問起他對「當文」的高見。他

幾了，微微一笑地說：「我並沒有老糊塗，你也不應該如此善忘，我早就向你提過意見了，而且你也謝過了我！」這些話可真是丈八金剛，使我摸不到頭腦，瞪目結舌了兩三分鐘，忽然想起那封「一讀者」的長信，原來是出自他的手筆。

「我想以一個讀者的身份與你談問題比用我的真名子好！」他誠懇地說：「辦刊物要拉好稿子，刊物辦好了，好稿子也自然會來，這都不是難事。難的是歷久不衰的精神，譬如校對工作，你們就做得不好！」於是，他又一次指責「當文」的缺點，要我設法改善；他津津有味地談起他在中華書局做編輯時的經驗，一本書要經過七次校對才付印，還是避免不了錯誤；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經過三個人過目。爲了避免防不勝防的活字版跳字，他建議最好打了紙型鑄版再印；事實上這是很難辦到的，因爲有些特約稿，總要等到最後五分鐘，作家的靈感才能到來。「稿」被推成墨未瀉，墨都未瀉，校對如何精確？同時，印刷廠也將時間算得很緊，早發稿也無用，往往看了初校就要逼着上機，連看大樣的時間也沒有。

我們相對嘆息了一會，臨行時，他依然堅持的說：「浮名適足累人，我還是以爲你辦刊物是一大犧牲，不如多讀些書，花個三年五載寫一部像樣的東西，比辦刊物有價值多了！」

舜老說得很對，其實一個作家一輩子寫三兩部就夠了，多產無益，反而有害。正如沒有計劃的生育，孩子多自然無法好好管教；但爲了生活誰也辦不到，我雖然不用靠刊物以謀稻粱，但却寫作前途毫無把握，正如他對辦黨沒有把握一樣。說來好笑，舜老對別人明察秋毫，對考慮自己的事却很馬虎，辦黨和辦雜誌一樣，沾上就脫不了手。如果他不辦黨，以五十年的時間治學，成就一定比現在大得多了；雖然他口口聲聲表示對政治只是「玩票」，可是他的戲碼却很大，從「遊園驚夢」一直唱到「魂歸離恨天」。

在老一輩中，舜老畢竟是令人欽敬的，他對青年人誠懇率真，不要手段，也不想利用，他從沒有鼓勵過我去做「政治馬仔」，倒是有意無意的啓發我研究問題的興趣，只要向他提出問題，他總是談笑風生的給你解釋，直到你

不耐疲勞轟炸而抱頭鼠竄。

有個時期，我也想摘摘近代史，怎知一接觸資料，禁不住血脈憤張，古人說：「柔則讀史，剛則讀經」，那知欲柔反剛，說不定我的高血壓就是讀史讀出來的。

誠懇率直，人家一眼就看出他的性格了，舜老的氣質實在是不適於搞政治的，更不具備政治領袖的條件；當拼時不敢下注，當退讓時又不願傷害自尊心，所以他也一直徘徊在政、學之間。從他的行動看來，總是希望在兩大之間找出生存壯大的機會，其實，生存已經不容易了，壯大當然不可能。

這種性格，在他打牌時也可以看出來，他總是不按牌理出張，上下家都不管，有多大做多大，在必要時又猶疑不決，在一片催促聲中他還是不能決定，催急了就發點胡兩牌氣；但他永不承認自己牌技拙劣，一提起雀戲，總會向你誇耀他的「十八羅漢」，（中發白門風都開了槓，十八張和牌）結果，他在牌桌上也和政壇上一樣，輸的時候多，贏的機會少。

舜老很重感情，尤其注重「鄉誼」，他對譚嗣同、蔡松坡、黃興都特別有興趣，所以花了不少功夫為他們寫評傳。青年黨的湖南派，對他的向心力很強。圍繞在他身邊的後輩，也以湖南籍的青年最多，例如孫淡寧、鄧中龍、趙滋蕃諸兄，他尤其欣賞滋蕃，老趙也得到他不少幫忙，如今滋蕃恰在台北，一定會去親自為他執紼吧！

這種「偏愛」的情形我們都知道的，有一次他忽然打一個電話給我，問我看了汪玲的電影沒有，他把汪玲稱得「天上有地下無，我覺得很奇怪，立刻到『百老匯』去買票，一進門就看到他和波波合拍的放大照片，當時敏感到此女可能是湖南人，後來一查果然不錯。又有一次瓊瑤到香港來，他又要我介紹，不用說，又是一位多情的湘女了。

跟舜老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喜歡女性，他也直認不諱，舜老就是如此天真可愛。有一次旅遊台北，一位女作家還意答答的向我談起舜老和她握手久久不放的笑話，我告訴她舜老有欣賞女性美的癖好，絕沒有壞念頭。當年他到延安訪問，還在百忙中向周恩來提出訪問江青的節目，遠逢江青病了，他又提出去看女作家丁玲。

打牌、看電影、看親女，可以說是舜老的三大嗜好。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就是在麗華戲院門前，那天演的是「小鎮春回」，我跑過去招呼他，他很高興地說：「我猜你一定會來看這個冷門片子的。」可惜人太擠，說話不方便。他的步伐已經有點困難了，左老太太扶着他，還是搖搖晃晃的。我很想擠過去幫忙扶持，他却苦笑的說：「不要客氣了，快開場啦！」

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在人叢裡隱沒了，他那浮腫的面容，猥濁的談話，給我很深的印象，心中不禁想到：「此老恐不久人世矣！」

他在病重時住在法國醫院，等到我知道時已經上了飛機。事後聽說劉子勳先生要去臺灣探病，很想託他帶點禮物，後來却在一次宴會中，劉先生告訴我：「左公現在全靠輸血，恐怕是沒有什麼好辦法了！」

一個人活到七十六歲，可以稱為高壽了。以他平時的酒脫不羈地性情，抽煙、打牌，活到今天已屬難得，也許他自己也認為超過「預算」；但我知道他有一個私願，希望能比他的同鄉而又同庚的毛澤東活得久一些，結束還是先毛而去。

平時有些朋友常常向他開玩笑：「左公壽少艾，老尚風流是壽徵！」

「毛也很喜歡女人啊！我和他半斤八兩，不一定勝過他！」舜老的風趣往往如此。

舜老的逝去，對香港文化界的朋友確實感到很悵，熱中政治的朋友更可能有樹倒猢猻散的感覺。政黨政治在這個時代中不可能存在的，槍桿子出政權，倒與軍閥時代緊緊的咬接起來。

對認識他的後輩來說，真有痛失良師之感，他給人的悼念，並不是他的政見，而是那些樸實純真的人情味。老實說，我認識許多搞政治的朋友，很多是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倫型，論氣量很少比得上舜老的。

由於舜老的去世，使我懷念起當年在「自陣」同事的老朋友，老一輩的人逐漸凋零了，丁廷標先生墓木且拱，左幹忱、譚伯陽先生也相繼離開人世，現在舜老又遠歸道山，下次又不知輪到那一個了。同輩的朋友倒是各有成就

，候北人兄已成了大畫家，徐東濱兄榮任星島主筆，燕雲小姐任職中文大學，最年輕成就也最大的是余英時老弟，現執教哈佛監中外學術界，只有我仍然擺這個文化小攤子，往事歷歷，真是不堪回首。

一般人都以為舜老是搞黨治學，很少知道他在新文藝上的造詣，遠在三十年代他就以詩名享譽文壇了。趙家璧編的「中國新文藝大系」也選了他的詩，現在敬錄下來，作為我這個文藝工作者悼念老前輩的紀念：

南京（原載少年中國一卷九期）

(一)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自然的美，

莫愁湖邊的柳，

復城橋上的月，

古道的台城，

暮色的鐘山，

柳啊！

月啊！

我願你永遠戀着你的湖，

照着你的橋，

我要和你小別了。

(二)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親愛的朋友：

有的似雨花台畔的石，

有的似揚子江的水，

有的叫我不能忘記，

有的教我拖住腳了。

讓你繫着，

讓你拖着，

我要和你小別了。

(三)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親愛的煩惱！

你把煩惱完全交付給我了，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所見晚年的左舜生先生

陳鳳翔

吳淞半泓水，卅年間匆匆一夢，歸期難指。蠻觸蟻爭爭一瞬，得失何關憂喜，且一覽江山信美。漫言鬢子竟成名，數今來古往多如此。拔劍起，鷓鴣笑！

家園破碎從頭理，爲問他沐猴冠帶，麀居能幾。少年徒侶沉淪久，淚眼看雲萬里。只願有相思堪寄。待從容整理登車，幸壯懷激烈猶是。共攜手，事所事。

——左舜生

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晨八時廿五分，左舜生先生因腎臟機能衰退、胃病及便血逝世於臺北榮民醫院，享年七十六歲。（報章作七十五或七十七歲。筆者按：左先生著「文藝史話及批評」懷念會琦一文內說：「壽韓名琦，別署愚公，他有一本詩鈔題作『藏室』」。四州隴昌人，生前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得年五十有九，僅僅大我一歲。」知先生實生於一八九三，到今年剛巧是七十六歲）噩耗傳來，海內外友好門生，無不惋惜輕嘆。

先生是湖南長沙人，幼年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母親及三姊可算是他的啓蒙老師。（見明報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左舜生——「請客，繡花，讀課」）曾在長沙國民學校讀了八年的小學。（據先生口述，當時的小學是八年制的，比現在香港小學六年制，功課的繁重，不可同日而語）隨後進了半年的「長沙縣立師範」（徐特立任校長），又轉入一間幾個日本留學生和上海南洋公學學生所創辦的「外國語專門學校」，功課以英文和幾小時的幾何代數

爲主。（見先生著「黃興評傳」寫在傳前的一段話）大學教育是完成於上海復旦大學。後曾在中華書局任編輯主任達十年之久，在此期間對於史學攻讀甚勤，並曾一度赴法國留學。離開中華書局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大夏大學及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歷史學教授。抗戰軍興，初任國防參議員，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歷任該會社會委員會前後九年，並一度任主席團主席。民國三十六年，出任農林部部長，以學者身份從政，對於農村改進、農業增產，多方推動，孜孜不倦，貢獻良多。

先生爲青年黨元老之一。民國七年，曾慕韓、王光祈、陳愚生、周太玄、張夢九、李守常等在北京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先生經過王光祈的推介，便正式加入「少年」做了會員，並且還得到曾慕韓的賞識，派先生在南京負起了發展會務的責任。其後慕韓到法國留學，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發起「中國青年黨」，先生便成了青年黨的黨員及中堅分子，他一生倡導「國家主義」，熱愛國家，堅決反對共產主義。

大陸淪陷以來，先生避處香港，晚年以講學爲生，曾任新亞書院、珠海書院、清華書院、華僑書院等大專院校教授，主講「史學」與「中國近代史」課程。並以餘暇從事寫作，文筆散見港臺各報章雜誌，遺著有「近代中日外交小史」、「近代中英外交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續編」、「中國名人軼事」、「近州年見聞雜記」、「萬竹樓隨筆」（是書曾印四次共六千冊，久已絕版）、「中國近代史四講」（香港友聯出版社印行）、「中國近代史話初集二集」（臺灣文星書店出版）、「文藝史話及批評」（臺灣文星書店出版）及「黃興評傳」（是書可算是先生最後遺著，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以上是左先生一生的大概經歷，本來以筆者二十來歲的年紀來談先生七十多歲的往事，是不甚妥當的，因爲所知無多，所述更是掛一漏萬。不過先生執教香港清道書院時，筆者忝爲門下學生。從一九六四年秋至六八年秋，在足足的四年大專課程中，筆者修了四年先生所授的「中國近代史」和「專書選讀」等課程（按：「中國近代史」本爲兩年課程，筆者因興趣問題，特修多兩年），畢業後更時刻造訪先生於鑽石山寓所，教誨之餘，並承先生期許甚

感，往往隨地有加。今先生不幸逝世，與生在悲痛之餘，回憶往事，除了一種莫明的悵然若失外，不禁執筆紀錄先生晚年數則軼事，以留紀念，亦畧表對先生一種思索之情。

清華書院是一所日夜校大專，先生所授課程有「中國近代史一、二」、「專書選讀」（選讀名著有史記、漢書、三國志、論語、孟子、世說新語等），這兩門功課，都是開在晚上，「近代史」課程在每星期二六時四十分至八時，「專書選讀」在每星期四的八時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先生上課之前，有充分準備，常帶參考書數種。講時徐述有節，井井有條，而不用看着書本，尤于近代史一課，講述至為生動，每說一事、論一人，皆如親歷其境，如數家珍。說到激動處，語調突變，聲容俱動，白眉蹙蹙，手指作勢；說到國運蹇困處，萬方多難，則不禁掩卷長嘆；說到平生際會之奇或興奮之處則撫胸呵呵長笑，淋漓與會而不覺疲倦；學生聽講，亦如沐春風，心焉嚮往。先生於近代史的年份，記憶尤為清晰，某年某月某日，很少犯錯。先生教書亦着重與學生討論，盡力誘發學生提出問題。先生即低眉靜聽學生所問，手中拿着香烟，慢慢的抽着，補充解答學生所問的問題。先生除喜歡學生發問外，還喜歡學生問及書本以外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時局與政治，常獨抒胸懷的表示一點意見，可惜筆者當時未能一一筆錄，否則便是研究近代史的一種很好資料。

大概在課堂上講授的時間太少，先生於課後，或與猶未盡，即約一二同學，到附近茶廳，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繼續他的談話。而筆者每次皆恭逢其會，有時甚至是先生與筆者一人獨對。附近的「嘉蘭盛餐廳」（位於太子道與公爵街交界處，亦即清華書院後面）、白宮酒樓（九龍城福佬村道，近已易名）、七喜樓（太子道）便成爲我們談話之處。又因先生居於九龍鑽石山，筆者則居於黃大仙竹園，所以放學後隨一方而而歸，先生每喜筆者陪同，從界限街一百五十號的清華書院漫漫策杖步行約十分鐘到九龍城，才召「的士」回家，並邀筆者同坐「順風車」，到彩虹道黃大仙警署側前，筆者才下車，而先生則繼續回到他鑽石山大觀路惠和園三號的寓所。凡此種種機緣，不論在課堂、茶廳、酒樓、回家途中、車廂之內，整整的四年接觸，使我能有機會進一步的受先生教誨。他的風采、

言論、思想、以至平生月息，都給了我一個簡單的觀感。

以下幾段文字，是先生曾對我開談過的，其中可能記憶有點模糊，但當時一老一少的談話神情與景象，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先生研究中國近代史已有四十多年，於近代史中每一件事或每一個人，都有清楚的認識，公正的批評，其中不少「風雲人物」，更是先生的至交好友，所以談起某一事或某一人，皆能親切感人，事事有首有尾，枝葉扶疏。先生平生所佩服的前輩有好幾位，其中孫中山先生、梁啟超先生、黃克強先生、章太炎先生與蔡元培先生，都是先生時常談話的對象。先生說上述諸人在近代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與影響。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但却喚起國人的醒覺，明白滿清的不可救藥，促成後來革命派的成立。孫中山先生代表的「興中會」，黃克強先生代表的「華興會」與蔡元培、章太炎先生代表的「光復會」在日本結盟，成爲一實力雄厚的「同盟會」，卒至革命成功，他們幾位的一生，影響了中國近百年來的政治、軍事和學術思想的全面，也是中國近代一切改革運動的原動力！

先生常說生平以未見過領導維新運動的康有為先生及領導革命運動的孫中山先生爲憾，但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灘龍路四十四號那所辦公開會的地方，先生却過去過多次的。一九六二年先生到美國舊金山參觀「少年中國晨報」，看見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時代曾在上面寫過文件的一張書桌，曾引起先生低徊留連不忍捨去的思慕之情。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是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日，筆者曾就此一偉大的紀念日垂詢先生有關國父遺事。先生的顯示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中山先生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到今年剛巧是百年誕辰紀念，回顧中山先生一生事功，可說的固然是不可勝數，但今天我提的却是中山先生幹革命政治具有一種科學精神。中山自十四歲開始，便接受外國的教育，二十以後，即從事學醫，經過六年以上的科學訓練，所造已相當深厚。科學精神便是一。二是二。因而他自信確有所見，即對他人不能隨意遷就。中山「知難行易」的學說，完成於民國七年，發表於民國八年。大家總以爲是他晚年經過種種刺激後的一種說法，實際他在三十以前，已早有這種見解。在他二十九歲「上

李鴻章書」便有了了一個最早輪廓。中山先生儘管對他自己見到的意見不肯輕易遷就別人，可是他究竟不願採用高壓，而不惜以千言萬語加以說服，這正是西洋民主政治家的風度，乃最值得我們加以讚美的。綜合中山先生一生的言論與行事，不出發展「科舉」與實行「民主」兩端，今後我們救國建國的方針，也決不能超越此一範圍之外。因此，我們在今天來紀念中山，最好就他的遺著擇要加以探索，尤其要了解他前後一貫的精神，大家從頭做起，努力「求知」。等到大家「知」的功夫做到了一定的水準，便會產生互信，互信一立，團結自然水到渠成了。」

先生雖然以未能一見維新派主腦康有為為憾，然而康的學生梁啟超却是見過的。先生雖然不是梁啟超的門生，但先生欽佩梁的學問，譽他為現代中國做啟蒙運動最努力的一人。梁治學重點屬於史學的一面，更為先生所私淑。民國九年春，先生與王光祈在上海中國公學和任公見過一面，同時聽了他一次長達兩小時的講演，內容是「歐遊心影」之類。後來先生在中華書局任編輯，讀過他許多手寫的清稿，但這些稿子印過便沒保存。有一天，先生正在中華編譯所上班，忽然接到任公從天津寄給先生的掛號信，先生在驚喜之餘打開一看，原來是梁著「清代學術概論」有一處涉及恭維胡適之的幾句話，託先生照他所重寫的代為改正。梁的態度是那樣親切，字寫得那樣規矩，自用信箋也很講究，尤其覺得他讚美一個同時的人，立言又是那樣鄭重，給先生上了有力的一課，也給先生無限的啓示。

黃興先生是湖南人，與先生是同鄉，所以先生對克強先生的事功、一生的耿介言行甚為關懷與欽佩，並從而產生一種親切感。先生常說黃興先生墓葬於湖南嶽麓山，天涯遠隔，現在已不能回鄉拜祭了。先生前年所寫的一本「黃興評傳」，便是基於一種敬仰與激憤的心情而寫的。書中自序會說：「克強先生對於創建民國的勳業，其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在民國初年，中外人士無論在口頭、在文字，一提到中國革命，大抵以孫、黃並稱；甚至連袁世凱在民元招待兩先生北上，也用了同樣隆重的典禮。可是，以我近三十年救國的經驗，各地大學生，在我沒有和他們講明以前，能舉出克強先生的姓氏，或略略知道他生平梗概的，已絕無僅有；甚至在某些敘述中華民國開國史的書籍，能有三兩處提到克強先生的也不多。抗戰初期，政府發號施令的重心，已轉移武漢，我抽取回過長沙一次，除

訪問我童年時舊居，追思我的父母以外，曾約同兩位少年同學，渡湘江到嶽麓山，屏隔過黃、蔡兩先生的墓地。（按：蔡指蔡鍔，字松坡，湖南人）其時去兩先生的逝世剛過二十年，墳墓周圍的情況已零落不堪，幾已淪為荒煙蔓草，好像從來沒有人過問，更不必說爲他們建立銅像這類的事了。我認爲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現代的中國人不重歷史，而敘述民國以來歷史的人，更失去公平，即爲最主要原因之一——先生對黃興先生的功在國家，一生以革命爲意志，領導革命實際行動最多的黃先生的功勳，到最後却遭遇到如此的冷落而感到不平。我們從以上這段文字可看到，先生對克強的同情已情見乎辭。左先生一生以公正的態度去律己律人，無論治學與治事，都抱着爲了使後來的青年學子，國人能徹底明瞭過往的歷史，分辨強種是非，先生這種態度，不惜多費筆墨，多費時間與精神，搜集可靠的資料，從事真實公正的評述，這也許是他要寫這書的最基本動機吧！

先生講授近代史辛亥革命一節時，對黃克強先生的事跡，其對革命的影響，曾作了最詳盡的介紹，筆者「專書選讀」畢業考試論文亦由先生指定爲「辛亥革命與黃興」，指導良多，可見先生對黃興的重視。

先生任中華書局編輯主任於上海時，得友人介紹，認識章太炎先生，從此每週必一次或兩次造訪章先生於同孚路同福里寓廬，就國事向太炎先生有所請益，前後凡兩年餘。先生稱此實爲生平親受前輩教益最多之一時期。先生回憶當日情景，以聽到明末遺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最多，因爲前者是太炎先生革命思想的所自出，而後者則是太炎先生會躬與其役者。太炎先生一生以鼓吹種族革命最勤，爲文於「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甚多，並於「民報」第六期開始，負編輯兼發行之責。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太炎先生遭袁世凱幽禁於北京龍泉寺，歷時達三年之久，其中袁對章的威迫利誘，教硬兼施，始終不能移動太炎先生的志節，晚年僅能以講學嘲詠終老。太炎先生一生的人格學問，先生是極爲欽仰的。

先生亦嘗請教太炎先生治學之方法。據說有一天，太炎先生問先生近讀何書？先生告以正看陳壽「三國志」。太炎先生便說：「此書簡練蘊藏，如能同時細看義注，則可悟古人運用史料之法。」後先生於此書會翻閱三四遍，

謂得太炎先生指示之力爲多。先生後任教清華書院，於「專書選讀」一課教授「三國志」，即以太炎先生所授之法轉授諸學生。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晚，先生到清華書院近代史一課，學生以是日爲「五四」運動紀念日，特別向先生講教有關「五四」運動始末及其影響，先生欣然答應，整個晚上的話題便落在「五四」始末之中。先生說：「所謂『五四運動』，有兩個顯然的含義：其一是政治的，其二是思想文化的。『五四』的導因，固然是起於華外交與打賣國賊，但却從政治上的運動擴展到一般的思想文化上，後人把這一運動的自保，歸納於『民主』與『科學』，雖然已算扼要，但仍嫌狹隘；『五四運動』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種熱情，它的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對文藝藝術要求的熱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種運動中所沒有的，單調的民主可流於形式，單調的科學可陷於枯澀，輿文藝有以偏色之，然後才做到駕實光輝，使人不倦。『五四』決不反對歷史文化的回顧，但着眼在舊文化價值的重估，其精神是進取的，決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煉舊的在新的中間去找位置，決不在歪曲或貶損新的在舊的中間去求附會。不只『中體西用』之說與『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國本位』之說，也與『五四精神』格格不入。」

「領導『五四』運動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以一介書生而參加革命，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人，以一個革命者而把他學生的精力貢獻於教育與文化事業，而自身又能夠不斷的向新知方面求開拓，蔡先生是最徹底的一個。蔡先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當他處理北大時，最能表現一種民主作風，他實行了教授治校的辦法，教務分任，事務合議。聘教員只問學力，不講資歷，也不問思想的派別，保持了講學的絕對自由。在他所聘的教授中，有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章士釗這類舊人；也有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李大釗這類新人。只問是非，不問新舊，合文理一爐而冶，一以研究的旨趣出之。一所以先生說在中國的教育史上，一直到蔡元培先生，才開始有了像樣子的大學出現。此一代宗師、黨國元老、教育勳章、文化先驅的逝世，曾使先生嘆息唏噓不絕，認爲是中國教育界的一大損失！

筆者時常以時局政治、國家命運等問題詢之先生。在談及國家的前途與將來的展望時，先生曾說：「凡一個國家的主權命脈，假如是操縱在一兩個軍人之手，那個國家將永不會得到真正的民主，而中國近代史的領袖人物，却差不多全是軍人出身，軍人是與軍隊分不開的，手握軍權，即有武力，有武力則可胡作胡為。尤其是我國，軍隊中的領袖與整個軍隊更是一而二，二而一，二者不可分割，軍隊成了某人的親信，私人財產。試看清朝的曾國藩、湘軍，左宗棠、淮軍曾喧嘩一時；袁世凱的小站練兵，手握四鎮兵權，至有日後的與清廷、革命軍兩面討價還價，卒至演成洪憲野心一幕。」

先生平日閒談，常說平生有三事不喜人做，第一最不喜人不守時，尤其國人的宴會，多不準時，請帖上印明八時入席，但到九時半還未見開席，所以先生於普通宴會，多是推辭不參加的；第二是不喜人寫完信後不註明日期，這樣將令收信人迷惑，尤其是有時間性的重要書信，更會誤人誤事；第三是不喜與目不識丁的「草包」談話，因為大家格格不入，無話可談。

和先生到酒樓茶叙，先生獨喜一種廣東點心名「豉沙包」及「星洲炒米粉」，每上茶樓，例叫一碟，吃來津津有味，我則認為前者失之太甜，後者失之太辣，然先生吃之津津有味，學生亦唯有吃之津津有味。

先生常嘆在香港大專教學不易，因為現代香港青年學生對政治患上冷感病，對近代史一無所知，故教書時，往往要將一事的前因後果，每一人的來歷，加倍的說明，才會令學生明白。

先生常恨生當亂世，未能好好的讀書，尤其以不能研究科學為憾，常說：「如果我從小有機會好好的研究理科，成就當比現在為大。」先生有一公子就讀外國，據說是研究太空數學，先生常此以為樂，說：「文學固然是一種高深學問，但終不及研究科學來得有趣。」上窮碧落下黃泉，那才是天地宇宙間最高深的學問！」

先生常勉勵筆者有機會多學習幾種外國語言，說：「將來有機會到外國跑跑，因為研究學問，越懂多一種外國語越有幫助，今天的世界已經是進步到一日千重，再不是坐着轎轎那時候了！可以應付得來的了！」

先生平日研究歷史外，獨好文藝，於詩詞更爲喜愛，常獨自低吟，自得其趣，但平生却不輕於做詩做詞。會說：「沒有好的題材不要濫作，無病呻吟只會把詩越作越壞。」先生自述平生作詞只五首。卷首所錄一詞，是和大陸老人冒廣生而作的，詩前有一段小序說：「讀冒鶴老賀新郎詞，悲涼悽麗，殆難爲懷，敬步原韻，勉和一闋。」這大概是先生最後的絕筆了。

先生上課時書寫於黑板上，或平時寫稿，字跡不甚整齊美觀。一次筆者曾笑問先生何以書寫不工？先生却說：「我一生做事，文章稿件，皆有秘書代爲抄錄，書法就這樣寫壞了。」

先生平時教學生讀書，於「正書」之外，特別推介啓文學，對小說更爲喜愛，尤其對紅樓夢一書推崇備至，但先生讀紅樓夢，着重於文藝的欣賞。先生不甚喜歡時下以考證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在前人研究紅樓夢的成果中，先生譽王國維爲第一人，說王先生用哲學、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的觀點去研究紅樓夢是很好的。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王國維厭世自沉於頤和園的昆明湖，態度從容。後人說王國維的死是受了叔本華哲學思想的影响，自然不失爲理由之一，但先生却說也許曹雪芹的力量在叔本華之上也不一定啊！

先生對紅樓夢、水滸傳等小說向來重視，曾說：「照現在一般人對『紅樓夢』研究趨勢，大致不出十年，一個進步的大學，可能會在它的中國文學系另闢一門『紅樓夢研究』的課程，或至少也得設一個『紅樓夢研究』的專門講座。我們既沒有理由反對在大學的外文系裡去對莎士比亞、哥德、托爾斯泰等人的著作作專門的研究，我們又憑什麼理由一定要把施耐菴、曹雪芹、羅貫中、吳承恩、吳敬梓等等的著作摒諸大學的大門以外呢？」

談及青年人戀愛與婚姻問題，先生認爲這是人生必經的一個階段，有些人因經濟問題被延遲結婚，結果悞了青春，先生却說只要男女雙方都有工作，羣策羣力，不難建立一個理想家庭。我國傳統的思想是男女結婚後，男的有負起養妻活兒的全部責任，而女的却不一定要出外工作，先生認爲這種傳統習慣與想法是要不得的，男女應該平等，男有工作，女也可有工作，男有負起家庭的責任，女也應有負起家庭的責任，只要雙方都有工作，一切問題便

可從而解決。問及男女結婚的適合年齡，先生說男子最理想的結婚年齡是二十八歲左右，到那時無論心理、生理、思想皆漸漸成熟；而女子却最好不要超過二十五歲。更熱青年在求學時最好可避免談戀愛，假如太早發生了，也不要太沉迷，否則將會影響其一生學業與前途。先生談到此種問題，從不諱言，更循循的對後學指導。

先生晚年居港，除在專上院校教幾個鐘頭課外，平時却以寫作賣文爲生，生活是過得異常清苦的。先生讀石山寓所，筆者是時常到的，房子不大，廳的兩旁擺滿圖書，然這不是先生平時寫作會客之處。先生另有一書房，約八九十平方呎，一面有窗，近窗處置一書桌，兩壁書本林立，各式書籍均有，尤以歷史書籍及近代史資料最多，據先生說單是有關近代史資料的書籍，大約收集有七八千萬言。正中牆上掛有徐悲鴻繪贈先生「奔馬」一中堂，畫下便是一張很舊的淺紅色的「沙發」。睡房在書房隔隣，簡陋異常，失之太昏暗，以頭掛有畫作寶書甲骨文對聯兩小條幅，此外便是一單人床，一小几外，餘無他物。一次，筆者因事謁先生，談話間話題轉到文藝詩詞方面，先生拿出一函綉裝書本，展開原來是一套「太白全集」，本子很大，印刷精美。據先生說是書是他在中華書局任編輯時留下的，現在市面上已不可見了，所以先生對此書極爲珍視。但後來却說：「假如有一天經濟拮据，我也會忍痛割愛。」說完又手指牆上懸着的「奔馬」說：「徐悲鴻的畫近年已不可多見，人人視之珍貴，假如有人願出港幣五十元，我也願出讓了，你（按指筆者）替我留意看有誰欣賞此畫吧！」先生晚年生活清苦，於經濟最困難時往往出以賣書爲生。這種生活，是不難想像的。然先生雖於貧困時賣書渡日，但書袋中有錢時，經過書店，却又不禁買進不少的新書，於此亦可見先生的勤學不怠。

先生居家生活清淡，但作事認真，公私分明。先生在日很喜歡筆者替他謄清抄錄文章，筆者亦每次欣然答應，但聲明不要酬勞，先生却說：「我平時家居，凡一切要別人代勞之事，諸如房子的打掃，買東西，甚至採拭一個燈泡，我也要給回人酬勞的，不論是我的太太兒女也是一樣，何況你是我的學生？」一次，先生交給我稿件後，對我說：「近日生活程度高漲，你以前替我抄稿是每千字一元計，現在漲價了，我給你一元五角吧。」筆者不好意思，

唯唯答應。每次拒收酬金，只希望先生能送一些參考書籍便滿足了，先生却說：「送書還送書，抄寫費還抄寫費，如何能混爲一談？」結果酬金不得已收了，過兩天，書也加送了。

先生晚年愛看小說，在港文人，獨喜歡徐訐先生作品，譽之爲有深度、有思想的文藝作品。臺灣近年女作家瓊瑤女士的小說，先生也很喜歡閱讀。一次筆者陪先生到九龍城聯合道經緯書店買了幾本瓊瑤的小說。不到幾天，他便看完了，還詳細的爲人介紹。筆者曾問先生何以近日獨好此通俗言情小說。先生却正容的答道：「我本來便喜歡看小說，舊的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西廂記我是看的；新的小說我也要讀。瓊瑤的小說近年在東亞亞港台各地流行，自有它流行存在的價值，我希望能從她的小說作品中發現近代青年的一般思想，並不完全爲求消閑解悶而看她的小說！」

先生除喜歡看小說外，更喜歡看電影，看後反殷勤的作推介。一次，先生提議我去看一部名「美鴨人家」的國語電影，說片子太好了，如果我不去看，將是我的一種損失！

一次先生與筆者逛書店，先生買了幾本外語翻譯小說，正要出門離去時，筆者發現書架上有一新版「金瓶梅」，於是笑謂先生能看否？先生却說：「本來以你這樣的年紀看這本小說是不甚適宜的，但現在也沒關係了，何況新版的『金瓶梅』，內容上已作了適當的刪改！」於此也可見先生雖是七十餘高齡，但思想並不固執迂腐，對下一代的青年，還是有着適當的指導。

先生平生曾到日本五次，最後一次是在五十七年，先生特別爲參觀「日本明治百年展覽」而東渡扶桑。回來後曾發表多篇文章，對日本近年的驚人發展，二次大戰後的迅速復蘇，除了感到欽佩外，更引起了他一連串的擔憂。先生曾說日本是一個奇怪的民族，一個歷不死的民族，近百年來，一直與我國發生重要的關係，隣國的一舉一動，均足以影響我國，故此先生不辭跋涉，目的是研究日本近年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爲文報道，以作國人一種借鏡及警惕。

先生經過那次東渡回港後，感慨良多，並以日本民族性的懷悍，埋頭苦幹的精神，引為深戒；爲了對日本作更深刻的認識，爲了懂得日本文字，爲了看懂日本書，先生不惜以垂暮之年，決心學習日文，聘得一日譯名中琦清子者每週教授四小時日文。先生常以此自傲，謂如此方是學不厭、教不倦。先生這種好學精神，曾使筆者在回顧檢討自身時，感到無限的慚愧！

先生是湖南長沙人，死時剛巧七十六歲，與毛澤東同年，毛生於湖南湘潭，先生與毛不僅是同鄉，少年時並相互參加「少年中國學會」，老毛常呼先生爲「老庚」。先生晚年常對人言要等老毛先死，自己才死，要看着毛的政權崩潰才得安心。但言猶在耳，先生却不幸逝去，未能親眼目睹毛的結局，想來不禁令人唏噓不已，這可算是先生一大恨事吧！

弔左舜老 憶何魯翁

陳再思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後，參加了在「新亞書院」舉行的「左舜生先生追悼會」出來，我心裡有無窮的感慨。一個人默默地走進附近一間清靜的咖啡館，要了一杯檸檬水，靜靜地呆坐了一個多鐘頭，我的心一直沉甸在陣陣追悼會的悲憤氣氛中。對於生死，我雖早已有所解悟，所謂「生者、虛妄法、繼續相。死者、虛妄法、寂滅相。」（維摩詰經）但人究屬有情，眼見不久前還見面的長輩，忽然便與世長辭了，心中總不免油然而興起無限的悲憫。嘆人生之無常，感萬法之幻化，對於世間的許多犖角之爭，頓覺可笑與可憐了。

關於左舜生先生的言論事功，在當日會場散發的「左舜生先生行狀」中，載得十分詳盡；後又經李幼樞先生報告其生平，以及黃麟書、羅香林、胡鴻烈諸先生，就各種角度讚揚左先生，使大家對於左先生有進一步之認識與了解。

在靈位前，陳列着蔣總統的褒揚令，其文曰：「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左舜生，性行貞固，器識闔通，學精文史，輝映士林；身際艱虞，奔走國事，嚴闢共產邪說，用力殊勤。當外患日深之際，矢志團結，同赴國難。抗戰以還，先後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農林部部長，謫論激切，允孚物望。迨赤氛既熾，潛操益彰，國民大會之集會，光復大陸之規劃，匡贊國策，不遺餘力。綜其生平，立身無改黨素，愛國出乎至誠，談飲獻替，功在國家。遽聞遠逝，震悼深，應予明令褒揚。生平事蹟宜付國史館，以示政府崇禮重賢之至意。此令。」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院長嚴家淦。」

還有蔣總統題頒的橫額「碩望嘉猷」，以及五院院長和各親友致送的數百副輓聯與無數的花圈。左先生生前交友甚廣，人緣頗好，因此追悼會到的人特別多，總在三四百人左右。聽說在臺北行喪禮時，場面更是盛大，左先生生前享盛名，死後有哀榮，總算不負此生了。

綜左先生一生，無論致學、做人、待友、從政，都能有一番規模氣象。誠如李幼樁先生所說：「他是一個中國的讀書人」，「從政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真正的興趣，仍然在讀書，所以在青年黨中，他並不以實際負責黨務工作見稱，而多以文章見解知名於黨內外。他教學頗廣，博覽羣書，論政則才氣縱橫，每有卓見。聽說在政協前夕，國共將要談判之時，他曾向當時的蔣主席建議：「中央可讓，地方不能讓；政治可讓，軍事不能讓。」這是十分扼要的肺腑之言。左先生治事謹嚴，文章必親自校閱，待友熱誠，樂於助人而不厭煩瑣。這些都是左先生的美德，至於文章之暢達洗鍊，言談之風趣橫生，更另有一番書卷氣。他特有的風度，在在表示他是一個成了「型」的書生政治家。因此我作了兩副對聯饒他：

一、一世讀書收書者書，不愧書生本色；

平生論政參政從政，允稱政界全才。

二、與毛潤之共歲共鄉，想當年剪燭延安，暢談紅樓水滸，終不免飄揚相見，未竟全功身先死，公心豈能甘

也！

乃左文襄同宗同道，曾立志苦學長沙，精研史記漢書，奮起而組黨救國，顛沛一世志難酬，天命其可知耶？

由於追悼左舜生先生，更使我懷念起去年逝世的青年黨另一位元老何魯之先生。何先生死了一年多，我還沒有寫過一篇文章紀念他。趁此情懷，稍舒所懷。

何魯之先生是我在四川大學讀書時的西洋史教授，又是四川同鄉，在香港近二十年中，和他在來較多，對他認識亦較深。和左先生剛剛相反，何先生是內傾性格的人，而左先生則是外傾性格的人。左先生喜歡表現，高談闊論，在大庭廣眾中議論演說，滔滔不絕。而何先生却憂沉思，靜坐默想，頂多三二人，娓娓清談。他可三月兩月不出房門一步，每天讀十份報紙雜誌，搜集許多資料。興之所至，也做兩首詩，寫幾幅畫，以泄情懷。畫則專畫鸚鵡，詩則頗有意境，有仙道味。

何先生於民國八年留學法國，入巴黎大學專攻歷史，得博士學位。先後在法七年之久。民國十二年，山東臨城匪案發生，巴黎報紙頭條登載，並稱「中華匪國」，四川同鄉會琦大憤，乃走訪何先生商量，時何先生為「華法教育會」秘書，何即發通知召集華僑青年學生開會。殊不知共黨份子搗亂會場，發生打架（時周恩來即為領袖），何先生當大會主席，一方面極力維護秩序，一方面設法應付法國警察，終於將會議堅持開完。會後一批愛國青年，如會琦、李璜、張子柱、李不昧、婁國偉，及何先生等即組織中國青年黨（又稱國家主義派），與共產黨對抗。青年黨之口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就是當大會琦在大會講演時所提出來的。所以青年黨之創立，先天便是反共的。

何先生於十五年返國後，先後執教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東北大學各校二十餘年，先後完成希臘史、歐洲中古史、歐洲近古史等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大型叢書）及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代史、法國史、希臘文化史、羅馬帝國史、西洋歷史地理圖解七部巨著。（稿已完成，惜未出版而在運道途中散失）除教書外，他並負責

青年黨四川黨務甚久。因他爲學做事，崇尚篤實，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故四川青年黨黨務甚有基礎，青年黨中四川人亦特別多。除參加青年黨外，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青年黨參政時，左先生出任農林部部長，他則和會琦、余家菊、常燕生諸先生，同任國府委員。制憲、行憲均爲國大代表。亦與左先生一樣，同被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

何先生與左先生二人情誼甚篤，並且還有一段政治上的因緣。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左先生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交換書信，從此兩黨開始合作。其實遠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左先生即已第一次在廬山見過蔣公了。而二十三年青年黨方面在幕後策劃的導演，便是何魯之先生。據何先生親口告訴我，此事甚爲偶然；他當年到上海與商務印書館接洽歐洲中古史出版，住在八仙橋青年會。無意間，遇見留法友人黃仲蘇，由黃仲蘇認識黃膺白，再由黃膺白推介，才在廬山遇見蔣公的。到莫干山去會黃膺白時，還是左、何兩先生一同去的。可以說國民黨和青年黨之友好，在青年黨方面，是左、何兩先生合作的結果。

如果以劉知幾論人才必須才、德、學、識四者兼備才能稱政治家的話，左、何兩先生都可當之而無愧。左先生又比較偏重於才識，何先生則比較偏重於德與學。也可以說，左先生比較接近縱橫家，何先生比較接近道家。自然這不過是比較的法而已。

記得去年何先生逝世時，我也繞了他一副對聯：

峨眉受教，香港相依，三十年師徒情重，哭先生今日去矣！

世變方殷，赤焰正熾，八千里家國難回，哀小子以後何從？

關於對左、何二先生私人崇敬的情懷，想就此打住。倒是由兩位先生又想到青年黨當年創黨時所淵的國家主義精神，爰再贅數語。當年青年黨人因反共而倡導國家主義，以與共產黨人所標榜的共產主義相頡頏。很多人每誤以爲國家主義之思想甚爲落伍、狹隘、反動、或閉關。其實國家主義爲近代產物，比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

主義，皆較為晚近。並且他是國際主義的基礎，世界大同的必經階段。

國家主義一詞 (Nationalism) 據大英百科辭典的解釋是「對於所屬國家的愛戀情操。」本來，愛身、愛家、愛國，這是人類的天性。人類之社會發展，由家族而種族，而民族，而國家，乃是逐漸因事實的需要而形成，並非依據某一特殊的理論而建造。至於政治制度上之爲民主或專制，權力之屬於君主或人民，那是在有國家之體後而發生的政治問題，但無碍於人之愛其國與忠其國。故無論民主國家或君主國家，很少人不愛自己的國家的。

更進一步研究，有「國」之後，自然有「國際」。(國與國之間始稱爲國際) 必須自己國家健全，國際才能平等待我，否則必被兼併或受屈辱。由各國之健全獨立，乃能建立公平之國際社會，由國際社會之更高發展，乃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這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社會發展方向。而且一個人愛護自己的國家，並不一定要仇視別人的國家。正因爲愛自己的國家，而推己及人，反而更可以友待旁人的國家。所以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國際主義乃是國家主義的擴大，國家主義則是國際主義之基礎。

歐洲在十八世紀前後，現代國家紛紛建立，由於地理、語言、宗教、種族、各種因素，多使人有「分隔」、「差異」的理念。於是對於國家的強烈愛戀情操大熾，因而有國家主義之思想產生。自然，國家主義被野心家特別惡化之結果，亦每每成爲帝國主義，侵略弱小。中國民族，因地處大陸平原，歷史孕育的傳統文化中，只有「天下」的觀念，而少「國家」的觀念。也可以說我們有「天下國家」、「文化國家」，而沒有「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的思想。故自稱「中華」，而目四方異族爲「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讀書人的最高理想和層次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最後止於「天下」。我們的政治哲學是「一治一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及至我們遇見西方國家之後，着着失敗，才悽然於國家思想之重要。因爲過去的異族，文化比我們低，即使武力勝過我們，亦不久被我們同化，不覺得國家的重要。現在的洋人，處處勝過我們，我們可能有亡國滅種的大禍。於是近百年的中國近代史，無不在奮發圖強，洗雪國恥，發揮了最高度的愛國情操。老實說，這便是素樸的「國家主義」精

神之表現。甚至中共之有今日，也是盜竊和利用了中國同胞的「愛國情操」，和搶了一點「國家主義」的唾餘之結果。那有資格自鳴得意，怎配反青年黨。

但共產黨，畢竟是漢奸，是沒有國家觀念的敗類，他們欺騙國人，奴役同胞，企圖赤化世界。今天不該反共則已，要反共，還須發揚國人愛國心（也就是國家主義的精神），發揮集體主義精神，才能勝利。像現在，大多數人沉溺於個人主義的享受，或世界主義的幻想中，那是甚為可慮的。

「自由民主」，不是不對，而是不够，因其基礎於個人主義。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以金錢為價值標準，配上以個人主義出發的動機，社會只有日趨於瓦解、崩潰、荒淫、和墮落之中。力量如何能凝結，壯大得起來？

中國今日急需集體主義的精神，國家主義的精神，才能取勝共產黨。

我以黨友人士的身分，敬以此語追悼友黨「中國青年黨」元老左舜生和何魯之兩先生。

書生政治家左舜生

魏 瀚

青年黨元老左舜生，昨天上午病逝於榮民總醫院，噩耗傳來，朝野人士一致表示悲痛和哀悼。

和左舜生先生有五十年深交的青年黨元老陳啓天，昨天感傷地說：「左先生是當今一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去世，不但是青年黨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

今年七月間，左先生抱病由香港來臺，促開青年黨團結大會，當時左先生形容消瘦，行走需人扶持，朋友們很為他的身體擔心，但是左先生自己却不在意，仍然日夜為開會的事奔走協調。記者到自由之家去訪問他，他很堅強而瀟灑的表示：「促成青年黨的團結，是我近年來的一大心願，一定要把它完成，我的身體總是這樣，好好壞壞，沒有多大關係。」

風趣健談·論事精闢

左先生並且說：「我已年近古稀，除了讀書寫作以外，別無奢望，唯一的願望是能親眼看見毛澤東政權的垮台。」

促進青年黨團結的心願雖已達成，但是左先生却無緣見到神州光復之日了。

左舜生一生講學、著述、辦報、從政，始終未脫書生本色。風趣健談，論事精闢，做事認真，是朋友們對他的一致評語。

和左先生相交最深的陳啓天，前幾天就知道左先生的病沒有多大希望了，但是昨天他聽到左先生去世的消息時，仍然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他含着淚告訴記者說：從民國九年，他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時認識左先生開始，五十年來，他們同黨共事，情如手足。抗戰前後，他和左先生兩家人在上海、重慶兩地比鄰而居達廿年；關係這樣深的老朋友一旦遽逝，心裡的難過不言可喻。

嗜好文藝·人情味濃

談到左舜生的一生，陳啓天認為有幾點可以充份表現在先生的個性、作爲和情操。他說：左先生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一生對文藝最感興趣，從七歲開始，左舜生在家鄉就喜遊說書，看唱本。稍大一些時，對文藝書籍愛不釋手。他這種愛好文藝的個性一生未變，因此在先生的古文和文學造詣都很精深。

陳啓天表示：由於左先生熱愛文藝，因此他一生處事做人也充滿了文藝氣息，對任何事都是那樣達觀泰然，和他交往的人，也可以充分領略他那股濃郁的人情味。

左先生的第二個特點是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始終不懈，他那種勤於研究的精神，引起了史學界探討近代史的

熱潮。

專治近史·學界推重

陳啓天說，民國九年至十五年那段期間，左先生對近代史的研究，已經頗具心得，曾先後寫了「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和「辛亥革命小史」幾部書。到了民國十五年，左先生連續發表「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篇和續篇兩部著作，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大家都認為左先生實開近代史研究的先河。

近廿年來，左舜生在香港仍然埋首於近代史研究工作，寫的書也不在少數，有：「中國近代史四講」、「黃興評傳」、「中國名人軼事」、「萬竹樓隨筆」、「中國近代史話初集」、「文藝史話及批評」等十餘種。

陳啓天認為，左舜生先生一向對國事問題觀察透澈，見解獨到，完全是長期研究近代史所累積的心得和經驗，所以談任何問題，都有全盤性的觀察和分析，而能言人所不能言者。大陸淪陷前，左先生在復旦、大夏等大學主講「中國近代史」，同樣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和學術界的重視。

陳啓天談到左舜生先生的第三個特點，是他對國事的基本主張，五十年來從未改變，那就是「愛國」、「民主」和「反共」。

愛國情操·強烈堅貞

陳啓天說，左先生的愛國情操極為強烈堅貞，無論是講學、著書，甚至在病中，都無時無刻不以國事為念。在言談著作中，常常強調民主自由的重要。抗戰時期，曾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後又極力促進憲政運動，並膺選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而談到反共，左先生與共產黨之間的鬥爭，從民國十幾年就開始，一直延續了四十年，因此左先生有時候很風趣地對朋友們說：「我和共產黨是世仇！」

和左舜生同為青年黨五主席之一的陳啓天，也特別推崇左先生對青年黨的貢獻。他說：左先生從民國十四年參加青年黨以後，一直擔任黨內的重要職位，直到去世前，仍念念不忘青年黨的同志和黨務。

獻身文教·著作等身

左舜生生前對文化事業也有卓著貢獻。據陳啓天記憶所及，左先生曾創辦過三個報紙：「申江日報」、「新中國日報」和「中華時報」，另外他所主編或參加工作的雜誌周刊，有「少年中國月刊」、「中華教育界月刊」、「醒獅週報」、「勤共半月刊」、「民聲週報」、「國論月刊」、「國光旬刊」、「國論週刊」、「自由人」、「自由陣線半月刊」及「聯合評論」等十餘種之多。

左舜生先生生前對金錢和生活享受，一向看得很淡，所以生活相當清苦，也沒有什麼積蓄，不過他未有半點抱怨。他一共有六位公子和兩位女公子，分別住在臺灣和香港。

左先生去世的前兩天，睡在病榻上渡過了七十六歲的生日，雖然他一直昏迷不醒，但是他的家人和好友們，仍站在床前向他行禮。很多朋友們看見了這一幕，都傷感得落淚。昨天，左先生的朋友們都有同感，那就是左先生雖然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和在學術上的貢獻，將永垂不朽。

愛國書生左舜生

張作錦

青年黨元老左舜生，昨天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

活了七十七歲，在社會上工作了五十多年，從事過出版事業，教過書，辦過黨，也從過政，左舜生始終表現了一種愛國的情操。

愛國不是口號，左舜生是腳踏實地做的，他時時關心國事，不保留的提供自己的意見，並盡力維護國家的自由與法統。左舜生當部長時固然愛國，在香港漢字報飢時仍然愛國；富貴如是，顯赫亦如是，這正是中國讀書人的風骨。

大家都知道，左舜生是青年黨的領袖，且曾擔任過委員長（主席）的職務，但在加入青年黨之前，他曾一度打算加入國民黨，以後數十年來，他一直是國民黨的評友，與這一發淵源或不無關係。

這話要從很早之前說起。民國七年，曾慕韓等人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那時左舜生正在南京教書，也經人介紹加入了這個學會。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僅是出版刊物，舉行討論會等等，並不是一個政黨組織。因為經過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民六張勳復辟，民四日本有廿一條款的提出，民國六、七年之交，段祺瑞秉政時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更是一年緊似一天，他們這一般青年們，深感內憂外患之深重，因此要把民國締造如何艱難，一般革命先烈犧牲之如何壯烈，以及當前的國勢又是如何的危險等，向社會廣作宣傳，以激發青年人愛國的熱忱。在這段時期，左舜生辦刊物、寫文章，非常起勁。

以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分子愈來愈複雜，連李大劍、毛澤東都是會員，則這個學會將為少數野心分子所利用已不言而喻。民國十二年，他們夥和「野心派」分了家，毛澤東等人玩他們「共產主義」的魔法去了，左舜生和他的朋友則提倡他們的國家主義，青年黨人士自認，從這時開始，就種下了青年黨反共的種子。

民國八年「五四」以後，青年救國的熱情日益蓬勃，左舜生很想為自己的信仰找個歸宿，他非常崇敬 國父孫先生，對革命先烈的言論手采也十分醉心，在「近三十年見聞雜記」中，左舜生曾說：「十四年中山死了，我會再加入國民黨的衝動，但辛以找不到適當的介紹人作罷。」從這兒可以看出，愛國的左舜生只求有機會對國家有所貢獻，而不以黨派自限。

九一八事變後，抗日的輿論一天天趨於激烈，但政府衝量國力，知道必須忍耐負重，以爭取準備的時間。社會

人士不察，對政府每多責難，但當時作爲青年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左舜生，却甘冒大不韙爲政府辯護，認爲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能遲一時之快。左舜生並曾於此時訪問日本，以考察日本的國勢，作爲研究中日問題的參考。

民國廿三年七月，左舜生奉令 總統蔣公之邀，在廬山晤談，蔣公並曾推介他到中央政治學校任教。

廿七年，抗日戰爭正式開始，這本是全民族的一場生死搏鬥，但「共產黨」和一些左派分子却別有用心，利用此一機會以行其顛覆政府之實。這時由左舜生擔任委員長（主席）的青年黨，却與執政的國民黨交換了一個文件，表示共同支持抗戰，與「國民黨共患難」。從這兒，又可看出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識大體，明大義。

加入國民參政會，是左舜生對國家的另一貢獻。這個在抗戰時期集合各黨派的路議機構，代表了國家團結奮鬥的精神。左舜生還從參政會看出了國家民主政治的前途。他曾說：「我從參政會所得來最親切的教訓，即民主政治在中國之實現，確有可能。」

勝利後，政府邀左舜生入閣。據他在「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這篇文章中說，政府請他在農林、水利、經濟、郵電四部中選擇，他選了農林部。農林部是「冷衙門」，但左舜生認爲，「像農林這類事業，在現代的國家，是頭等重要的。」以後他果然幹得有聲有色。

左舜生一向看不起毛匪澤東和共產匪黨。據他自己說，他在民國十一、二年時，在上海安南路民厚南里一家商店的樓上和毛益首次見面，隨後又在民厚北里擺過一次龍門陣，覺得毛益「了無異人之處」。

民國卅四年七月，左舜生、傅斯年等人訪問延安，曾與延安的頭目們晤談。據他在回憶的文章中說，大半時間都由毛益狂吹，「十足表現一種獨裁的作風」。毛益還告訴左舜生，他那幾條爛槍，可以和美國人打仗。

於是左舜生得到了結論：共黨有一個不能補救而自己又不承認的毛病，便是一個「陋」字。他們處在那樣一個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而不幸他們竊據了大陸，所以初期不能不「一面倒」，以後更不能不以屠殺爲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

大陸陷落後，左舜生寄居香港，共匪會派人遊說他，希望他能「前進」「共轍」，但為左舜生嚴詞拒絕。相反，他的反共的文章又一篇跟着一篇出來了。

最近幾年，左舜生多次返國，除向當局有所建言外，還在公私場合暢論國事。他一再強調，國家前途絕不悲觀。他認為中華民族本來就是多難的，但中國人總有辦法把這些困難一一克服，這就是民族韌性的表現。所謂韌性，照他的說法，就是吃苦，肯幹，下定決心後絕不動搖。有了這種民族美德，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他還會指出，我們要完成反攻復國的目標，必須繼續發揮韌性。

在反共前哨的香港，左舜生默察大陸的各種變動，他早就認定共匪是絕對要失敗的，可是這位在野黨的領袖，却忍不住要勸告國人，敵人的失敗只能有助於我們的成功，但並不就是我們的成功，這二者之間沒有等號。我們的前途，還要靠我們自己努力。所以他會一再提醒國人，不要安於小康局面，我們要從大的方向着眼，找我們國家的出路。他認為共黨先天的缺陷是要不停的鬥爭才能生存，所以它隨時會出毛病，我們的機會相對的就很多很多，但我們不能把握的住，就看我們今天做了些什麼。

作為一個國民，左舜生忠於他的國家，而作為一個青年黨的黨員，他也忠於他的黨。青年黨分裂幾近廿年，他是非痛心的，以往幾次回來，他雖在公開場合避言黨事，可是私下裡，他仍和黨內同僚商討，如何重振這個黨。迨至去年，蔣總統接見左舜生時，殷殷以青年黨團結相囑望，於是左舜生決定挑起這付擔子，經過多少困難挫折，青年黨團結大會終於在今年七月間舉行。那時左舜生在香港大病初愈，本不宜於操勞。但左舜生還是抱病來了。青年黨團結是成功了，可是那些日子的勞累，却促使左舜生的病情提前顯化。

七月十七日，記者到他下榻的自由之家訪晤他，他曾說，醫生告訴他，他的腎臟已逐漸失去功能，如果好好保養，三兩年或者沒有問題。這位學者政治家多少有些驕然，他表示，他受利用這三兩年，到世界各地走走，增長一點見聞，或者能對國事再提供一點意見，盡最後一次養生報國的責任。雖知回香港即又發病，於九月十四日來臺住

院，就再也無法實現他環球壯遊的願望了。

訪近代史學家左舜生先生

饒亞琪

旅居香港的我國近代史學家左舜生先生，是青年黨元老，為促進該黨團結於日前返國，並於廿一日與李璜同往參加該黨全國代表大會，左氏雖因病初癒，但精神很好，並在大會上致詞。記者在自由之家拜訪左氏時，客人絡繹不絕。

在國家多難之秋，有些人，甚至國民黨的高級幹部都背叛國家以圖保全個人利益，唯有左舜生，數十年來，一直表現着一個愛國的書生本色，他雖寄寓香港，但他惦念國事，關心國家前途，另一方面左氏也留意大陸的演變。

朱毛匪幫最近上演的醜劇「九全大會」，左氏爲了研究這個鬧劇的內容，在香港曾看了這個「九大」鬧劇的紀錄片，他認爲是有畫排演的一場鬧劇，其目的不外是：第一、結束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的暴亂。第二、確定林彪繼承人地位。第三、希望在安定中重建其已垮解的組織系統。

左氏提醒世人，不論毛共能否達到上述目的，都要注意大陸今後的動態，因爲其內部一旦有休養生息的機會，就有變更其對外態度的可能。

左氏更十分感慨的說：根據國際間的看法，共匪正在製造飛彈，自由世界竟然容許毛匪壓榨百姓去發展危害人類的武器，這位以治史著稱的中國青年黨領袖指出，歷史上有很多戰爭和宗教扯在一起的例子，如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如今天的中東戰爭，而在大陸上，毛澤東已不是「人」，他正在努力把自已塑造成一尊「神」。自由世界豈能袖手旁觀。

左氏接着說：不論大陸的動向如何，收復大陸還是我們自己的事。這位愛國老人，每次回國，總會向有關方面

提供他的國是意見。這是他認為應有的書生報國之發。

左氏這次返國雖是爲了促成青年黨的團結，但這一回，可能也有很重要的國是建議提出來，不過他先要找幾位專家談談，以了解他的構想和可行性。

左氏認爲臺灣是一海島，他強調制海權的重要。鞏固台澎金馬是我們的基本工作，在這條綿長的沿海線，匪兵必須集結在那兒，他們席不暇暖，我們才有機會。

左氏愛國絕不後人，但是他表示，他從來沒有說過要求政府「明天就反攻」這一類的話。國家生死存亡在此一舉，這是多麼重要的事，豈能放言高論！他信賴政府在選擇一個最適當的時機。

兵學大家蔣百里是左氏的朋友，他生前曾說過不要「宣傳中毒」，左氏很信服這句話，處理國事，平實第一。目前國內朝野上下腳踏實地的努力工作，左氏表示敬佩，這番辛勞，將來定有收穫。

左氏又記起他另一位朋友胡適之常說的話：「要緊的，是先把你自已煉成一塊鋼。」中華民國正在鍛鍊自己。鍛鍊自己還表現在日新又新的精神上。左氏在香港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政府正在進行「全面革新」運動。他對此事似乎很感動，認爲是政府努力求進步的具體表現，值得讚揚和支持。不遠他鄭重指出，全面革新的首要條件是力行實踐，蔣總統一再就此發爲號召，作爲各級幹部的就要仰體領袖的殷切期望，大家一心一德的去，才能收效。

全面革新的號召，左氏相信政府是有決心進行革新運動的，因爲高雄青果合作社的弊端，涉嫌人員政府均依法嚴懲，雖高級官員亦不例外。這件事，海外反應極佳。

爲政在人，人是很重要的，左氏說：他七十多歲了，可謂閱歷多矣！某也賢，某也不肖，那裏會看不出來？所以他每次回來，拜訪朋友，還是有選擇的。

國家近年來培植人才，拔擢人才，左氏說這是每一位愛國的國民都感到高興的事。他記得若干年前他在美國，

在一個秘密會上聽一位國內去的青年外交官報告外交問題，有條理，不說大話，對每一項實際問題都能提出主張。雖然他過去並不認識此人，但是他預言這是人才。這位青年外交官就是今天的外交部次長楊西庵。

左氏此次返國，主要任務是為促成青年黨的團結，青年黨人希望借重他在黨內的地位，發生影響作用，使團結之事，不致功敗垂成。

七月廿一日上午十時該黨召開全代會，左氏曾慷慨致詞說，美國人已登陸月球，我們不能再為黨氣而爭，應共同團結為反攻復國努力，發揚青年黨的國家主義精神。獲得與會者熱烈掌聲。

左氏談到青年黨的問題時說：那個民主政黨的內部，會沒有不同的意見呢？有意見沒有關係，提出來大家談談，總會商量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可是不能有意氣，一有意氣，那意見就談不攏了。

這位青年黨的元老重申他的看法，青年黨的團結，形式上比較容易，精神上則比較困難，大家如不捐棄私見，團結就無法達成。

總之，左氏說：對於青年黨團結的事，他會努力去做到。「盡了人事，就只好聽天命。」

青年黨團結之後，依左氏個人的意見，仍以不參政為宜，因為臺灣處於一非常局面，政治上應力求安定。否則，執政的國民黨人才眾多，青年黨只要居於一在野黨地位，為國家盡一份力就好了。

永遠年青

費 禮

前年夏天，在香港拜訪了左舜生先生。找到了那條不太熱門的道路，經過了一條上坡，曲折長長的巷道，在一幢古舊而很雅緻的屋子裡，見到了這位年長的老人。在他那堆得滿坑滿谷的書房裡，他告訴我，最近身體不好，本來每天學習六小時日文，這幾天只能學四小時。他說他有一個文學的問題要研究，有許多日文的資料要參考，如果

不懂日文，如何能深入的探討？他又說醫師認為他還有三年到五年的壽命，就算還活三年，他打算化一年用功學好日文，化一年研究那個文學上的問題，最後的一年跟遊世界！那份酒脫，那份豪情，洋溢在他神光奕奕的臉上，使我不相信他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而他自己已經知道只有三、五年好活！

經過數度與病魔的搏鬥，終於因年邁體弱，左先生於去秋離開了人世。據說他自知不治時，靜靜地流下了二滴眼淚。這是英雄的眼淚，壯志未酬的眼淚。只有永不服老，永遠年青的人，才會流下那二滴眼淚！

每當我在工作上受到挫折，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只要想到那間堆滿了書籍的書房，書房中那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正神采奕奕地談他如何苦學一種外國語文以便研究一個問題時，那份酒脫，那份豪情，就會帶給我無比的力量！

我所認識的舜生

張夢九

我的老友左舜生，原名學訓，生于湖南長沙中產家庭。少時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與曹慕韓、李幼樵、黃仲蘇同座，凡湖南民族性的優點，如剛健、篤實、不安協、百折不回等等氣質，舜生皆有。當時慕韓以會湘鄉自命，而以左文襄期許舜生，舜生亦當仁不讓，以澄清天下為己任。舜生在震旦畢業後，由仲蘇約至其家訓其弟妹。及五四運動起，上海中華書局老闆陸費伯鴻，欲乘風氣之先，整頓書局內部，苦無人才，藉之郭虞裳（時為上海南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郭氏經考慮後，告訴陸老闆，說人才不易得，現在新興之「少年中國學會」，其中人才不少，如左舜生者，我看是一位青年人才，可以延攬。其實當時郭氏與舜生，並未謀面。陸從其言，聘舜生為中華編譯所新書部主任，發行新文化叢書一百種。我時在上海任救國日報總編輯兼新聞報主筆，與舜生朝夕會談，及新文化叢書出十幾種後，中華聲光大起，我向他道賀，他道：「此尚非我之本願，我之本願，在改革中華以動商務，如中華改革而商務仍不動，那我也算失敗。」果然半年後，梁任公先生率領張君勱、蔣百里、徐新六等考察歐後歐洲，路過

上海，商務董事長張菊生氏，係戊戌變法時任公老友，盤桓數日，以革新商務向任公請教。任公勸其物色人才，張氏請任公介紹，任公遂介紹胡適之，詎胡氏野心在北大，正用全力佈置一切，乃介紹其當年在中國公學的英文教員以代。至此舜生乃喜形于色道，我的志願算是達到了。不久又勸陸老闊辦一「中華教育界」，助全國學師範的朋友進修，並促進教會學校改革，聘青年專家陳啓天氏主持，行之數年，成效大著。舜生以編輯時間太閒，乃專心于近代史之研究，十年以後成爲第一流近代史專家。

當舜生在中華十年編輯生涯內有幾件事值得一提的：

第一、對於「少中」會務的努力。本來在王光祈未出國前，所有會務，由光祈在北平負責，到光祈去國前，會務移到上海，由舜生負責。當時「少中」是全國青年嚮往的中心，說到會務，只是回信一項，至少每月要在千件以上，還有訂雜誌（當時少中有兩份月刊，一少年中國，一少年世界），每種每月銷路，都在五千份以上，那些事務也是够忙的，單是這兩件事，至少三個人都是每天喘不過氣來，可是舜生當時是一三包辦，真不知道他當時是如何對付過去的。

第二、當時蔡韓、光祈、和我，每月申報、新聞報的稿牘，都託舜生代領代匯，三四年中，從來沒錯過一次，這就是他平生篤於友情，樂於助人的精神表現。

第三、舜生好客，每週星期日，必有幾位朋友在座。（多半是少中會友）有一次我見到一位怪人，我進去見此人面白而鬚，頗似平劇上曹操、董卓的臉譜，頭上戴的稍歪歪斜斜的西部式武俠帽，身穿藍布長衫，挺腰昂頭的坐着。舜生爲我介紹道，這是毛澤東，後來我們談了一個鐘頭，毛澤東始終未發一言，也就出門去了。我說這毛澤東是一個怪物，他大有眼中看不起你我的樣子。舜生道，他現在搞什麼馬克斯主義研究會。

勝利以後，政協會時，毛澤東到了重慶，當時少中有人在重慶的，約有二十四五人，他們爲好奇起見，想用「羅漢請觀音」的方式，約毛澤東和曾韓韓見面，託舜生去向周恩來交涉（因舜生在重慶時，曾訪問延安，表示少

中會友要公宴毛澤東。後來周恩來的答覆是：「你們要公宴毛先生，毛先生非常高興，但是毛先生出門，有一排憲兵保護，你們如一定要公宴，須得爲這一排憲兵也預備酒席。」舜生聽了，頗有難色。周恩來又說道：「毛先生又說了，要是你們諸位在外找不到大地方，他願意當東。」舜生說好極了，後來毛匪就在張治中家預備了兩桌。那天有一位會友沒到。周恩來自稱係「少中」之友，請列席，毛匪點頭，周遂坐下。這一次毛匪還是官話短少，不過有問必答。

舜生從法國歸來後，就應復旦大學之聘，教授近代史，一鳴驚人。因屢次發表對日外交言論，受知于黃書白先生，由黃氏介紹於元首，在政大任教，現在各界知名人士，曾聽過他講課的，其人不少。

舜生對於內外重要問題，喜研討到底，尋求最後結論，決不輕易放過。在日本檢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半年以內，我曾五次發表論文，斷定日本必動，到第五次論文發表時，日本剛派來樞大使赴美，不到一週。有一天，舜生和幼椿約到君勳先生、張縉、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及各派領袖在重慶信義街青年黨臨時黨部，和我討論日軍對美問題。先由舜生問我道：「日本對美態度究竟如何？這關係世界前途，非同小可，所以各報態度，對此非常穩健，雖大公報也不故作冒險的預言，老兄究以何爲根據，五次斷定日本必對英美作戰？」我答道：我的理由，已見於國民公報五次社論中，如今不妨重述一遍：

第一，日本民族性，重復仇而敢于冒險，從前日俄戰爭，就是爲了俄國在甲午以後，聯絡德法，干涉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現在日本自一九二一年太平洋會議以後，美國干涉日本，要他將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得的一切權利無條件放棄，從此日本痛心疾首，決定對美復仇作戰，已非一朝一夕。

第二，日本自九一八以來，所有軍政大權，已掌握在少壯軍人之手，而少壯軍人一夜大袍虛轟，就佔領了比日本大一倍半的東北，從此認爲天下無難事，他們眼中對於一切侵略行動，認爲都和東北一樣。

第三，東南亞的經濟資源和市場，對於日本，非常需要，如荷印的石油，馬來的錫礦和橡膠，安南的米，早是

日本人幾十年來垂涎欲得的目的物，如今英法無暇東顧，只須日本艦隊一動，整個東南亞全部，可以盡入日本人手。中。

第四，幾年來日本所謂戰略家如伊藤正德等人，公開討論對英美作戰，已經不是短時間的事。

第五，這次東條組閣，東條是主戰派的領袖，而在少壯軍人中以快速行動著稱，這次內閣，可以說是擴大戰爭的內閣。

我的話說完以後，舜生連連點頭道：希望你這不祥的預言，不要實現才好。君勳先生道：夢九先生，據政府所得外交團的可靠報告，說是日本萬不敢動，並且來猶不是才去了嗎？我說：君勳先生，我一向談世界大勢，不是完全重視消息，常常以大勢作參考，況且今天日本的少壯軍人，為完成他們的野心，雖犧牲幾個外交家，亦是滿不在乎。何況日本就對美國發動戰爭，來猶也未必瘋狂。羅薩基冷笑道：夢九先生，為這個問題，你敢不敢賭一個五千元？我道：我道：羅先生，五千元太少，最好我們賭一個人頭如何？羅薩基聽了我這話，不敢作聲，其餘的人，也都不敢作聲，還是舜生作結論道：我聽了夢九這段分析，頗感興趣，我看賭人頭太嚴重，五千元也不多，我看將來日本人要動了，由羅薩基請客；日本人不動，由夢九請客。那知兩週以後，日本人大動起來，有一次竟死了羅薩基，問他何時請客，他竟笑道，你不過不幸而言中罷了。

勝利以後，執政黨為擴大賈路，以農林與經濟二部選本黨選人充任，當時本黨開會，推舜生任部長，舜生自擇農林部，有友人問其故，舜生答道：「我選擇農林部理由有三：①中國以農立國，農林部可做的事，較各部為多，以往主持的人，什九不想作事，如想作事，我想農林部部長大有為。②勝利以後，四海困窮，想做官發財的，層層皆是，但青年黨人不應有此想法，並且農林部各附屬機構，負責的什九皆係專門人才，我雖以青年黨代表參政，但各部門仍應由原專門人才負責，本黨人士如係農林出身，只應擔任助理。③宋教仁是中國政治上有人數人才，他也曾擔任過農林部長，他是吾鄉先進，也是我生平最佩服的一人，假使我能繼他之後，略有表現，使世人知道湖南黨

生，都能辦事，這也不是一件壞事。」

舜生就任部長以後，其初本黨人士，對他不甚滿意，後見他實踐諾言，一切附屬機構，都以留用原來專門人才為主。於是黨內人士，對他才大表敬意，就是被任用的，面不敢亂來，而未被任用的，也不存十分妄想。

舜生就任部長以後，他發現農林部自成立以來，所以毫無成績，並不是專家們不想發揮所長，而是由於兩大毛病：第一、有幾位部長，都是從前的方面大員，他們寬囊充裕，借此養老以終天年，既無人批評他，也無人來排擠他，每天坐汽車上下班，一週不過開一兩次會，閒來無事，同幾位舊部聊天，比老僧到禪堂打坐舒服得多。其次，便是各附屬機構的經費，都是少得可憐，是不足以辦公人員吃飯，已大成問題，如要談到興建，那除紙上談兵的計劃以外，毫無事業可言，但是專門人才也都是聰明絕頂的人，他們看見歷任長官，都是把農林部看作老僧退休的禪院，他們也只得把這道衙門當作旅館食堂，每日除看報聊天以外，有良心的還擬訂幾個不相干的計劃，來當充飢的畫餅，至於沒得天良的，簡直就拿銀錢賭博來消遣漫長的一天。可是舜生他是代表青年黨的一位部長，雖然農林兩政是百年大計，至少非年有美金一億以上，不足以言建設，可是當政府戡亂之際，自然沒得大款預算來建設農林，幸而友人幫忙，每年總有一些點綴的預算，一遇這種機會，舜生必以去就力爭，這是農林部的老專門人員驚歎為自有農林部以來很少聽見的事。

舜生是湖南人本質，但因上海住得太久，頗欣賞杜月笙一流之為人。子女家多，負擔頗重，在大陸淪陷後，携眷赴港。當抗戰八年以後，只見短期勝利曙光，不幸又處此海角，四顧茫茫，心情沉重，不言可知。

今天舜生既已蓋棺，對他生平，不妨下一結論：舜生是一位書生，一位政論家，如果天假以年，則其在學術政治上之成就，決不止此，對於後世，更有深遠的影響。惟舜生對於我國近代史的貢獻，中外人士，早有定評。舜生一生惟一的遺憾，應是未及見反攻復國大業之完成，這是舜生所難瞑目的。

噩耗傳來，謠以輓聯一首，用誌哀悼。

九土陸沉，未見反攻終有恨；

萬方多難，幸留著作等身傳。

十年長我氣如虹

周謙冲

紀念左舜生先生

今天聯合國第一委員會討論國際安全問題，上午在法代表最後講話完畢後便宣布散會。大概還有一個禮拜比問題即可結束，然後討論韓國問題。去年開過五次會，主席說今年希望少開幾次即可結束韓國問題。在中午休會時間，忽然得着內子劉致勤由家中打到聯合國圖書館二樓研究室室的電話，報告左舜生先生在臺北仙逝的噩耗，這真是一個令人最難過最傷痛的消息。我與舜生先生的關係，真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從何時說起纔好。

四川隆昌縣韓曾琦先生詩云：「書生報國無他道，祇把毛雞當寶刀。」我們中肯的朋友，少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而訂交，而結黨，今日大多數人在海內外，依然未忘本，仍是以教書寫文爲生。我們的黨務之沒有進展，黨徒之沒有在數量上有任何大規模的增加，也是因爲我們的結合，重精神而不重物質，重質而不重量。千人一語，不如一士之獨騁！所以我們海內外同志最敬愛的湖南長沙左舜生同志，自己的黨號，就叫做「鵬公」！我因在湖北第一師範畢業後當了兩年小學教員，到南京讀書，要靠投稿寫文爲生，所以投了一篇有關「學校調查」的譯稿，寄到「中華教育界」雜誌，許久沒有下文，那時左先生任中華書局總編輯，我寫了一封信，說明希望不能登出即請將原稿退回，後來承他刊登了。那是我們通訊的開端。第一次晤面，好像是在南京雙龍巷口他和陳修平學長在南京開辦中華教育社平會返滬的途中，他對參加那次會並不滿意，所以匆匆返滬。自從我入黨後，與義韓及修平兩位學長通

輒轉多。但在歷屆黨的代表大會時期，舜生兄嫂的熱誠款待，早餐、午餐、晚餐，有時臨時成爲不速之客，也要去打擾他們一番。俗語說得好：「長哥長嫂當爹娘！」舜生先生和我的關係，可說介乎師友之間，也可說是等於我的家長一樣，他整整長我十歲，比我在辛亥革命時漢陽危如累卵在武昌守城的先家兄周顯德里十大兩歲，所以我一向是以長兄視之。而在大嫂之不辭勞苦，對四方八面來滬及經滬轉各方去的青年男女同志，無不體貼備至，也等於一個大家庭中的長嫂一樣。所以有一次我函候舜生先生，引陳散原一句詩：「十年長我氣如虹」，可爲舜生先生詠矣。

某次在滬上將近黃昏時節，舜生兄要我陪他去關北一個商人處。小老弟敢不奉陪。到了那條弄堂，要從後門去問門牌，因爲上海人的習慣，前門是不打開的，而門牌號碼却釘在前門口。我當時年少氣盛，少不更事的反問了他一句：「爲什麼自惹麻煩，黑夜來陋巷尋陌生人的門牌？」他以長兄的身份訓誡我，說：「一位四川老友，又是少年中國學會的老會友，拜託這位關北的商人撥款，接濟他的兒子作學膳費。受朋友之託，白天要辦公，祇有晚間來關隆中了。」從那天黑夜找門牌開始，我就深深認識長沙左舜生先生是一個最好而又最可靠的朋友了。

大家都知道四川溫江王光祈先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也是抱大志願，想以音樂救國的愛國志士。他在德國留學，完全靠積蓄維持生活，有時一面吃止痛藥片，一面仍以手扶額，勉強支持努力寫稿。他的手稿，據舜生先生告訴我，是中華書局的排印工友所最敬佩和歡迎的，因爲王先生爲了便利工友排印起見，手稿特別寫得工整。王著音樂叢書，種類繁多，均經舜生兄仔細爲之校閱，由中華書局出版。祇有一次，有一本極專門的「音樂」書，中華老板因爲估計銷路不會太多，堅決不肯收印，舜生兄力爭不獲，乃千方設計，最後說服了「睿智」書局的老板，他是代印中青黨報「醒獅」的老友，決定以三元一千字收印，這完全是舜生兄的友情所換得來的，也是光祈先生苦學的精神所感召而成的一種難能可貴的心靈交易，而光祈還抱恨沒有辦到四塊錢一千字。所以幫助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盡了大力，而他還認爲不夠。但是舜生兄雖不抱怨，也不怕麻煩，而依然熱心助人如故也。嗚呼！痛哉，長沙左舜生，千古一人而已！

參政會駐會委員，在渝開會，中蘇條約由油印分發給各委員參考，會畢，蔣委員長在軍委會大會堂招待各委員晚餐，首先談揚湖北崇陽雪艇王世杰先生的功勞，說明他赴莫斯科之行，不辱使命，辦到了宋子文先生所未能辦到的三點。然後蔣季陶先生起立發言，發揮孫中山先生的民族自決主義。其次，莫柳老起立說：「悲喜交集……」其次褚耀老、黃任老均是兩可之辭。最後問到在野黨中青領袖長沙左舜生先生，他好似用很大的勁，雄壯的起立，應聲覆若谷的蔣委員長點名徵詢各方意見而答曰：「我的答案，祇有十個字：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平！」他答詞說出的時候，我正坐在他對面，他坐在蔣先生的右邊，褚耀老、莫柳老等都坐在蔣先生的左邊，他發言時聲音特別的比一切都來得更響亮，更宏亮，簡直如同高聲喊口號一樣。聽了舜生先生十個字的答案之後，全場寂然無聲，舉座為之震驚，在我的個人自動反應說來，也好像打了一個涼驚。在那個時節，我更深的感覺長沙左舜生先生不僅在本黨中是千人諾諾中一士之謬謬，也是海內外難能可貴的一位有見地有擔當有氣魄有主張不愧為系韓契友，中青黨魁。在抗戰期中，受黨命於危急之秋，毅然決然與蔣總統交換信函，公開宣布「無所企求」，政黨休戰，「與國民黨共患難」，共赴國難。我們決沒有與在朝黨共安樂的幻想。嗚呼痛哉，長沙左舜生先生，千古一人而已。

述往事 悼舜老

沈雲龍

以言論鋒銳縱橫政壇和治近代史有卓越成就而馳名當代的青年黨元老左舜生先生，不幸於本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病逝臺北石牌榮民總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那天我整個上午在世界新聞都有課，等中午回家，方始得知已由趙純孝兄傳來噩耗，同時電視上也正播放他逝世的新聞。舜老臨終，我竟未能與之作最後一面，中心悲悵。

抱憾殊深。

壽老的病因，起於五月初所發生的尿血症，而且有高燒，在香港法國醫院住了十一天，檢查結果，其左腎已壞，肝亦有病，經治療後，尿血暫停，熱度減退，即行出院回國休養，但病根潛伏，並未祛除，他依然為促成青年黨團結而辛勞，其間曾有一些類似「返老還童」極為可笑的爭論，無可如何，愈益增加他精神上的不愉快，祇好悶在心裡，無從宣洩，這對他病體更為不利。到七月十六日，依舊力疾來臺，和比他遲兩日自美歸國的李幼樺先生，遇兩人在黨內的才能、聲望和魄力，從容調協，卒能透過歷時五天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形式，而將分裂近十八年的青年黨歸於復合，這才使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然而大家看到他那付滿臉病容，神態蕭索，衰象畢露，無復已往的神采奕奕，談笑風生，都憂慮其不永，勸他留臺就醫，徹底治療，而他堅持不允，終於八月九日返港。但返港第三日，尿血症復發，再入法國醫院治療，以費用昂貴，僅住幾天即出院，而病情未減，經港、臺兩地親友同志不斷的勸勸和敦促，方勉強應允於九月十四日由其女公子宗華陪護來臺就醫於民權醫院，那天將他用擔架抬下飛機，送上救護車，直駛石牌。在車上，似乎神志還不給，對迎接的親友同志，都能頷首示意，然而我總覺得其病情嚴重。康復難期，恐怕業已走到人生的終站，這一點莫明其來由的預感，如今畢竟成爲事實了！

在他住院期中，我曾數度前往探視。九月二十五日那天上午，只有宗華及周寶三兄的男女公子在守候，壽老已進入手術室接受檢查，因爲先兩天主治醫師要用血管照相檢查病源，而血管已硬化，儀器揮不進，乃改由尿道探測。不久，泌尿科主任通知我們四人到手術室門外懸候報告，並手持瓶管內貯溼濁的排泄物，指示說明壽老的左腎已完全壞死，失去功能，右腎尚完好，輸尿管可能有一小瘤或癌，照通常情形，應該馬上切除。但壽老年邁體弱，難以時間太遲，不敢貿然動手術，親友方面應該會商有所決定。我當時問道：「如果切除左腎的話，有沒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醫生答：「百分之五的把握也沒有！」這等於說病情已經絕望無能爲力了！於是宗華含着眼淚，隨侍老父由手術室回到病房，壽老神情尙勉強撐持着，祇是感到在手術室時間太久有點厭倦，但還是和我講了一些話。

並問起我兒子的終身事業，力贊對方之美而兼，他大欲也有所聞，表示異常關切而愉快。還有他友來探訊，話因而打斷，我着他疲乏欲眠，遂辭出，趕回臺北，向各方報告舜老病況已到嚴重關頭。以後由於飲食不進而漸陷昏迷，幸心臟尚跳動，改用氧氣維持呼吸，如是拖延二十多天，終於醫藥罔效而辭世，是病症之無可挽回，在那天手術檢查業已註定了的。

舜老的病逝，使我想起他和民國十八年一月在北平協和醫院去世的梁任公先生，是患着同樣的尿血症，舜老病在左腎，任公病在右腎，雖經剷除，而終於不治，歿年僅五十七，比舜老逝世更早。他兩人同樣是書生報國，以言論稱雄，對政治有極大抱負，俱曾參與閣席，而終於夙志難酬，大體甚相類似；晚年退而從事文化教育及學術寫作，俱未能完成其預定計劃，也正復相同；乃至其家庭生活，某些娛樂嗜好，以及喜和年青人接近，不忘情於國事安危，寄希望於未來一代等等，都可說是同一類型。然而天妒才人志士，竟使斯人而同罹斯疾，先後如出一轍，其命也乎。我生也晚，未及親炙於任公之間，但以隸籍青年黨之故，追隨舜老有四十年之雅，尤其我對中國近代史得以略窺門徑，受諸舜老之啓迪及鼓勵者甚大。茲於其逝也，緬懷前塵往事，歷歷如在目前，不禁悲感交集，誠如任公挽其師南海先生聯語中有語：「羣生也有涯，卒免瞎斯民魚爛陸沈之慘！」「政悉天之將喪，不獨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我也有此心境，亦復有此同感，真不知涕泗之何從了！

二

我之初識舜老，早在民國十九年春初到上海就讀光華大學的時候，黨內的若干集會上，經常聽到他對時局的剖析，滔滔不絕，鞭辟入裡，語句雄渾而有力，毫無陳腔濫調，極爲令人心折。次年上半年，我奉令暫時休學一學期，與劉九兄分別主持上海市黨、團部。其聯繫同志及開會的場所，即借用膠州路陸軍里舜老的寓所，另外在愛文義路哈同路口開設的愛文書店，則作爲對外接洽和通訊的機構。到九一八事變後，由於黨、團的發展擴大，才又在

赫德路福照路口福德坊及西愛威斯路慎成里分別租了兩幢房子，又在威海衛路開字路口開設大陸書店，及鄰近的瑞興里租賃一間前樓，作為掩護，大概全國各地同志凡是來往過上海的，無不知道這幾處是上海市黨、團部活動的據點。但除慎成里曾一度遭受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外，其他一直安全無恙，尤其蒲石路蒲石里堆放文件的一處，始終保守秘密，可見大家工作的審慎。

我因為經常出入陸德里，對舜老的家庭也有所了解，他的夫人和媳賢淑，幾位男女公子都很小，老太太尚健在，一家和樂融融，對同志殷勤招待，從不厭其煩。舜老那時任職中華書局編輯所新書部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他對中國新舊文學的造詣很深，中外制作或翻譯的文藝小說，幾於無不瀏覽，同時對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亦有其湛深的研究，有關史料也開始作廣泛的搜集，他喜歡買書，是其生平嗜好之一。我到上海噫書時，他在中華輯印有「中國近百年史資料正續編」四冊，還寫過「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辛亥革命史」等書，是他個人研究的心得。他對國家治亂問題和民國以來的政治得失，有其深刻的觀察，精闢的見解，完全得力於近代史的研究，儘管一些自命為正統的歷史家，鄙夷近代史而不足道，認為只有地下發掘出來的才是真正的歷史，可以由其牽強附會任意解釋，好在死無對證，這完全是學術上的障蔽與偏見。今天中國近代史成為大專院校的必修科目，乃至國際間研究的熱門，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推源創始倡導之功，實由舜老開其先河，也是不容抹殺的。

自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京滬一帶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掀起抗日隨願的熱潮。接着不久，一二八滬滬抗戰繼起，上海近郊，都成戰場，租界內民衆群起支援，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救死扶傷，輸將購彈，充分發揮愛國精神，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鏡頭。舜老這時候對外活動更爲積極，和各方面聯繫及交換意見也倍加繁忙，不得不把中華書局的職務辭去。他曾通電全國要求爲抗日的十九路軍支援，也會被上海四十餘團體公推爲代表，前往平、津，策動張學良、吳佩孚抗日。他主張極爲堅決，認爲非結束訓政不足以言舉國一致，非舉國一致不足以言抗日，他曾寫就一篇簡短的「毀黨救國」宣言，印成傳單，交由赴京請願的青年黨同志相機散發。這個主張自然不會爲政府所

接受，而他拒絕出席政府召開國難會議的邀請，也就爲此。

後來淞滬停戰協定簽字，上海依舊恢復歌舞昇平，人民趨於苟安宴樂如故。是年十二月二日，適爲青年黨建黨十週年紀念，上海市黨部爲喚起人心促醒羣衆一致，兼避免租界當局的注意，決定於次日下午三時在南京路舉行示威運動，指定主持市團部的蔣傳之兄（現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會委員）擔任總指揮，把參加的同志分成數十小隊，每隊五、六人不等，陸續分批前往南京路和浙江路的交叉地區，這是上海最熱鬧繁盛的中心，來往車輛輛輛，行人擁擠，大家分布於馬路四週的規定地段，僞裝逗留觀望，等待傳之兄的號令，即將事先準備好的傳單隨手散發，一致高呼口號。俟任務完成，指定每小隊必須有一人到先施公司樓上大東旅館及四馬路大中華旅館預定的兩個房間向負責人報告。舜老聽到這個決定，本着湖南人的一般衝動，便要親自參加行列，不外是身先士卒之意。那天示威運動甚爲成功，傳單紛飛，口號震天，觀者如堵，馬路秩序大亂，交通阻斷很久，始將群衆驅散。但我却看見傳之兄被印度巡捕拳足交加，送上警車。待我到大東旅館，舜老不久亦至，而各隊亦陸續有人來報告。舜老便命我同往大中華旅館，一看那邊情形。離開大東不過數分鐘，有一位同志因傳單遞剩下一張，便從窗口向浙江路拋下，被巡邏的巡捕拾起，立即上樓搜查。以我們那個房間人多而複雜，嫌疑最重，結果被逮捕的有周耀冲（現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謝魯平（現在美國加州教書）、張希爲（現任國大代表）等，另外在馬路上逮捕去葉乘藩、侯恩彤等數人，都被送往提籃橋監獄。不久，周耀冲等因證據不足開釋，傳之兄和葉同志以現場拘捕，曾經爲第一特區法院，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徒刑二年半，後上訴高等法院，始判無罪，然已白白地多住了十個月的西牢。假如舜老不喊我先行離開，可能俱免不了一場牢獄之災，這是與舜老共患難的一段小故事，是頗值得回憶的。

三

民國二十二年初，日軍發動從東北向關內進攻。經過長城浴血抗戰，其勢力深入華北，平津岌岌可危，政府急

命黃膺白先生於五月逃程北上，擔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與日方周旋，結果派員與關東軍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暫時緩和華北嚴重的局勢，不料引起南北輿論的極端非議。這時舜老在上海以「仲平」署名寫了一篇「時局評言」，刊登於時事新報，闡述抗日既尚無充分準備，則主持這個停戰協定的人，在那樣險惡環境下，能有這樣一個結果，實在大不容易，着實對這班主持的人有不少的怨詞，這對當時大肆攻擊的言論，抱持着獨特的見解和不同的態度。恰好膺白先生逃職南下，在火車上看到這篇文章，不無知己之感，輾轉打聽始知是他的大作，遂借由沈君怡先生邀約舜老至莫干山暢談了一整天，他對膺白先生的印象，有一種特別的看法，覺得搞政治活動是「小人因緣以爲利，君子不得已而爲之」，所謂「小人」，便是「政客」；所謂「君子」，便是「政治家」。政客是吃政治飯的，所以「知進而不知退」；政治家是爲一種意識或主張而幹政治的，所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因而他認爲膺白先生實在是有有一種政治家的風度。這一惺惺相惜的文字遇合，可說是非常偶然，但對舜老個人的以後出處，却有甚大的影響。

也許是這番莫干山談話的投緣，次年五月間，今總統蔣公便電邀他於暑假至廬山一談，這可能即由於膺白先生爲國愛才的推薦。舜老行前，與青年黨創黨人翁蔣韓先生在上海中國飯店交換意見，他提出三點必守的原則：一、團體不失立場；二、個人不失身分；三、爲國家之故，可能與國民黨合作，但決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系鬭爭。這一光明磊落不卑不亢的態度，完全得到蔣韓先生的贊同，因而才決定七月廬山之行，和蔣公晤談兩次。這是舜老以文字言論見重於政府最高當局之始，也爲國民黨和青年黨之間開啓了合作之門，而他始終抱定以上三項原則矢守勿渝的。不過，青年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自十九年起即從上海遷至天津，二十一年夏一度改組。次年因北九環境惡劣，復南移香港，不久便等於無形停頓。舜老這時在黨內所擔任的名義是蘇浙皖京滬黨務特派員，到二十三年多，便由蘇、滬黨部徵得他的同意，建議依據黨章由各省市黨部聯合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但在第二特區地方院任法官的喬萬選同志（曾任清華大學校長）家中舉行，我也是出席代表之一。會中決定重新恢復中央黨部組織，並

籌備創辦國論月刊，這是黨內一個重大關鍵，是由於舜老的明智決定，而為外人所不知的。

臨時全代會後，我於二十四年春東渡日本讀書（二十二年春我再度為教育行政當局垂青而開除惡籍），並開始向國論「投稿」，以維持生活。是年夏，青年黨在上海召開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我以留日總支部推派回國列席。時舜老已遷居地豐路地豐里八號，是一種雙開間三層樓的房子，甚為寬敞，他全家住二樓，以三樓兩間為國論月刊社編輯部和宿舍，樓上兩間一為現代圖書室，一為會客室。全代會即以三樓為會場，會中推舉舜老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郭贊黃（我好友郭鶴曾博士的尊人，抗戰時任湖北省參議員，病歿恩施）為中央檢審委員會委員長。舜老擔任這個委員長名義，一直到二十七年左漢口召開的第九屆全代會止，再由蘇韓先生擔任。會後我仍回日繼續學業，到二十六年春畢業回國，穆師濟波本有邀赴陝西教育廳任職之約，但舜老留我任國論月刊編輯，以為中日關係已瀕決裂邊緣，東南遲早有事，何必遠走西北。我也因現代圖書室藏書已具規模，有益於我的進修，兼以食宿都在地豐里，隨時可向舜老請益，遂決定留滬。舜老這時已應聘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教書，每週往來京滬，甚為忙碌，而回滬後仍然手不釋卷，常常有朗誦吟哦之聲，傳於戶外，可見其用功甚勤。本來，以一異黨人士而在中政校任課，不能不說是破格延攬，而且連續教了七個學期才被停聘，學校當局之容忍，還是有限度的。然在舜老則覺得「為國民黨教好一個青年，也和為青年黨教好一個青年是一樣的」，毫無城府，不分畛域，這是何等的胸襟！今天他的中政校門生兒子，在臺灣各方面任要職者甚多，談起這位黨外的左老師，還是敬佩不置呢！

四

當是年七七事變既起，政府最高當局召開廬山談話會，青年黨領導人亦有多人被邀參加。今總統蔣公即席致詞有謂：「抗戰一經發動，便須不顧成敗利鈍一直打到底，決無所謂中途妥協，妥協就是投降！」當時重溝壕的砲聲逼人，政府抗戰國策便已宣示得如此明確而堅決。接着八一三滬戰發生，舜老由廬山回滬，策動組織上海教育界

抗敵後援會，借尤中女中爲辦事處，率同我們從事宣傳、募捐、救濟等工作，深晚間在地豐里陽台上看市郊砲擊，砲彈與照明彈交織成天空一片火花，轟隆之聲不絕，他東點點，西指指，心情激越非凡。到八月底，政府成立國防最高參議會，網羅各黨各派領袖，共赴國難，青年黨的曾憲韓、李幼椿兩先生和丹老都被選爲參議員，丹老隻身應召入京出席，自是青年黨從九一八以來所呼籲的舉國一致團結抗日，畢竟因敵弱深入而完全實現了。

不幸這一年冬，軍事逆轉，不僅華北日軍長驅直入，上海、南京國軍亦先後撤守，政府西遷武漢，並指定重慶爲行都。二十七年三月，國民黨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漢口，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爲全國一致信守之準則；推定今總統蔣公爲總裁，並結束國防參議會，成立國民參政會爲戰時最高民意機關。青年黨中央認爲國難嚴重，必須擁護政府抗戰，以求最後的勝利，乃於四月二十一日由丹老以中執會委員長代表致電蔣總裁，表示願與國民黨共患難之基本態度，其原因如下：

「敬啓者：國難尚在極嚴重之階段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但在目前，則尙不敢即以輕忽之心，遽弛其戒慎之念。國民黨最近所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苟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與國家有益。中山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民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爲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道相符合，願表示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禦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昔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交臂倥傯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始終不渝，補偏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

續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總之，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外此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外此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踐，耿耿之懷，敬候明教，此頌動安！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啓。」

附國民黨蔣總裁即於四月二十四日覆函如次：

「舜生先生惠鑒：屢讀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切欽佩。並承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相符合，尙示擁護政府之赤誠，願爲抗戰建國而盡最善之努力。誠懇坦直，矢共艱難，循誦之餘，彌深感慰！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與期望，已具詳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所旁貸，而實踐之功，必資群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排除海外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念職責之艱鉅，尤望架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斷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同昭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其誠敬，即維鑒察，祇候台綫！蔣中正謹啓。」

以上函件的交換，是中國政黨合作的創格，使愛國反共的青年黨在野秘密活動了十五年，總算取得合法的承認。因此，雙方函件發表後，引起國內外新聞界廣泛的重視，不少撰有專文評論此事，都表示甚深的慰悅。即如張季燮在四月二十七日大公報所寫的社論「團結的增進」一文中略謂：「經此往來信之發表，可謂該黨已取得公開存在的地位，而同時則加強國民黨領導全國的立場，……於抗戰前途甚有利益，對內對外俱有良好影響。……中國青年黨二十年前發源於留法青年之一團體，……與國民黨異其歷史，然亦不處於正面相反之地位，今天國難這樣嚴重，當然捨小異而趨大同。……而如左舜生書中所云，……充分表示愛國的純誠，而甚足以得一般無黨派國民的同情。」甚至在國際間素負盛譽的合衆社，也在四月二十六日在漢口發出廣播電，謂「國民黨已於本日正式承認中國青年黨，蔣委員長與該黨領袖之來往信函，亦經正式發表。中國青年黨抱純粹之國家主義，現已完全擁護國民黨及蔣委員長所領導之國族解放戰爭。……」可見國內外輿論的一貫。所以凡是欲求了解中國現代政治史或中國政黨史，決不

施經視上引的兩項重要歷史文獻，以後青年黨之由共同抗戰而共同制憲、行憲、參加政府、協助動共、獻見，乃至大膽撤退，始終擁護反共抗俄國策，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及國家不能不團結以謀共保，別無其他企求，都是以此項交換函件為契機，一線相沿而來。舜老一生對青年黨對國家的最大貢獻，也就在此。至於臺北世界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大事記」，說是由「中國青年黨李璜上書蔣委員長，表示團結抗戰」，祇要一顧來往函件的原文，便知完全與事實不符，必須加以注意的。

五

抗戰期間，我一度流離轉徙於蘇北，嗣即赴閩供職省政府，繼因母喪返里，以道路梗阻，乃隨從蔡緯先生遷居居滬，並在光復中堅執教。和舜老亂後相見，已是勝利後的三十五年春初。我由臺灣因公赴滬，在地費里看到他兩鬢如絲，神采尚不減曩昔，他正忙着創辦中華時報，對國事前途以中共坐大，烽煙四起，感到極度的憂慮，囑咐同志們提高警覺，準備一場長期的反共鬭爭，決不可因抗日勝利就以爲天下太平無事。他既不悲觀，也並不樂觀，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形跡詞色，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

舜老在三十七年行憲前後，以青年黨被邀參政，在張群、翁文灝、孫科三任內閣中，曾擔任了共一年八個月的農林部長，這是他畢生從政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其時我已由臺辭職返滬，在經濟部及改稱工商部的附屬機構任職，並曾赴京出席行憲國大，以及青年黨在上海召開的第十一屆全代會，和舜老有多次的晤叙。知道他對農林雖說是外行，但能聽取專家的意見，而仍保有一個政務官的獨特見解。他既無官氣，也無僚氣，仍然平易近人，並不裝模作樣端空架子，依舊保持舊生本色。可惜勝利以後政局始終在匪亂動盪中，共軍傾其全力於一切破壞，加以幣制膨脹，法幣和金圓券不斷的貶值，以致他對農林建設想做的都沒有如所預期，是極引以爲憾的。

當三十七年多餘時會散後，政府南遷廣州，行政院改組，舜老於戎馬倉皇中，在上海辦妥了交代，即於三十八

年春由他的服務空軍的公子宗惠接來臺北，寄寓温州街中華農學會。住了四個月，覺得坐食無補時艱，遂於七月間離臺飛廣州，轉赴香港，從事文化出版事業，以言論反共，遏阻其向海外的虛偽宣傳。頡頏之巨，俾斯年忽送來一紙黨大罰書。時我已與家邊黨，舜老告訴我：「老傅不是請我敬書，而是替我送行，還是走的好！」因為他深知大陸淪陷後教育界遷來臺者不少，過去的南北門戶之見，壁壘分明，其流風遺韻，一樣傳到臺灣。他早年僅在上海震旦大學肄業，民十五，到過法國，在巴黎歷史政治研究所研究。抗戰前，到過日本考察，時間都不長，從沒有以「留學」「學人」「講學」這類名詞來自我吹噓。他和國內出版界和學術界有不少的朋友，但和南北派系的學壇「顯主」們都攀不上蠅營狗苟的特殊關係，何況他又不是什麼研究員、院士、評議員之類的自命正途出身，而是未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通過的所謂「黑牌」教授，自仍本其獨往獨來的性格，不願和「因緣以為利」的那一班名師而實不至的人打交道，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然而我却相信：如果那時候一直留居臺灣，以他憂國憂時的熱情，經過常人的才智，和對毛共的透徹了解，以在野黨的立場，隨時密陳獻替，對國家將有更多的裨益。

舜老自三十八年秋離臺赴港，除了四十三年回國出席行憲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和四十五年經臺赴日參加親善訪問團，五十一年應哥倫比亞大學東方學院之邀赴美外，定居香港將近二十年。陸續購置圖書不下十萬冊，一面教書寫文章，一面致力近代史研究，有錢到手就買書，沒有錢就賣書貼補生活。他會和朋友們先後創辦「自由人」和「聯合評論」兩個刊物，俱以經費不繼未能維持長久。他寫了幾十萬字政治性論文和短評，以赤裸裸揭露毛共罪惡及對國際問題的分析批判為多，對臺灣也有不少善意的諍言，坦率直陳，言人之所不能言。他是湖南人，喜吃辣椒，文章不免也有辛辣氣味，與他有同病的，覺得過癮，吃不慣辛辣的，自然感到受不了，因而難免對他有某種程度的誤解。然而他還是行其心之所安，滿不在乎，仍然本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心情，淡泊自甘，寧靜自處，廣事近代史料的搜集和閱覽。先後寫或出版的有「中國近代史四講」、「萬竹樓隨筆」、「反共政治論文集」、「近三十年見聞雜記」、「中國名人軼事」、「黃興評傳」、「中國近代史話初集」、「中國近代史話二集」、「中

國文藝史話及其批評」、「遊記六篇」等書，可見此老用力之深，寫作之勤。另外專寫罵人的某青年竟未徵得他的同意，在臺北出版「左舜生選集」五冊，前面還有一篇沒有任何署名的序，把舜老亂恭維一番，却聯帶的對青年黨大肆譏嘲，其實青年黨創黨受難之日，他還沒有出生呢！有人告訴舜老，要追究版權，舜老笑着說：「就讓這位青年賺點錢吧！」其率真而風趣，正是舜老可敬可愛之處。

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我和王師曾兄飛港，促請舜老和幼樺先生來臺，以謀黨內的團結。於勾留的半個月中，在二老的港、九寓所，不下談了七、八次，對國事、黨事都會詳加研討。大體上二老俱可同意來臺一行，細節有待磋商，終以某種原因而中止。如是又遲了六年之久，舜老始應政府邀請來臺，他自己解嘲說是「這好比失落番邦的遊子，經過這樣一個長的時間，始得重返故國。」他在臺住了三個禮拜，參觀了故宮博物院、臺大、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會、榮民總醫院、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等機構；中央、徵信、聯合等報社，他對輔導會主任委員乘銜、調查局沈局長之岳，讚譽為「臺灣新興事業中少壯代表的雙璧」，並且說：「不僅他們自己異常努力，即與他們共事的那一群高、中、下各級幹部，也莫不表現蓬蓬勃勃的氣象，使他們經辦的事業顯出前途無量。」這不是溢美之詞，而是極公道之論。

前年暑假，他再度來臺住了一個多月，曾往臺中省政府、省議會及高雄新興工業區參觀，旋又往橫貫公路、蘇花公路遊覽，沿途又看了不少機構。同遊的有浙南省宿趙夷老等，我們幾個朋友也隨行觀光，見他遊興甚濃，精神矍鑠，私心為之欣慰。不料去年九月三度來臺，精神已現衰頹之象。會入榮民總醫院檢查，並未發現身體有何重大問題，孰知僅隔一年，病情迅速變化，竟令這一位畢生愛國忠黨的醫生政治家溘然長逝，豈僅青年黨人有黃城人琴之痛，也是國家無可彌補的莫大損失。茲錄我的晚聯於後，以示個人的哀悼之忱，兼作本文結語：

是一代才，負一時望，具超越一世眼光，為國憂勞，不讓前哲。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有橫掃萬人手筆，等身著作，垂範後昆。

左舜生先生臨終美德

王嵐僧

青年黨的曾左李陳四位先生，我與左先生認識的時間較晚，私人間接觸的事也較少，一直到民國二十年春，我由天津回上海，才開始與左先生相處，才不斷的談談國事與黨事，以及文與生活的愛好與興趣。二十四年我回到北平，擔任宋哲元先生主持下的華北平津冀察四省市的反共特殊工作之時，左先生偕同崔萬秋兄暢遊平津，我們日日聚晤，由國事黨事談到女人的事，我們是同樣的率直與坦白。我們嘗說慕韓先生，有吃冷猪肉的資格，身後可以進入聖廟，我們是凡人，可以談政治、談文藝，也可以談談女人。左先生談話，滔滔不絕，又那樣風趣。他這一次旅行中，我們有較多的認識，就在這個時候，我們認定中日之戰，絕無方法避免，而青年黨必須與國民黨密切合作，才能鼓勵全民，起而長期抗戰，以挽危亡。以後我們在上海在四川，雖也不斷見面，但我在前線，他在後方，也復少有機會作深夜之談。中日戰事結束後，我們同住上海，見面機會雖多，但深談之時甚少。卅六年他擔任農林部部長，我們又同在黨內任中常委，卅七年我又繼袁良先生任花紗布管委會主委，我們在夜車往返京滬不時同車，見面時談文藝的時間多，談公事的时间少。卅八年反共形勢逆轉，我們黯然神喪，有一天他約我在他的南京寓所吃午飯，其時慕韓先生已經赴美，幼椿先生返川，他問我對黨事與國事作如何的考慮，這時候我兼任了黨內的秘書長，我坦率告訴他，我必須根據慕韓先生臨別示言，「無論天涯海角，青年黨必須與在朝黨合作到底，任何絕望時期，此心不變。」他也勸了許多話，要我好自為之，他自己則準備先赴台後赴港，靜觀世變，我鼓勵我為黨作最後之掙扎。後來我在四川，想從事遊擊工作而未成，蒙總統蔣公的關懷，由谷正綱黃少谷兩先生面告，要我們撤退來台，景陶西英滿聲師會翰珍雲龍諸兄與我由成都飛海南來台。民國四十年青年黨不幸分裂，我與張伯倫兄赴港，晤左李何（魯之）張（子柱）四先生商黨事，左先生見了我不由分說，痛責我一頓，說我不應該目中無人，將一個有歷史的

黨造成分裂，我一言不辦，要求再團團結，左先生是陽剛型人物，越說氣越少，最後還是客客氣氣和伯倫與我談了二小時。最近若干年來，左先生不時來台，每一次我們總是心平氣和的談談黨事與國事，然後有空總喜歡談談文學，我告訴他，我今生再不想服公職，也不願再為黨事吃苦受累，只願留下十年時間，研究「詞」學。五十七年多左先生赴日經台，承總統蔣先生致勸調解本黨團結，幸賴余陳兩先生及黨內十五同志之商談，分裂近二十年之青年黨，乃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而實現全黨一致之團結，使久居海外的李幼樺先生翩然返台參加大會，左先生以久病之身，奔走協調，超過刑體負擔能力之辛勞，實不相宜，而五主席諄諄勸告，雖不容辭。主席要我擔任本黨第一任幹事長，我以年近七旬之軀，任此艱鉅之責，實不相宜，而五主席諄諄勸告，雖不容辭。詎料左先生返港不久，病益加重，扶病來台進入榮民總醫院就醫，當左先生病情危急時，我不敢日日探視，深恐問長問短，有傷病體。當左先生去世前二日，周實三兄告我，左先生時時想與我晤談，待我走近病牀，左先生向我含笑示意，要我坐在他的身旁，他輕聲細語告我二事：一為張夢九先生為他五十年老友，生活艱困，我必須善為設法幫助；二為他過去知我不深，奔走團結一年中，他對我益深瞭解，望我對黨事千萬不要灰心，寧可一時受屈，團結必須整體。寥寥數語，意短情長，我當永銘肺腑。我別後僅二日，左先生溘然長逝，嗚呼痛哉！左先生是政治家、史學家、文藝思想家，其好學與做人，足以勸青年輩後世，不待我的贅言，我僅就我與他的關係，追述其始末，以誌哀思！

弔左舜生先生

劉鵬九

吾黨領袖，左公舜生，岳麓鍾靈，湘江毓秀，秉性淳樸，聰穎異常，幼而好學，讀經作文，涉獵新書，立意革命，榮繞於心。弱冠負笈，東下滬濱，肄業震旦，結識新人，見聞既廣，襟懷更暢。民國肇造，政基未固，內憂既

熾，外患相侵，中原板蕩，舉國騷然。思潮澎湃，新舊雜呈，乃入學會，是爲「少中」，啓迪青年，刷新中國，魚魯混雜，難以並存，愛國共產，分道揚鑣。五四運動，始於外交，終於文化，狡詰者流，因緣利用，引「熊」入室，貽害無窮。「醒獅」出版，一吼驚人，經理編校，獨任其勞，「孤軍」奮鬥，相得益彰，聲勢大振，共黨膽寒。入青年黨，同心戮力，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有志之士，聞風景從，關心國事，未較著述，任職「中華」，新書頗出，貢獻之大，士風丕變。旋赴法國，巴黎大學，鑽研歷史，迨回國後，仍事筆耕，東北事變，全國震驚，力主對日，不辭一職。淞滬戰起，抗日主張，先見之明，復旦大夏，兼及政校，講近代史，旁徵博引，聽者動容，教授如斯，前所未見。國事日非，廬山談話，國青合作，於焉肇端。東瀛日本，侵華日亟，七七響起，再登廬山，全面抗戰，抗帥決策，日軍深入，政府西遷。國防參議，國民參政，團結全國，一致對外，民意激昂，協助政府，八年苦戰，終獲勝利。復員還都，百廢待興，改革政治，首要之圖，制訂憲法，與民更始，制憲行憲，循序而進。邊渡時期，出長農林，以農立國，根本之道，奮生治事，尊重專家，還有一養，步武鄉賢。共匪叛國，政府遷臺，國大集會，一致增訂，臨時條款，總統連任，主持跋扈，準備反攻，興滅繼絕，有賴英明。光復國策，倡議支持，國家爲重，肝膽相照。近代史家，聲名遠播，美國方面，邀往研究，發表言論，內容精渾，中立左傾，大受影響。爲國宣勳，輒在前途，滯留港九，旨在反共，環境特殊，用武有地，講學寫作，批駁糾邪，冀挽狂瀾。痛心黨事，謀求團結，元首關懷，克服困難，今年七月，吾黨團結，方底於成。形式上易，精誠則難，在政策上，既少歧見，箕豆相煎，所爲何來，悲歡離合，政黨常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原無足怪，相忍相讓，協和爲上，黨之前途，團結是賴，臨終之人，諄諄相誡。近幾年來，左公舜生，用腦過甚，體力就衰，復患胃疾，飲食失調，乃損健康，更有甚者，腎臟功能，相繼失靈，甚至肝臟，亦漸硬化，惟心腦強。七月來臺，抱病出席，代表大會，會後返港，病即加劇，九月回臺，榮民醫院，竭力診治，年老病深，醫藥罔效，沉痾難起，延至十月，十六日晨，溘然長逝，享壽七十七，嗚呼痛哉！吾黨損失，國家損失，凡後死者，永宜銘記：左公舜生，愛國愛黨，爲國爲黨，鞠躬盡瘁，毅力感

人，精神不死，永留遺字！

長夜漫漫失明燈

潘再中

悼念左舜生兄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謗謗」的謗公、舜生兄與世長辭，迄今已整整六個月了。舜生兄性格豪爽、瀟灑、堅強、正直……素為僑胞所欽佩。其忠於國，瘁於黨，孝慈於家，精誠於同志，對事膽大體而不拘小節，堪稱一代完人而無愧。他是民主反共五十年的英勇鬥士，當此國家危急千萬倍於往昔，國土未復，毛賊未殲，奈之何遽爾遽逝！國失諍友，黨失領導，這是無可彌補的損失！「長夜漫漫失明燈」，絕非過甚其辭，私人哀悼，猶其餘事。

我於民國十四年由法返國，受安徽省長吳炳湘先生之委任，擬創辦菸業改良場於故鄉鳳陽，並設廠製造捲菸，以抵制英美菸草公司在內地非法設廠。當曾函告壽韓兄，回信要我到滬面談。我到了上海，壽韓兄特邀約幾位同志共同商討計劃，舜兄就是其中之一。他侃侃而談，全力支持，並主張將重點建立在安定繁榮農村經濟基礎上，與共黨倡導以暴力破壞農村相對抗。可惜時局發生突變，一切計劃，均成泡影。

二十四年，舜兄應聘為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每週由滬來京，我們乃得時常聚會。一天，我們郊遊明孝陵，席地而坐，他拍着我的肩膀說：「我怕你酸溜溜掉書袋，應該學貴鄉先輩朱三P（元璋），光復漢土，驅逐胡元，轟轟烈烈幹一番！至於你想承祖產，耕隴畝，守妻子，優游里閭，是舜生夢死要不得的……」這一番話確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氣。他又要我在家鄉搜集有關明太祖的史料和明陵碑文等，研究其成功之道。從此我也染上讀史的興趣。

二十五年夏，舜兄有東瀛之行，返國後曾對我說：日本已入戰爭狀態，不幸的事是避免不了，它是無止境的侵

略，我們祇有不分黨派，團結全國，準備抵抗到底。只有這一條死裡求生的路可走。是年冬，西安事件突發，舉世震驚，舜兄以青年黨主席身份，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他首先報告，大意謂國家已面臨存亡關頭，統帥蒙難，我人絕不容隔岸觀火。現在剿共，將來抗日，都需要他領導，我們黨本國家高於一切的原則，積極發動輿論，制裁叛逆。又電促在北方的曾慕韓兄，勉日與閻百川會商營救策畧。迨廿五日晚，我們正在南京青雲里聚談，忽報叛匪高呼號外——「蔣委員長脫險回京」，他立刻叫工友買了十萬鞭炮，並備酒熱烈慶祝。足見他心中只有國家至上意識，絕無狹隘的黨派觀念。

二十七年初夏，我率着一批皖省游擊軍營抵漢，並出席青年黨的九全大會。這時舜兄寄寓其戚連冠五家（武昌文昌巷），頗幽靜，與我長談今後抗戰形勢。我告以已由中央振濟委員會委員長許靜老（世英）委派搶救難民等任務，他豎起大拇指說：「這是件保存民族實力的偉大工作，不要輕視啊！我今天特別用湖南臘肉和大雜酒來慰勞你。」此後注定了我六年致力於撫恤流亡的繁重工作。到了三十三年，舜兄和幼椿、修平二兄又認為戰後邊疆問題極為重要，因此由他出面勸我到國立邊疆學校去協助校長老友王衍康先生（懷遠）辦理邊疆教育。

在重慶時，羅隆基、沈鈞儒等時來游說，詆毀政府，擊揚共黨，當時我亦在座，舜兄起初聽而不聞，後來他們再三重彈此調，他忍不住說：「說够了嗎？政府有百非而無一是，共黨有百是而無一非嗎？走！快走！我不願再聽這種刺耳的唠叨！」真是快人快語，我在旁也感到十分痛快。

三十五年春，舜兄和一班朋友紛紛東下，行前他請我留守重慶，讓他們做前哨兵，先出去開闢新天地——辦報館等事業，我在後方擔任補給工作，將來負責駐渝特派員。我歸心似箭，急於想東下，但趕不過他的勸說，我終於答應暫不離渝。果然，他回到京滬後不久，中華時報正式發刊，駐渝特派員也有人代替，他來信大意是說京滬要做的事很多，需要人幫忙，勸我有機會東下。我遂於是年九月中隨邊疆學校，率眷復員，沿途停頓，十月半抵京，轉往無錫梅園定居後，即赴滬參加中全會，藉悉國事變化的情況。後來聽說舜兄參加調解國共的工作，和周恩來等開

題了，我始終沒詳細問過經過內容。上月讀到幼樁兄悼念舜生一文，才知道又是「暴徒」李維漢在周的教導下大吵大鬧，逼的中青、民社、和社會賢達立刻同政府採一致步驟，參加國大，共同制憲。原來在民國十二年秋，我們在巴黎就和周恩來、李維漢等有過幾場惡鬥，第一場節目，就由此掀揭幕。我飄眼看見李維漢率領黨徒在會場上把李不懌老大哥打得頭破血流，於是留法的愛國青年才決心組黨，專與共黨周旋。當時我們贈他一個綽號——「暴徒」，會流行一時。想不到二十餘年以後又與此際相遇。舜兄自經過這一幕後，便立刻決定使青年黨參加國大，名單也隨即選出。對於他這一明智的領導和抉擇，我是深深佩服的。

三十六年春，政府決定擴大基礎，成立聯合內閣，舜兄被中青中央推為農林部部長。他最初因為我是在法國學農的，要我擔任顧問的名義。不久他找到我到部長室談話，他說：現在農田水利工程處長出缺了，水利灌溉是農林源泉，基本事業是福利農村。阻遏洪流漫延，我希望你不要再叫我頭痛，不跳火坑也得跳，你放手做去，將來業務計劃、經費、人事，我盡量支持你。他態度如此誠懇，我感動得無話可說了。

復員後的水利處，業務遍及全國，先擴大處內員工編制，工程隊由十三隊增至二十五隊，原有總工程師、技術及事務人員，均予慰留。接着各地紛紛申請建設水利灌溉工程。舜兄竭力爭取事業經費及美援抽水機、鑿井機、測量儀器、工程車輛等等，開辦水工機械技術訓練班，使各地得以順利興工，計在冀、豫、川、滇、京、蘇、皖、浙、湘、鄂、贛、閩、粵諸省，先後興建了數十處較大的工程。據當時參加考核成績的冷彭同志說，僅一年多的成果已超過以往六年的總和。是否如此，我不敢誇，只有自勉自己，鼓足勇氣往好處去做，才不負舜兄之所託。可惜大局陡變，赤俄燎原，未能完成志願於萬一。迄今年夜捫心，猶引為一大憾事。

徐蚌會戰時，某晚我在其京寓——梅園閒談，適其次公子宗憲奉命執行轟炸任務歸來，敘述前方情況。舜兄說：「我的家訓就是努力作共匪。炸！炸！炸！現在不作它，不久它就要炸我們了。」同時，他立刻催促任京市參議員的某同志趕快募捐採購食品毛衣，代表京市民專機飛往前線慰勞。三十七年，共黨分子滲透到流亡學生軍中，竟

在京市聚家遊行示威，秩序混亂，舜兄目覩心傷的對我說，如果當年允許我們有較多服務教育機會的話，多提倡一些國家民族觀念，愛國反共意識，或許多少有點補益，不至壞到如此地步。言下不勝慨歎之至！

三十八年我們隨政府播遷穗、渝，翌年春，我由蓉、復轉台，聽說他在香港創辦「自由陣線」，在海關首倡反共大旗，同時開了一家「士多」，真做點小生意過活，不禁為之憫然。直到四十三年他返臺出席國大第二次會議，我們才有重聚的機會。在談話中他曾透露，不久前有人奉毛賊之命，到港進行統戰游說，盼望他到北平去聚談國事，他斷然拒絕，毛退於荒唐，愚陋，竟敢把國號改了，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和他們無親無故，談什麼國事！說得斬釘截鐵，大義凜然，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五十五年秋，舜兄三度來臺（四十五年初夏二度來臺），目觀祖國社會經濟的繁榮，他說百聞不如一見，一般普通人家都有冰箱、電視、收音機等等設備，足見生活水準已大為提高，但宴安享樂足以導致民族精神的鬆弛，不可不防。他在參觀了各項經濟建設、匪情資料之後說，臺灣的紡織品比舶來品還好，今後我的衣著要全用國貨了；這裡的匪情資料比我在滬九搜集的或看到的，更為豐富而深入；還有許多事物，在我未來之前簡直想像不到，中華民國是有光明前途的，以後我每年至少回來一次。真的，以後每逢夏秋之交，他總要回國來看看。

五十六年，某次我率三子文潮去拜訪他，他把文潮拉在樓裡並吻其額說：「你現讀高中，我羨慕年青人，要加倍用功上進！我和你爸爸雖苦幹多少年，但對國家社會沒有貢獻，以後你要接棒子！我喜歡你常來看左伯伯啊！」五十七年，我又帶義女黎雙光到中國之友社看他，介紹她是師大歷史系畢業，他與高彩烈的指導她如何研究歷史和寫作，並引瓊瑤女士為例，說文藝和歷史是分不開的，如有不懂之處，可隨時寫信給他。他對青年人的愛護，鼓勵，提携，真是無微不至。他勸老友保重健康，愛惜光陰，說他常服用艾羅補腦汁，配合一天作兩天用來寫作，如能再活上五年至十年，環遊世界一周，才能完成寫作計劃，因此分秒必爭。

青年黨的團結，舜兄確是耗費過一番心血和奔走之勞，他在全代會之前，突然舊病復發，大家都執心他能否來

臺主持會議。但他愛黨心切，終於帶病來臺出席大會。在會議開幕時，他曾致詞說：「美太空人今天登陸月球，人類的觀念全改變了，我們應擴大眼界，趕上時代！」言簡意賅，語重心長。記得是五十八年八月八日晚上，他扶病應嚴副總統邀宴，精神已萎靡不堪，席間曾以微弱的聲音，提出兩點意見：在經濟方面，臺省面積較香港大若干倍，人口不算太膨脹，物資亦較多，工商商業大可發展，但須防止財富集中，應認真厲行節約，禁止浪費；在國防方面，應多訓練海軍人材，不能全靠盟邦，一旦協防有變化，平時培植的海員，即可抵擋來犯之敵人。這是我聽到他對國事的最後的意見。次日他就返港。在他離臺後大約四五天光景，我夜晚夢見和幾個朋友同遊一所古廟，見他乘馬車而來，衣服整潔，依然是三十年前的英俊飄逸，他對我說：「悔不聽你勸告留臺醫療，現在我又病了，馬上到醫院去……」一樹登車而去。我瞿然而醒，心想「謂公當真又病了麼？」果然，幾天以後就有他再度病倒而且有打算來臺就醫的消息。

九月十四日，他飛抵臺北，他已經不能步下飛機，要用擔架把他拉下來，然後運送榮民總醫院病房。由於種種原因，我直到雙十節那天，才和修平、自翔二兄陪伴趙病榻，始知其奄奄一息，已入彌留狀態，我震驚得思潮起伏，潸然淚下，惟有默祝：「你是國家、全黨、和我個人的明燈，願你的光輝永照大地，度過這段坎坷的道路和漫漫長夜！我來太晚，豈忍與老友永訣！」取路徘徊者久之，始黯然而別。

十月十六日，他終於離開了多災多難的祖國而遠逝，一代奇才，從此長眠安息！同月十八日，中青舉行第二次中評會全體會議，恭讀煌煌遺言，悲哀的氣氛籠罩整個的會場，我報告他兩次救黨的史實，相期毋忘他偉大精神的感召，誓必完成他「精神團結」的遺志！誇公！你至大至剛的質樸和精神，將充塞人間而不朽！

嗚呼舜兒，蒼生報國，鞠躬盡瘁；

痛哉苦黨，團結初成，泰山遽頽！

悼念民主鬥士左舜生先生

朱文伯

中國青年黨主席左舜生先生，不幸於本年十月十六日病逝榮民醫院，享壽七十有六歲。左先生的去世，不僅是青年黨的損失，同時也是國家民族的損失，朝野人士，同致惋惜。有關左先生的生平、德業、樂聞和事功，各報刊論述已多，無需再贅。我們現在站在青年黨的立場，從民主的觀點，來談談左先生的畢生奮鬥。藉誌我們對這一位民主鬥士的悼念之忱。

中國青年黨提倡國家主義，主張全民政治，國家主義者必然是愛國之士，全民政治即是民主政治，以愛國民主的緣故，就必然連帶反共，所以青年黨是愛國、民主、反共的政黨。青年黨成立於民國十二年，在巴黎鄂外玫瑰城舉行結黨式，以「先聲週報」為機關報；民國十三年九月，曾琦、李璜兩先生由巴黎回國，是年雙十節在滬創辦「醒獅週報」作為國內的機關報。這是青年黨初期在海內外的兩個重要宣傳刊物，左舜生先生便是當時「醒獅週報」的總經理，這是左先生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開始，也是為民主的理想而奮鬥的開始。

「醒獅週報」創刊初期，由於主張正確，適合國情，兼以執筆者均屬一時知名之士，所為文章，情文並茂，故能一紙風行，不脛而走。其時青年黨是一個秘密的革命政黨，尚未公開黨名，因「醒獅」宣傳國家主義，故黨人稱之為「國家主義派」，或稱「醒獅派」。「醒獅」的創辦，沒有外界的任何援助，完全靠一班書生親力親為，所有寫稿、編排、校對和發行，都要自己動手，而經費的籌集，尤其費力，「醒獅」的基礎，便是在這樣的艱苦中建立起來。在當時一班朋友中，最能表現苦幹精神的，當首推左舜生先生。

左先生在「醒獅社」，一面要寫文章，一面又要負起經理部門的一切繁重工作，從印報到發報的有關事務，集中在一身。發行部設在他的家裏，每到出版日期，就全家動員，幫忙貼地址、裝包、打繩等工作，最後由左先生親

自把報紙送到郵局，「醒獅週報」就是這樣投寄到海內外去。發生很大的影響和收到很大的效果。青年黨在巴黎出版的機關報——先聲週報，因為沒有鉛字排版，改用手寫石印，從編輯到發行，也像「醒獅週報」一樣，全由同志出錢出力，克服一切困難。青年黨初期的黨務，發展甚速，它的基礎，端賴海內外兩個宣傳刊物從艱苦中建築起來。左先生參加「醒獅週報」工作，純粹是激於愛國熱情，自動自發的爲着追求民主理想而奮鬥，因為他在民十三年加入「醒獅社」，民十四年才正式加入青年黨。

左先生加入青年黨以後，工作更積極，好的開始，等於一半成功，從此奠定他自己的基礎，展開以後四十餘年的政治活動，而獲得光輝的成就。在左先生的政治生命過程中，有兩件事與民主政治特別有關，頗值得我們回憶，茲略述如次：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左先生代表中國青年黨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先生交換文書，青年黨爲了共赴國難，協力抗日，從此放棄原有的革命主張，改爲普遍的民主政黨。此舉的真正意義，不在於青年黨取得合法的地位，而在於從一黨政治的狀態之下，塑造出一個兩黨並存的民主雛形。隨後民社黨主席張君勱先生也與國民黨總裁蔣公交換文書，終於導致三黨共同制憲行憲之局。這在中國政黨政治史上所顯示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青年黨與國民黨交換文書之日，正是抗日戰爭吃緊之時，所以文書中有說：「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此種心情，我們隨着國家的災難而保留到現在，未嘗稍變。現在是民主憲政時代，我們亦惟有本着愛國民主反共的精神，促成全國大團結，以期早日光復大陸，此外別無所求。此其一。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和二十八年二月，青年黨同志在國民參政會曾先後提出「對期設立省市參政會案」和「對期成立縣參議會案」，提案人曾琦、連署人左舜生、李璜、陳啓天、余家菊、常乃惠。該兩案認爲「民主政治之基礎應建築於下層」，所以限期成立各級民意機關，「以完成民主政治之體系」，乃屬「刻不容緩」。在「中國青年黨

爲抗戰週年紀念宣言」上，對此也有所說明：「在這個抗戰建國的艱鉅工作上，我們認爲非發動民衆共同一致努力，不能收到圓滿的成功。而發動民衆，則非實現民主政治，不能使民衆自動自發的繼續犧牲毫不反顧。因此我們主張爲使作戰的政府建築在更廣大更熱誠更自動的同情基礎之上，中國政治是有更進一步的擴大民主化運動之必要，國民參政有更進一步設立各縣民意機關之必要。我們確信抗戰建國的軍事經濟基礎是不能離開民衆的。……」抗戰中和抗戰勝利後各省市縣的民意機關之所以能先後成立，實得力於該兩提案的通過和實施，在中國政黨政治史上，這一極關重要的民主憲政運動，左舜生先生躬與其事。此其一。

上舉二事，可說是左先生爲民主而奮鬥的兩個重要里程碑；至於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從歷屆週報而申江日報，國論月刊，國光旬刊，新中國日報，中華時報，自由陣線，以至聯合評論，都可當作左先生的民主許程器看。左先生雖曾任部長，但依然兩袖清風，在香港舌耕黨文爲活，廉潔自持，不失書生本色。本年七月青年黨召開全大會，左先生有加強民主反共宣傳的建議，民主信念，老而彌堅。左先生學生爲「愛國、民主、反共」而奮鬥的精神，值得後人敬佩，我們之所以悼念左先生者，原因也就在此。

敬悼左舜生先生

宋益清

——紀念一個現代國家追求者的逝去——

本黨主席左舜生先生於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這一代熱心、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者，就此放下工作，停止奮鬥，離開了我們。

左舜生先生是研究近代史，而且在這個部門，他是一個相當權威的學人。他在這方面第一重要編著是「中國

近百年史資料」，同時在這百年歷史中，將其深入重點的研究所得，寫成專著，即是包括甲午戰爭、戊戌維新、庚子拳變、辛亥革命之「中國近代史四講」。

今天我們大家主張國家要現代化，我們要追求一個現代國家。但是距今二十餘年前，中國青年黨從革命黨改爲民主政黨，其宗旨中就有「建設現代國家」之句。這宗旨內容是出自左舜生先生和李璜先生之構想。我們再追溯上去，日本明治維新到明年卽屆百年，他們正向世人告訴他們國家現代化的成就。舜生先生對這與我國並世百年的歷史，很有研究，而且對日本人這百年努力的事實背景、理想依據、觀念認定，都非常讚佩。舜生先生自認受梁啟超的影響很大，自然接受其維新的觀念。「維新」卽是國家的現代化。

說到國家現代化的內容，我們得提到歐洲文藝復興後的兩大產物，那便是民主與科學，這在英、法、德、美等國家百年前的百年歷史中已經深植根基，開放花朵。日本維新是沿著歐美已經數好的憲政與科學這兩條大道行進的。清末維新中的「立憲」與「西化」運動大體上也沒有離開「民主」和「科學」的兩大方向。「五四」以後，這兩大主張更爲確定，更爲鮮明。左舜生先生在其回憶錄中說：「五四以後……所主張的實先生和德先生，卽「科學與民主」這一趨向，我却至今還是承認不錯。」

橫貫在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上，亦卽讓現代國家所必備的兩大要素——科學與民主——無由具備，無從實施的，在清末爲慈禧太后及其他王公大臣，民國以後則爲袁世凱、北洋及各個地方軍閥。最好看的莫如「五四」而後名爲「中國共產黨」，實則受制於蘇俄的國際共產黨。他們以無產階級否認全民，以專政制度否認民主，而且共產主義否認國家存在的理論；沒有國家，何由國家的現代化？在這個時候，舜生先生加入了爲民主反共而革命的中國青年黨，爲民主革命而工作。舜生先生不會公開承認他做過革命工作，自然不自認是一個革命家，但他當年加入的確是一個主張民主反對專政的革命黨，爲這個黨做了不少的工作。今天他去世了，蓋棺論定，我們給他加上革命家這一頭銜，他在地下有知，也不會不承認的。

舜生先生在其「三十年見聞雜記」（從民國八年「五四」，到三十八年由大陸退出）開場白中說：「我個人這三十年的經歷，概括言之，不過是十年的編輯員，十年的教書匠，最後更混了十年的所謂政治生活。」可是他這十年的政治生活正是證明他對現代國家的追求。我們以政治家稱之，正是以此。

這十年的政治生活就包括他在任國民參政員的八年，這時候他和李璜、陳啓天、余家菊諸先生一面縱橫於各黨派與人士之間做舉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的工作；一面在會中爭人權，爭言論與新聞自由，主張成立省、市、縣臨時參議會。後者的努力的意義固然仍是激發抗戰中的民心士氣，可是一面抗戰，一面要在抗戰中建國，建國就是以民主措施來使得國家現代化。

左舜生先生十年政治生活也包括其出任農林部長的二十個月。他以書生從政，有其個人觀念之認定。他在部內，重視科學技術專家，重視研究實驗組織，重視農林事業機構。他深深的了解國家的現代化，須從國家各方面，各部門做起，在農林方面他曾這樣的說過：「據我觀察，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已在發端，假定能有十年的安定，繼以不斷的努力，更加上若干國費的協助，即不難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但主要的關鍵仍在政府對發展農業的重要性，確有相當的認識。」他又說：「我在農林部二十個月的時間，僅僅大致理解了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農業必如何使之逐漸進入現代化，而為國民經濟奠定一個堅實基礎。』」

左舜生先生不失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國家的主張者、追求者，也是半生為之努力者。

憶左公及籌備港九追悼會

王世昭

為了青年黨團結，我陪左先生入黨是七月十六日，左先生逝世則是十月十六日，這一次香港各界為左先生舉行追悼會，也在十一月十六日，這三個十六，可謂湊巧到極。那曉得還有一個更湊巧的，張君勱先生在香港的追悼會

也是十六日，那是三月。今年「十六，有三個是不祥的日子，只有一個還差強人意，那便是促成本黨團結的成功。

左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他不特是一位近代史研究權威，而且是政治家兼文學家。他最大的優點是能服勞，忍苦，直率，幽默，樂天，切切實實是不折不扣的讀書人。對於世界局勢，他有通盤認識，尤其對於東方的日本，西方的美國以及不東不西的蘇聯，甚至大陸的毛王朝，他認為其一：可與為友，可與為敵；其二：可與為友；其三：敵而非友；其四：民主的敵人。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他對中華民國寄以極大的希望。而在事實上，他於政府的獻替，幾乎盡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地步。

記得民國三十九年初，我到香港，謁之於鑽石山水康酒店。那時他與易君左、夏爾康、左幹臣四個人合設做小生意，那一天下午輪他當值。我看他穿着一件長袍，手上捧著鹹脆花生一粒一粒拈進嘴裡大嚼特嚼。他見我來，連忙讓坐，隨手抓了一把花生米給我，我只好一手接過，也大嚼特嚼起來。一面他和我談天，一面又替小學生掙拍紙簿，或者鉛筆一支。那時的拍紙簿和鉛筆，一毛錢可以買兩枝，如果買一支的話，還要找五仙尾數，找了錢之後，還要登記在簿子裡，以便晚上結帳。以一位三任農林部部長的左先生，下了台之後，却經營起合股的小生意來；而且還兼任老板，掌櫃，伙計，在中國書海中，可算是少之又少的例子。

之後，我們時常有來往，但也不一定，可能一兩年不見面。見面的時候，我看他多數在寫作中，為了生活，他不能不寫作。有時候他也在幾個大專任教，為了生活，他也不能不任教。我看他的頭髮，一年比一年白，可是他與會一來，高談闊論，往往令人忘倦。

他對我的看法，有幾件事，我不能不敘述一下。十幾年前，他送我一本萬竹樓隨筆，親自題字如下：

「世昭兄正——左舜生 年月日。」

三年前他要我為「黃興評傳」題簽，出版的時候，他也送給我一本，題道：

「鬻翁正之一」 弟舜生 年月日。」

這一次的題字，使我嚇了一跳！我沒有老，爲什麼稱我「鬻翁」？又：也許他是敬重我，所以稱我「鬻翁」。現在，我所尊敬而又風趣更懂得幽默的老人，却悄悄地離開了我們了！

多年來，我有約幾個朋友，吃小館子，樂開心的興趣。當然多數都是有請有應，湊湊大家熱鬧。自從民國五十六年年底開始，他每年都邀請幾位親友吃年夜飯；前年在雪園，去年在泰豐樓。雪園之約有兩次，一次許孝炎先生及其女公子在座，那是爲許小姐餞別。泰豐樓之約則分作兩天，他對我說：「可以多熱鬧一次，也可以多吃一頓。」這個約會，前年我與函甫在座，去年我與函甫及丹明均在座。老人眉開眼笑，其樂融融。現在已酉年快要過完了，年夜飯呢？當前次左宗華和張煥華兩夫婦到我家裡的時候，我說：「今年讓我來做個東道吧！」

七月十六日我們隨左公飛臺，代表大會開完後，左公於八月九日回港，我料想他心緒必極其惡劣。爲了他走得快，當我趕到自由之家的時候，他已經到飛機場去了。八月十五我飛馬尼刺，九月三十日我由馬尼刺回港，左公又已飛臺療疾。我和他最後一面是在臺北市立殯儀館，那是十月廿六上午十時。這時的他，已成冰凍後稱爲發胖的老人了！

本來當我回港，聞他飛臺，即已感覺到不妙。因爲華則仁醫生曾對我說過：「油盡燈枯，老年人往往如此！」爲了我很懷念他，於十月三日拂曉前三時半做了一個夢，夢裡臺北朋友來了一次電話，極其清晰地說：「左公恐怕不幸了！」我醒起來，連忙提筆記下。天亮七時我起牀，想到前塵往事，歷歷在目，不禁悲從中來，打了一個電話給黃天石兄，略述夢境。他說：「希望不是真的！」

七日上午，宗華與煥華夫婦來，宗華告訴我：「爸爸已昏迷數日，醫生說：『照已任經驗，可能再拖一兩週，甚至一月也不定！』我爲了家務忙，所以先事回港。……」她說到這裡，我插上一句：「左公幾時昏迷的？」她說：「大概是三號。」我把我夢後所記的一句話告訴她，她說：「爸爸昏迷是在三號。」十七日晚上，龔從民兄打電

話給我說：「左公於十六日上午八時半逝世！」十八日上午宗華也打電話來，證實了這個消息。

爲了左公的惡劣消息，我們早有不祥的預感。李幼樺先生本定十月十日在樂宮戲院被邀公開演講，他對主人說：「萬一左公不幸消息在八九兩日，我恐怕無法參加這個盛大的慶典了。」其沉重心情，於此可見一斑。

雙十節那一天，我們參加慶典以後，我約李先生到樂宮樓飲茶，子麟兄也在座。李先生決定了幾個原則：一、左公如逝世，派我和子麟以及其他二人入臺代表致祭。二、由李先生主持召開香港追悼會籌備會。三、我須準備入臺弔左公祭文。話雖如此說，我們實在希望左先生早占勿藥，可是事實擺在面前，打鹽水針一開始，我知道沒有救。因爲過去有一位朋友患的與左先生同樣的病，臨終前骨瘦如柴，醫生問他要不要打鹽水針，他希望過八月中秋。醫生判斷病情，無法度過明月團圓的好日子，所以爲他輸入鹽水針。輸入鹽水針一開始，醫生對我說：「恐怕拖不過兩個禮拜了！」語畢，爲之辛酸不已。

我怕左先生搏鬥不過死神，可是總希望他能拖一天算一天，所以祭文遲遲不想動筆。假使真的有一天不幸的消息到來，我自己可以料得到，必然心亂如麻，這篇祭文能否寫得出來，實在沒有把握。到了十五那一天晚上，我忽然心血來潮，不管怎樣，下了決心今晚不睡覺要完成初稿。藥寫好了，已是三更過後，來不及看第二遍，打開氈子，倒身便睡。一覺醒來，已是十六日上午九時，我連忙將草藥更正。讀完了草藥，不覺悲從中來，哭了一場，隨即電話與從民兄，將祭文原稿（該祭文見新中國評論第三十七卷第五、六期）讀給他聽。那聽得我完成祭文之日，正是左先生撒手塵世之時。十八日我們得到消息，本擬即日飛臺，後以宗華來電話：「爸爸出殯在廿六日！」所以我們幾個人約好，廿四日結伴同行。

天地間事無巧不成話，許定寰、潘青兩父女於二十日上午到我家裡，他們也得到左公逝世的消息，所以跑到尖沙咀來，問長問短。我把最近有關左公的事，略略作一概述。於是潘青告訴我：「前晚做了一個夢，夢見左公在門外跌一交，我連忙把他扶住，送他回家。左公在路上對我說：『小妹妹，妳要寫一頓觀音菩薩給我，千萬記住火化

「伯伯，你說奇怪不奇怪？」左公生前極其歡喜讀書，希望有機會帶她到東京去參觀古畫，我在口頭也嘗答應過與左公同往一遊。可是事與願違，連袂東遊，竟成了口惠而實不至的憾事。一面也怪我出門好獨往獨來，一面也爲了到日本旅行在我也另有籌劃。現在，什麼都成過去了，老年人對於朋友的關切與提挈，在我算是極爲可感的一件事，所以順便在這裡提一提。

我與他接近，也是最近幾年的事；他對我另眼相看，也是最近幾年的事。他嘗背後對朋友說我：「王世昭是個奇人！」民國三十六年我到南京，朱任菴在鳳頭村替我算一個命，他說：「本黨的朋友，帶三奇的命的人很少，很少，你算得一個。」那時我不懂什麼叫作三奇！最近讀尤達人所著「命理通鑑」，他引「淵海子平」云：「甲戌庚，爲天上三奇；乙丙丁，爲地下三奇；壬癸辛，爲人中三奇。」又引「三命通會」云：「凡命遇三奇，主人精華異常，襟懷卓越，博學多能，好奇尚大。帶天乙貴人者，助業超羣。帶天月二德者，凶災消散。帶三合入局者，國士及臣。帶空亡生旺者，林泉高士。誠上格也。」我究竟屬於那一類？因爲對此道屬外行，抄在這裡，以實通人。此外尤達人先生還抄了一首古歌，歌云：

「天上三奇甲戌庚，地上三奇乙丙丁，人間三奇壬癸辛；人命若值三奇貴，狀元及第冠軍英。」

我從來不信命，也像不信鬼神仙佛上帝一樣，但我却相信名言真理。此事細想起來，有合有不合，很有趣！

十月廿四我與子麟、宗華、宗楷同機飛臺北，李特超弟先一小時搭日航，張子良兄早已入臺，我們一同參加了廿六日左公弔祭及出殯，我看了安葬，才與劉泗英、王嵐僧、周實三、李滿康諸兄一同下山。是日上下午皆有雨，惟步行登山前後皆無雨。我對嵐僧兄說：「此老頗有人情味。否則山徑陡峻，黃泥滑滑，不打幾個磨頭勸斗才怪！」

十一月六日我趕回香港，襄助李公辦理左公追悼會。先是李公已於十月廿六日，邀請各界人士到車厘哥夫聚叙，是日到會人士有：李璜、甘家驊、孫德智、徐季良、張向華、冷定菴、陳經國、林伯強、張六師、王韶生、樊仲雲、陸潤之、羅永錫、許孝炎、沈亦珍、張任民、徐野、馬彬、周吳斌、涂公途、朱振聲、唐君毅、黃麟書、馬鯨

文、祝平、徐東濱、汪振華、何家驊、李聖五、胡家健、陳訓念、李任難、曾南飛、張藻恩、呂偉東、李秋生、史澤之、龔從民、尹致中、羅香林、徐速、陳德斌、權文毅、張煥華、練漢雄等四十餘人。公推：李璜、張發奎、黃麟書、沈亦珍、許孝炎、周異斌、劉子驥等七人為籌備員，王世昭文書組組長，黃逸暹財務組組長，劉子驥招待組組長，曾南飛事務組組長，預定於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假座新亞書院大禮堂舉行追悼會。

古人說：「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此雖為生者而言，但與一個人生前，做人處世，待人接物，學問，事功，也都有連帶關係。左公的為人，平易近人，不擺架子，求才若渴，見賢如恐不及，這些條件，都是領袖輩應有的條件。而且，左公生前交友是多方面的，所以追悼會一展開，就有人打電話來，要參加發起行列，追悼會未到前，有人打電話來打聽日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到了追悼會舉行之日，新亞書院大禮堂擠滿了人，送輓聯輓幛的，送花籃花圈的，排滿了大禮堂，而且展掛到樓梯口，所謂「生榮死哀」，左公真可當之無愧。

而且自他逝世消息到連滯九之後，工商日報、星島日報、天文彙報、時代批評、展望雜誌、萬人雜誌，也都有悼念他的文章。黃天石先生極其哀痛地打電話給我說：「我為左公擬了一付輓聯，請你用分書為我書好帶到臺北去。」句云：

「唯唯盈廷，踴躍一士；

憂先天下，志在名山。」

並且他對我說：「這是流水對，怎麼樣？」我說：「好極，左公的黨號就叫作「謬公」也。

追悼會的程序：(一)全體肅立，(二)奏哀樂，(三)向左舜生先生遺像行三鞠躬禮，(四)獻花(主席團李璜)，(五)恭讀祭文(王世昭)，(六)報告左公生平事略(李璜)，(七)致悼辭(黃麟書、羅香林、胡鴻烈)，(八)家屬致謝(一鞠躬)，(九)奏哀樂，(十)禮成。

悼念左舜生先生

徐漢豪

舜生先生不幸去世，是青年黨的一大損失，也是國家的一大損失！

我認識左先生是在民國二十年，那時我和蜀雲剛從法國回來，因為蜀雲在出國以前，即與左先生和他的家庭熟識，所以他一聽到我們回國，第一個請我們到他家裡吃飯。他問了許多關於巴黎黨務的情形，談了許多政治上的看法，還風趣地要我們就說戀愛經過，希望我們早日結婚。

左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非常健談，而且朗爽，說話從不拖泥帶水，對於一件事物的論斷，常有獨到之見，每從歷史的觀點，批評當前政治上的得失，說到激動的時候，慷慨激昂；平時談談家常，則親切和藹，使人覺得輕鬆愉快，所以青年黨的同志和他的學生都喜歡聽他的政治性講話，也很喜歡和他接近。

民國二十一年，我去四川大學教書，第二年又和蜀雲去廈門大學，每逢寒暑假回到上海，一定要去拜訪，他對於我和蜀雲兩個年輕教授給予不少的鼓勵，那時我們都才二十七歲。

抗戰期間，他任重慶，我和蜀雲則遠去貴陽教書，很少晤面。勝利前三年，我們轉職重慶，才又時常接近，他對於我和蜀雲可以說從那時起才有了較深的認識。

勝利還都，我和蜀雲都被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我還擔任了第三審查小組的召集人，這是我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開始。開會期間，我們和左先生幾乎朝夕相見，在公開的集會或私下閉談裡，聽到他許多對於時事的分析，見解精闢，使我增加了許多政治上的見聞和知識。

三十六年四月，當局邀請青年黨參加制憲後第一屆內閣，除政務委員外，青年黨擔任的有兩個部長，最初決定李幼樺先生任經濟部長，左先生在農林部長，後來因為李先生不就，大家囑望左先生出任經濟部長，左先生以對農

林事業較有興趣，不願變更，於是黨中央改推陳啓天先生擔任經濟部長。左先生出任農林部後，一般人都以為青年黨初掌政權，一定要撤換大批職員，大家都備備不安，不料左先生就職之日，就向部內同人懇切表示，決不隨便撤換一人，希望大家安心供職，後來事實表現，除了委派幾個同志遞補業已辭職的空缺外，各司處及所屬單位主管幾乎沒有什麼更動，即使偶有變動，對於繼任人選，亦儘量求其最有學識經驗能力者來充任，絕對沒有絲毫黨派私見。記得在他剛就任一個月的時候，河北墾業農場場長出缺，這個農場是全國最大的一個，範圍之廣，從北平到天津就有十幾個分場，當時就有不少黨內外人士在爭取，我因受劉厚（大悲）兄之託，去看左先生，向他推薦。劉先生是早期法國留學生，在里昂大學得農學博士學位，吳稚暉、李石曾兩先生在法國創辦中法大學，就聘他做秘書長，吳、李兩老經常返國，中法大學的事務，事實上差不多由他負責的時間比較長，兩老提倡勤工儉學，在法國工讀的學生，也都由他接待和安排，法國留學生，沒有一個不知劉大悲其人。他於廿二年返國服務中樞，後來又主辦過幾個農場，皆成績斐然，平時吃苦耐劳，精力充沛。左先生一聽到我提起劉先生，立刻說：「好極了，好極了，我正在考慮一個腳踏實地的幹才，劉先生能來，真是好極了，請他馬上來看我。」大悲兄與左先生見面後，第二天就發表。次日南京各報登載農林部任命劉厚為河北墾業農場場長的消息後，青年黨河北籍同志十餘人，大為不滿，認為這樣大的一個農場，場長職位重要，應該派一位同志去擔任，不該任命一個黨外人士，齊赴左先生公館，大興問罪之師，弄得左先生許久不得安寧。後來經中央一再勸導，左先生反覆解釋，才告平息，然而左先生從沒有透露半句說是我介紹給他的。事後左先生笑着對我說：「我不敢直說劉厚是你介紹的，我恐怕說出來，他們也會找你的麻煩」。這件事在當時青年黨內可說是一件不小的風波，我現在把這一秘密公開出來，證明左先生用人唯才，絕沒有任何黨派或私人成見。劉大悲兄現已退休，住在臺北縣三重市。

那年，我正在政治大學任教，同時還兼了上海大夏大學法律系主任，每週往返京滬，「儼然要人」（當時南京政要，每週必赴上海度週末），相當忙碌，也很辛苦。有一天，徐天從、周賈三兩兄到我南京上海路寓所，他們兩

人自出任農林部主任秘書、機要秘書以後，由於工作關係，已有月餘未晤，現在老友相見，甚感歡欣，他們來時，我正預備吃晚飯，於是邀同共餐，飯後徐、周兩兄鄭重地告訴我，奉左公之命，邀我擔任農林部參事，他們說：「農林部參事，按照編制，本有六人，六人中有五人是學農林的，新近一位學法律的部參事病故，參事是執掌法律的，自然仍要補一個學法律的人。左先生接到許多介紹信，黨內同志，活動此缺者亦不少，而左先生考慮再三，決定要你去幫忙。」我因與農林界向無淵源，農林方面的知識又很缺乏，根本沒有想在農林部謀一官半職的意，我雖很感激左先生的盛意相邀，但祇有請他們婉言辭謝，可是他們不聽我的解說，堅持我非答應不可，否則對不起左先生，他們也無以覆命，一直談到深夜，直到我答應後，才欣然辭去。回憶在部兩年，在工作上雖不辱所命，但未能為左先生多分勞累，總覺得有負左先生的「器重」。

看左先生的文章和他的談吐，人很剛毅，但心地却非常寬厚。三十七年中，農林部有三個單位的高級主管，一個在部內，兩個是部外的所屬機構，被人告發有舞弊不法情事，經左先生派員調查，證據確鑿，大家以為左先生一定大發雷霆之怒，不是移送法院，就是下令免職。可是事隔多時，不見動靜，有一次，左先生約部內的青年黨同志到他家裡去會談，並聽取我們工作上的意見，當兩位次長說話以後，我也站起來提供許多意見，最後談到三個單位主管舞弊不法的事，我希望左先生拿出魄力來加以撤換，不要有所顧忌。左先生聽了，當時並沒有表示，會談後，走出大門，次長周昌曇兄拍着我的肩膀，說我很有勇氣，我想大概我的吐詞太率直，態度不够沉着。事後左先生私下對我說：「你的話很對，不過政治上的事情很複雜，你知道他們在職已有多年，每個人都有他的背景，他們都不是青年黨員，如果我一次撤換三人，別人會造謠言，說我排除異己，你要知道當家人也很難做，何況他們都算是學有成就的人，不要一下子給他們毀了！」言下不勝唏噓！後來時局緊張，政府改組，我們都隨着左先生離開農林部，而那三個單位主管都滯留大陸，我想我們來不及法辦的事，共產黨總不會給他們便宜罷！

左先生為人清廉，公私分明，在部長任內，從不顧問財務，每月發薪時和大家一樣的領薪水袋。有一天下班，

我經過總務司門口，向大廷兄對我說，你們倒回去了，部長家裡沒有米，打電話來借支半個月薪水，要我馬上送去，好買米下鍋。我還不能馬上回家呢！當時鈔票正在貶值，一個月的薪水，用不到半個月，部長如此，一般公教人員之苦，可想而知。

大概是在三十七年的秋天吧，行政院公布黃金國有政策，黃金美鈔必須向銀行兌取金圓券，不許人民持有，否則一經查覺，即須處刑。當時人心惶惶，大家攜着赴銀行將金鈔兌取鈔票。在政府宣佈這一政策之後二、三天，他從上海回南京，約我下班後去何仲愚家打小牌，大家知道左先生喜歡打小牌，做了部長，即不在外面找搭子，又不願放棄這一嗜好，他知道我也能摸幾張，所以每星期總有一二次約我去他家玩上八圈。他的牌品好，無論輸贏，總是有說有笑，每次玩畢，我順便搭他的汽車回家，習以為常。那天在同車回家途中，我問起黃金國有政策，民間反應不佳，是否可以徹底執行？他說：「藏富於民，民富則國富，乃不易之理，中國人稍有積蓄，都要買些金銀飾物，現在一下子全部收歸國有，不許民間持有，以後老百姓誰肯儲蓄？如果鈔票稍一貶值，前途將不堪設想。」我再問他：「你和陳先生有沒有在行政院會議席上表示意見？」他說：「人家已經決定了的政策，我們說也無用，何況我和陳先生都不是財（政）金（融）專家。」後來事實演變，固不出左先生之所料，多少人因此而破家蕩產，而我和蜀雲在抗戰八年中，節衣縮食所積蓄下來的十餘兩黃金揮得俱全。

三十八年，上海撤退，避地來臺，左先生住溫州街農學會，我住青田街，相距很近，又得時常聚會。後來他去香港，雖很少通訊，不過經常有很多朋友來往港臺，彼此的情形都很清楚。民國五十三年我和輪珍、嵐倫、澹波、漸濃諸兄創辦「現代國家」，他每次來臺，見到我們幾人，總要誇獎幾句，鼓勵一番。「現代國家」上登載蜀雲的旅法回憶二十餘篇，他說他篇篇都看，沒有脫編過一期，他希望蜀雲趕快寫完，出版單行本，他要好好做一篇序文。在左先生逝世前十幾天，我和蜀雲去看他，那天，他的精神尚好，還問起蜀雲，文章何時可以寫完，蜀雲安慰他：「大概是在左先生出院的時候，可以印行單行本了，我還等着左先生做序寫呢。」不料左先生病情遽日惡化，終於

不起，聞耗之日，使我耳聞聲啞然若失者久之！

揮淚弔舜師

朱祖貽

左先生終於積勞病逝了。逝世的前兩天，是他滿七十六週歲生日，我還特地去石牌樂民醫院，立在他的病床邊，向我這位多年崇敬的老師默默地祈禱祝福，雖然他已昏迷多日，不省人事，明知這是我在他有生之日最後一次的祝賀他的生日了，然而在我胸懷之中，我覺得我這樣做還是很安慰的。

左先生的生平事蹟，是多采多姿的，亦可歌可泣，海內外人士知者甚多，我也不必在此細述；簡單的說，他可算得上是我國近數十年來難得的一位以書生本色而參加實際政治活動的傑出領袖人才。他的基本思想，是純愛國主義與民主政治。他參加政治活動是於民國七年加入「少年中國學會」開始，「五四運動」以後，因與李大劍、恽代英、毛澤東等人在思想上不能相容，乃毅然與他們分手而於民國十四年參加了以信奉國家主義為宗旨的中國青年黨，終身為國家報效。青年黨於民國十二年在法京巴黎成立，先生雖不是一個創黨之人，但他對黨的貢獻，並不比黨內其他諸先進稍遜色。四十餘年來，他站在黨的立場上，以他那枝生動簡潔而有力的筆，不斷的發揮主張，交論時政；以及他參加抗戰時期的國民參政會，戰後參加制憲、行憲，擔任農林部長等若干重要階段所表現的卓越才華，深為黨內外人士所重視與稱讚。他之死，無論對國家對青年黨而言，都是莫大的損失。我與先生為同志關係，又是師生（上海知行學院）與部屬關係，從上海、南京、重慶以至香港、臺灣，近四十年的追隨於先生左右，我尊他彬彬之禮，而他亦嘗視我如賓，不及私，無恩怨，師生之間純摯感情，始終如一，如今他一旦棄我而永訣，我焉能不格外地悲痛與哀悼。

我們不必諱言，在最近若干年中，先生對黨是持着極端冷淡的態度，對黨事不予聞問。同志們如若和他談起黨

內的是是非非，他非但不聽，而且要發脾氣。他寫文章寧可外登，亦不願爲黨內任何一派系所出的刊物而寫，甚至連看也不願看。他這種痛苦的心情，我想每一位忠貞同志應該是完全可以了解並原諒他的。所以我過去每次由臺灣去香港探望他時，除了和他談談時局和讀書心得而外，從未和他談過半句有關黨事。祇有在前年的秋天，我去香港和他見面長談時，偶然之間問他一句：「左先生，你爲什麼對黨這樣地冷淡，連談也不願談它呢？」他毫不猶豫的說：「我何嘗願如此，我對黨的熱誠，相信不比任何同志低。」當時我聽了此言，感動得幾乎流下眼淚，但是他仍然不願多談，直到去年談團結了，十一月間我去香港時才敢和他談黨事，而他也願和我深談了。

去年九月，左先生由港來臺，承蔣總統約談，當面一再促請先生爲青年黨團結奔走，先生感於總統的盛意，更鑒於國家利益之迫切需要，遂毅然挺身而出，與在臺之修平、景陶兩先生共同邀約各方代表同志十五人，在諸先生領導之下，經過了九個月的艱苦商談，最後並促請在美的幼椿先生專誠來臺大力相助，終於在今年的七月廿一日召開了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了多年來的分裂局面，達成全黨團結。先生如願以償了。

但是先生並不以此爲滿足，他認爲這祇是形式上的團結，基礎並不鞏固，更談不上發揚光大，於是他更進一步的呼籲全黨同志要在精神上團結起來，才有意義。並且他還提出若干具體的寶貴意見，供大家採納，例如他主張黨的領導階層應增選幾位較年青的優秀同志參加，使黨有朝氣，有活力，有新生，以便將來接棒有人，不致於走向衰老滅亡之途。他又主張團結後，原有各方面所出的刊物雜誌應予合併，集中黨內有限的人才和經費，另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像樣的刊物，以宏宣傳之效；文章由編輯委員會公開審定，絕不馬虎。黨的經費儘量的由同志自籌，非萬不得已不要向人家伸手。可惜這些寶貴意見，礙於事實上的種種困難，一時無法實現，先生心中自不無遺憾，但他只好顧全大體，留給同志以後徐圖之了。

從以上種種情形而看，先生在黨內不僅是一位受同志愛戴的領袖，在國家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外，他還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文學欣賞兼寫作家。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的確下了不少功夫，自民國九年始，他就不斷地

從事歷史著述。其著作之豐富，見解之獨到，早爲士林所重視。去年十一月間我在港，曾經勸過他可否再以三年的時間，寫一部公正而完整的中國現代政治史，從國民黨北伐統至國民政府撤退大陸止，以銜接李劍農先生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之後（李先生與先生同爲湖南人，係我讀武大時之老師，現亦已作古。），留給國人，尤其是留給晚一輩的年青人去看，讓年青人知道國民黨是怎樣統一中國大陸的，又怎樣失去了中國大陸的，今後應該怎樣發憤圖強，去光復大陸。我懇說，這工作當然是十分艱鉅，必要時可請雲龍兄幫忙。他聽了我勸說之後，半天未答，看他當時的表情，倒似乎有此雄心，可是經過了他鄭重考慮之後，他說：「有此意，但時候未到，難以下筆，等以後再說了。」現在先生已去，我這個對他熱誠的希望永遠成爲泡影了。

此外，關於先生的生平素行，還有兩點值得我在此特別一提。一，先生秉性坦率，做事用人，一向都是秉着大公無私，量才爲用的精神。非但在黨內，他無派系觀念，即黨與黨間的界限亦看得很輕。就他任農林部長時的一段歷史觀之，即可證明。當時青年黨同志隨他去農林部工作的爲數極爲有限，而在此有限的同志中，未參加任何派系的就有好幾位，本人（任前任秘書）和馬聯芳兄（任專門委員）便是其中的兩位。至所有部屬重要機構主管，則大部份都是延攬黨外人士擔任，如現在臺灣的馬保之、李慶雲、沈宗瀚、劉發煊以及已故的趙連芳先生等都是他當時借重的人。因此，還曾經一度引起黨內同志批評他黨性不夠強，其實我認爲他這種開明的作風，倒完全符合了一切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的黨宗旨，絲毫沒有違背黨的立場。二，前面我已說過，先生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以書生本色參加政治活動的人，因此，他爲官始終是抱着清廉自持的精神，決不做半點貪墨虧心之事。可舉一件事證之，記得黨政府從大陸撤退之前，中央對各部會均撥有疏濬經費，作緊急疏濬之用，適此時農林部奉命與經濟部合併改組，以致一再輾轉耽誤，經費遲遲撥到，而此時局勢已相當緊急，與各附屬機構間之聯繫已發生困難，但左先生仍命立即開列各單位名單，將撥到之款全數分配核定，迅速轉撥各單位負責人簽收應用，本部除廣州辦事處外，身邊分文不留。事辦妥後，先生才放下心來。像先生這樣的臨危不亂、隨處不苟的君子之風，在中國官場中實難得見者。是故先

生自報官以來，始終是清貧如故，身後除了遺下多年搜購約值港幣三數萬元的喜愛書籍而外，別無他物，是勢所必然了。他常對我說：「我這麼多年來沒一寸土地，也沒有一塊錢的股票。」我也曾對他說過笑話：這樣才是一個反共產主義的真正「無產階級」呢。

現在黨已團結了，而先生亦已盡了他應盡可盡之最後的力量了。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可當之無愧矣。留下來的責任，我們還有健在的諸先生和衆多同志會來承擔的。先生可以安息了！在臺灣這塊自由的祖國土地上長眠，總還是安靜的。

悼懷左舜生先生

劉東巖

余與左舜生先生結文字因緣，係在醒獅刊物上，但相識晤談，却在民國十八年秋於香港舉行中國青年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時光荏苒，轉瞬已逾四十載矣！

抗戰軍興，舉國一致。當今之將總統介石先生於時有數名言，允爲國人所永憶難忘者，即：「和平未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於時本黨——中國青年黨本平素「外抗強權」之決心，與愛護國家民族之素願，願以在野黨之全力，與在朝黨——中國國民黨朝野一心，携手同行，共圖挽救國家民族於危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因左舜生委員長（其時左先生任中國青年黨之委員長，即若以及全黨之主席一職）代表本黨與代表中國國民黨之總裁今總統 蔣先生訂有交換條件，共勉效忠國家，是爲國青兩黨相互承認以平等合法地位合作愛國共同救國之始，轉瞬又已三十餘年於茲矣！

抗戰既達最後勝利，國青兩黨同仁，爲期謀國深遠，皆盼早日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提前實施民主憲政。因由兩黨各推數人，交換國是意見，增進兩黨友誼，以與海內外各方面之賢達，共同促成民主憲政。於時本黨負責交涉之

人，其現在臺北者，除左舜生先生已逝世外，尚有余家瑞先生及本人。緬懷共同報國相期無負平生之素志，人天遠隔，哀悼曷任！但念往者雖逝，來者正多，天人合一，實無旁貸。切盼我全國各友黨及無黨派之各方面高明賢達，在蔣總統領導之下，繼續維護並厲行民主憲政，俾克早日光復神州，化干戈為玉帛，化戾氣為祥和。庶可勉相躬修，趕上時代，開發宇宙，創造文明，共臻治理！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向其國人與世人，宣佈對我中華民國，對我所有盟邦，表示無條件投降後，世界在表面上，即已恢復和平秩序。杜魯門總統曾派特使馬歇爾來華，協助我國政府，謀求和平統一全國。當值左舜生先生曾與本人共同訪晤馬歇爾氏於重慶牛角沱宋子文氏之宅第，交換重要意見，促其維護我中央政府早日和平統一中國。當會勉竭棉薄，促進邦交，流光島逝，瞬又二十四年於茲矣！

抗戰勝利，左舜生先生與周澤沖兄及余本人，曾即黨命，由渝飛滬京一帶，與本黨各方同志，辦理復員有關事宜。左先生並負責籌辦中華時報。余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初自滬飛臺一行，藉便參觀臺灣省政治。其時臺灣國民教育兒童就學百分率之高，產額與水菓之多等計已有十四項，在全國各省區中佔第一位。民國三十六年夏秋之際，左舜生陳啓天兩先生奉政府命，出長農林經濟兩部，轉効國家。余則奉政府命，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全國總選舉事務所委員，與主任委員張少武先生、委員洪蘭友、蔣勻田、金葆光諸先生共同為各國民大會代表各立法委員服務。日月易逝，瞬逾廿載。民國四十三年春，左先生自港返臺，出席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憶某日，余曾於臺北市郊約請左先生、徐夢麟先生、莫柳忱先生、王坤履先生、曾寶琛先生等諸友好聚餐，暢敘親切。十數年間，徐莫左三先生均已先後謝世，緬念前賢，曷勝悼懷！

舊憶今秋中青在臺召開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後，七月三十一日午後三時許，余曾與左先生晤談於自由之家，因悼念張君勱先生，兼悼懷胡適之先生與梁任公先生，相與研討史學及政治學，暢敘移時。余曾請左先生為余題嘉言，彼當即書其勉世之言以贈余。其言曰：「世變不可知，要在有心人靜觀默察，細心體會，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地。」

。人生不過數十年，民族國家，則有其悠久之生命，能合全國人多種善因，積之既久，自收善果。」今復聞其嘉言，益復想念其為人。九月中旬，左先生復由香港飛臺，住榮民總醫院診檢身體。嗣後不久，余曾往榮總看望左先生於病房，孰意一朝別離，竟成永訣！情同兄弟，哀何能已！因賦以詞曰：

嗚呼舜兄！

當世學人！

論政研史，

時代精英！

相期報國，

從政農林。

嗚呼舜兄！

舉世忠貞！

敬悼左舜生先生

張伯倫

當我們欣慶吾黨團結之際，不幸左先生溘然長逝。此不僅本黨失去一位傑出的領導者，也是國家失去一位反共的調士，史學界失去了一位健將。左先生逝世的前兩天是他七十六歲生日，沒想到過了兩天，他竟與我們中青同志撒手而別。左先生在本年七月由香港趕來臺北參加全國代表大會，促成全黨的大團結，是以帶病之身而來，冀對國家有所獻替，為此左先生竟置病體於不顧，在臺期間，與同志周旋，備極辛勞。他以「先求形式團結，進而達成全黨精神的團結」為目標，他自謂能假我五年，必再可以為國家多做一點事。不料就在全代會閉幕之後，以身體不適，即行返港就醫，不久轉臺住入榮民總醫院。所可惜的，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負和他的豪語，竟未如願，就溘然撒手而去。我感覺內心不安的，是我十多年來都不離病榻，半身不遂，行動須人扶持。左先生在臺住院期間，我未能去探視他的病況，這正是「非不行也，實不能也」，心餘力拙，深感歉疚。

我與左先生有四十餘年的交往。記得是民國十四年秋，我從法乘船回國，但那次郵船却載的法國土兵，運往北非平恩摩納哥的戰爭，所以繞道北非返國。通常的航程只須四十餘日，但那次却走了五十餘日。到了上海之後，我按照在法國時期的通訊地址到閩北找曾先生（素韓），但曾先生已經遷移了，我換了一個空，想到曾在法會辦學

社法國事務的通訊處；然後靈機一動，我決定先找商務印書館的鄭貞文先生，鄭先生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且為學藝社的主辦人。找到鄭貞文先生之後，由他告訴我曾先生的住址。那時曾先生是住在上海民厚北里一六一六號。時曾先生正辦「醒獅周報」。見到了曾先生，他將回國後的一切及創辦「醒獅」周報的經過告訴我。當時醒獅周報在上海辦得有聲有色，以堂堂的軍陣鼓吹愛國思想，不兩月發展到兩千多份。當時左先生在「醒獅」是挑大樑，以他的熱心才華，肩負起「醒獅」大樑的任務，由個人的寫作及稿件的徵集，一直到刊物到讀者手上，左先生都參與其事。從那時起，我更與左先生認識了。我們都是書生，除了辦刊物之外，還要教書。我們辦刊物不是爲了賺錢，而是書生報國，不僅不賺錢，而且除撰稿之外，還得自掏荷包。可見當時中青黨人是富於愛國熱忱的一羣書生，完全以道義來維繫，從沒鬧什麼家務。撫今思昔，實不無今昔之感！

我在上海這段期間，曾、左、陳三人同住一個房子，適修平、子柱（早我一班船由法國回的）二先生已赴南京、漢口等地策劃黨務及宣傳等工作去了，因此當時對於左先生的談話都認識頗深。記得協助左先生辦總務工作的是黃鍾聲先生。當時爲「醒獅」撰稿的，除曾、左二先生之外，尚有幼椿、修平、景陶、夢九諸先生。不久李騰泉先生由俄返國，也在醒獅撰稿。

我在上海起初是住在旅社，因爲費用不貲，左先生勸我搬到黃鍾聲先生所租的房子合住，待輪回川。曾先生的事情太忙了，各地來信積壓太多，我只好代曾先生爲各方回信。在黨務策劃方面，我建議曾先生重視四川的黨務。由於四川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民情熱忱且長於組織，是發展黨務最理想的基地。曾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囑我多與在北平教書的李幼椿先生連絡。於是同年冬，我由滬返渝，在重慶成立組織，發展四川的黨務。

民國七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我與劉淵英元生向西北發展，闢在吳佩孚將軍幕府。當時安徽周敬仁同志手下有兩三萬人，駐在兩當一帶，準備爲抗日戰爭而效命。後因楊虎城勾結回軍，將周敬仁同志誘殺於天水。此後我隨吳子玉將軍軍次鄂中、鄂東、豫北、山西、經察哈爾到北平，實爲張學良抗日之助。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左先生被上海四十公團推為代表，前來北平勸說張學良、吳子玉出兵抗日。當時我與酒英先生仍在吳子玉將軍幕府。左先生來動說吳、張，同時若干美國華僑通電吳、張二氏出兵抗日。我同劉酒英先生與左先生有多次研討，終以當時局勢不便，因此左先生毅然返回上海。

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宣戰，政府決心抗戰到底，隨着政府的西遷重慶，青年黨中央黨部也隨之遷到重慶，黨部設在朝天門的信義街二十九號，左先生時常在中央黨部聯絡內外，我則時常往來成、渝之間，奔走黨務，我與左先生晤談甚多。劉子鵬同志由浙江來重慶，他請左先生和我，我們在「大三元菜館」吃的「三元會」，左先生和我算是地東，却由子鵬作東。今天思之，我們「三元會」就「缺一門」了。

抗戰勝利，「民主同盟」開全代會於重慶通遠門的鮮公館。我們參加的代表，有舜生、修平、景陶三先生，還有劉酒英、李公權和我。曾先生同劉東巖兄自北平來參加。當時「民主同盟」人士企圖瓦解青年黨，並攻擊國家主義，說「國家只是一種工具」，有解散各黨各派之陰謀，倡言「國家工具論」。左先生起而反駁說：「我們抗戰八年，以國家至上為號召，始能全國一心，以獲致抗戰勝利。今天說國家是工具，我們豈不是為工具而犧牲嗎？」左先生的義正詞嚴，左派人士自知不能自圓其說，企圖未能得逞。由此足見左先生思想與見解的正確，中青黨人數十年來堅守此一理想如一日，從不為異端邪說而動搖分毫。

卅五年青年黨召開在川中執委座談會於重慶，決定今後政治方針，曾先生同劉東巖先生由北方回到重慶。我為曾、左晤談黨的方針及辦法，安排在「渣白紀念堂」內，我把門反扣，以免影響他二人的暢談。當時座談會開的很圓滿，大致獲得協議。

卅五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本黨參加代表五人，左、李二先生未參加，左先生及師曾、東巖和我任顧問，酒英先生任代表團秘書長。接着本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國民政府遷都南京，本黨中央黨部遷上海，左先生任宣傳部長兼財務計劃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我供職中央黨部，常往返於京滬之間。因中央黨部人少事繁，往往一人身

兼數職。我在當時曾患肝病，尚未就醫。左先生辦中華時報。他第一次勸我就醫，我沒有聽他勸告，熬了些日子。第二次他見我眼睛發黃，他從中華時報派了一部車子來接我，送我到朱仰高醫師診所就醫。左先生的關懷之情，至今仍未敢忘懷。人之有疾，未有不求醫者，因為當時我沒有錢就醫，故遲遲未果，在盛情難却之下，只好想窮辦法，我太太將所有手飾拿去賣了，住了兩個多月的醫院才治好。我在生病時期，曾先生問我是否願在常會中提案，欲在總部撥出一點錢作為醫藥費。我的答覆是心領了，用黨部的錢來治病，我不能開此惡例。還有陳修平先生送我一百萬元治病，我也只有心領，而未予接受。總之，在當時的中青黨人可以說大家都只有道義相見，互借互諒，同舟共濟，充份發揮了同志愛之精神。

卅九年，大陸沉淪，流落香江，成了政治難民。時左先生先我到香港，爲了生活，一代政治家竟至於開小雜貨店，以舖一家之口。我正虎口餘生，數十年故人，復相見於危難之間，真如隔世。我們漫話當年，一幕一幕的往事，不禁湧入腦海。從上海、北平、重慶，以及於「政團同盟」，而至大陸沉淪。

記得在重慶時，毛匪澤東等到重慶，邀請中國青年黨人士吃飯，席設張治中宅。我與毛匪素昧生平，乃因周恩來之介紹，與我握手寒暄。毛匪當時向我幽默笑道：「你這個張伯倫，不要學英美的張伯倫啦！」當時毛匪又語衆人說：「中國要在二千年後，纔能實行共產主義。」當時我真想當場揭穿毛匪的謊言。我接着向毛匪要一份共產黨的政綱，毛澤東却佯裝沒聽到，顧左右而言他，毛匪確是世界上善說謊言的專家。

左先生談到重慶的往事。當時蔣先生請青年黨十幾位重要人士吃飯，那次我也敬陪末座。吃飯前，蔣先生先請曾、李、左三位於別室談話，這是張岳軍先生的安排，以示尊重之意。

談到國民政府在南京改組時，曾先生抱病出席首次會議，對於曾先生有感而發的那首七律，我和左先生都有同感。詩云：

刺復興衰豈偶然，禹湯罪己可回天，仙船丹船蘇民困，定有黃巾起朔邊；南渡應思東晉事，西郊寧姚北征

篇，杞憂敢爲諸賢道，周室宜防再播遷。

而今大陸沉淪，共匪竊據，政府播遷海隅，這首詩好似成爲諛語了。撫今思昔，令人悵惘。

談到辦刊物，左先生是辦刊物、撰稿、編輯的高手。我雖對刊物不在行，但想當年我對於黨辦刊物，亦會略盡棉力，如總部所辦的「新中國日報」，以及其他刊物，我無不竭力捐輸。四川省參議會開會期間，參議會同志十餘人，時時聚會歡飲於寒舍，正所謂「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也！而今流爲政治難民，生活竟至困境。一代政治家的左先生，亦流於市井做小買賣。我倆談至於此，不禁相對悵然！

左先生當時對我說，他每月必須要港紙一千多元，始可解決開銷。當時李先生亦在香港，曾先生已去美國。曾先生交李、左二位的信，常由我轉交。記得一次左先生在致曾先生的一封信有云：「如果兄身體康復，請到日本東京，我們共同再幹一場。」落至如此窘困地步的左先生，仍然毫無不減當年，實在令人欽佩也。曾先生一次來信，勸我早日到臺灣去，結果辦理入境手續竟拖延了兩個多月之久。我到臺灣兩一周光景，不幸的噩耗傳來了，曾先生逝世於美國。到臺灣兩年左右，我就患了腦溢血。左先生身在海外，常對我的病體備致關懷。

本年七月間，左先生爲了促成本黨大團結，他抱病來臺，他和李先生同住於自由之家。久不見面，遠道而來，我扶病去看他。沒想到那次的相晤，竟成了最後一次訣別。左先生自己身體不大好，而猶關懷我的病況，左先生對我說：「我很想見你，你身體不好，不必出席。」我回答說：「老大哥們萬里千里遠道而來出席全代會，我怎能不出席呢？」當時我看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前，我勸他回去以後，多多休息，左先生毫不含糊的回答說：「我的經濟情形欠佳，無法休息。」我又問道：「你的兒女沒孝敬你一點嗎？」左先生兀聲答道：「你不是不知道，我是從不求兒女的嗎？」他那不含糊而爽朗的性格，仍然數十年未變。最後我幽默地對左先生安慰道：「古人說：『貴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我和你大概是同樣的命運吧！」想不到那次的懸談，竟成了我們最後一次交談。至今思之，猶似眼前。當左先生第二次住入榮民醫院的時候，他尙向李楚柱兄問候我的病況。在自己疾病垂危之際

，尚以我的驕驕爲念，實在令我感激不已。因爲我的半身不遂，我竟未能親到榮民醫院去看他最後一次，他便溘然長逝，豈不悲乎！傷感之餘，痛撰一輓聯以悼之云：

壯志未酬，海角空餘恨；

長才遽逝，天涯故人悲。

拉雜進來，亦感力不從心，雖有萬語，難盡悲思。故人其妻，愁痛自深。病榻口述，亦無非略表哀悼之情耳！

左舜生在農林部長任內

冷 彭

「我知道要爲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奠立一個堅實的基礎，至少要花上十年苦幹的功夫；要有十億以上的美金可以繼續運用；而且要時局相當的安定，至少沒有戰爭；同時還非訓練多數的人才不可；決不是任何一個因陋就簡而且根本不懂得農業如何重要的政府所能辦得到的……。」這一段話，是左舜生先生在「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第十一節「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略記我從事農林行政的一點經歷」中所說的。他接着又說：「總之，我在農林部二十個月的時間，僅僅大致理解了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農業必如何使之逐漸進入現代化，而爲國民經濟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現在我看見中共這一切胡鬧的行爲，只好目笑存之，以靜待他們的失敗。好在我們將來對一切一切都須要從頭做起，固不只農業一端而已。」

左先生念念不忘的「中國農業現代化」，正是憲法所規定的「促成農業之工業化」，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國家應運用科學技術，以興修水利，增進地力，改善農業環境，規劃土地利用，開發農業資源，促成農業之工業化。」便是左先生的農政依據，據以推動全國農業之復興與重建。左先生從民國三十八年秋起，大部份時間住在香港，所有共匪的人民公社，水旱病蟲疫，和農民逃亡等失敗情形，都歷歷在心！仍然不無遺憾的，就是沒有看到毛匪

死，不能從頭重建大陸農業。左先生自信他會死在毛匪後面，不幸！竟在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農曆九月初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光復大陸從頭做起的責任，落在我們後死者身上！

部長三任為期兩年

話仍得從左先生的「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引起：「關於青年黨參加政府的一幕，大抵在三十五年的夏天，國青兩黨的中央，便已在重慶有所接洽，最初所擬議的，國府委員會由我們參加四席，行政院則由我們任一部一政委。我們的中央……要我擔任行政院的一部，當時據說有兩部聽我們選擇，一部是農林，一部是水利……我的回答是農林。」

制憲國民大會之後，青年黨先參加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參政會和憲政實施促進會等四機構，再同黨國民政府改組方案。三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制定共同施政方針十二條；同日，國府令選余家菊、何魯之、曾琦、陳啓天為國府委員。四月二十四日，特任左舜生、李璜、常乃惠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左舜生兼農林部長，李璜兼經濟部長，李因故未就，改任陳啓天。左先生五月十六日到部視事，他一面感到：由參加四機構到行政院改組，一氣呵成，過於急促；一面表示：他自己是書生，有定見而無成見，和大家共同從事農林建設。旋以中國農業現代化為目標，在兵荒馬亂烽煙四起之中，展開農業復興重建。

三十七年六月一日，行憲行政院成立，青年黨兩部兩政委，經濟部改為工商部。十二月一日行政院改組，劉維煥任工商部長，左先生仍舊。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總辭，他把所爭取的一大筆事業費，如數分配給各附屬機關之後，於四月間從容飛臺。自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連續三任農林部長，為期將近兩年。如從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到部，至三十八年一月離京計算，則為一年又八個月。

放手做事大膽用錢

農林機關總不如工程交通機關高，農林機關的待遇總不如工程交通機關多，這是由來已久人盡皆知的事實！不僅如此，農林機關辦農林事業，經費往往不足；非農林機關或非正規的農林機關辦農林事業，經費就比較多，或相當的多。例如：抗戰前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抗戰期間的中茶公司、農本局、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和勝利之後的農復會，都有較多或很多的經費，但是當年農林部和今天經濟部的農林經費就微不足道了！

農林經費少，不能放手做事，不能和工商業齊頭併進，影響全面經濟發展，恐怕就是目前的事了！農林部對於附屬機關的經臨各費，一向是主管司先核，部次長再減，甚至會計處統計之後，第三度削，然後送行政院，行政院主計處召集會議第四度緊縮，其結果往往是今年度預算加追加預算的和，就是來年度的概算！因此，除了幾個較大的實驗、推廣、營業機關外，一般農林機關，發了薪餉，就所餘無幾，事業費不過象徵而已！左先生任內，不僅不減附屬機關的概算，而且增加，不僅增加，而且大量增加。他常說：「一件事只要我們確實看準了，認為值得做，我們便應該放手做事，大膽用錢。」這確是一件重大的改革。今天的中美經社基金，百分之二十以上用於農業；農業基本法案規定：中央、省市、縣鄉農業建設支出，不得少於經濟建設支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等，只是大膽用錢的嘗試。農林界還要進一步繼續積極奮鬥！

用人惟賢實事求是

「接事後經過了半個月的時間，我自己便已內定了四點辦法：一、原有部內及各附屬機關的專家或技術人員，一切照常，決不輕予更動；二、工作進度，須以實地考察為準，我不能完全相信書面的例行報告；三、除原有確定

的預算照常經由會計處會同總務司的出納科支付以外，凡一切臨時興作需用錢者，即召集有關方面協商，仍按會計手續辦理，略採重點主義，亦不顧其過度偏枯；四、凡部內各司及各附屬機關的相關事項，例如糧食增產，即召集各首長開會解決。」

前述用人、用錢、治事等辦法，第三項正是對於「大膽用錢」的註解，「大膽用錢」乃所以放手做應當做的事，而不是不受主計和審計法令的約束。

第一項是用人，左先生用人惟賢，對於技術人員和事務人員，同樣尊重。當時更計劃延攬全國農林專家，共策農林大計，特別是旅居海外以往對於我國農業有過貢獻的，禮聘趙運芳先生為技監，不遠開端而已！

第二、四兩項是治事，左先生經常觀察京滬一帶的中農所、綿改處和蠶絲公司等。對於待遇菲薄的員工加以鼓勵，對於各機關設備上、建築上、經費上的困難，都用種種方法予以解決；三十七年多，更抽取到平津一行。農林部以會議協調業務，但不常常開會。當年有一個沒有名稱不定期的十人會議，也是公開的秘密。

增產糧食安定民生

左先生的方針、任期、用錢、用人和治事等，略如前述；以下列舉十項重要事業：「在我任農林部的一年又八個月的時間，下面所舉的若干工作，確已走上了相當的軌道，而且多數已在發展中：一、我們完成一個全國性的「糧食增產計劃」，部份已付諸實行，成敗互見。」

民國二十六年之前，我國每年平均進口米一千六百萬市擔，麥一千萬市擔，麵粉三百萬市擔左右。民國三十四年勝利之初，我們向聯總要求七十二萬噸米，七十五萬噸麥，聯總不能如數供應。三十六年起，糧食增產的重心，由糧食部移歸農林部，左先生四月接事，七月便核定「農林部糧食增產計劃綱要」，配以大量經費，並支持實施。前項計劃，以增產食糧，充裕軍糧民食，減少輸入漏卮，尤注重於缺糧都市之食糧供應。於是改良推廣並重，

換用良種，施用肥料，防治病蟲，改良栽培，增加面積，改善儲運加工，分別配合進行，期於第三年自給自足。第一年增產稻谷五百萬市擔，第二年一千萬市擔，第三年二千萬市擔。增產小麥第一年三百萬市擔，第二年六百萬市擔，第三年一千二百萬市擔。雜糧第一年增產三七二萬市擔，第二年七九〇萬市擔，第三年一、〇四〇萬市擔。分別在蘇浙皖、湘鄂贛、閩粵、四川、兩粵、豫晉陝、冀魯察綏、遼吉等八大食糧供應區實施增加生產，以供給京滬、杭州、潮汕、廣州、平津、膠濟等六個缺糧地區的食糧。三十六年下半年的預算四百億，三十七年的預算八百億。在當年確屬大膽用錢了，可惜還是不能放手做事呢！

輸出農產換取外匯

「二、若干可以換取外匯的農業物資，如桐油、茶葉、蠶絲、豬鬃等等，均定有獨立發展與整理的計劃，蠶絲因有上海蠶絲公司主持，人事、經濟、技術、設備均有相當基礎，情況頗可樂觀。」

爲了供應戰後經濟建設需要，訂有「戰後外銷物資增產推銷計劃大綱」，計劃復員第五年起，每年輸出農產達一億噸，價值法幣二十二億至二十八億元。根據經濟地理和原有生產基礎，劃定各種主要外銷農產增產區域，專業集中生產。各地產區的產品，由政府成立立法案，保障生產成本，維持合理利潤，並隨時隨地收購，同時促進各業合作組織，以爲每個區域中的生產單位。左先生對於外銷農產的貢獻，是督導有關農業機關配合推行。

桐油：以四川、湖南、廣西、貴州、浙江等產桐縣份爲中心，增植新桐林，整理舊桐林，設立新式榨油廠，期於復員第五年起，每年輸出二百萬公擔至二百五十萬公擔。茶葉：劃安徽祁門，江西婺源，和浙、閩、湘等省的茶區爲外銷茶增產區，集中推行大面積茶園，機械製茶，聯合精製，計劃復員第五年起，每年輸出一百萬公擔。生絲和綢緞：劃浙江太湖與錢塘江之間，和廣東三角洲爲兩大外銷生絲增產區，設立蠶種製織廠和共同烘繭灶，計劃復員第五年起，每年輸出生絲十至十五萬公擔，綢緞四萬公擔至五萬公擔。

改進棉毛促興紡織

「三、若干國內的必需品，如棉花、菸草、羊毛、水產、牲畜等，亦均分別推進，棉花的增產與改進，更有顯著成績。棉產改進處建了一座頗具規模的「棉業館」，在我離職前已告落成，且已有了部份的設備。」

民元至民八之間，我國棉花輸出多於輸入；民九以後，轉成入超，棉花、棉紗、棉貨輸入，常佔輸入的第一位。直到民國二十五年，國產皮棉到了八百五十萬公擔，進口四十多萬公擔，出口三十八萬公擔。民國二十六年，棉田擴充到六千萬畝。八年抗戰之後，三十五年的棉花輸入，再度升到最高峯——二百八十萬公擔，和民國二十年相等了！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成立農林部棉產改進諮詢委員會，三十六年一月成立農林部棉產改進處。左先生到任之後，大畫增加經費，擴大進行。棉改處掌理：棉花生產，棉業經濟，棉花檢驗和人才訓練等。設有北平、南京、上海、漢口和西安分處；棉場，植棉指導區，棉花打包廠，更遍及南北各棉區。爲了供應四、五八二、二五二枚紗錠，和其他用途，三年增產計劃目標：三十六年皮棉九二七萬市擔，三十七年一、三二〇萬市擔，三十八年一、七一七萬市擔。

羊毛增產，以陝甘寧青川爲中心，由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主持，繁殖良種，防治羊病，管理剪毛和包裝，計劃每年輸出十五萬公擔。細毛增產計劃從略。

魚膏運銷營林防砂

左先生在魚畜方面，注意運銷和法案；在營林方面，注意示範和防砂。民國三十六、七年加強上海魚市場和漁業銀團之後，更籌設青島、天津、廣州和南京等地魚市場和上海家畜市場。左先生在任內除修正農林部組織法和蠶種

製造條例之外；修正獸疫預防條例案，經行政院會議通過送立法院審議；修正漁業法完成草案六章五十二條，可惜都沒能完成立法程序，大陸就變色了！

林業方面，左先生的觀感是：「六、大規模的從事造林，也是中國一件迫不容緩的大事，但過去總是蹉跎復蹉跎的沒有舉辦……因而，我與南京市的沈市長（怡）協商，想由農林部與京市合作……同時，我也向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提出了一個西湖造林的計劃……我之所以着手於首都與西湖造林的意思……實在想引起一般大人先生們對於森林的一點興趣，因而我好作進一步的規劃……。」

勝利之後，農林部有西北和黃泛區兩大防砂林計劃。西北防砂林，橫亘陝、甘、遼、熱、綏、察、寧、青八省，計劃沿沙漠內陸邊緣，營造平均寬十里，長約萬里的防砂林帶，以防止沙漠內侵。三十六、七年，在榆林、景泰、磴口、東勝和都蘭五處設場實施。黃泛區防砂林，計劃在皖、蘇、豫三省造林一百萬畝，三十六、七年，在中華、鳳台兩地實施固砂、營防風林、和開牧草帶等。

農業實驗研究推廣

農林部有五個實驗所，和一個農業推廣委員會，左先生對於這六大機關，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四、……中央農業實驗所添建了一座『土壤肥料館』，正準備作一種較大規模的研究，各種化肥的實驗，已分別在各地進行。」中農所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是我國農業科學研究最充實的機關，和林、漁、牧各所都是農林技術的策源地。「五、農林部在我任事以前，原已有一個農業經濟研究所的創辦……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就地規劃，興建一所可容近百人從事研究工作的所址……。」經研所是農政的參謀本部，所址向西北，象徵中國農業將向大西北發展。

「六、……農林部有一個中央林業實驗所，我經過一番研究，覺得無論在人才、經濟、設備、規劃的各方面，都太嫌不夠，一再想加以擴充……。」「七、我的前任居然在上海有一個水產實驗所的創建，總算難得。我接事以

後，補充了一部份建築……內容都還是異常的空虛，不只設備上來不及，人才也確實不容易找……。」「九、在我眼中，中央畜牧實驗所的進步，比較是內部設備上的居多，這一方面得着聯總的助力確實不少，許多重要的儀器，價值數十萬美金……該所有若干優良的乳牛、羊隻、種豬、鷄隻，也大抵得自聯總，在我手裡僅為該所建立了一所鋼骨水泥的牛舍，大致可容大小牛隻一百頭以上……。」「中林、中畜兩所，都是民國三十年成立。」

農業推廣委員會轄九個推廣繁殖站，左先生有意把它改為農業推廣總局。

農林本部善後總署

「十、農林部本身的建築，本來也是很簡陋的。在我離職的半年以前，已感到不大够用，因而籌款建了一座辦公大樓，下層有一個可容二三百人開會的大廳，三間醫務室也設在樓下。同時我手裡建了四十八家的職員宿舍……。」農林部是民國二十九年成立於重慶，疏散瓷器和歌樂山之間的清涼庵，遷都之後，先寄鐵道部大廈之下，然後在大石橋一塊廢墟上，建立活動房屋辦公。

農林部和聯總、行總的關係太密切了！左先生特別提到農具廠，他說：「八、聯總送了中國若干套製造農具的機器，原已由聯總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總廠，並已選定在若干省區繼續建立，但工作的進行異常遲緩，我因提議在南京設立一個首都農具製造廠，由農林部供給地皮，聯總擔任建築，即把聯總所送的機器，運一整套到南京裝置起來……不到一年的工夫，即已完成……。」以上各節是左先生在內十項重要事業的梗概。此外，小型農田水利工程，也與修不少。

「今後無論是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國際組織，如果對中國某種事業願在實際上加以協助，其可採用的方式，應以兩種為限：其一、完全以外國人為主體，參加的中國人僅以提供意見為主……其成敗得失之責，即由外國人直接負之。其二、由某一國家或國際機構供給經濟或物資，並得提供原則上的意見……但由中國人全權主持，有無成績

，亦由中國人負完全責任。最不好的一種方式，即在名義上由中外共同處理，實際則外國人隱操大權，形式上在中國行政系統之中，事實上則儼然一獨立王國，而超出於中國行政範圍之外……。」左先生是有感有見而發，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特別警覺！不再蹈覆轍！

農業工業齊頭並進

「……我所最注意的，乃在水利與肥料對於增產的關係。優良品種推廣對於一般農民經濟改善的可能，農業機械運用對於目前中國農村的限度，防止病蟲害與獸疫一切藥械的利用對於農產畜產的效能，各類農產品對於國家整個經濟體系上所應該發揮的功用……據我觀察，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已在發端，假定能有十年的安定，繼以不斷的努力，更加上若干國際的協助，即不難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最主要的關鍵，仍在政府對發展農業的重要性，確有相當的認識。」這是左先生重申他的信心，他相信中國農業現代化已在發端，不難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其關鍵則在於政府能不能重視農業？直到今天為止，我們不能說政府不重視農業，而是重視的程度不夠，沒能和工商業同等的重視。左先生不愧先見之明！

「……過去中國的輿論，曾有過一度重農或重工之爭，少數日本人也曾發過「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狂論，其實自我觀之，這些話都是多餘的；一個國家的工業不發展到相當的高度，則農業高度的現代化實為不可能……同時一個國家的農業如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有無數的輕重工業亦將遭遇莫大的困難……今後我們的旨趣，只在齊頭並進，分工合作，執輕執重的說法，根本是用不着的。」左先生任內建立農具廠，棉籽加工廠，充實病蟲藥械廠、綢緞廠等費用和農產工業，大都屬於「農業引發工業」範疇，如今已通過「農業培養工業」階段，應該是「工業復興農業」，「貿易發展農業」的時代了！

大陸農業從頭做起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左先生由滬來臺，寄居臺北市潭州街中華農學會。中華農學會暨各農業專門學會，對於大陸農業須待從頭做起的看法，和左先生不謀而合。各學會聯合年會，在五十七年十二月通過了「光復大陸後農業建設實施方案」，茲摘其中建議農業政策十點於後，以慰左先生在天之靈！

一、依照三民主義之原則，以建立現代化農業，增進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所得，改善農民生活及促進經濟建設為目的。

二、廢除人民公社，實施耕者有其田，建立家庭農場，獎勵合作經營，維護農民合法權益，使能享有自己工作之成果。

三、依自由經濟之原則，善用人力物力與科學技術，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及促進農業經營之企業化。

四、開發土地資源，予以合理分配，作最有利之利用。發展農田水利，勵行水土保持。

五、森林以國有為原則，勵行保護經營，加強保安國土，促進森林工業。

六、發展畜牧事業，開發邊疆牧野，改善加工運銷，增進國民營養。

七、維護沿岸魚源，發展遠洋漁業，改良養殖漁業，促進魚產加工，擴充魚貨外銷。

八、充分供給農業生產器材，促進肥料工業發展。

九、建立完善之農業金融制度，及健全之農民組織。

十、加強農業技術推廣及農業教育。

聖誕前夕悼舜老

周劉教勛

數月來，爲探問左先生病況，我與香港、臺北、米里蘇達三地友人通信頗繁，我們日日懸念，夜夜祈禱，希望他老先生的病狀，能够轉危爲安，化險爲夷。然而不幸的噩耗，終於傳來，悲難自抑，淚落潸下，嘆人世無常，往事如夢；痛人天永隔，追思無窮。憶左先生遺著：「踏莎行」有云：「歸蔡冉冉又黃昏，家山凝望空回首。」先生未及目睹凱旋宮闈而早逝，是有無限遺恨的。

一九六三年，左先生應阿哥大，來美講學。初抵紐約，在舍下小住數日，每於晚飯後，先生從世界國家大事，談到家庭瑣事，朋友趣聞，乃至古往今來的風流韻事，他談笑自若，逸興橫生，時而慷慨淋漓，時而詼諧幽默，談文論學，隨時寫出吟詠之作以助興，這些紙紙片片，我都抄錄下來，保留下來，甚爲珍視。

是年，正是左先生七旬大壽之年，我和謙沖要在他的生日，爲他慶壽，邀請在紐約的友好聚會。他堅決婉謝。及期，我們帶着就讀的兩個男孩，買了蛋糕，去旅館向他拜壽，唱快樂生日歌。後來，我們改走在雙十一宴客，大家都是老朋友，相談甚歡。因是日爲第一次歌歌休戰紀念日，紐約市有遊行，車行受阻，許多客人遲到。先到的客人太客氣，堅持要等候客人到齊才開餐，鬧到大家饑腸轆轆，我們非常抱歉！

年終放寒假，左先生的幼子宥權自「愛我華」來，先來信告以抵紐約的時間。是日下午五點，我的老二允力，前去接車。詩以寒風緊，大雪紛飛，等到午夜一點，仍不見到。左先生在旅館，我在家裡，允力在車站，三地電話聯絡傳消息，大家都失望而焦急。想是假期，人多車多，天寒地凍，中途車壞，因而誤點。數年前，龔懷漢來美留學，由港乘總統輪抵金山，改乘灰狗長途汽車來紐約。我們依時前往接車，從早上七點等到下午五點，原來他的車在芝加哥壞了，等修理好才開行。那是酷熱的夏天，今是嚴寒的冬天。我在電話中，請左先生勿憂，早點安睡，他却一直不睡，站在窗前，向外凝望，迎接風雪夜歸人。快近兩點了，宗權到了，給我電話，說車站內外，人山人海，沒見允力。我催他快去旅館，未幾，允力來電話，告宗權已去旅館。（後來左先生曾有文描寫這一段咫尺天涯，憂喜交併的情緒。）左先生自六樓下來，奔去門前，父子相擁抱，樂也何如！次晨，見愛子衣薄，同去買大衣。據

左先生說：「在寒天雪風中，走了十幾條街，我真走累了，才選中了這一件價廉物美的多大衣。」兒身暖，觀心也暖。真是天下父母心！

每年聖誕節，我們家裡，總有一個聚會，招待臺灣親友來美留學的青年男女。今年左先生在此，宗權亦來，我們邀請年青客人，共二十多人，左先生對青年們，一一細詢他們讀書的興趣和進度，工作的類別和志趣，多加鼓勵和鼓勵，再三叮囑讀書或工作，要努力學習，將來為國效力。留宿一宵，次日和宗權一同搭巴士進城，赴何廉教授家的宴會。

左先生又去波士頓，應哈佛教授費正清的約會，在其酒會中，與多人辯論問題，慷慨激昂，過度緊張，致胃病復發，住余傳猷家，急送哈佛醫院醫療。余君即在該醫院任研究工作，人事關係方便，請得專科名醫診治。譯沖聞訊前往，轉達紐約諸友好的關切慰問，力主開刀，以求根治。但左先生堅持不可，對譯沖說：「我今年七十了，如不幸，你如何向我太太交代？」卒未果。病新愈，再來會，原已蒼老，益見憔悴。我們正要他任此休養，竹生姊亦來函相托，但左先生一再堅持要回旅館去。要去哥大圖書館看書，要去準備未完的講課。適程廣祿先生帶著瑞士太太和小孩來看他，吃過晚飯，左先生說請專待理，要回旅館，趁程先生有車，送他回去。我們知道左先生要回旅館的原因是什麼，是想抽煙呵！我們要他戒煙，後來發現客廳小几中待客未完的半包煙，先生悄悄地偷吸了。此後譯沖常常去看他，陪他，他也常去附近何教授家，何夫人常留用餐，這對病後的左先生，心情和飲食，都有極大的安慰和幫助。

一九六四年元月下旬，左先生在哥大講學完畢，即作經日返港計劃。先生去了金山，病再發，並且很厲害，幸有政大學生吳醫生夫婦，妥為照料，住最好的醫院，請最有名的醫生，他們自己也是醫生，悉心診治，輸新血，打補針，終於轉危為安。病痊，還是去了日本，再回香港。

由美歸去，左先生生活平安，數年來照常教書，照常寫文；去過臺灣，也去過日本。寫作甚勤，有了新著，即

簽名賜贈，掛號寄來。三年多前，謙冲返國，出席國大會議，我一同隨往。會畢，謙冲先返美，我多留月餘，特經香港，拜候諸友，去左先生家，見他們質伉儷身體精神都好，先生衣長衫，瀟灑自如，環顧室內，四壁圖書，日坐書城，寫下不少的宏文大著，先生又妙語如珠，介紹香港名勝、山城故事，又請我和其家人，間上有名餐館，美味佳餚，大快口腹。離港時，左先生伉儷及二位小姐，前來送行，我急忙趨前拜謝，豈敢勞大駕，真不敢當。想不到那次機場一別，竟成永訣了！

在香港機場臨別時，左先生說：「我們父子在美多承照料，將來宗禮結婚，還要多勞神。」時宗禮已與雅惠訂婚，他們在我家相識，一見鍾情。宗禮平日課忙，家書甚簡，為徵求父母同意結婚事，寫了一封很長的家書，老人歡慰，欣然同意，囑將回信給周伯伯母一閱。我記得大意如此：「你旅美幾年，這是第一次長信，所談結婚問題，有情有理，我和你母都贊成。從前國父中山先生，在香港讀醫校，年紀很青，已早結婚，各科成績優異，都是甲等，名列第一。你今日情形，和中山先生當日同，年記青，與未成，要結婚，結婚不影響讀書，早婚亦可，從此可安心讀書，讀得更好。」結果，宗禮是一九六五年夏，在紐約結婚的。劉唯聲先生來美主持小姐的婚禮，雅惠小姐秀麗聰慧，非常能幹，畢業臺灣東吳大學外文系，婚後同在一校，一讀書，一工作，互助互愛，美滿愉快。宗禮讀完物理及電機工程兩個碩士學位，現在米里錄達一有名電氣公司任工程師。去年得一子，祖父歡慰，為之命名「大任」，其屬望先生的殷切，可以想見。

去年秋，左先生來信說：「弟今年即將進入七十有六，雖還可勉強支撐，但食量減少，不能耐勞，固衰老之徵也。」後聞體重突減廿磅，去臺灣檢查身體，而檢查結果，身體各部，並無疾病。左先生以無病心釋，再去日本，此行留日月餘，訪問考察，搜集資料，返臺時，體重加六磅，精神愉快，家人和朋友，都為他老健康而欣喜。史料今夏忽患腎病便血，令人擔憂，是重病早潛伏了，往米臺灣，時病時愈，最後終以病況深沉，體力日衰，日趨嚴重，群醫束手，終告不治。嗚呼，傷矣！

香港竹生姊，臺北恩謝妹，光華姪，告病情，報哀訊，生離死別，懷愴哀痛，異地同悲。近日讀臺灣報筆端誌，許多朋友寫的悼文和挽詞，更增進我對左先生的誠解和敬佩。情難自抑，特檢出舊照數幀，芻草此篇，遙寄哀思。

敬悼本黨左故主席舜生先生

陳善新

本黨中國青年黨五主席之一左舜生先生，不幸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在臺逝世，享壽七十七歲。惡耗傳來，黨內外同其哀悼，朝野聞莫不念惜。同人等茲勉抑哀思，爰將左先生行誼、逝世經過、對國家民族及對本黨之貢獻，略述於後，以示悼念。

左先生諱學訓，字舜生，別號仲平。湖南長沙人。生於前清光緒十九年陰曆九月初四日。曾先後肄業長沙縣立師範、外國語專門學校、上海震旦大學及巴黎大學。先後創辦主編「少年中國月刊」、「中華教育界」、「醒獅週報」、「申江日報」、「國論月刊」、「國光旬刊」、「民聲半月刊」、「新中國日報」、「中華時報」、「自由陣線」、「聯合評論」等報刊。並曾先後任職「中華書局」新書部主任，復旦大學、大夏大學、知行學院、中央政治學校、新亞書院等校教授。國民參政員、制憲行憲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暨農林部部長等職。

先生身體素健，惟近年來對國事黨事過於憂心，且年事已高，健康不免大損，時鬧胃病。加以自去年秋間起，為奔走本黨團結，更極操勞。自上次扶病來臺，參加主持本黨全代會返港後，病況更轉嚴重，乃於九月十四日來臺治療，終以腎病、肝病、胃病及血管硬化等症併發，不治逝世。

先生之死，不僅本黨之重大損失，亦國家之重大損失。先生對國對黨之貢獻，其最重大者計有數端：

一、對抗日救國之貢獻：先生生平，素極反對日本之侵略中國。尤以「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先生更加憤慨。立即辭去「中華書局」職務，專門從事抗日救國活動。在上海組織抗日救國團體，與日寇展開抗爭。「一二八」之役，並曾策動淞滬駐軍旅長中肯同志翁照垣將軍抵抗日軍之進攻，隨而爆發震撼一時的「一二八」淞滬戰事，使日本帝國「皇軍」死傷慘重，損失慘重。日本駐滬海軍司令，由鹽澤少將到野村中將，到白川大將，一再增兵昇級易其統帥，始終未能討得便宜，卒至迫和了事。由是翁照垣將軍之英名大噪，騰喧全世。先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一戰勝我，再戰勝俄，日本少壯軍人，趾高氣揚，驕橫萬狀，認為舉世無敵。並曾揚言：以十個師團兵力，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即可佔領全部中國。詎知「一二八」一役，十九路軍翁照垣將軍，以少數孤軍之力，即將來犯之數擊潰，令日本一再增兵，敵前數易其將，仍不得逞，使日本顏面丟盡。反之，我自甲午戰爭失敗以來，國人恐日畏日，雖仇日而無可奈何。經此一役，而揚眉吐氣，全國振奮。始知「大日本皇軍」，亦非無敵。日本強權，亦非不可抵抗。自甲午以還，數十年屈辱怨毒，一朝一吐盡，一掃而光，證明皇軍也不是打不敗的，中國軍隊也不是不能戰的，日本人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人也不是隨便可以欺侮壓迫的。自是軍心大振，民氣大張，愛國之心，油然而起，爲此後之「七七」、「八一三」、以及八年抗戰修獲勝利奠定成功的心理基礎。此劃時代之光榮事件，大部即由先生策動而來。

二、對抗俄反共之貢獻：先生少年時代，因深受梁任公、黃克強維新革命思想之影響，愛國心特別強烈，對不合國情，賣國殘民的共產黨徒，極端厭惡。故當初期「少中」分裂，共黨代表陳代英、楊賢江、鄧仲夏，與本黨代表李璜、陳啓天及先生正式談判時，先生即與李、陳兩先生堅持反共。談判破裂，不惜與共產黨人「相見於疆場之上」。此爲先生首揭反共義旗之先聲。民國卅年在滬，中國青年黨與國家社會黨、第三黨、職教派、平教派、村治派等所謂三黨三派合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先生並曾一度擔任其秘書長。最初活動頗爲積極，後因共產黨滲入變質，先生不願受其操縱控制，乃毅然率領全體同志退出。又如以後之參加制憲國大，與共黨民盟分道揚鑣。及居

港廿年，在最前線，長期與匪週旋作戰，不斷予匪打擊，凡此種種，足見先生反共之堅決。先生嘗謂：「中共是中共的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真正頭痛敵人。」我們也可以說：「左舜生也的確是毛澤東的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真正頭痛敵人。」

三、對國粵合作之貢獻：中書創黨之後，前期因反對聯俄容共，後期因反對一黨專政，因為共產黨所仇恨，也為國民黨所不諒，後國民黨因清黨反共，及進行對日抵抗，驅謀舉國團結，逐步開放政權，逐步實施民主憲政，先生乃與本黨中央共同決定，抗日禦侮，一致對外。於二十三年秋，由黃郛約赴廬山與蔣委員長會見，此為國粵合作，共同抗日救國之始。二十七年夏，先生更以中國青年黨委員長身份，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蔣公交換函件，相互承認，更為中國民主政治奠立切基。自大陳陷港，先生撤退香港，廿年來，對政府及執政黨的批評，言論時或稍涉激越，然究因愛國深情，望之殷，責之切，究不失諍友態度。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先生曾返國出席。於重大關節處，總是支持政府。故兩黨關係始終良好，其間先生之斡旋連繫，其功實多。

四、對本黨團結之貢獻：本黨自四十年「六、四」分裂，十八年來，先生與寄居香港之李璜、何魯之、張子柱——所謂香港四老，始終促進本黨之團結。自五十年「中國」再度分裂，黨覆之日，幾演流血慘劇之後，終於引起國家元首執政黨領袖 總統蔣公之關注，乃出面調停。於六年鄭勳囑陳啓天先生促進本黨之團結，經陳先生之努力，各方終於停止摩擦，坐下來談，結束敵對狀態。對黨之團結，達成了初步的任務。四年前蔣總統又面囑余家菊先生促進本黨的團結，經余先生之繼續努力，終於成立了「中央聯合委員會」。對黨之團結更邁進了一大步，達成了第二階段的任務。去年秋天，左舜生先生來臺檢查身體，總統更殷殷囑告左先生促進本黨的團結，經先生年來之多方奔走調處，團結乃告成功。又經李璜先生之返國共濟，故乃有此次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圓滿結果。

以上所舉，不過為先生對黨對國貢獻之筭筭大者而已，至先生之其他嘉言懿行，更指不勝數，茲更略記三、五

事，並誌悼念。

一、先生早期於民國十七、八、九年之間撰文，常用「黑頭」、「阿斗」等筆名。時先生供職「中華書局」，待遇菲薄，而兒女成羣，負擔甚重。李璜先生時常向我們提起：左先生生活如此困難忙碌，且常抽暇為本黨刊物義務撰稿。如「阿斗文章」、「黑頭文章」之類，常常大寫特寫，大量出籠，同時還要忙於為你們上課，殊為辛苦難得。你們應體左先生心意，好好讀書。

二、先生黨號「壽公」，蓋取義自趙良對商君語意，所謂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訶訶，不願意作德賊鄉愿之謂。故先生為文，常言人之所不敢言，時有石破天驚之壯語。惟先生晚年，觀念一變。謂用「黨號」，乃地下革命政黨秘密時代所用暗號，今黨既已公開，應行廢止不用。

三、當本黨尚處秘密革命時期，在滬辦黨同志，慮身份公開不便。同志書信往返，大都託由可以公開之場所交寄「中華書局」，托由先生代收代轉，左先生每日必代收轉大批函件，不以為煩。我等知行學院同學，時常累先生帶來很多信函，親自一一面交。勞神殊感。

四、先生為人頗為幽默風趣。憶三十五年春，本黨在滬創辦「中華時報」，先生出任社長。曾邀約宋達波、劉鳳九、張希為、崔萬秋、左幹臣、王辛郭諸同志和我入報社工作。記得某次我與達波兄往謁先生時，先生曾垂詢余等辦報意見。我謂老師辦報方針，究採英國風乎？抑採美國風乎？先生笑問何謂美國風及英國風？予謂：如採英國風，則從平實著手，一點一滴，紮穩腳跟，漸進發展，以策萬全；如採美國風，則集中人力物力火力，注重熱鬧，製造聲頭，掌握高潮，一鼓作氣，一下子就挾拍出名。先生笑謂：我們中國人，不急不徐，走中庸路線；既非英國風，亦非美國風，而為中國風云。余等咸相視大笑。

五、先生主持「中華書局」新書部時，曾介紹友好多人在該局任職，介紹若干友好著作在該局出版。並對我等知行同學之家境清寒者，介紹若干人擔任零星校對該局書籍工作，如「辭海」之類書籍的初、二次校對，大抵均出

自知行同學之力。同學得先生之扶掖，從中學習若干津貼，以助膏火之資，亦不無小補。

六、先生除從事政治運動、文化運動外，生活豐富，生趣盎然，暇時喜讀小說，愛看電影話劇，偶爾也跳舞和打打小牌。

七、先生觀中國以農立國，農業問題，最稱重要。故本黨參政，先生即選擇而出任農林部部長。

八、先生研究日本問題，最感興趣。每三、五年必赴日本一次，搜集資料，觀光采風，盡興而歸。

九、先生專研中國近百年史，早期曾有「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稿篇」之輯作。自後國人之重視近百年史，大概係由先生首先開端。又，先生晚年更重視名人傳記之研究，會著有「黃興評傳」、「宋教仁評傳」等多種。目前傳記文學流行，其實早於三、四十年前，先生即已重視傳記文學了。

十、先生於慶且大學肄業時，與會、李二公同窗，及後又共同創黨，合作無間。劉忍英先生嘗謂：三人各有特長，會謀、左斷、李幹，三者湊合，並加其他領袖及全黨同志之力，故中青乃有今日。其言頗為允當。

綜觀先生一生，於愛國、反共、民主、文化、教育、農林建設諸業，貢獻實多。茲當先生不幸逝世，我們除悼念先生外，並望全體同志，繼續共同努力，以完成先生未竟之志業。

敬悼左舜生先生

陸崇仁

一生為實現中國國家主義和民主政治和反共而奮鬥，中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先生，突然於上（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噩耗傳來，全國上下，宛若天上一顆巨星驟然隕落一樣地感到震驚和悼悼。大家所哀傷的，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智識份子、卓越的政治家和反共先知者的逝世，同時尤其痛惜一位在現實政治上社會上一向具有楷模作用的導師從此喪失！

此外，也許祇有極少數明瞭政治內情者才知道的一件事。這便是左先生受黨魁之重託，於完成中國青年黨全黨大團結之後，亟想進一步促成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三黨的大合作，以利自由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反共復國政治力的加強。以左先生在政治上的聲望，他既能促分裂將近二十年的青年黨的大團結，必能進而促成朝野的大合作，重為自由中國憲政史上創一新頁，原是絕無疑問的，而今竟遺志未遂，撒手西歸，這真是國家民族無法補償的莫大損失！

從蓋棺論定的立場上說，揆左先生一生，不僅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無比重大，就是他一生行誼，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了。我們深深相信，像左先生那樣的人物，如果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他個人才能的發揮，必將更大，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一定也是不同凡響的。然而他正好不幸生在清末和民國那樣長期而極度混亂的時代，他的長才無法得展，最後憂傷以終，幾乎是命定的。像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從過去歷史上，找出無數例子來。以下且讓我們稜述下列幾點感想，來追悼這位已經遠離世間的一代偉大人物。

一、堅定不移，始終如一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不同，政客是以一己的利害為前提，以獵取高官厚祿為目的，既無政治主張，又缺乏純正的愛國心。政治家則不然，抱民胞物與和佛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胸懷，親世俗之榮華富貴似敵，對於自身所抱的主張，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義之所在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左先生一生努力以赴的政治主張，是國家主義，民主政治，以及反對共產黨階級革命，強調社會政策。他自從民國十四年參加中國青年黨之日起，至他臨終前夕止，堅定不移，始終一貫地為實現他的政治抱負而奮鬥。中國青年黨之有今日，中國有此種正現代化的政黨，左公之功不可沒。他率路藍縷培育中國青年黨壯大，他在祖國抗戰時期，曾經代表青年黨參加廬山談話會，並進而促進國青的合作。他也曾在抗戰首都組織民主政團同盟，但一旦發現中共份子參加，他便拂袖而去。在避難香港期間，中共會問接派人一再邀請他返大陸參戰，他寧邀請者以閉門羹。他也會對報界發表過談話：「即使把我左某燒成灰燼，我仍然是國家主義者！」說明他雖然在顛沛流離時期，仍不稍改他自己的主張信

仰。他對於親自參與的三黨共同制定的現行民主憲法，特別珍愛，所以當前些年國民代表大會開會，曾經爲修訂憲法，而不惜毅然決然地表示堅決反對。但是對於反共政府支持的初衷絕不稍移。所以當後來僅限於臨時條款修改通過，蔣總統連任第三任總統之後，他和政府的關係，便立刻歸於融洽。而他這種光明磊落、有爲有守的素行，却正好證明他是一位偉大政治家，而不是依違於兩可之間的政客。

二、一生清風亮節，廉介自持，光大書生報國的君子精神。中國青年黨是由一羣青年愛國書生所組織的政黨。中國書生受數千年來儒教思想的薰陶，絕大多數都是抱有「憂道不憂貧」，純粹爲公家爲國家爲民族服務的君子精神。依照現代眼光看，這種君子精神祇能和佛門僧侶，和基督教教士相比擬。而這種精神，又正好和現代倫理國家精神相符合。以是中國青年黨所代表的傳統愛國思想和愛國精神，恰好接上了現代國家思想和愛國精神，而成爲創建現代化中國的精神原動力。

以上中國這種傳統書生報國的精神，又因爲和歷史上充塞現實政治的貪墨營私，以獵取利祿政權爲目的的官僚太監權臣一流的腐敗份子，造成強烈的對比，因而承擔了中國歷史綿延四千年之久的重任。以是中國青年黨書生報國的精神，便又成了國家民族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精神。而左先生在中國青年黨領袖中，便是最具備這種精神和人格的一個典型人物。他一方面是以儒家精神的底子，即接上現代國家思想。他爲了自己理想的實現，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一方面持身則始終清風亮節，廉介自持，從而充分發揚光大了中國書生報國的君子精神。左先生打從年青時期擔任中華書局編輯開始，中經培植中國青年黨長成，到抗戰勝利，至爲部長止，一生都是過着清風亮節，廉介自持的生活。當民國三十八年整個大陸淪於中共偽政權之後，無數高級官吏身挾巨金，遠走高飛，在黃金國依舊度着舒適的寓公生活的時候，而左先生却囊空如洗，在香港幾乎成爲難民，一家人在香港鑽石山，開設一家小雜貨店，自己進貨，自己賣店，圓頭微利以資糊口。事實上，他近二十年來在香港一直是靠着教書和賣文度着艱辛的日子，因爲家中用不起用人，以是又得親自操勞瑣碎家務。試想以一個七十以上的高齡，如何禁得起這種生

活的煎熬。最近不治病重之日，一時醫藥費用無着，而不得不向人告貸。若非政府關懷，動請來臺就醫，情形可能更爲慘慘。至於死後清點遺物，除部分藏書外，一無長物。像這樣清澹自持的精神，難道不可作爲今人從政者的楷模嗎？

三、嗜嗜讀書，勤於寫作，最愛接近青年。爲左先生個人自己打算來說，最好是不問政治，而專心意志地讀書寫作，乃至在大學教書，這樣不僅他家庭生活，可以過得好些，而且學術上的成就，一定比現在更來得偉大，那是絲毫沒有疑問的。但是近半世紀來中國一直處在空前的內外交迫之中，凡是中國人有誰忍心坐視不救之理呢？何況左先生又是一位生來有抱負有理想的人呢？然而左先生雖然從事政治，一方面對政治劃定一個界限，這就是他所常說的：「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爲之，小人因緣以爲利。」所以他對於政治，常抱着一種超然的立場，一方面一生從不離開研究學問的崗位，這就是他一向被人譽爲書生政治家的由來。他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有着特殊的成就和貢獻，早爲海內外所一致推許，此層已不待我們在此多所辭費。

他認定中國今日之陷於貧弱落後，基本癥結，在於知識的水準太低，不求進步所致，所以時時不忘提醒同志和國人求知求新。也許他對於現狀，已經感到絕望，所以不得不把這一希望期待於下一代青年人身上，這恐怕就是他平素對於青年特別愛護，特別喜歡接近的緣故吧？因此，他不僅在學校教書，喜歡和青年學生們接近，就是朋友中的子弟們，祇要你去拜訪他，他總是應得異常歡喜，從生活情形一直問到所學科系和興趣，談上半小時一小時，絕不感覺厭倦。由此種種，我們可以看到左先生對於國家的生命下一代看得何等的遠大！

普通一個人活到七七高齡與世長辭，自然不能說是短壽。但是像左先生那樣一方面自己尚有一部理想沒有完成而正待完成，尤其他希望親自看到中共政權崩潰，大陸失土重光，而竟未能看到；一方面在政治上，正好接近實現他多年的宿念，於完成中國青年黨大團結後，進而促進三黨的密切合作，再爲中國憲政奠定一良好基礎。不料時不及待，遽蒙名歸道山，這豈止是左先生個人的不幸，尤其是國家的重大損失。不過一個人肉體總不免有死亡的一天

，而他的精神則可以永生不滅。左先生過去一生，已經爲他所熱愛的國家現代化，建立了鞏固的基礎，直到中國復興的一天，這是我們堅信不疑的。

悼念左舜生先生

李沐南

本黨主席、中國著名史學家左舜生先生，不幸積勞逝世，全民族失去文化導師，人格典型，豈僅青年黨人同聲哀悼而已！我自民國廿年認識左先生起，屈指至今已歷三十九寒暑，追憶往事，感念生平，真有說不出的感慨。

民國廿年夏，我因吳宗漢學長之介紹，在本黨江蘇省黨部擔任秘書。（黨部設在上海赫德路羅德坊一五九六號）那時正是本黨秘密活動時期，我因從事黨務工作，得知左先生用「蔣公」黨號，兼任中央東南特派員，負有統籌本黨全高的重任。我因職務關係，得以時時面聆教益；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見到左先生，是由於參加在上海麥根路培明女中舉行的本黨青年團會議，是左先生列席指導的。會中有一極難解決的問題，經他復委婉的說明利害得失，使大家很樂意傾聽他的道理，這一番語重心長的話，確實是經過他深長的考慮，精心的錘鍊，更由於他態度誠懇，主張堅定，循着中庸的大道，儘量減少刺激，不走極端，消除了人事摩擦於無形，使得大家衷心悅服，欣然接受，在和諧的氣氛中結束此一會議。由此可見左先生對同志的感召力是如何之大了。左先生有豪邁恢宏的氣度，變然成章的文采，做事認真負責，對本黨同志尤爲慈祥惻怛，在陣沖中流露出至誠。本黨是一個書生集團，外無異援，手無斧柯，知識份子愛國的熱忱，是本黨唯一的動力，而先生不管國家動盪到什麼程度，他總是站在時代前面，表現着愛國家愛民族的傳統精神，因此本黨半世紀來雖時在驚風駭浪之中，仍屹立不墜。

左先生是本黨的領導者，一生樸樸皇皇，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是讀書人最高的旨趣。時代有如一個大洪爐，必須有無數知識份子將他們的心血，甚至生命投擲其中，方能發出光和熱。左先生爲了國家，爲了黨，爲了民主意政

，他已盡了他應盡的責任，千秋萬世以後，在中國民主、反共運動史上，自將佔有重要的一頁。我因為很早便有親炙左先生教益的機會，由他的一生志業，我所得到的啓示，是一個知難份子，由少及壯而老，所遭遇的連遭困難環境，絲毫不會影響到生命的價值，相反的，只有更增加其精神的偉大，使他的一生志業永垂不朽！左先生在本黨參政時，貴爲部長，卸任之後兩袖清風，在港靠經營「士多」及賣文渡日，不減書生本色。即此一端，已足爲現代士林的風範。本黨播遷來臺以後，不幸陷於分裂，閩贛犄角之爭，起伏靡已，黨的命運危如游絲，左先生登高一呼，促成本黨全面團結，李幼樞先生最近致書本黨某同志，痛切的說：「左先生如果不是由於奔走團結過於辛勞，我相信他還可以多活幾年！」誠然，以他的體氣和精力，不得謂其天年僅止於此，而他竟甘願犧牲個人剩餘的生命來延續黨的生命，這是何等悲壯與偉大的心情！若非有大智、大仁、大勇，曷克臻此。他是永遠活在每一同志的心中。

學術界以及一般社會人士，大家都知道左舜生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學家，著作等身，有筆如椽。殊不知左先生在半世紀動亂中所鑒造的讀書人偉大風格，才是最值得世人崇敬的。回想當初參加本黨的一羣愛國青年，逐漸都已步入老境，我很坦白的說，大家雖然已將大好青春投向本黨，但真正能談得上對國家有貢獻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千軍之赫赫，不如一士之謬謬，」左先生一生行藏，無愧謬公之號，也只有他這種峻嶒的風骨，偉大的魄力，倔強的態度，忠誠的格調，才足以挽救中國政治社會乃至學術界的頹風。本黨的同志都該以他爲榜樣，以救國救民爲努力的方向，這樣才對得起左先生在天之靈！

本黨應以精誠團結來紀念左舜生先生

關德辛

本黨領袖之一，左舜生先生不幸積勞逝世。近年來，左先生的健康一向不算好，以一個將近八十歲的老人，大

可願養晚年，不問世事，但他仍然不斷讀書、寫作，從來沒有以老為藉口，而偷閒躲懶。尤其以多病之身，促成本黨全面團結，其勇於負責的精神，使本黨全體同志留有最深刻的印象。左先生是不平凡的，因此，我認為悼念左先生，不單是語言文字之事，而應該以實際行動來印證。這樣才能告慰左先生在天之靈，也不負他生前對黨的一片苦心。

左先生在本黨召集全代會的前夕，曾經說過：「形式的團結不算真團結，必須進一步精誠團結。」現在，他走了，我相信他的話仍然縈繞在全黨同志的耳邊。

直到目前為止，左先生生前所希望的本黨精誠團結，似乎尚有一段距離，這是毋可諱言的事實。我察覺到團結以後的本黨，尙未能擺脫三層陰霾的籠罩——恩怨、黨氣、派系。談黨事能超越三層陰霾的人，實在不多。

以吾恩怨，本黨經過十八年長久的分裂，同志與同志之間，因鬭爭所產生的恩怨怨怨，往往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爛帳。按常理來說，既然團結了，爛帳就不必再算了。啓啓說，宰相肚裡好撐船，畢竟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本黨號稱是養生樂園，多少帶有文人相輕的習氣。恩怨怨怨的纏夾不清，也就在所難免了。

以吾黨氣，倒是知識份子從事政黨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種氣質。如無崩山扶澤的豪悍黨氣，如何能有「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抱負？但黨氣絕非每一同志在黨內互爭雄長之謂。黨氣之爭，只能使黨的力量互相抵銷，你扯我拉的結果，大家均視黨務工作為長途。「不善為整，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對本黨具有歷史淵源的老同志粉粉塵岸高蹈，黨務工作的推動也就加倍困難了。

以吾派系，本黨曾經長期陷於分裂，諸同志幾乎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我敢說任何政黨的派系都不若本黨之壘壘分明。據我所知，日本的政黨，不講派系的存在，日本政黨的派系之間，正因為是鮮明的，公開的，反而容易互相協調，而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民主政黨，由於對一切問題都有見仁見智的看法，其形成派系，毋寧可說是極為自然的。青年黨雖然團結，派系却難以派除，這不足為病，我所深感杞憂的是，派系之間不求協調，而仍然墮

不已，這便貽「黨同伐異」之譏了。政黨的派系，能趕上時代，對於黨並無害處。假使還是墨守陳腐之見，非關爭不可，必然同歸於盡。

本黨同志試一冷靜觀察，就能發現：本黨所謂恩怨，不過是雞毛蒜皮的睚眦之怨。所謂黨氣，也無非是文人積習使然。所謂派系，更屬抱殘守缺，不值一談。因此，左先生所揭舉的精誠團結目標並不難達到，只要全黨同志能够澈悟，一夕之間，就能激發黨的無限生機！

我常常默想，像魯壽坤先生、左舜生先生，他們將畢生的心血都投在青年黨裡，爲的是什麼？正確的答案應該是，他們基於一己的良知，了解這是一個充滿光明也充滿黑暗的時代，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都需要無數知識分子投身在時代的大洪爐裡，發出光和熱，來延緩發揚國家民族的生命。質言之，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註定了是奮鬥者的命運，收穫將是下一代或更下一代的事。很難得的左舜生先生已經替本黨同志樹立了一個好榜樣，他的治學精神，做事態度，處人度量，都值得我們做效。本黨同志對政黨首魁普遍提高，自然就是達成精誠團結的希望了。

左先生在農林部

趙葵生

國人對於左舜生先生，都熟諳他是一位黨的元老，一位經常寫出令人傳誦的精闢文章，以及談吐高雄風趣的人物。我於左先生主持農林部時，在部服務，我發現左先生也是一位行政能手，對農林部業務十分瞭解，處理十分妥善。

抗戰勝利，政府遷都南京，召開制憲國大後，他出任農林部長。當他尚未接任農林部長時，農林部內大家都帶一點驚奇與期待的心情。但當左先生就職工作不久以後，大家對他的疑慮，一掃而空，而且無不衷心歡服，敬愛有加。這種對左先生敬佩的心情，今天在臺灣的農業界人士中，無不津津樂道，覆往無已。

我隨同左先生進入農林部，在工作兩年的時間，我對左先生有幾點深刻的印象：

他對於中國的農業，不僅有廣泛的認識，而且深悉如何去改良，以發展中國農業。他對於農業推廣的技術與人才的培植以及人員的配合，思慮週詳，然後切實去做，使一些從事農業推廣有多年經驗的專家，都為之傾倒佩服。

他訂定幾種中國農業發展計劃小冊子，這幾本小冊子，首先由我負責校對，一字不錯，印刷精美。凡遇到國內外農業專家，他都要我去奉送一冊。這些小冊子的名稱有：「中國的漁業與發展」，「中國的林業」，「中國的畜牧與繁殖」，以及「中國農業教育的發展」等等。在當時南京國府的許多部會中，農林部是最具有業務計劃的一部。

左先生不僅對於中國農業前途，有高瞻遠矚的見解，而且對於各省各地方的特殊農業措施，他能鉅細不遺，瞭如指掌。有一次，我隨他去浙江杭州，參加浙江省主席主持的一次中央與省級農業專家聚會，還有幾位美國農部派來的專家參與會議，那次左先生說明對浙江人口密度與農業發展關係，使與會的中外專家，一致認定他是學識淵博，勤於治事的人，而且是第一流的做事有效率的農林首長。

左先生對於人員的調配與安置，都做到恰如其分，人盡其才，絕無黨內黨外之分野，遵守為事擇人之原則。總期做到因才授職，各安其位，各展所長，使得在過渡時期的農林部有一番新氣象。

左先生對於部內許多學者專家，真是優禮有加，愛護備至。例如留學美國學農，獲得博士學位的馬保之，他父親馬君武先生與左先生相識，當時馬博士任農林部司長兼上海辦事處處長，他是一位精明勤於做事的年輕學者。左先生對他的器重與推崇，無以復加。政府進來臺灣後，馬保之博士曾任臺灣大學農學院院長，不久轉任農復會中組長，四年前由聯合國推介，往西非洲賴比瑞亞擔任農學院院長，至今仍被留任，以其成績卓越，深獲彼邦人士之讚揚。

我在民國十八年認識左先生於上海。在農林部二年時日中，與他接觸較多。我是學習農業化學的。在農林部我

任職於化學肥料專業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以中央銀行總裁、農民銀行及中央信託局等總經理為委員，每個月開會時，左先生對於這些銀行的業務，談笑風生，雅趣良多，因此農林部向國外購買的化學肥料價款，動輒在數十萬乃至百萬美金以上，銀行界都願幫忙結匯。

左先生因為以一個學者而從政，他沒有時下那些官場中的習氣，絲毫沒有官架子官腔。左先生真是平易近人，有時還愛說幾句風趣話，使與他接近的人感到輕鬆與愉快。這大有助於事業之推進，但他人本無此種感覺，他說話做事，一切皆出諸誠意而自然。

我對於左先生最不易磨滅的印象，是他談話時的態度顯得那樣有條理，他說出來的話有內容而富於哲理。這種印象，今天在臺灣許多農林界人士都有同感。

今天，左先生已安眠於陽明山麓，他使黨內黨外的人，對他懷念與景仰，我猶其感到左先生可以含笑於九泉的，是臺灣農業的成就，與他的深遠見識有關，他當年所愛護所培植的人才，今天都能在臺灣各展所長，卓然有成。我則碌碌於粉筆生涯，真是感觸萬端，寫此短文，聊申哀思。

敬悼左舜生先生

黃欣周

左舜生先生逝世已經一個月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時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好像他仍然活在世上一樣。他沒有死，至少他的精神是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

我初次認識先生，還是民國二十年冬天的事。那時正值日軍佔領東北，我們在南京的朋友們爲了組織抗日「鐵血軍」，特地派了一隊男女青年（都是中大同學）到上海去募捐。記得是一天下午，我同一位姓謝的朋友在一幢洋房的二樓遇見先生，地點好像是在極司非爾路。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大器磅礴，氣象崢嶸，確是一個領袖的風度。

。以後要到二十四年初夏，先生受聘中央政治學校講學，我也辭了杭州一個學校的教職復返南京，從此才有時常見面請益的機會。其年秋，某大學有一位著名的史學教授，因久慕先生之名，特別託我介紹先生一語，由教授作東，請在一家館子裡。這一晚，他們兩個史學家交換對時局的意見，談得非常痛快。某教授還遞數國文字，不僅學識非常豐富，對政治也有深刻的見解，嗣後他一再向我表示：他對左先生非常欽佩。

二十五年春夏之交，我應邀赴滬，擔任「國論月刊」的編校工作。時先生已寓居地豐路地豐里八號，自己一家人住在二樓，樓下是圖書室和會客室，三樓便是月刊的編輯室。先生仍在中政校兼課，每週往來一次，但國論的最高編輯方針，實際仍由先生負責。先生辦事很認真，對稿件的甄審甚嚴，重要的稿件有時還得自己校勘一遍，所以國論在當時出版界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二十六年「八一三」戰事爆發，先生立刻號召上海文教界人士成立「上海教育界戰時服務團」，地址設在麥特赫斯脫路的允中女中。先生每天要去參加集會，決定重要事項，指揮各組工作，因前線戰事緊張，急待發動大上海人力物力的支援，中午照例就在團部裡用膳，飯後照常辦事。我那時擔任團中的組織工作，每天要同許多人談話，因此認識了不少大中學的教職員。我們還吸收了許多青年學生，擔任通訊及運輸的工作，對支援前線算是盡了不少的力量。對於受傷的將士，我們還派人去慰問，其中有兩位蘇小姐，據說是曾文正公的後裔。有一位姓張的同志，河南人，在前線當排長，需要一件毛衣，我們就請一位王女士（據說是王西泮的女兒）爲他打了一件送去，他高興極了。不久，先生即應當局之邀前往南京，我們的戰時服務工作又繼續了一段時期，直到國軍撤出上海，我們才停止活動。那時我已遷居「大中中學」內，有一天，敵軍居然荷槍在學校門口走來走去，爲了全市抗日分子的安全，我才把一份包括幾千人的「上海教育界戰時服務團」的名冊燒燬了。

這一年年底，經先生之促，我們一行四五個朋友，繞道港滬，到了長沙。長沙是先生的故鄉，我們一到，先生早就給我們準備好住房，廚子，一切不用費心，雖然我在地板上睡了幾個月，但仍有賓至如歸之感。廿七年春，先

生創辦「國光旬刊」，同時交了一筆錢給我，叫我購置一些必須參考的書籍。這時的長沙，其重要性僅次於武漢，我們的國光旬刊和成都的「國論週刊」及廣州的「國防線」是彼此呼應的，重要的文章常互相轉載。時評多半是先生親自執筆，記得有兩個人會受到先生薰厲的誅伐：一個是當時湖南的主席張治中，履任不到三個月，居然出了言論集不只一本，先生說他「大概以為湖南是沒有文化的蠻荒之地，真是贖大妄為！」還有一個是章士釗，當時傳說他要受日本人的利用，先生憤怒地指斥他多年來早已墮落得不成樣子，如竟甘心受敵利用，「就是站在湖南人的立場，也是應該大張撻伐的。」

五月初，「國光」遷武昌出版，我們也跟着到了這個抗戰的輿論中心。六月中旬，先生籌備的「新中國日報」在漢口出版了。因為我們對編輯並無經驗，所以在最初十天之內，每晚由先生親自領導着從事剪刀漿糊的工作，他教我們如何做題，如何編排，我們聽了題目，經他改過以後，才發出去。如是者一個多禮拜，我們已能從容應付，他才將編輯工作交給我們。真想不到，就從這裡開始，我一生中竟整整的捱了十年的夜生活！

武漢危急，新中國日報遷往成都，我們也隨着逃川。此後八年中，因成渝遠隔，和先生難得見面，只有一次，大概是三十二年之夏，先生有青城、峨眉之行，路過成都，一天在何魯之先生家裡碰到，他為我剖析世局達一個半鐘點之久。那時我有一個偏見，希望希特勒徹底解決蘇俄，美國徹底解決日本，中國以後就可從容建國，不愁敵人來干擾了。先生認為無此可能，也不盡以為然。

抗戰勝利後，我於三十五年五月中旬由渝飛滬，先生主持的「中華時報」已於半個月前問世了。同時，「中國人文研究所」的所址亦已覓定，裡面圖書滿架，已經够一個對學問或時事有興趣的人去埋頭研究了。不用說，這些都是先生一手掌劃經營的。在以後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先生撰稿，從政，為國事奔走，真是忙得可以。記得當時羅隆基向共黨靠攏的跡象，日益明顯，凡有言論，無不偏袒共黨，先生實在看不順眼，乃不顧多年老友和參政會同事的關係，在中華時報上接連發表兩篇「賈經隆基博士」的社論，取得他體無完膚。羅本是名利心好勝心極強的人，

但我曾注意過一段時期，他對於左先生的駁斥却始終沒有答覆。

三十八年春，先生已辭去農林部長，時常約集志友們商談反共救國的種種問題。四月，共軍渡江，先生乃搭機來臺。我這一次算是特別幸運地，承先生帶我離滬，沒有花一文錢、費一分神就平安地到了臺灣，這是我一生也忘不掉。記得我們的座機從江灣機場起飛，冉冉地劃過大上海的市空，我從窗口望到國際飯店、跑馬廳、四大公司的高樓……與先生默然相對，心情像鉛一般的沉重。飛機在臺中郊外降落，我們在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搭火車來臺北。

最近二十年來，先生在香港的生活異常清苦，但仍省吃儉用，自辦了一個圖書室，寫了幾百萬字的文稿，其中包括近代史、反共政治論文、傳記、隨筆、遊記……等等，其驚人之創作力及成就，迥非一般學者所能望其項背。也就因為平時透支了過多的體力，致身體日就羸弱，終至不起，痛哉！

在中秋節後一天的下午，正值颱風剛剛過去，我到榮民總醫院去看先生。先生這一天比較清醒，強閉眼睛看到我站在林邊，枯瘦的臉上綻開一絲笑容，問我雜誌最近辦得怎樣了，我約略的告訴了他，他憤激地說：「毫無辦法！毫無辦法！」我就心他動氣，立刻把話頭轉到別的事上，他才平靜下來，向侍疾的二少爺宗惠索取一支香煙來抽，隔了一回，他慨然地說：「我的病，說壞，有時又覺得好些；說好，又總是好不起來！」他顯然並不知道自己的病嚴重到何種程度，我當時內心十分難過，因為我早已知道他老人家的病，已到了回天乏術的境地，我只得安慰他說：「慢慢來，醫生希望你多多休息哩！」他立刻伸出手來，我握了一下，就離開他。這是我同他最後的一次談話，也是最後一次的握手。以後再去看他，他已經陷入昏迷中，即使張開眼睛也看不到我們了。

我最近覺得，左先生的一生，很像鴉片戰爭時代的龔定盦。定盦生於乾嘉時代，晚年適逢鴉片戰爭，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他生性豪放，多奇氣，篤於情感，富有浪漫情調；少時受母教，十二歲從外祖說玉菽開學，對於小學經學，均立下堅固的基礎。及長，結交四方志士，慷慨論天下事，嘗留心西北邊務，頗欲奮志功名，為國家創一

新的局面。無如朝野憤懣，曲高和寡，終於心灰意冷，鬱鬱以終。他的散文，被列為清代第一，有人說他「行文如神龍行空，縱橫變化，不可方物。」也有人說是「劍拔弩張，全是霸氣。」這固然是他的性格如此，也是時代的激盪使然。後此維新、革命時代的人物，幾無不受其影響。他對於史學也有獨特的造詣，只是為文學的光芒所掩蔽而已。他目擊英俄侵略的形勢，復恨發奮圖強之無人，不禁先天下之憂而憂，曾有一首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所謂「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他是一個傷時憂國的詩人，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者。

左先生的性格，豪放朗爽，剛性自決，而且熱烈真摯，帶有一種浪漫的意味，又有湖南人那種「灑不在乎」的神氣。在民國二十一、二年的時候，上海有一個脫離共黨的共黨分子，辦了一個叫做「社會新聞」的雜誌，幾乎每期要給先生造個謠，先生從來不看這種雜誌，有人告訴了他，他頂多打個「哈哈」，從不計較。他對於不愉快的人和愉快的事，甚至不會浪費幾秒鐘的時間去想他。

左先生的散文，列為當今第一流，實毫無疑義。他的文字簡潔精鍊，自然奔放，清新壯麗。不僅才思橫溢，觸處生春，引人入勝，天生一支神筆，又足以供其縱橫馳騁，左旋右抽，無不如意。其生平所作詩詞甚少，偶有所作，其神韻格調，亦足以媲美前賢，絕無愧色。

他對政治雖有抱負，有遠見，但畢竟是舊生政治家，對於實際政治不感興趣，苟非國家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他也許根本就不會轉入實際政治的漩渦。然而由於國家的危亡，人民的痛苦，他終於無法明哲保身，只得放下研究的工作，起來過問實際政治，而且在反共和民主憲政方面，確也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可是却因此就誤了他的學術研究工作，以致在逝世前仍有若干種著作未能完成，這不能不說是學術界的一大遺憾！

有人說先生只是一個中國傳統式的士大夫，平心而論，這句話並沒有貶抑的意思，因為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如梁任公、嚴復、三國維之流，其學力品德比諸後來自命前進的人士，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不過先生雖具有中國士大

夫的傳統優點，却完全沒有他們的缺點。例如先生始終肯定道德的重要，但也從來沒有放棄民主與科學的倡導；先生從不唱高調，或者像以往的士大夫一遇到實際事務就茫然不知所措，相反地，他總是言之有物，言行合一，事無大小一到他手裡，總是辦得有條有理；一直到老，他還是中懷謙虛，力求新知，凡此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所能做到的。

有人又說先生有霸才，這也不算說得過火。左先生與龔定章同屬霸才型的人，祇因環境不許可，同時他們的學術興趣又那麼濃厚，於是其霸才就只有表現於字裡行間了。

先生對於鄉先輩如宋教仁、黃克強、蔡松坡等，十分崇敬，而且決意為他們一一作傳；對於晚一輩的，只要一技之長，先生也要一一約晤，多方給予鼓勵。「淚眼望眞才」，先生和龔定章有同感焉，這也是時代使然。我深信，後人之崇敬先生，亦必如先生之崇敬先輩，今人之崇敬定章。

左舜生先生遺言讀後

黃欣周

時代似乎又在轉變了，不然，何以對現代中國政治學術曾發生重要影響力的老一輩人物，如張君勱先生、何魯之先生、現在又是左舜生先生，都在不到兩年的短短時光中先後凋謝了呢？

我們要衡量一個人的偉大或其對國家的貢獻，不能僅以他的表面事功或等身著作為準。一個人的事功儘管表現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但是否真正對國家人民有益，恐怕還是大有問題，經不起推敲；一個人的著作，不論堆得多高，如果祇是人云亦云，了無新義，那依然只是一堆「純廢話」，徒災梨棗，根本說不上什麼貢獻。因此，我們對於一個偉大人物的批評，必須從他的環境和權力範圍以內，去看他對國家對時代是否已經盡了他最大最善的努力？就這一點講，左先生對國家、對社會、對時代、對學術，確已盡了他最大最善的努力，說他是民國以來政治學術

界的偉大人物之一，決不爲過。因爲，像他這樣對近代史有深湛研究，對文學有高度修養，對政治又有遠見有抱負的人，民國以來，實在不多。詳細一點說，他實在是一個毫無憑藉的愛國書生。祇憑中華書局新書部主任的地位，他主持出版了那麼多介紹新知識的叢書，又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他從民國十一年起就和「少中」及青年黨的朋友們共同致力於阻遏中國共產主義的運動，他那一枝縱橫馳騁的「神筆」始終是打擊毛共最有力的武器；自抗戰以後，他就從事及早結束黨治和實施憲政的工作，今天中華民國能成爲一個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左先生的推進之功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我們尤其不能忘懷的，是在先生的政治風度，他是一個偉大的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極端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歷史文化的存續，但他對實際政治却並不熱心，他的興趣始終在學術研究方面，要不是國難當頭，共禍滔天，他也許一輩子不會走到政治的路上去。他曾經說過：「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今日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方面固然要有人從正面去苦幹，一方面還要有人從側面去冷靜的思考。由這種思考所得的結果，或憑藉其人在社會上的資望，或以某種私人的因緣，往往在無形中能對國家有莫大的貢獻。」（見「談風度——紀念黃膺白先生」文）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喜歡研究問題，冷靜的去思考問題，這樣也許比參加實際政治對國家有更大貢獻。所以他總是勸朋友要多多搜集資料，動於閱讀，冷靜的研討問題，不要熱中實際政治，浪費寶貴的光陰。他的風度正好是一個標準的中國書生政治家的風度。

政治家與政客的分別很多，大抵政治家對國家民族有着深厚的愛，個人的名利心異常淡薄，政客則只對自己的功名富貴關心；政治家的言論都是本諸內心的體會，或者自己能够做到的，他才出之於口，而政客則一味唱高調，諛佞取寵，言不由衷。我們說左先生是一個政治家，就是基於上面這兩點而立論。其實，這也是天下之公言，不信，請看下面的評論：

△左先生之可以不朽，就是他所說的，正是他平日能身體力行的。……左先生以書生從政，也出任過部長；但綜其生平，除學有專長外，是他耐得住寂寞，耐得住窮，從不汲汲於名利；現在，左先生雖已歸隱山，但左先生的

言論風采，仍足以爲世法，而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政黨競爭的社會中，他的遺言，實足以「敬頌立權」。〔十月十八日聯合報黑白集〕

△說左舜生氏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觀夫他的一生，應可當之無愧。……讀左舜生氏爲青年黨八所預留的十點遺言，如謂……凡此種種，非僅對青年黨人而發，實乃對我全體國人共同的呼籲。今日讀左氏遺言，回憶其生時手采，真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左氏遺言之最令人感動者爲其末後兩段。其言曰：「我時常有幾句話向朋友們說起：『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爲之，小人因緣以爲利。』我們人人應該關心政治，但決不需要人人都去從事實際政治。」又說：「……救國建國之道多端，無一不需要極深的學術基礎。我們上了年紀的人，不得不特別愛惜時間，加倍用功讀書，充實自己。但願天假以年，使我能實現預定的計劃，再完成幾部歷史著作。」左氏的前一段話表明了他一生對政治的態度，這種光風霽月的胸懷，不愧爲生本色。而後一段話更充份顯示出「吾生有涯，而報國之志難酬」一的感慨。人非聖賢，左氏一生，或亦不無缺失之處。然而縱就其忠誠愛國至死不渝一端而論，實堪爲知識分子之典型，足爲後死者景仰效法。〔十月十八日中國時報社論「悼左舜生先生」〕

△左先生爲愛國救國而辦刊物，而參與政黨活動，在五十年風雲激變的政局中，能保持其耿介清操，即由於不熱中於政治，不汲汲於名利，得以行其素志，不因現實政治環境而流轉，就在他自己的黨內也保持超然立場。……左先生有幾句話，粗看似憤世嫉俗之言，實則是其番生本色語。他說：「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爲之，小人因緣以爲利！」基於此一觀點，他認爲：「人人應關心政治，但決不需要人人都去從事實際政治，我們要有所不爲，要能甘寂寞，要耐得窮，要不畏強禦。」必須綜觀左先生一生事蹟，才可知這不是牢騷語，而真正是夫子自道。〔十月廿六日大華晚報星期雜感〕

其次，左先生認爲反攻不是唱高調的事，應先造成可取之勢，然後聽候最高統帥的決定。這是他的良心話。何以言之？記得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左右的某天，我到鑽石山的惠和園三號謁見先生，先生因爲我即將返臺，

請我在蘇尖沙咀不遠的一家西菜館進餐，在汽車中我問他：「你們（指聯合評論的編輯先生們）爲什麼不督促政府早日出兵，反攻大陸？」他老人家不假思索的回答我：「在主客條件未成熟以前，逼政府出兵反攻，那是違反良心的。」我當時深爲他這句話所感動，我想，這就是政治家與政客的基本不同之點吧。十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副刊上文壽先生在「仁者遺言」的短評中也說：「先生一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雖曾一度從政，但始終未嘗忘情於近代史的研討。晚年卜居鑾石山惠和園，流亡中仍擁有三萬冊圖書，其興趣之廣與用力之勤，一般後生小子恐難望其項背。他對現實政治的觀察與判斷，喜歡擺在歷史的參考系統中來研判，有整體觀察的心理習慣，故判斷精確，頗有卓識卓見。例如他說過去每逢大陸上有什麼變動，有些人就責備政府又失去了一次反攻的機會，我個人從來沒有作過這種責備。因爲反攻復國是需要許多條件配合的，這是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豈能放言高論。就應該算是孺然仁者之言。不較於一試是智無，敢於一試是勇氣。智無加勇氣必然在最有利的時機發而爲最有利的行動，仁者的遺言使人深深懷念。」

關於團結——全國反共大團結，這是左先生二十年來不斷向朝野呼籲的一件事。他在十八年前「團結之道」這篇文章裡，曾經提出「以辦法求團結」的「仁說」，他認爲集合一大羣觀點出發不同，是非尺度不同，利害關係不同，認識深淺不同的人，單靠幾句不着邊際的空話，如何能團結得起來？因此他主張：「一個國家到了緊急危難之際，結合全國可能結合的聰明才智，以共同產生一套挽救國命的辦法，並由多方面來共同執行，這在許多先進國家固然是家常便飯，即在咱們的中華民國也並不是沒有這種先例。」這話在今天看來依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雖然今天的情勢和抗戰時期已有顯著的不同。

左先生對於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是不可動搖的。他在三年多前所作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一文的末了堅決地說：

我們今後惟有高舉民主的大旗，向共匪開火，千萬不可三心二意，照毛澤東那樣去胡思亂想。必須了解無

樣千迴百折，中國終於要出現貨真價實的民主，然後才有一個和平統一、分治合作的現代國家出現，這是我們不可動搖的一個信念。

左先生遺言中足以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方針，鼓舞我們向前邁進的地方太多了，希望將來有人替他出一本「言類編」，那就嘉惠士林不少了。

悼念舜師

周寶三

舜師，是我追隨相從四十年一向對他的尊稱。他不僅是青年黨的忠誠愛國領袖，而且是一個具有慧眼的政治家和史學家。不幸於今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撒手人寰了。哀哉！

雖然，我是民國十七年加入青年黨，但是，認識舜師却是民國二十一年暑期在上海，當我初次識見舜師於其寓所時，他那種親切熱忱的談吐，平易近人的態度，使人感動忠心嚮往，此一深刻印象，至今思之，猶歷歷湧現眼前。民國二十四年春季，我再到上海為黨工作，並一度逐日在其寓所整理圖書，從而向他請益的機會比較多。可是，是年冬季，奉會故主席蔡韓先生電召赴北平，與程光復兄共同辦理文書。其時同住而擔任其他工作的，尚有林可璠、王風僧、李受之（在大陸被匪迫害）三兄。次年暑期，舜師偕崔萬秋兄到北平轉日本考察，在北平小住一週，與其晤談兩次。接着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八一三」滬戰相繼爆發，我於九月上旬由北平避難天津，循海航轉濟南到南京，又在南京晤面於青雲里一號，記得當時他以很沉重的心情對我說：「這可能是一場長期抗日戰爭，如果打下去，南京必不可保，速回湘轉告同志，要作長期準備。」之後，舜師由南京撤退到武漢，旋於二十七年春天到長沙籌辦「國光旬刊」，並在長沙九嶺里租一房子，一面作「旬刊」社址，一面作為避難同志的宿舍，其時我亦奉命由家鄉到長沙，那時居九嶺里的同志很多，只記得有左幹仲（已故）、黃欣周、張希為諸兄，專為旬刊負責寫稿，

另有已故的李不昧先生(他住北門)、王慈君、夏乃炎、陳一潛(三人均在大陸被匪迫害)和我負責辦理湖南黨務。不久，武漢吃緊，舜師撤退到重慶，我亦於三十二年由衡陽避難到渝。回憶自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與舜師晤面起，一直直到三十二年止，在這十二年中，我的工作關係雖與舜師見面的時間不多，但書信往來從未間斷，却是獲益不少。

自民國三十二年春夏之交，日軍佔領長沙，衡陽危急，同年夏天我隨亞西銀行撤退到廣西柳州，經貴陽轉重慶，與舜師同寓於重慶信義街二十九號，從此開始，公餘後要兼為舜師辦理文書。三十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青年黨第十屆全代會閉幕後，舜師任中央黨部宣傳部部長，王師曾兄任副部長，我任秘書。三十五年一月又隨舜師復員返滬，籌辦「中華時報」，他任該報社長，我任主任秘書。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政府發表舜師為農林部長(實際到部視事為五月十六日)，我辭去中宣部及中華時報職務，隨其到農林部任部長室稽要秘書，並同寓南京梅園新邸，一直到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孫科內閣總辭，政府將農林部改為農林署併入經濟部為止，時間則為兩年，但從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到部視事起，至三十八年一月在混亂時離開南京時止，則為一年八個月。那時因徐蚌會戰失敗後，南京人心惶惶，社會秩序漸趨不安，政府各部會均向東南地區疏散，農林部大部份員工及重要物資檔案等，亦分別疏散到廣西柳州及廣州等地，僅少數必要人員仍留部內辦公。可是戰事一天天緊迫，南京漸趨混亂狀態，京滬線火車時開時停，人潮擁擠，無法搭車，不得已，遂於一月底，部內留守人員改乘農部卡車沿公路撤退到上海。舜師和我則乘小輛車滬夜沿公路於次日午後八時抵滬，立即在上海漁業銀團開室繼續辦公。到上海後，舜師又預定在三月中旬赴臺，由於當時農林部有一筆大宗的款項約三億餘萬元，尚未分配給各附屬機構，故遲遲其行。這筆款項是舜師向政府爭取撥交農林部的，是一筆特別的事業費，因有人向其建議，此筆款項不必分配給各附屬機構，宜乎留作另外用途，他堅決的表示：「絕對不可以」。次日，要戎告會計處長迅即通知各附屬機構具領，等到各附屬機構一一分別具領後，他始放心於四月下旬乘其公子左宗惠兄所駕駛的軍用飛機飛臺，由此可見舜師從政是如何的清廉，這是值得一提的。在舜師飛臺的前一天，囑我將壓部印信及各種文件携赴廣州辦理移交，並再三叮囑必須移交清

楚。我於四月底偕內子赴廣州，寓廣州德政北路農部辦事處，會同該處同事辦了三個月的移交工作，分別將印信及檔案等造具清冊移交農林署。我們在廣州辦理移交時，儘管他已辭職，但是，他還在七月初旬由臺到廣州小住一週，要看看辦理移交的情形，這是何等的認真負責呢！

在舜師未到農林部視事前，他即決定以「用人惟才」為原則，尤其對於技術人員，決不輕易更動。因此，視事後所有農林部各附屬機構的主管，從未經易更動；即青年黨籍的技術人員，充其量任一副主管，而且為數極少。在部內除秘書處、總務司外，其他如農業、林業、畜牧、漁業、墾殖、農業經濟等司的主管一概留用，確實做到不分黨派，純以「用人惟才」為原則，這是一般從政的人，尤其是有黨見的人所不能辦到的。在他一年八個月的短短時間，却為農林部做了不少的事情，例如完成全國性的「糧食增產計劃」，且已部份付諸實施；若干農產品如桐油、茶葉、蠶絲、豬鬃等，均訂有獨立發展與整理的計劃；若干必需品如棉花、菸草、羊毛、水產、牲畜等，亦均分別推進，其中棉花的增產與改進，更有顯著成績；尤其在南京所建的「首部農具製造廠」，已有部份出品；同時，除了建築農業經濟研究所的所址和棉產改進處的「棉業館」，還在農林部本身建有一座三層辦公大樓，並建有四十八床（每棟一家）職員宿舍。本來農林部是一個很窮的部，而舜師居然在這短短的二十個月中，能有那些成績，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此可見他是何等的認真苦幹了。

在廣州辦完移交後，我於八月到香港，舜師則於九月始來港籌辦「自由陣線」週刊，首先在港九樹起反共旗幟，向港九五十多萬（當時香港政府公佈的數字）居民灌輸反共意識，後來又聯合港九反共人士創辦「自由人」及「聯合評論」，抨擊匪共不遺餘力。其時舜師與我在九龍鑽石山比鄰而居，為着兼辦他的文書，日必晤面。四十三年二月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臺揭幕，舜師偕宋益清兄先行，我因回港簽證關係，遲至三月初始到臺出席。會後返港，我決定八月携眷遷臺，記得離港前夕去其寓所辭行時，他說：「你去臺灣也很好，遲早總是要去的，將來我最後還是要到臺灣。」想不到十餘年前的幾句話，今日竟變成讖語，他終於長眠陽明山安息了。思之不禁泫然！

回憶從民國三十二年到民國四十三年，在這一段時期，可說是我追隨舜師與之共事最長的一個時期。他一向好學讀書，勤於寫作，無論是從政或教書，甚至在顛沛流離之中，只要有暇，總是手不釋卷。最近幾年來，經常來信託我和沈雲龍兄代他購書或箋治著作出版。一個上了年紀而將近八十歲的人，尚且擬定讀書五年計劃，預定每年出書一種，這種治學勤謹的精神，實為常人所不及。自五十五年，每逢夏秋之時，輒作晝日之行。至於訪日之勤，從歷次給我的來信可以看出，特摘錄如次：

「我這次赴臺一行，動機很簡單：(一)十年不見的親友，願意再見見面，以我自己的身體而論，表面看似乎還可支持三五年，但實際很難說，也許這一次便算是和你們作最後的告別了。(二)兩年來寫的文章，比過去稍多，且發表者都係定期刊物，必須按期照交，走開一下，則可能有一個月的休息。(三)看看國內的進步情形，對國際變化，我依然注意，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有機會，我還想作第六次日本之遊，以未來整個亞洲的局勢決於日本，大家還不大留意，我必須繼續摸索，弄清楚一點，能有三五月勾留自然很好，否則十天半月亦佳。」(五十五年八月二日香港)

「我到此已兩天，談話雖仍不少，但已比較輕鬆，目前談話主題，在對日本求得進一步的了解，及其今後在國內國際的動向。在十天內能有多方接觸，或可有較深入的認識，但一踏決不敢鬆下……甚至不敢作大膽的假設。目前只有兩句話可以奉告，即：吾人今後的責任，不僅在如何求得「中華民國」的保全，且須深刻注意「中華民族的死活」。情況嚴重以至如此，「我的朋友雲龍」當更能心領神會，以加強我們的努力。一切鷄蟲得失的問題，自然不在話下。我此次到臺，承兄等多方照顧，朝夕不離，衷心感激。更難得者，自介公總統及岳軍先生以次，及國民黨中央諸兄對弟無不推誠相予，愛護有加，私心決不能忘，然亦不願作形式的表示，惟有以有盡之年，對國家民族勉盡個人之責，但「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五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東京)

「日本這個民族，可恨，可怕，又可愛，許多人都不大甘心，我則非常着急，現在日本的武力，實際已超過戰前三倍，不出三五年，他們必然應有核子武器，武力與經濟力雙管齊下，我們能應付嗎？大陸匪區能應付嗎？現在他們的負責官員，隨時在放言高論，態度是何等可怕，有一天，美國還非借重日本不可哩！」（五十七年四月十一日香港）

「這次到臺以檢查身體為主，如檢查結果，確實還可支持，則十月初赴日，錢稍寬則住兩月，否則一月亦可，我的日文下月十五日暫告一段落（補習日文），此次能住在一日人家中則更佳，我是一個對日本抱有深憂切慮的人，雖及我之身，難有切實貢獻，總希望把我所能見到的告訴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不能安為應付，則在亞洲終為中國患者仍為日本。」（五十七年八月七日香港）

舞師自去年以來，身體常感不適，易於疲勞，尤其體重銳減，由一百二十四磅減到一百零四磅。九月來臺入榮民總醫院作全身檢查，並於總統約見後（囑望舞師促成青年黨團結），於十月一日赴東京，停留一月再回臺返港，回港後來信說：「我近來時有小病，經醫生打針服藥，時好時壞。」今年一月又來信說：「我沒有什麼顯著的病，但不能多用腦，容易疲勞，稿子也寫不動。所以，近來感到身體一天天不行，隨時都有點小病。」從舞師每次來臺時，看他的身體，總是一次不如一次，我內心深為隱憂。果然，到今年五月病忽加劇，小便出血，進入九龍法國醫院，經檢查結果，左腎已壞，肝亦有病，住院十二天回家休養。二十七日來信說：「我的病還只好了八成，出院在家休養，走路無力，恐真非下月底不能赴臺。這次的病，使我深深體驗到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是隨時可以死的。」到七月十六日來臺，力疾出席青年黨全國代表大會，會後八月九日返港，因積勞病又復發，再度進入九龍法國醫院。接着九月十四日來臺進入榮民總醫院，在他住院時，我逐日總要抽暇去探視，在某天晚上，他對我說：「我沒有什麼財產，所謂財產就是香港所存的一大堆書籍，大約可值四五萬元港幣，希望有一機構能整批收購，所得的書款可平分給兩位老太太作生活費。」當時他面有淚痕，我儘量抑制，想話安慰他。次日峰告陳啓天先生，由他設法

向當局進行商議後，現已圓滿解決，並照所屬辦理了。因為這是舜師對家庭方面的一項遺囑，所以特別在此一提。

據醫生說，舜師的病醫治太遲，變成絕症。以年邁力衰，不能動手術，終於醫藥罔效，溘然長逝！在舜師臨終時，我和左宗憲兄均隨侍在側。這一噩耗，不獨是青年黨的損失，也是我國家民族的損失，朝野人士，同深哀悼！親族故舊，尤為愴痛！

悼 念 舜 生

左黃竹生

九月十四日的下午，舜生離開鑽石山惠和閣的寓所，他已不能自己移動一步，是由何家驊先生、樓木丹先生、女媯煥華及兒子宗楷幾個人用藤椅抬上停在惠和閣中的小汽車內，開往啓德飛機場，由汽車下來，即扶上等在那裡的輪椅上，由輪椅推上飛機的升降梯內，當升降梯的門關上之後，我和女兒宗煥都不禁悲從中來，熱淚交流，已預感到這是最後的訣別了！許孝炎先生在旁安慰我們說：「不要難過，左先生是去醫病，在必要時，你們也可以去臺北。」但我知道我們不可能離開香港，因宗楷在津貼中學教書，不易請到代課的人，更不可辭去職務；她一人在港，無人作伴，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們母女都無法離港赴臺；宗楷在離富國師範學校求學，也不能多請假，以致不能陪侍父親去臺北；宗楷又遠在美國，更不可能回來。幸得宗華陪伴，否則，以垂暮之年，重病臨危，雖子女都已成立，於緊急時，却無人侍奉。這真是物質的威力，壓制人類的精神！我與宗煥都因此種心情，加倍難過。

舜生此次生病，開始於四月末，先是發高熱，接着是小便出血，經中西名醫診治，並於五月住法國醫院兩週，病雖稍愈，便血亦止，但身體已衰弱不堪，走路無力，需人扶助；七月青年黨在臺開會，他一定要力疾前去參加，我曾幾次懇切勸阻，因他重病之後，羸弱之軀，加以高齡，實不能再任繁勞的開會工作，然而他責任心重，一定要去臺北，我知他此去實在是太危險的事情，如此炎夏，開會、談話、聽酬，豈是高齡而帶病的身體所能負擔？但他

固執要去，無法阻止，只好請醫生多開了一月服用的藥方，買好藥丸，分別寫好服食的次數，要他依說明按日服食；臨行並再三叮囑，於開會完畢後，即進榮民醫院治療休養，最低限度需休養三兩星期，然後回港。青年黨大會完畢後，我又去一信到臺北，敦促他去榮民醫院休養。誰知他會後只去日月潭一遊，即回臺北，並不去榮民醫院；他寄來一明信片說：「我在日月潭的涵碧樓住了一晚，總不舒服，隨時都想回港，在臺北還可以吃一點東西，到這裡連東西也不想吃，真是苦惱之至！」從這幾句話裡，可知病已潛伏在身體內；這張明信片是八月五日寫的，這是他最後給我的一紙短簡了。他匆匆由臺回港，抵家後，我清理他的行李，發現帶去的藥丸，一粒也沒有吃過，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吃藥？」他嘆一口氣說：「你不知道我在臺北是多麼繁忙，那裡還記得吃藥！」我也不禁接著長嘆一聲。我當時的心情，真不知道是生氣還是着急！這已是凶多吉少的先兆！果然不到兩星期，病又復發，而且較第一次更嚴重，於深夜又住入法國醫院；一星期後，便血雖止，然身體已虛弱不堪，因住院費用昂貴，他常以此為念，每天要急於出院回家，我想此病非長期醫療不可，因此請李幼椿先生、劉子驥先生等軟勸他去臺北榮民醫院休養，他仍固執已見，不肯去臺北，住法國醫院兩星期回家，病既無起色，身體也日益衰弱無力；又經許孝炎先生力勸，才答應於九月十四日乘飛機去臺北。

初抵臺北的一星期，從宗華和孫君給我的信中，知道他病勢似有轉機，我與兒女都很高興；誰知道是曙光返照，以後病勢日趨沉重，最後陷於昏迷狀態有十天之久，在他這昏迷的十天中，我與兒女每天如熱鍋上的螞蟻，等候臺北來的信息；我們不可能去臺北，惟有每天祈禱，希望能從絕望中有一線希望；到十月十六日的下午，看到某晚報上的消息謂：「左舜生先生於今日上午八時二十分病逝臺北」，我們還有點懷疑，因為別的報紙沒有記載，可能是誤傳，仍存着最後的希望，一直到晚上十二時，收到臺北來的長途電話，才確實知道他是水逝了！我們的希望是幻滅了！！人生如夢，世事轉眼成空，數十年聚首，終有一天永別！回首往事，如在目前。

回憶三十八年前，我在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讀三年級的時候，一天下午，一位女同學對我說：「這學期來

了一位教近代史的教授，姓左，是你們湖南人，講近代史真有趣，課室坐滿了人，窗子外面都站滿了，不知有多少人去旁聽；我已去聽了兩次，今天你同我一起去，好不好？」我說：「我不是歷史系的學生，懶得去，一連三個鐘頭（舜生在復旦大學投中國近百年史，時間在下午，一連三堂，接續着講，中間也不休息），聽得要聽誰，不如坐在宿舍內看看小說，有聽得多。」那位女同學又說：「你一定要去，你聽過一次，一定會要不停的去聽的。」我被她再三敦促，只好同她一起去。果然，她的話不錯，我去旁聽了一次之後，以後就不斷的去旁聽；而且每次要早去搶坐位，否則，課室坐滿了，無位可坐。舜生講書的長處，不是在教材準備的充分，而是講起來刻畫入微，講述一段事實或一個人物，虎虎有生氣，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又能於言辭中充滿自己的情感；聽他一次講演，如讀了一篇文學名著，深受感動。復旦大學有不少名教授，著作等身，但講授課程，不能與他們的熱誠相配稱，學生聽來，不易受感動，只是如自己看書一般。我到四年級選課時，就選了舜生所教的兩種課程，一是中國近百年史，一是中華民國史。他講得有趣，學生也從未缺課，兩種課程的考試，我的成績都是A，他因此認得了我這個學生，我也對他相當佩服，我們從此由師生成爲朋友。

我從大學畢業後，就在安徽和湖南等地教書，我們隨時通信有六年之久；他在信內告訴我看了什麼好書，要我也看，我看過了，就寫信告訴他我對該書的觀感和批評；他如做了一首詩，必寫給我，我偶然學做了一兩首詩，也寄給他看，請他修改，他却推辭說：「我只是喜歡欣賞詩詞，自己却不會做。」他到一地旅行，必詳述該地的風景人情，好像寄我一篇遊記；我也常將教書的情況和做校長教務主任的困難向他申述。我們由六年的朋友而成爲夫婦。

三十一年前我們在重慶結婚，婚後，因爲住在青年黨的辦公處和「國論」編輯所，我不須負起做主婦的責任，也就不需做家庭瑣事，我們每天對坐讀書，兩人各圈點四史，並約定每人每天讀熟兩首名人所作詩歌，也許因爲我的年齡比他小，記憶力因此較好，我很快就能背誦，總比他快，他說：「記憶力好，不一定就是了解力強。」但

談起四史來，許多地方我却須向他請教，有些我雖能了解，然要深刻的明瞭，非他指導不可；他常說：「你不夢一知半解，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他也曾向我取笑說：「梁任公有詩云：『孤袖添香對譯書』，我們雖不是譯書，而是讀書，多少也有點類似吧？」我曾寫信給我的父親說：「我是一個最不會做家事的人，也是最不愛做家事的人，現在很幸運，我雖結了婚，仍是做學生。」這樣說了一年書，我們團點完了四史，也讀熟了百首左右的詩。一年後，我們第一個女兒出世，（她已三歲時在重慶患白喉夭折）從此以後，接連着添了三個孩子，我就停止了和他併坐讀書，只是終日做孩子們的母親，再不是學生了！男女之不能真正平等，世界上有名的女學者遠比男子爲少，豈是偶然！

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於共匪，我們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臺灣，由臺灣來香港，環境變遷，家中沒有工人，我只好負起煮飯洗衣的工作，一天天遠離了學問的領域了！舜生常對孩子們說：「媽媽把讀了的書都退還老師了。」話雖如此說，但是有時當我正在廚房裡煮飯炒菜的時候，他往往突然喊我到書房裡去，原來是他在寫了一段得意的文章或做了一首詩，要我看，如果是做了詩或詞，必反復讀幾遍給我聽，並問：「好聽嗎？」有時看久了，常常把飯菜燒焦，我說：「飯和菜燒焦了。」他回答：「不要緊，看完了走。」最近幾年來他寫的文稿，差不多十分之八九都經過我抄寫一遍，他一則怕他寫的字太潦草，排字的人看不清；二則他說我每天只忙着做家事，連他所寫的文章都懶得看，所以要我抄，就可以把文章細讀一遍了。

去年來，他常向我說：「現在孩子們都成立了，你也可以抽空一些時間，再好好讀幾年書吧。」我說：「等明年宗權讀完師範，三個孩子都做學，經濟寬裕一點，我們雇一個工人，我就專心讀幾年書，再做你的學生。」他聽得很高興。誰知天不假年，等不到宗權師範畢業，他竟別我而與世長辭了！此後我雖能有較寬裕的環境，想再重新讀書，可是親書思人，家中已無良好的導師了！！回首往事，恍如夢境！

我們結婚三十餘年，很少談論家事，如講到家庭瑣事，我多講了幾句，他必定說：「不要囉嗦吧，我要看書了。」

。」我只好作罷；如談到書本，他必不厭其煩，講得津津有味，不願停止；我若是急著要去做家中瑣事，他必阻止，要我聽完了才走。此次重病赴臺，也從未和我提到家事，我當然也不願說起，以免他難過。

我們相處三十餘年，我從未向他需索過任何衣物，有時我偶然說起我的衣服穿壞了，要添製一件，他就看看我，然後對我說：「你身上的衣服，不是很好嗎？」我聽了，也就不再多說一句，因為多說了也無用。但我要買書，他必馬上辦到，例如：我看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覺得真是名作，如此簡短的故事，寫得如此動人，令人看得不願中途停止，一氣看完後，感覺餘味無窮；我要看英文原著，他馬上出近代我買了一本回來。又如去年中國時報連載了音樂家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所寫的「黎明之前」，我看得有趣味，因她寫中國內地的情形，和我的家鄉很相似，讀來倍感親切，而且寫共匪的暴戾，因為是她親身的經歷，情況活躍紙上；後來我看中國時報社印了單行本，我要寫生寫信去臺北為我買一本，他立刻握筆寫信。又如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兩部作品，一部是俄國巴斯特納克的「齊伐哥醫生」，一部是日本川端康成的「雪鄉」，爲了我要看，他也很快就代我買了回來。我看完了這些書，他一定要我說出書的大意，並加以批評，好像考問學生一樣。我也給他這樣考問過了，有時不等他問，我自己就先向他滔滔不絕的說一大篇，他也很美意聽下去。如今他水逝了，我再看到一部名著，也無人和我談論（因我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是研讀文史的），思念及此，不禁涕淚之縱橫！

舜生，永別了，我不僅是失去丈夫，更是喪失了一位良師益友！

憶慈父

左宗華

爸爸，親愛的爸爸，您離開我們已整整的兩個月了。您至愛的女兒在輕輕的呼喚您，默默的想念您！您知道嗎？您從五月一日生病，我到鑽石山去接您，住在我家中治療，我日夜陪伴您，扶持您，總希望您能早日痊癒，雖知

病情惡化，入法國醫院治療。我與宗禧弟不辭辛勞分日夜陪伴於您。華則仁毛文奇二位名醫悉心診治，但因您年事過高體力太弱不能施手術，而致病情日益嚴重。九月十四日我陪您飛臺北入榮民醫院，我與惠哥分日夜在病榻前陪您。病情時好時壞。當主任醫生向我解說您的病情時對我說「對不起」的時候，我內心是如何的慘痛啊！明知您已無生還還要裝着笑臉來哄您，諷笑着給您聽，和光華、大磊一同陪您玩拍糖的遊戲，回想起來這一幕如在昨日。

颱風來襲，交通受阻，親友們不能來看您，我們感到分外的寂寞，父女二人淒然相對，窗外風雨交作，病室之內，深憂的我伴着重病的您，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肝腸寸斷！

您再三要我不要離開您，要我帶您回香港，我都答應您，可是，我沒有做到，在您昏迷後的第四天，我因家事匆忙回港。一別竟成永訣！再來臺北時，只能見到您的遺容，睡在棺木裡，是那樣的慈祥與安靜，親友們瞻仰遺容時，樂隊奏出淒涼無比的音調，動人心弦，我忍不住酸淚長流。蓋棺了，覆上國旗，從此桐棺三寸，人天永隔，天何不仁奪我慈父，使我兄弟姊妹永成無父之人。

您生前最愛吃粉蒸肉和炒鱸魚多是雞腳湯，每次想吃的時候，總先打電話給我，第二天和弟妹們一同來，歡歡喜喜大吃一頓，何等快樂！您去世後，我們沒有吃過一次粉蒸肉和炒鱸魚。您又愛吃海鮮，白灼蝦，豆豉辣椒炒蜆，常帶我和小多去鯉魚門，青山，香港仔，海運大廈都有我們的遊踪足跡，三代老小，玩得開心心，今後不知何時我才有興趣重遊鯉魚門！我常回鹽石山去，家中一切和您生時一樣，沒有變動，只是我坐在您書房裡，感到異樣的冷清清，少了一個您，就如同失去了溫暖的陽光，缺少溫暖。您愛的鐵樹，還是開得很茂盛，您心愛的寶貝狗，還是那樣顽皮和懂事，看見我去，親熱異常，牠常常望着您坐的椅子和睡牀發呆，雖是畜生，牠也有知，明白老主人是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昨天做夢，看見您，似乎我們在什麼地方吃東西，我先到，您後來，和生前一樣，您穿了長衫，圍了圍巾，戴了帽子，醒來却是一片空虛。爸爸，您長眠在陽明山下，感覺寂寞冷清嗎？願您在天之靈安息吧！我們永遠懷念

一

獻給公公

外孫女張逸白

親愛的公公，您還記得這是誰的聲音嗎？您心愛的外孫女正在這裡等着您回答呢！您怎麼好像沒聽見您的人呼喚呢？

公公，您是去世了，這是我沒有勇氣接受而又必須接受的事實。您怎麼這麼快就離開我呢。難道您忘了您要帶我跟孫孫姐去參觀日本的世界博覽會嗎？難道您忘了您說過假使我出國讀書，您要送我去，我們一起坐船，先到各地遊覽再送我上學。可是您畢竟是忘記您說的話而離開您愛的人了。這是多麼殘酷的事！

記得您對我說過：「你不知道公公多愛你，你總不說你是最愛公公。」可是你怎會知道我的心！我是愛你的，可是我不會說出來，因為我覺得愛一個人不一定要人知道，所以我把我的心事埋在心底，沒向您說出來。公公，假使您對於沒聽見我說：「公公，您是最愛的人」而遺憾，那麼我是一個罪人，不能安慰您的晚年。公公，您會原諒我嗎？在學問上，因為我年紀小讀書太少，根本不能跟您攀談，不能做您一個好學生，使您高興。但是，爲了要您高興，我常陪您去吃東西，看電影，參加鷄尾酒會，看漂亮的明星，我高興因此您也更加高興了，因為我知道您一定會爲您所愛的人快樂而更加快樂。在您喜歡到的地方，都留下我們祖孫的足跡，留下我和您的歡樂，可是現在，我們不能再在一起舊地重遊，不能再一起享受這歡樂，所留下的只是一片清晰的回憶！沉痛的回憶！

在飛機場送您的時候，我哭了，您知道嗎？您是不會知道的，我沒有在您面前流淚，我強忍着。因為我不想增加您的痛苦，當您進了電梯，我也忍不住滿眶的眼淚。您走了之後，我總是騙我自己，說您一定會回來的，可是最後我自欺的想法打破了！公公，您健康時曾說過，您希望臨死時能抓住您兩個寶貝的手，可是我們

連這一件事也不能做到，我恨我怎麼不能身在臺北送您的終，怎麼不能在您靈前盡孫女的孝思。不孝的孫女連您的新墳也不能去上，公公，您在天之靈會怪我嗎？

慈愛的爸爸，永別了！

左宗楮

「世無不取之筵席」，我們慈愛的父親於十月十六日在這人生舞台的筵席上與我們永別了；爸爸對我們兒女的教導與關懷絕非我這笨拙的筆所能形容於萬一。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知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以上二首唐詩與二段古文，就是當我和弟弟宗楮還在讀小學的時候，爸爸所教過的許多唐詩和古文之一；爸爸不單自己喜歡誦讀詩詞古文，更喜歡講解給我們小孩子聽，並要我們背熟，雖然我們當時似懂非懂，但我們都非常樂意的聽，尤其喜歡聽爸爸吟詩傳唱歌般的聲調。當我們開始進初中的時候，爸爸更鼓勵我們看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志演義、東周列國志、封神榜演義等古典小說；爸爸常說：「看這些小說和誦唐詩古文，不但能引起我們愛慕中國豐富文化的興趣，也能幫助作文的進步。」雖然現在我們的作文還是「高山滾鼓」（這是爸爸常用來罵我們的一句俗語），但我們那愛慕中國五千年豐富文化的心志却永遠也不會動搖的。

中學畢業之後，弟弟赴美留學，我仍在香港讀大學，雖然我們學的都是理科，但我們從小就喜歡聽爸爸講自己的經歷、歷史故事、外國遊歷觀感和世界國家大事；我記得平常一有客人或爸爸的學生來拜訪的時候，我就被爸爸

那種慷慨激昂的聲調所吸引，靜悄悄的站在客廳門外偷聽老老與客人談世界的局勢、國家的前途、或近代歷史上的大事，聽得我津津有味，往往使我忘記了站立的辛苦；因為這種耳濡目染的影響，從小就養成我愛國的思想，我們雖然現在流亡海外，但我絕不會忘記我們苦難的中國和在苦難中的同胞；也同時增加了我不少課外的常識。

爸爸不但在知識上教導我們，他更是關心我們的生活和做人處事的態度，就以爸爸到臺灣去醫病之前，兩次進法國醫院時的幾件小事情上可以看出。第一次是五月初，第二次是八月中旬，這兩次住醫院，白天由宗華姐姐陪伴，晚上則由我作伴，因爸爸患的是腎病，半夜時要起來進廁所四、五次之多，因此我也就跟着起來扶他進廁所，但爸爸起來時從不顯減我一聲，因此有兩、三次我因白天太疲憊的緣故（我自天在一間私立的英文中學教書，除了每週上三十節課之外，並負責教務主任的工作），就不夠警醒，爸爸起來，差不多走了一半我才發覺；而且每天晚上總是叫我早點睡；由爸爸晚上起來不顯喊我和叫我早睡，雖然他沒有說出理由，我也知道爸爸是怕我晚上睡得不够，白天沒有精神工作；所以雖在重病之中尚且這樣關心，而我們做兒女的平時關心到父親多少呢？到了第二次爸爸進醫院時我已考取了官立的羅富國師範學院，爸爸曾多次問我：「你考取了師範，原來學校的工作，一定要交代清楚，千萬不可隨便，一走了事。」爸爸雖在重病時，仍然記得教導我做人的態度，不可馬虎苟且，更叫我們做兒女的感覺慚愧。後來爸爸又多次問我：「你什麼時候開始實習？」（大專畢業進師範只需讀一年，共實習二次，上下學期各一次）想不到轉眼之間，我現在第一次實習已快完了，而爸爸已看不到我實習了！現在回想起來，爸爸當時是否已預感到等不及看到我實習呢？

後來爸爸到臺灣去醫病時，我總想陪伴前去，但因讀書的緣故，不敢多請假，以致不能如願，身不由己，奈何！爸爸去世之後，我雖然請了幾天假，到臺灣去送葬，但却永不能見到爸爸去世之前的最後一面，人生什麼事比這更悲痛呢？爸爸，您雖然已離我們而去，但您的聲音和教導我們的話却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但願我明年畢業之後，軍教教鞭時，好好的教育下一代，為多難的中國多造就幾個有用的青年人，以報爸爸對我二十餘年養育教導之恩。

追憶慈父

左宗權

現在是明州初冬，外面正在下大雪，雪花紛飛，白茫茫的一片，七年前的一段往事，又很清晰地浮現在腦海裡。

那年我正在愛阿華州一間大學念二年級，爸爸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來美講學半年；爸爸一到舊金山，就馬上寫了封信給我，告訴我因為時間關係，他不能在愛州停下來看我，希望我在聖誕假時，能去紐約與他相聚。離開冬假還有一個多月，爸爸就從紐約寄了一張支票來，叫我預訂車票。

聖誕假來到，我就乘灰狗公共汽車起程赴紐約，原來預定在下午三時左右可到達紐約，但是沿途大風雪，公共汽車屢次拋錨，又開不夾，我心裡好着急，因為我知道爸爸也一定在急；好不容易到了紐約，已是第二天凌晨一時，比預定時間遲了十小時。我馬上叫了一部計程車，直到爸爸住的旅館，一進旅館，真想不到看見爸爸還坐在旅館的大廳裡等我；爸爸告訴我他已在那裡坐了好幾小時，一看見我就說：「宗權，一年多不見，你又長高了那麼多；你一定很餓，我已煮好一鍋鷄湯等你來吃。」爸爸那時看來雖已很疲倦，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還用手把我頭髮與身上的雪掃掉，幫我拿了一件小提包，就乘電梯上到爸爸房間，爸爸熱了飯和鷄湯，又開了一些中國罐頭給我吃飯，他坐在旁邊看我吃得狼吞虎嚥的，一直在微笑。那晚我們父子兩人同林而眠；是我雖已十九歲，但爸爸還是把我當小孩看待，一直替我拉棉被，叫我不要受冷。

有一天，我們正要出旅館去參觀一間博物館，爸爸看見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很單薄的大衣，就說先要替我買一件厚大衣；那一天外面才下完大雪，寒風刺臉，爸爸陪着我走在曼哈頓定了好幾條街，看了好多家商店，雖然路很滑，風又大，但是爸爸非常耐心地替我選擇，最後選了一件黑色長厚大衣；現在這件大衣我已穿了七個冬天，雖然已相當

陳舊，但是穿起來還是相當溫暖；衣服尚在，想不到爸爸已離開人世了！更想不到七年前在紐約一聚，竟是永別！今年暑假離開學校開始工作前，本來打算先回家一趟，但因經濟關係，只好決定先工作一年，明年回去，假如能預先知道爸爸等不到明年，無論怎樣困難，我們也要想辦法先回家一趟。論語上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我們現在是遊得連歸期都渺茫了！爸爸有生之日不能承歡膝下，臨終之時不能隨侍在側，不孝真是到了極點！養育之恩欲報無日，只有多多孝順媽媽，又安慰爸爸在天之靈了。

我一向不很愛寫信，自結婚後，寫家信的責任就移交給雅慈，爲了這事，爸爸曾責備過我，有一次在信中說：「家禮未免太簡，有了一個秘書，便從此不寫信，總不成話吧！」我因爲功課相當忙，也當然還有點懶的成份，並未因爸爸的責備就此提筆。今年爸爸壽辰時，雅慈準備好了拜壽卡，我也寫了封信，並附了幾張照片，但那時却已經太晚，爸爸已昏迷不醒，再也不能看信了！爸爸如能再醒過來，那怕是一百封、一千封信，我都願意寫，但是，爸爸，再多的信也喚不醒您起來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於美國明州。

哭我未謀面的公公

左劉雅慈

自五月婆婆來信說：公公腎臟出血，我們就開始擔心。但又自我安慰，公公年歲雖高，但多次却能逢凶化吉。聽說七年前來美講學時，曾病到香港各報誤傳他老人家病逝美國的地步，誰能說這次不會呢？七月爲青年黨團結開大會事，大約又好忙了一陣。本來打算開完會後，住進榮民醫院休養的，不知爲什麼沒去就回香港了。婆婆來信說，老人家連從家裡帶去的藥也沒有吃；一回家，好像病情就惡化。我們每次接家信，每次看中央日報，都是心驚膽慄的。總是先大略的看一眼，就怕有惡訊。報上沒消息，才互相安慰說：「沒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是不幸的消息畢竟還是來了！

本來，我們一直計劃在京權畢業開始工作前，先回家一趟的。多年沒回去，也該回去看看了。讓公公婆婆抱抱沒見過面的小孩子，做媳婦的我也好拜見一下久聞大名的公公。更何況我自己的爸爸剛生了一場大病，做長女長婿的我們，也實在該回去探探病。但是隔了半個地球，要去這麼一趟也不是容易事，經濟這道大關就難通過。只好退而求其次盼明年了。誰知這一延期，就今生再也無緣見到公公的慈顏了！我現在才了解以前祭文上寫的那種：「子欲養而親不在，抱憾終生」的心情，但已後悔莫及了！

公公事忙，每次家信總是婆婆執筆，偶而公公附幾句話，但已能看出他老人家治學之勤：七十五老翁，還在學外國語言，還一再去日本旅行，為的是「日本是關係亞洲大局的主要國家，我不能放鬆她。」兩年前來信說：「我今年已進入七十五，如能再活五年，則將滿八十，不過即只活八十，我還是會把這五年做十年過，總還是天天會有進步的。」這種勤奮的精神，真教懶散的我慚愧。

公公年紀這麼大，在我一向想來，總以為也很古板、舊式，沒想到竟新得驚人；以前我在家時，過年過生日，要向爸媽磕頭；還以為左家規矩比我們更多呢！要結婚時，我告訴宗權說：結婚後應向我爸爸磕頭，把他嚇得直說：「我從來沒跟人磕過頭，我們在家都不興這一套的。」過年過節的一些中國舊風俗，宗權也都沒聽說過，沒看見過。公公之新式，也就可想而知。

公公好像特別喜歡女孩子，大姑宗華來信也說：「爸爸對人家說有四個大寶貝，你、我、宗權（小姑）和五姨；兩個小寶貝，小多（宗華大姑的女兒）和大磊（五伯的女兒）。來信和文章上也蒙老人家一再讚美，我却未能定嘗侍奉，辜負了他老人家一片愛護之心。我們寄回家的照片，公公用很講究的相簿貼了起來，來客總是一再展示；來信曾說：「大任的照片，我是每每看兩三次的，」老人家愛孫之心，不特洋溢字裡行間。我從來以未見過我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為憾，還在為大任慶幸四位老人家均健康，當能享到老人慈祥呢！誰知只半年間，公公去世，外公也中風而半身不遂。

得知公公去世後，悲痛之外，第一個感想就是老人家沒白走這一遭人世，他老人家的確是活得有價值了。七十七齡在今天看來仍算是高壽，何況他老人家這一天當做兩天生活過。伯伯姑姑們都學成業就，且仍勤奮不已；宗禮雖因經濟關係，未能一鼓作氣求得博士學位，但已謀得一相當滿意的職位，並有繼續深造的機會；婆婆有我們大家奉養，生活可無慮；公公應能瞑目了。

懷念爸爸

左宗機

世界上最悲痛的事莫過於生離死別，但年輕的我已嘗試到這種滋味。我至愛的父親不幸於十月十六日與世長辭了！回憶父親第一次往法國醫院時，我心裡一點恐懼也沒有，我每日去醫院時，總覺得爸爸的精神非常好，起牀時，也不要人扶持，平日照樣談笑風生，這是父親一慣的作風。可是，在父親由臺回港後，第二次進入法國醫院時，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非但精神甚差，而且說話也提不起精神，整日躺在病牀上，很少起來。我當時想為什麼爸爸會突然變成這樣呢，兩年前還能健步如年輕人，自己常常出外買一些小東西或看電影，而且還說過要帶我去遊東南亞呢！我記得有一天，爸爸住在法國醫院時，對面病房的病人死了，爸爸馬上叫我把門關上，免得死氣過來，想不到，這一句話真的應驗了。爸爸從醫院回家後，起初病情沒有惡化，但過了幾天後，病一日一日的沈重起來，晚上常常不能安睡，起初我睡在裡面房間，但是爸爸那呻吟痛苦的聲音，使我心如刀割，不能入睡，那些時候，媽媽是睡在靠近爸爸睡房的書房中，因這樣，晚上起來照料比較便利，那時候爸爸已經不能自己用力了，媽媽一人的力量有限，扶不住爸爸，我便索性跟媽媽兩人擠着睡在同一張沙發上，往往兩人睡得渾身是汗，每天晚上爸爸起來達五六次之多，早晨，我一早又去上課，所以整天都在模模糊糊中，可是我覺得，只要我能服侍爸爸，略盡兒女的孝道，就算怎樣辛苦我也能忍受。在學校裡，同事常問我：「為什麼近來瘦得這樣呀？」我只好說：「可能是不習慣教

備吧！」實在當時我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肉體痛苦得多了。我一放鬆回來，醬包還沒有放下，首先便走進爸爸的房間，看看爸爸是否睡着，病勢怎樣了。直到七月十四日的下午，爸爸離開寓所去臺北，到機場後，坐輪椅上飛機的一刹那，我不禁嘩然大哭，想到我為什麼不能陪爸爸去臺灣醫病呢？自爸爸去臺後，我每天在學校打電話回家，問媽媽爸爸有沒有信來，晚上，媽媽、哥哥和我都各懷心事似的，默默無言，好像有一件事情將要發生，每日我們都在惶恐的狀態中。起初姐姐寫信回來說爸爸的病沒有惡化時，我們稍為安心，可是命運有意作弄我們似的，不久，爸爸的病情惡化，陷入昏迷，全靠打葡萄糖和氧氣氣生存，當我們知道了這種情形，那種心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也不知哭了多少次，媽媽總對別人說：「仔仔（宗權）哭得很傷心。」在那十天內，我的眼淚也不知流了多少。直到我們接到臺北打來的長途電話報告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我當時的心情，豈是我這支禿筆所能表達於萬一！

回憶爸爸生前常說：「仔仔你是我的三寶之一。」每天都要我到書房去陪他坐一下，談一陣話。有時，唸幾首詩給我聽，或講一些歷史故事，常說：「一個女孩子，一定不要俗氣，要多看一些書。」爸爸也常要我陪去看電影或去餐館小吃，可是我總因為太忙，很少陪伴；現在爸爸永離了這個世界，再想陪伴爸爸出遊，已不可得了！追想往事，使我抱恨無窮！爸爸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嗎？

我在祿富國師副學院畢業後，常對媽媽說：「下學期我教書時，每逢星期日我一定陪爸爸出去玩，使他老人家能在晚年快樂一下。可是，在我才開始教書，爸爸已重病不能起來了！我想和盡兒女孝心的深望，竟不能實現了！爸爸呀！請安息吧！我和哥哥們一定會好好照顧媽媽的。我們一定會為您禱告，使您安心。爸爸，雖然您已離開我們，但您的舉問和不屈不朽的精神永遠長存！

懷念我的叔祖

左光華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在臺北石牌榮民總醫院逝世了一位精忠報國的書生——左舜生先生，我的叔祖。因他的逝世使舉國上下人士都深為惋惜不已。他的一生實為我們現代青年人的模範，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希望因他的精神喚起更多愛國之士盡一生為國效忠，早日恢復我們的錦繡河山，重歸我們的故鄉，那我相信叔祖一定會含笑於九泉之下，因為這是他一生所最希望之事了。

叔祖的一生是非常的清苦，生活簡單，唯一的嗜好是讀書。他一生從來沒有一天不看書，他常說「如果一天不看書就像缺少了什麼似的。」他老人家可以說沒有享過一天福，不是為國家，便是為家庭，晝日勞碌奔波。他常對我們說，他的朋友有酸甜苦辣，我們這些孫女兒們則是他的甜朋友，他最喜歡女孩子，只要一看見我們便開心，有時他常教導我們做人之道，使我們得益不少。如他老人家從國外回來，他必定告訴我們他的遊歷經過，他的感想，常勸我們有機會要出去見識見識，而且每次回來總會帶一些小禮物送我們，像我盒內的小玩意，十之七八是他老人家所送的，如今只要我一看見這些東西，不由我便想起以前的種種，於是有令人不堪回首話當年的感覺。

從我有記憶開始，便記得每逢叔祖生日，過節，過年，爸爸媽媽便帶着二哥和我去觀石山惠和園（香港的九龍）叔祖家去，他老人家總是笑哈哈，談笑風生，幽默十足，天生一幅樂天派神氣，尤其是年夜飯，叔祖最為重視，無論他有多困難，他都要吃這一頓飯，每年都是大人一桌，小孩子一桌。記得有一年他實在是沒有錢買菜，一早便揀着幾本貴重的書出門去賣，回來時手中提滿了許多菜，令我們都深深的感動，但他老人家好像若無其事，袖子一捲便親自下廚燒起菜來了！大家於是便歡歡喜喜的在幫忙，七手八腳的把一頓豐富的年夜飯搞好，吃完飯後，一家人歡樂融融的在客廳內談天，小孩子們在外面玩耍，放炮，捉迷藏，直等到婆婆來叫我們進去喝蓮子紅棗湯時，我們便知道要發壓歲錢了，大家便一窩風的擁到客廳內，只見叔祖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滿臉的笑容，看起來是那麼的和藹慈祥，然後笑着用手指着我們對大人們說：「他們這些小傢伙來的目的不是來向我拜年，而是想來拿紅包的。不過有條件，誰要紅包，便要把屁股送來給我打一下，許的要多打一下。」我知道是針對我而言的，爲了那一封

紅包，我只有乖乖的將小屁股讓得高高的，送給叔叔去打，樂得他老人家哈哈大笑。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是充滿了甜蜜的回憶，只有一件事情，便是叔叔在讀書時或寫文章的時候，我們絕對不能打擾他，否則一定會被罵一頓。如今我們均已長大成人，這些事情也只能變成回憶的一部份，令人無限的感慨，時光為什麼不停留在這一刻呢！

永遠難忘我們一個多月在醫院服侍叔祖的情形，他雖然是病了，但是還是不時想到國家，想到家人，他關心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也不時想出種種的方法來騙他打針吃藥。記得有一天大概是昏迷的前一天吧！他老人家執着我的手對我流淚，淚水由其双目已盲的眼眶內落在枯黃瘦弱的臉頰上，口中不斷的喃喃叫着，要我帶他回家，那形態是多麼的令人心痛與心酸，使我不禁淚下如雨，人生有那一幕是比這一幕更慘呢！有時看見他痛苦的模樣，我們都很不得他老人家快一點解脫，但人就是矛盾的，總覺得有一口氣在還是會有希望的，他自己何嘗不是一樣的想法呢！勇敢而努力的向病魔挑戰，可惜就竟是因為年老體衰而敗下來了。我覺得從叔祖由香港來臺治病直到他安葬在陽明山第一公墓為止，好像是做了一場夢。人生好比一個巨大無比的舞台，每一個人都是在扮演他們各自的角色，有的是默默無聞，有的是轟轟烈烈，但是總有謝幕的一天，有的仍是默默無聞，有的則名垂千古，萬古流芳。像叔祖這樣愛國愛民的精神是永遠會留在後人的心中，永垂不朽。

最後，我願先叔祖之靈在天國永遠安息，並求他老人家永遠保佑他所喜愛的兒孫，繼承他的遺志，為國效勞一番。

懷念祖父

左大磊

您會說：「人與人相處都是一種緣，無論祖孫、父子、兄弟、姊妹、朋友、夫妻……都靠這種緣分去結合。你有我這樣一個祖父，我有你這樣一個孫女，緣是很多的，今後我們只看如何珍重這種緣就是了。」您又說：「我每

天總有時候在想念你，尤其我看書看到晚上兩點鐘的時候，我就想着：我的孩子恐怕還在做算學的習題吧！也許還在寫化學的筆記吧？你也會這樣想到公公嗎？」我回答：「公公，我以為能擁有您的愛而驕傲，而滿足，我願能隨時隨地陪伴在您身邊。」而今，使我傷心的是：我雖然能感到您時時與我在一起，您却不再同我說話，不再親我面頰。您說您以寫信給我為您的愉快，而我也以讀您的信為一種需要；有一次，我希望您的信盼得急了，您就說：「以後你如果好久不曾收到公公的信，這便是公公最想念你的時候，你不僅不要難過，而且應該非常高興。」從今以後，我不會再收到您的信，那些不是喚我「我最喜歡的孩子」、就是稱我「我最愛的孫女」的信；但是我確信公公您還是同樣地在想念我，就如同我在這裡懷念您一樣地深刻。

自從您住進醫院以後，我的心情始終是沉重的，雖然我極力拒絕不幸的來到，却仍抹不去心府的一片隱憂。住院的頭幾天，您在病牀上依然談笑風生，還可以下牀來，抽根煙，與親友們話家常；看到這種情形，大家都為您欣幸，認為病情有好轉的希望，您自己也頗具信心地說：「我大概還有兩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公公，您叫我怎能相信後來您並不是像我所期望的那個樣子呢！

這種令人覺得有希望的情形，只持續了一個星期左右，您的病情就很明顯地一天比一天惡化，雙腿無力，頭也抬不起來了。我陪您去做心電圖檢查，我扶着您照X光，看着您在一張硬板上反覆翻轉，我只有忍住潸潸眼淚，用盡力氣去撐住您毫無力氣的身子，等到走出檢查室，我們祖孫二人一身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您曾對人戲稱：「我的孫女就像我的手杖一樣啊！」如今，這根手杖失去了效用，我恨我即使再有更多的力量也無法使您站起來。原來我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平安愉快地活滿天年，也算是做孫女兒的盡了孝心，但是我親眼看到那麼粗的針頭插進您的肌膚，親耳聽見您呼痛的聲音，我心何忍？却只有暗自歎泣，恨不能代您受這病痛折磨。

在我的油履裡，有您的信，有您的手錶，梳子，我不是常用這把小梳子為您梳理頭髮嗎？然後您總是照着鏡子點頭稱好，梳子仍然在我手中，上面還留有您絲絲白髮。公公，您在那兒？難道您不願再與您所愛的孩子共享親情

您的手錶是只能倒開的，爲什麼手錶可以倒開，時光却不再倒流？倒流至每一段我們祖孫相處的時候。您靠在牀上，我坐在您身旁，我們說詩談詞，您說您的故事，我說我的未來，其樂融融；此情此景，彷彿如昨，而您却再不說一次：「走路過句要當心，一定要記住公公愛你。」我喜歡聽您唱詩唱詞，聲調揚抑快慢，聽在我耳中尤其有趣味。公公！何時您會再唱一次「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是您對我特別強調過好幾次的兩個句子啊！莫非這是您早已預感我們時光不多而發出的感歎？您說您願意負起教導我的責任，您爲我解說詩詞，歷史，補充我的常識，然而我們才開始，您就要我而去！公公，您是認爲我不够聰明，抑或是朽木不可雕？您說：「我不及見我的祖父，您却有一個愛你的祖父教您，你真比我幸福多了。」公公，現在我也同您一樣了，我哭我失去了良師，我哭我失去了親愛的祖父。

有一次，您帶我一同去拜訪梁翼秋先生，梁先生說：「假如一個人的事情沒有做完，是不會要他死去的。」公公，您的五年讀書計劃尙未完成，東南亞之遊亦未成行，您所研究的問題，如今也功虧一簣，我不禁要爲您叫屈，要爲您抱不平！但是仔細思量一番，您平日用功的程度，又何嘗是您體力擔負得了的？您這種作學問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我身爲您所鍾愛的人，却不能如影追隨，實在羞慚不已。公公，我知道您多希望我們左家能出一個會作學問的姑娘。

您答應我明年暑假一開始就帶我去參觀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博覽會，現在，我不想跑那麼遠，我只求您能再與我同去一次故宮博物院，或者再同去欣賞一齣平劇，這不會花您很多錢，也不會傷您太多精神，而我又能獲得一番教導，這一舉三得的事情，您爲什麼不答應我呢？每一次您到臺灣來，我幾乎天天陪您，有的時候，我有事情去遲了，您就打電話來催，您說只要我在您身邊，您就不覺得疲倦。公公，您現在始終這樣輪着不起來，又不理我，是怪我不聽話，還是氣我沒有多陪您？您不是說假如我只有三、四歲的話，您一定會抱着我去遊日月潭，背着我去爬阿里山的嗎？公公，我無論如何想不到今天我只能與您魂喚魄隨遊陽明山峯，陽明山的風雖大，但拂不盡我足跡點點。

只願那風那雨帶給您我豪情一片！

左舜生先生治喪紀要

周劍南

一、老成隕謝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青年黨主席左舜生（仲平）先生在臺北市石牌榮民總醫院逝世，享壽七十七歲。喪報隨即由中央通訊社及各電台播發各地。

先生從政清廉，治學勤謹，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有權威的史學家。去年九月來臺作健康檢查，醫肝有病，今年五月病漸加劇，在港兩度進入法國醫院，九月來臺醫治，惜天緣已終，雖經醫生會診，亦竟回春乏術，終於不起。總統寫念老成，性行貞固，愛國反共，謨猷獻替，功在國家，特明令褒揚。社會各界親族故舊，極懷風範，同深悼痛！

先生遺體於當日上午九時四十分移送臺北市民權東路市立殯儀館，有關各方會商組織治喪委員會。

二、籌議治喪

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左先生生前友好一百餘人，假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第一會議室集議，成立治喪委員會，推谷正綱先生擔任臨時主席，全體默哀後，由王鳳僧先生代表家屬報告左先生患病及醫療經過，陳啓天先生報告左先生生平，旋對治喪事宜進行討論，公推谷正綱先生為主任委員，黃少谷、張寶樹、陶希聖、郭驥、郭澄、賀

莫寒、陶構父、余家菊、陳啓天諸先生爲副主任委員，黃雪邨先生爲總幹事，施裕壽、夏松、周寶三、趙純孝諸先生爲副總幹事。決定：(一)定於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小殮家奠，九時起公祭，十時三十分瞻仰遺容大殮，公推郭瑛、郭澄、孫亞夫、陳啓天四位先生於靈柩覆蓋國旗，十一時發引安葬陽明山第一公墓。(二)由治喪委員會專案呈請總統明令褒揚。

治喪委員會分文書、總務、接待、佈置、典禮、交通等六組，由總幹事及副總幹事總其成，規劃工作，分別辦理治喪事務。會議於十一時三十分結束。

三、大殮公祭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先生遺體在市立殯儀館大殮，儀式至爲隆重，靈堂正中，懸先生遺像，其上懸總統題額之「碩望嘉猷」輓額，右罩總統褒揚令，文曰：「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左舜生，性行貞固，器識闡通，學精文史，輝映士林。身際艱虞，奔走國事，嚴關共盡邪說，用力殊勤。當外患日深之際，矢志團結，同赴國難。抗戰以還，先後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農林部部長，議論激敏，允孚物望。迨赤氛既熾，清操益彰，國民大會之集會，光復大陸之規畫，匡贊國策，不遺餘力。綜其生平，立身無改儒素，愛國出于至誠，謙辭獻替，功在國家。遽聞遽逝，震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生卒事蹟宜付國史館，以示政府崇禮重賢之至意，此令。」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四週滿佈各界致送的輓聯與花圈，素燭香花，莊嚴肅穆。先生遺體着長袍黑馬褂，恭昇入棺後，家屬祭奠。治喪委員會告殮，由各主任委員正副主祭，親友依次瞻仰遺容，讀告殮文，旋即蓋棺，覆蓋國旗。

各機關團體舉行公祭，計有治喪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中國民主社會黨、留法比瑞同學會、空軍作戰司令部、臺北市麗且大學同學會、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

上海知行學院在臺同學會、湖南同鄉會、前蔣政會在臺同仁聯誼會、前農林部在臺同仁、中國青年黨香港總支部、空軍官校第十四期同學、臺灣地方人士致哀團等單位。

是日上午，蔣總統特派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前往致祭。副總統嚴家淦、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立法院院長黃國書、司法院院長謝冠生、考試院院長孫科、監察院院長李嗣堯等政府首長，各黨暨社會各界人士近千人前往致祭，備極哀榮。

四、發引安葬

先生靈柩於十月二十六日出殯安葬，是日上午十一時，在市立殯儀館舉行啓靈儀式，隨即發引。儀仗行列如次：開道車、輓額車、樂隊車、靈車、家屬車、親友車。由殯儀館經民權東路、民權西路、重慶北路、百齡橋、北校等地抵達陽明山第一公墓。十一時五十分，在墓前舉行安葬儀式，由治喪委員會委員劉涸英先生主持告窆祭，送葬親友參加祭典，旋即封穴，禮成。

五、祭告文

治喪委員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谷正綱，副主任委員黃少谷、張寶樹、陶希聖、郭澄、郭驥、賀表寒、向攝父、余家菊、陳啓天，暨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清醴之儀，致祭於

左公舜生先生之靈前曰：

嗚呼先生，衡湘毓秀，學貫中西，言行並茂。

宏文碩學，望重樞林，孤陶績懋，桃李芳岑。
抗戰方殷，中樞參政，卓識蓋樓，風高聲盛。
利民裕國，掌理農林，夙興夜寐，鉅細躬親。
促成憲政，歷清民選，獻替無遺，恩深慮遠。
興邦志切，經世心長，發爲述作，彪炳文章。
夙疾就醫，方期健復，噩耗驚傳，人天永訣。
飾終令典，冥冥祇承，莊嚴肅敬，禮制是遵。
大殮殯宮，親朋咸集，國旗覆棺，哀榮備極。
痛懷高直，愴悼同深，香花清醴，靈其來歆。
嗚呼尙靈！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謹以香花清醴之儀，致祭於左故代表舜生先生之靈曰：

嗚呼先生，湘江菁英，幼習詩書，頓悟過人。
曩且卒業，學識超羣，歷任教席，桃李盈門。
熱愛文藝，造詣精深，潛研史事，著作等身。
副憲行憲，盡傾丹心，愛國反共，衆佩堅貞。
光復設計，領導羣倫，神州未復，遽爾紛歧。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緬懷風節，哀悼曷勝，香花清醴，來格來歆。

嗚呼尙靈！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時果之儀，致祭於左故副主任委員舜生先生之靈前曰：嗚呼！

聚維先生，一代耆賢，胸羅經史，氣薄雲天。

遠遊歐陸，政治精研，瘁心國事，領導青年。

聲華懋著，出長藤林，宏規肇劃，流惠迄今。

東鄰肆虐，傾國來侵，受聘參政，迭抒忠忱。

廣選代表，憲政弘揚，赤誠蕙天，亮節備彰。

中興翊贊，會務勤勤，蓋籌碩劃，議論煌煌。

香江寄跡，抱病來臺，胡天不愆，棟折樑摧。

國失耆賢，朝野含哀，謹布微忱，冀其鑒哉。

伏維尙靈！

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國青年黨主席余家菊、陳啓天、李璜、胡國偉率全體同志，謹以香花清醴之儀，致祭於左故主席舜生先生之靈前而文曰：

嗚呼左公，吾黨之雄，幼承庭訓，頭角崢嶸。
震旦大學，群豪融融，立志救國，參加少中。
醒獅週報，驚噴起聳，遊學法京，聲譽日隆。
滄陽事變，竭志盡忠，兩黨合作，首建其功。
八年抗戰，風虎雲龍，主持筆政，氣勢如虹。
制憲行憲，無役不從，出長農部，清議推崇。
逃難海外，猶馭長風，偉言議論，暮鼓晨鐘。
抱病救黨，慎始克終，精神團結，心長語重。
等身著作，休休有容，一代賢哲，翠柏蒼松。
方期垂老，復國反攻，胡天不弔，月落幽穹。
香花清醴，哀切挾叩，嗚呼尙鑒！

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召集人間橋父、郭虞裳、蔣勻田、王世憲、孫亞夫、李級，謹率全體同仁，致祭於中國青年黨故主席左舜生先生之靈曰：

嗚呼哀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況值離難，
玄黃殞墜，胡云不傷，失此瑤珥。嗟君卓犖，
士飲英萃，旋乾轉坤，弱齡有志。一吼醒獅，
虎狼群島，抗戰反共，竭忠盡智。團結呼號，

驚頭起瘁，唯我兩黨，嘔鳴共事。同味苔岑，
聯鑣並轡，遠大交期，民主齊軌。憤憤蒼穹，
摧玉蘭萎，悼此哲人，縱橫涕泗。嗚呼哀哉！
尚冀！

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議以香花之儀，致祭於
左公舜生學長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仰望衡雲，俯視湘流，天靈左公，朋輩罕儔，年方七歲，文擅句修。
從幼到老，手不釋卷，著述等身，遐邇名留。
治史講學，啓後更優，轉而從政，卓著勳猷。
蓄生本色，不因此休，愛國情殷，堅決反共。
團結青年，驅敵殺仇，擁護國策，言論恢宏。
光復大陸，死念故丘，天胡不弔，奪走斯賢。
收京未睹，含恨是天，噩耗傳來，草木同悲。
忝列朋輩，涕淚縱橫，一同祭奠，聊訴哀情。尚冀！

上海知行學院同學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知行學院同學會，謹以香花清酌，致祭於
先師左公舜生先生之靈曰：

嗚呼吾師，一代哲人，篤生衛獄，才冠群倫。
天下已任，堪比前賢，內除國賊，攘臂呼傳。
號召領海，外抗強權，發爲文章，正氣凜然。
領導吾黨，團結青年，研史諷今，意更殷拳。
昔在瀛濱，親承教誨，卽知卽行，爲國盡瘁。
壯志未伸，至今殊愧，耿耿此心，有負詞費。
丁茲赤禍，避亂天涯，哲人遽萎，揮淚如麻。
甫悲勳老，又哭長沙，胡天不慙，國喪駑駘。
似舟失舵，震悼邇遐，公已不朽，著作籠紗。
齊澤走集，舉世同跨，願公靈爽，默佑邦家。
乾坤再造，群醜無諱，敬陳薄醴，虔獻香花。
魂兮歸來，伏維尚鑒！

中國青年黨留港主席李璜暨香港總支部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歲次己酉，十月廿六日，留港本黨主席李璜，暨海外全體同志，遵代表王世昭、劉子麟、李特超、張子良，謹以清酌香花，致祭於本黨故主席左舜生先生之靈曰：

嗚呼！昊天不慙，喪我老成，黨失南鍼，民懷碩德；當斯世變，正彰賢良，沉復危邦，荼毒有道。先生之去吾
嶺，何其速且酷也！

猶憶赤禍初橫，政綱失取，嗚呼天下，望治尤殷。吾黨乘機，遂以崛起，玫瑰之盟滿十二子，全中國之選都若

千人。公以三湘七澤之英資，乘九州四海之壯志，延攬殊方，馳心宇內。一枝毛穎，勝十萬之雄師；倚馬千言，闡天下之大計。文章有價，望重當時；學術多方，才雄一代。抗日倡政黨休戰，名重廬山；戰爭樹民族精神，謀參重慶。洎乎勝利，大建國之弘規，力勳行憲；去東瀛之舊惡，義合存邗。三黨一家，開其端緒；異邦唇齒，用彰厥功。遠大陸變色，廿載棲遲，作桴鼓於他山，功存民國；彰仇讎於今日，筆掃機槍。驅馳域外，盡國民之責於外交；團結同仁，作吾黨中興之柱石。勢異時殊，宗留守抱渡河之痛；日居月誥，陸放翁遺家祭之悲。萬里魂歸，應迷蜀道；一棺附體，望斷湘江。所冀後死乘風，揚標船於東海；先生式爽，復維新之舊邦。此志此心，有如嗛曰；無偏無頗，殫彼渠魁。

惟先生實式憑兮，用造我自由之邦兮，海外舉僑二千萬兮，一心一德亦足以固吾國兮。汝蕪存精，方足以當戰守兮；吏治清明，庶有以蘇民困兮。組織漁紳，以作我前鋒兮。斯天下之公言兮，音聲猶在耳兮，其將志而救世也歟？哀哉，尙鑒！

家奠祭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廿六日，不孝男宗矩、宗憲、宗明、宗楷、宗權，謹以香稻清酌時饈不腆之儀，泣祭於吾父

顯考左公舜生府君之靈前曰：

嗚呼！天佑吉人，不與其病，不速其危，不枉其歿，此理之常也。吾父敦厚一生，而仁民愛物，宜乎天錫純嘏，允享遐齡。奈何病而頹危，危而致死！其天道乎！吾父雖年遠古稀，顧目明耳聰，行不扶杖，坐不即倚，語冗不疲，信乎餘年有待。乃疾驟而不逮治，羣醫束手，其事理乎！嗚呼！天道不可憑，事理不足徵，人力不能恃。吾父終棄不孝等而仙逝矣！其命也乎！嗚呼痛哉！

吾父以九月十四日來臺就醫，淹霖下機，猶頗頗與遂者頷首。翌日精神轉旺，談笑如平時。方幸沉疴非不能起，人事或有可爲，治得其宜，殆可迅占勿藥。孰意不兼旬而病惡化，竟後誕辰二日而超脫乎！哀哉！

吾父治學一生，積勞有自，不事藥石，七十後，體力日以衰微。揆諸常情，信乃老態。第疾非不治之症，特在治未及時。蓋其始也，爲國事奔波，不以偶爾不適爲量；其次也，誤於不孝等之怠忽，未克強懸吾父就醫。迨病入膏肓，刀圭失效，而回天乏術矣。使不孝等及早爲吾父安危計，健康謀，安知吾父不樂享天年，而登龜龜哉！嗚呼！不孝等侍奉不週之罪，上通於天，其可追耶！其可恕耶！吾父嘗自詡八十猶可有爲。從知吾父病之猝，致之亟，匪獨不孝等有晴天霹靂之驚，抑亦吾父自覺所不及者。嗚呼痛哉！

吾父生逢亂，萍寄半生，憂國憂民，不遑舉處。不孝等各以生計，就食四方，未嘗一日盡菽水之養，謀團聚之歡。致吾父以七十之年，猶三餘少暇，煮字療飢。境境如斯，人生何趣！累數十載鞠育顛覆之德，乃子不能盡孝，孫無以承歡。行路哀之，而況於人子乎！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而況並微薄之養而未會有乎！嗚呼！萬死莫贖其罪，苦塊寧盡其哀。不孝等縱泣血悔恨於吾父之靈前，亦奚足以盡吾父之鑒宥於萬一哉！

嗚呼！庭園依舊，室闈人遠；榭架猶存，書封卷掩。尊溫馨於手澤，涕泗橫流；望顏色於屋梁，音容宛在。傷心觸目，悲痛胡禁。吾父有知，對不孝等之徬徨眷戀，其亦哀之，憫之，而託之夢以慰之耶！苦酒盈樽，哀歌吮淚。傾腸布奠，難酬罔極之恩；泣血陳辭，莫罄棘人之痛。不孝等欲傾訴於吾父者，寧有盡乎！嗚呼痛哉！尙冀！

啓 題 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谷正綱，副主任委員黃少谷、張實樹、陶希聖、郭驥、郭澄、賀寅豪、向構父、余家菊、陳啓天，暨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清醴之儀，奉告於

左公舜生先生之靈曰：

嗚呼！耆賢遽逝，永隔幽明，緜懷愆矣，哀悼實深，飾終令典，敬謹勉承。茲奉移靈柩安葬於陽明山之陽，山清水秀，穆卜攸留，途程既戒，執事惟寅。白馬紫車，送靈輅以就道；辰辰吉日，告殯宮而啓行。嗚呼何喪！

告 芝 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治喪會同人，恭奉左公舜生先生靈柩，安葬於陽明山之陽，既登穴封土，謹致祭於墓前曰：

嗚呼先生，精神不滅，吉日良辰，安此窆窆。蒼松翠柏，瑞霧清風，山明水秀，形氣鬱葱。爽接湖南，靈祭海北，默佑中興，永昌家國。何喪！

六、哀輓詞聯

蔣總統頒賜：碩望嘉謀

嚴副總統題頒：永式清芬

考試院長孫科挽：盡瘁國事

監察院長李嗣聰挽：蘊論流徽

司法院長謝冠生挽：典型足式

張 羣：邦失耆賢，士思楷則，嗚呼左君，念茲愧側。

其志卓犖，其學淹通，其才遠到，其慮公忠。

我昔論交，初因國是，風雨同舟，相期共濟。

既敦氣血，復屈壯偉，梅鹽心苦，笙磬音闕。
未補艱虞，載經播越，隔海同心，久要毋忒。

猶煩直諫，策復神皋，馳驅著述，瘁矣維勞。

一月醫坊，瀕危幾見，愛國培材，遺言永念。

光垂淳史，業在名山，傷哉逝水，一往無還。

黃國書：史級政事兩不朽；

湘水蓬山一繫思。

谷正綱：政府歷宣勤，粉績宏昭，憲席並欽隆獻替；

老成驚遠逝，養德不泯，神州待復慰英靈。

黃少谷：爲國家民表宣勤，多士久推清望重；

以學術文章名世，百年尤惜史才難。

陳立夫：亮節高風，濟世襟懷昭一代；

微言議論，等身著述足千秋。

薛岳：積學遠才華，領導青年，宏濟艱虞欽議論；

中興同朝贊，勳勳會務，極懷風雨鬱沉哀。

趙恒惕：壯志未全酬，幸有文章傳後世；

王師將奏凱，惜無機運觀中興。

鄭彥棻：是今日史家巨擘，政論匡時，爭看當代勝秋，靖邪秉正傳千古；

記初涼友黨五賢，明澤陪觀，話到同舟風雨，乍別重逢少一人。

何應欽：治學以文史著稱，留有令名傳奕葉；

報國從諍言見志，怎堪暫看隕蓬瀛。

黃伯度：是少壯交遊，復爲仲氏良友，女弟良師，風雨久同舟，前席嘗聞杼議論；

歷艱虞歲月，竟爾謀國忘身，著述忘老，冰霜見勁節，寢門止淚忍私哀。

陶希聖：瀕瀕反赤之盟，特嶺抗戰之會，重慶之政治協護，南京之制憲散亂。際此半世紀中，安危休戚，互濟平行

。如今光復已可期，更寄望法家獨士；

丁年冠劍之豪，盛年舉比之重，中年之國事奔走，近年之思難憂勞。在這一時代裏，志趣行蹤，殊途同轍

。詎料敵虜纒拜別，忽過赴白馬生祠。

展知本：沅芷澗蘭，映階綠草自春色；

烏啼花落，隔葉黃鸝空好音。

于斌：濟世抱宏圖，領導青年匡國運；

中興興大計，長留風範式儒林。

曾實孫、曾灼農：誼重鄉邦，學曠勳名，應懸史冊；

心存漢室，精神氣節，猶照人間。

郭驥：和協濟艱危，秉筆筆成近代史；

平凡見偉大，蓋棺猶是老書生。

李璜：(一)政治，不得已而爲之，一語轉深鄉國痛；

文章，今以後可擲筆，千秋欲覓解人難。

(二)書生報國，不談槍桿，到頭來知識重要；

遺言團結，貴在精神，是全靠忍讓工夫。

郭 澐：德業夙昭，最堪欽望，士林風高憲席；

山河待後，恨未睹春回鍾阜，日麗湘江。

袁守謙：文擬賈董，心存黃宋，名山自有千秋業；

遁地幼安，暮年夙信，旅棗遙携棧卷書。

陳啓天：緒交五十年，切磋琢磨，共矢觀貞履報國；

通籌千萬里，造次艱沛，惟餘忠憤望收京。

賀衷寒：撥亂拯斯民，匡濟多方，儘有勳名昭史乘；

誓亡誅大慙，復興在望，何期邦國失耆賢。

黃 杰：所志在匡扶，相看名世文章，襟期如對三秋月；

關心是憂樂，更有迴天意緒，亮節猶懸萬竹樓。

余家菊：矢勵矢勇，立論常持大體；

必信必忠，相期毋負平生。

蔣彥士：邦本久纏綿，緬想一德匡襄，垂老尚懷憂國淚；

民胞常繫念，每嘆九州糜爛，彌留猶有濟時心。

胡國偉：香江飄旅，矢志亡秦，但看名世文章，大麓墜天光史冊；

寶島長眠，遺言興夏，且待王師蕩寇，上京俎豆慰英魂。

黃雪邨：報國兼忠誠，身經幾度滄桑，正義總堅持，畢生無忝求仁志；

時傷況悼，心念同舟風雨，沈疴知莫起，客死難甘載病歸。

胡健中：天道寧論，竟先毛賊而死；

許其具在，當與會侯並傳。

張維翰：正誼召青年，濟區志業輝曾左；

同仇坪赤禍，忠愛詩文近社碑。

向楊父：在公爲黨友，在私爲同鄉，世亂方殷，斯人不作；

論直若吾岑，論交若金石，舊京未復，良史云亡。

趙聚廷：經世早有文章，更風節艱貞，垂範足資多士式；

遺言不忘國是，嘆老成凋謝，及身未見九州同。

查良鑑：博學貫中西，救國匡時多廟略；

忠心堅鐵石，滅毛平共見遺言。

周至柔：愛國致忠忱，灼見真知言不朽；

著書揮直筆，坦懷熱血意尤長。

三刊五：文章政事兩兼長，垂老尚鑽研，於近代史尤推巨擘；

患難憂虞幾經歷，立身性道義，述平生事足式群倫。

倪文亞：早著流風心爲國；

群欽學術自名家。

阮毅成：論交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平生道義兼師友；

斯人竟憔悴而憂傷至死，潮城風雨近重陽。

李壽雍：組黨以救國爲心，七十年聲望長清，道引青年誰一轍；

治學本史家之態，數百萬文畫不朽，摩挲黃卷又千秋。

熊鍾：才識縱橫，心在邦家，時有談猷參前席；

中原尙安亂，魂歸故土，那堪風雨泣同舟。

高信：審道德，能文章，最賦遠矚高瞻，論議廟堂襄偉業；

勳業修，崇氣節，永懷清儀雅度，晦冥風雨動哀忱。

端木愷：主筆送與俚，更領導青年，匡濟時艱推獨步；

司農昭政績，況老成謀國，議壇議論足千秋。

楊克功：忠貞報國老彌堅，翊贊中興，早有微言匡大局；

風雨同舟期共濟，騁棲南服，那堪寥宇隕晨星。

易君左：交深四十餘年，舉世皆知，君姓左不左，我字左不左；

才高百千萬輩，一朝忽逝，生享名成名，死垂名成名。

曹聖芬：當危疑巖岌之秋，體國矢公忠，常著文章持正義；

抱雪竹松筠之節，傳經忘老至，追憶名業仰山高。

民國廿四年，左師彝生受聘中央政校，任中國現代史教授，每講述，旁徵博引，口若懸河，聖芬得列門牆

，獲益實多。其後，政府團結全國，與軍抗戰，共匪肆其挑撥離間之技，以迷惑文人政客，而左師與其青年黨

同志，恆持正義，與政府合作，始終無間。大陸淪陷，左師講學香港，不知老之將至。今聞流逝，愴痛曷已。

徐復觀：廿載流亡，瘦骨幸能埋國土；

畢生志節，老懷應自念中原。

吳三連：政教懲勸猷，論道每關天下計。

斯文崇節概，傷時長失老成人。

史尚寬：天挺人豪，報國文章見肝膽；

世驚星隕，臨風涕淚灑蓬瀛。

趙自齊：數十年典範昭垂，久爲士林所欽，道德文章貽後世；

百萬里河山待復，今竟騎箕而去，悲歌薤露悼先生。

蔣勻田：曾言不求滿壽，命長百齡，但願多活幾載，以觀毛酋結局，亦可辯奸懲逆，新編史頁，原期名手特書，何竟去耶？

遊涉奠祭師喪，時後十月，遊時黃夜重洋，遙看萬甸河山，未免觸景傷懷，剛入國門，又驚老友噩耗，豈勝悲乎！

戴翼翹：卅載接清輝，淡泊襟懷，民主奠基，名垂竹帛；

一朝歌薤露，廣陵曲散，玉樓赴召，齊仰英靈。

程滄波：談笑論英雄，將相帝王，誰是健者？

淒涼感身世，山林健鼎，臣本布衣。

邵鏡人：藥石難回天，千里求醫終失望；

文章已名世，九原有恨未收京。

孫 震：爲反共之先知先覺，壯志未酬，精神長在；

從治史求經國經世，蓋論不朽，碩德永昭。

田炯錦：筆秉左氏，世重史才，褒貶最持平，共仰媲美前修，終老耐備完大節；

志在青年，心宗宗國，艱虞期協濟，忽報歸真上界，長教朝野覺哀思。

董文琦：行誼式千秋，豈獨文章高進望；

忠獻昭一代，已同河嶽著賢聲。

孫亞夫：謀國失嬰鳴，烟水招魂，正鴻雁來時，菊花梔候；

收京希驥足，蒼穹莫問，曠謫言在念，蓋策空陳。

楚終秋：匡時有策，反共抒籌，治學紹湘賢，素志欲追三代上；

淡泊爲懷，憂勞瘵疾，遺言陳國是，傷心未見九州同。

梁塞操：追繼國士，以文字蜚聲，恒能關懷民瘼，抗目時危，廊廟江湖傳共水；

可奈小人，緣政治爲利，每見技獮齷，術工詭嘆，豈符狐鼠價何多。

何 彤：史學仰高明，信歷代興亡，暴力殘民，中共惟烈；

復邦留至計，懸詰朝晴難，發師拯溺，國土重光。

胡木蘭：懇仰哲人，黨懷諍友；

政藝國是，功在邦家。

蕭一山：忠勤堪式，青年樓氣；

妖氛未清，痛失耆賢。

陳慶瑜：言行皆率真，彌緩志念惟團結；

平生重風義，凄其風雨悼老成。

湯元吉：固窮斯君子；

報國一書生。

萬耀煌：聞名早想望，儒珍黨籍不同，每以高文欽亮節；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從政始追隨，闔部讎符偶寄，遽因多難愴前驅。

張夢九：九土陸沉，未見反攻終有恨，

萬方多難，幸留著作等身傳。

施裕壽：碩學貫中西，政教宣勤，憲席士林問著績；

哀歌歸臺海，膏肓莫挽，紫莢黃菊俱含悲。

陳建中：瀛海仰風規，患難相扶，籌策總關天下計；

黨員傳噩耗，神州未復，愴懷遽失老成人。

方治：立身淡泊，論政從容，陶宏景無愧山中宰相；

反共堅貞，高吟慷慨，陸放翁自是愛國詩人。

黃朝琴：清望重書生，著述名山成盛業；

忠忱謀國是，彌留隔海念中興。

愷：碩：績學長懷經世志；

橫流痛失濟川才。

宋英：協力效邦家，主持言論天下重；

關懷恩交舊，厄歲風波海外心。

胡秋原：邦國不忘懷，言多遠旨；

陪都共參政，攻錯他山。

白瑜：形望衡山，桑梓竟成工古別；

空期涓水，經綸何只鶴人傳。

王志超：開揚中華文化，績效卓越，名留後世；

爭取國家自由，大業輝煌，功在人間。

王永慶：以學術作青年導師，衝護倫理民主，堅貞爲吾黨驍友；

其精神是文化騎士，抨擊階級獨裁，英靈奪毛賊游魂。

葉光：號召團結救國，德望允推天下重；

盡瘁民主憲政，愴懷未見九州同。

吳望儼：獻替議壇，每多創見匡時政；

榮回心曲，逼近重光赴玉樓。

邱繩武：德席忝同寅，仰碩學宏謨，業績深欽聘國重；

道山驚返翟，煥遺徽餘澤，老成頓逝典型存。

陳鵬：堅貞愛國，強烈反共，爲民主自由而奮鬥，畢生不渝；

獻身文教，著作等身，對近代史料之貢獻，永垂典範。

沙學浚：海疆晏動，史地同研容請益；

道山返駕，人琴增悵懼遺型。

劉巨全：憂國抒孤忠，香海恬暹容嘔傲；

議壇推巨擘，道山遽返惜迎光。

李永新：一夕噴大星，忍見神光斂泰斗；

千秋昭定論，長留助業在人間。

曹啓文：宣力議壇，報國文章宏幹濟；

沈炯經歲，道山歸去惜靈光。

趙觀白：蓋序爲宗邦，立儒廉頑，並世羣倫繼馬首；

艱辛催晚歲，紀功述德，千秋青史耀龍光。

陸京士：聲名洋溢增時譽；

大筆淋漓永後思。

雷法京：領導羣倫，青史永垂勳業在；

維懷禹甸，吳天痛悼老成凋。

查良釗：心存喚起國魂，哲人其萎；

志在光復大陸，大壘云亡。

錢用和：謀邦夙擅經綸，立論平生關大計；

接席榘參政事，歸真秋晚悼元良。

馬樹禮、何叔賢、李揆生、曾廣頌：士類仰高風，早見文章驚四海；

邦家凋大老，尚存德業式群流。

周宏濤：鼎革著勳華，一代規範欽雅操；

春秋存正義，八方風雨悼賢良。

劉錫五：爲中興，爲反共，盡力促成團結；

是志士，是仁人，著書留與後昆。

周開福：經綸滿腹學良師，除賊抗強早有爲；

幽結促成功不朽，待看復國樹豐碑。

蕭同茲：等身著述許藏山，治學有根源，是相倚靈巖一流人物；
故國興亡終在念，憂時傷況瘁，與放翁工部同樣心情。

王撫洲：海內重議論，清望久爲多士仰；

臨危念復國，堅貞永繫後人思。

王問榮：愛國湖青年，獨崇仁恕推儒者；

復邦除赤禍，詳述興亡出史家。

周學藩：死望中興淚眼懸，撫憂積疾遞相煎。

清流品自存公論，烈士情懷損暮年。

姓氏豈因鈞黨重，文章要是濟時先。

培材愛國遺宮在，敢以同心告後賢。

龐壽峯：史學尊秦斗，喚起後進；

行憲奠基業，功邁先修。

王竹祺：憂時心殷，海上著書多歲月；

星沉斗宿，息壤歸來正首邱。

彭運斌：青年見精神，領導國家爲重，支持政府學生志；

近世推巨擘，繼承莊左之宗，濟世文章護憲心。

王國瑞：著作等身，畢生反共，遺言救國須團結；

澤被湘楚，德齒同尊，驚傳正氣折棟樑。

李慶鑾：大雅云亡，空懷舊雨；

哲人其萎，悵望高風。

敗劍痕：曾佈助歐昭黨國；

長留典範式來人。

王培驥：與君相識在巴黎，往事追維，俱成陳迹；

此日歸真離議席，中興未覩，遺恨重泉。

劉行之：萬竹樓中丘明筆；

鑽石山下舜水心。

唐國楨：儲遠尊三，列傳可參有文苑；

待回大陸，王師迅掃夫蒼英。

張導民：是湘水耆英，著述等身，蜚聲學海；

爲議壇俊乂，膏肓速疾，歸葬祁山。

高惜冰：參政憶共事，著文章，發議論，一代勛名留青史；

神州痛論胥，言學問，念安危，千秋師表別群倫。

翟紹華：名流物望，冠冕南州，自有聲華光一代；

學術文章，淵源左氏，卽論著述已千秋。

虞兆棠：湘楚顯文星，彌佩養生能報國；

蓬瀛安蕙賦，長教議論耀青編。

張鏡影、吳深堃：知來鑑往，著述等身，議論永垂宇宙；

持正不阿，始終反共，勳猷應貯金隄。

陳表凡：才高一代，望重儒林，公而備國士襟懷，長師渠範；
續著樞衡，策宜議論，世共仰風霜令節，壇坫芳徽。

尹諒齋：霖散林泉，兩袖清風對明月；

寔處前席，一襲布衣傳公卿。

王宜：議論勸猷國反共；

協和志業策中興。

劉鳴山、劉昭晴：爲黨魁，任代表，不失英雄本色；

著史書，論國是，無愧蒼生僑流。

黃紹祖：政聲教澤同輝，事國勛名堪不朽；

議論嘉猷著績，讓壇獻替有餘輝。

朱如松：學生勞瘁好大難；

異趣同歸仰高賢。

蕭次尹：在黨爲友，在政爲賢，盡瘁抗敵歎共濟。

立言足傳，立德足式，平生志業已千秋。

金克和：治史爲當代宗師，金陵侍學，欣沾化雨；

匡時有等身著作，瀟灑歸眞，痛哭著賢。

楊晉北：振直筆爲淋漓慷慨之文，忠愛不渝，病榻纏綿堅夙志；

擊近史洞治亂興衰之故，艱難正亟，他山改錯失斯人。

馬壽華：學兼幽德，學貫中西，久仰文章崇北斗；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痛感人琴，魂招海遠，那堪風雨近重陽。

劉 拓：在野爲諍友，在朝爲諍臣，風骨凜然，不愧舊生本色；

論學乃儒宗，論行乃儒道，文章卓犖，猶存名著等身。

凌紹祖、蔣佩儀：道德文章，永垂史冊；

清風亮節，長在人世。

袁 雍：學人結習名心淡；

國是相成助力多。

蕭贊育：學術名家通政體；

仙都登籍悼耆賢。

劉 勛：平生反共救國，道德文章同敬仰；

一旦沉疴遽逝，泰山喬木有餘哀。

粟 直：舞弓重瞳，光復大陸，別具隻眼；

生民塗炭，領導青年，終有一手。

楊毓滋：碩學耆年，主張民治，志行文章昭千古；

青天碧海，召赴玉樓，月關風濤湧老成。

劉 誠：常年部務長農林，憶雲歎親承，感舊難忘叨訓迪；

畢生憂樂關天下，嘆老成凋謝，愴懷豈止爲恩私。

韓中石：富民族思想，融世界眼光，立德立言，才識早爲當代重；

倡國家主義，反共產邪說，不移不屈，節操長使後人欽。

延國符；卅載憶交遊，煮酒每聞匡國論；

九天正憔悴，傷心頓失濟時才。

張佛子；餘事始著書，史筆無慚，微見雕龍爲巨匠；

畢生唯教讀，弱才未展，終憐袖手對神州。

潘仰山；舜何人焉，愛國家，培英才，先生之志不左；

生有所自，福全民，倡憲政，士人可貴在茲。

張益弘；三湘儒者，一黨元勳，平生筆伐口誅，獨抱丹忱期復國；

八表同昏，兆民待拯，此日人亡邦寧，何堪舉世共含悲。

金遠凱；波湧洞庭，湖水長沙齊痛哭；

魂歸故國，竹樓妙筆動悲吟。

伍根華；時重謫言扶正氣；

哀同秋葉寫愁髮。

何聯奎；研近代史蹟，作青年導師，著有聲華煥海表；

抒議壇議論，秉體國公誠，故應天帝迓英靈。

林忠；經世經國，澹泊益明；

盛德至善，直道常留。

龔裕；文章華國通今古；

閱譽施身推逸邇。

王夢五；爲自由民主，組織青年成大業；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用文章噴舌，（上）匪後學贊中興。

黃範一：建業懸聲華，議論惠民黃永式；

忠忱抒國難，神州未復有餘哀。

高廷梓：痛民主先驅，遺老成凋謝；

仰高才磅礪，念勵望崇隆。

王大任：節義文章天下重；

謠言風範士林垂。

閔湘帆、全道賢：膽識證言行，望重壇坫，昭垂懋績；

端溪勸稼谷，神傷痘霖，未際澄清。

蔣友文：論道稱堯舜；

逸觀外死生。

楊興勳：峻望重儒林，愛國書生明大義；

遺徵留憲席，匡時議論仰高賢。

詹潔悟：德望重巖廊，政教宣勤昭懋績；

微猷照憲席，松筠頓折鬱沈哀。

彭蔚村：國喪元勳，哀慟雲山同一哭，遺下未竟志，深淵蒼生望呼誰？

吾失導師，靈前泥首拱佛壇，堅心承衣鉢，維護群黎得樂土。

劉季洪：主一黨與革命相依，寫民瘼，立丹青，健筆縱橫，浩懷長倚擎天柱；

贊中樞爲反共急聲，結志士，陣紅流，艱貞盤錯，遺憾難酬報國心。

李 寰：精達文史，學術獨樹一幟；

翹翹廟堂，事功永垂千秋。

毛子水：我為國家悼志士；

公於文史是通人。

羅英德：黨領青年，在廬廟，在江湖，憂樂生平關大計；

心如朗月，崇民主，崇法治，遺留後世有箴言。

劉季齡：四十年前受業申江，問道執經，曾許我志；

一霎時間星沉寶島，臨風雪涕，未報師恩。

鄧徵濤：文章有力千鈞重；

愛國無瑕一片誠。

陳綬民：鄉黨志賢者；

實字贊書生。

陳稚倫、黃振華：學術率先驅，風範久為朝野重；

典型昭後進，精神長共雪霜清。

蔡永才、黃福雄、唐克郁、唐克一：史乘千秋在；

忠魂萬里招。

林可璣：卅年患難相依，每逢大事，無不經君思決；

數月病榻纏綿，一生遺恨，未睹共黨滅亡。

于復先：時局艱難，為歷史所未有，公何可死；

國家建設，以學術作基礎，言豈偶然。

沈聚龍：是一代才，負一時望。具超越一世眼光，爲國憂勞，不讓前哲；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有若無萬夫手筆，等身著作，垂範後昆。

王嵐僧：憑一枝筆，成一家言，一代才華稱巨擘；

擁萬卷書，寫萬竹樓，萬方風雨失宗師。

王師曾：毛賊尙未死亡，爲我公臨修德事；

團結必須堅固，願同輩永矢精誠。

周實三：宏教育樹人，澤惠沉微，痛絕泰山頽頃刻；

爲區時救國，諄言論政，凜然正氣耀千秋。

葉時修：爲反共先鋒，爲政黨領袖，奮闘五十年，遺德未覓光復；

是青年領袖，是學術宗師，著書百萬字，真誠翊贊中興。

劉泗英：慷慨瀝加盟，巴渝抗日，亦步亦趨，我愧老兵慙後死；

自大夏講學，中樞參政，大開大闢，人呼會左哭先生。

翁福清：英氣夙如虹，共仰詰人抒偉略；

德行垂不朽，長嘯吾黨失良師。

嚴保三：魯殿失靈光，哀亂清風，助後進；

海天悲落月，頽山墮木哭先生。

劉東巖：訂交數十年，誰知一別成永訣；

報國近半紀，相期無負於平生。

李公權：半世紀花葉飄零，寂寞文壇推巨擘；

近百年風雲變幻，紛紜國事失備宗。

張希爲：議論倘能行，國家或可免至此；

名言原自道，政治不得已而爲。

周謙冲：當年風雨聯牀，抵掌縱談天下事；

此日王師待發，傷心未見九州同！

張子柱：史學名家，政壇耆宿，砥柱中流聞朝野；

書生本色，領袖群倫，歷歷落月痛沉淪。

潘再中：嗚呼舜兄，書生報國，鞠躬盡瘁；

痛哉吾黨，團結成功，泰山遠頽！

史澤之：謀國以忠良籌策，興黨有團結方針，太息中原未定，瀟城風雨愁一尤；

著述追新會綴椽，史論越船山精奧，今也殘令見頌，蓋世才華自千秋。

陳翰珍：富經給才，宏儒者願，勳業在國，著作等身，論德望英名，吾黨尤推翹楚；

消箕豆叔，盡佛婆心，戾氣方除，斯人不起，紙筆車白馬，八方聞叩首賢。

宋益濟、章俊屏：團結勸苦岑，驅馳酬公，此去但期遺德少；

誠備勞啓誨，稠情厚我，知深我愧負慚多。

丁俊生：一代重賢賢，宇宙名高，望隴山斗；

卅年親罄款，神州鼎沸，痛失儀型。

徐漢豪、周蜀雲：卅載重雍容，謀國老成，曠代典型尊樂境；

一朝遶營款，靈壽永在，千秋遺烈助收京。

朱文伯：政學之間尊一老；

事功以外有千秋。

胡自翔：盛名邁羣倫，憶當年廬山奔走，蜀都參政，滿載豪情冠一世；

浩氣收家望，看此際香江拒赤，臺陽獻曝，平生志業足千秋。

夏爾康：學生標勁節，永矢公忠，每於大敵當前，力協群賢紆國難；

兩代沐春風，備受誘掖，際此中興在望，空懷遺教痛山頽。

吳宗漢、黃欣周：元龍豪氣，司馬長才，筆底走風雷，踵武前賢聚新會；

歌浦潮回，洞庭波渺，平生傷邑舍，同悲憂國買長沙！

邵培之：乃史學名流，爲政評巨擘，連年佳構爭傳，洛陽紙貴；

是國家舊宿，亦吾黨宗師，今日晨星遽逝，瀛海風寒。

梅漸濃、梅自芳：宇內結羣英，偉抱永垂，萬里雲天思往蹟；

海隅盡靖獻，鴻猷未竟，八方風雨痛先賢。

鄧·斌：有猷有爲，覺世醒民芳百世；

爲國爲黨，鞠躬盡瘁耀千秋。

朱垂淵、韓元溥：文章報國，道復匡時，偉範大名垂九有；

公忠接物，寧淡持躬，高風亮節耀千秋。

丘式如：赤誠尚禮天，王師待發哀公去；

謠言猶在耳，功業垂千古。

楊伯安、王文濤：汜史有成，一代權威著述在；

辯姦數惡，平生崇起世人知。

賈崇官：爲憲政基石，在野威尊大老；

是反共健士，闢邪洞燭機先。

程光復：具季高之才，惜未翼鴻猷，公在九京知有憾；

秉新會之筆，最能寒敵膽，文留百世足爲師。

黃千里：久接警款，霽月光風，永留儀範；

屢承疑許，寤給朽木，愧對先生。

關德辛：是近代史權威，喚筆攸關天下事；

爲在野黨魁首，典型魁稱百世師。

范英莪：黨事久紛紜，團結初成，尙賴元勳資柱石；

瀛濱承教範，追思如昨，何堪中道失典型。

劉子驥：畢生盡瘁學術邦家，同舟共濟，垂老憂勤，國事倍操心，曩續猶籌興復計；

視我有如至親骨肉，易地就醫，臨歧握手，前塵一回首，沉哀痛讀死生篇！

黃天石：唯唯盈廷，謗謗一士；

憂先天下，志在名山。

熊恢：夙膺忠肝，振奮人心功不朽；

雄才卓識，匡扶黨國業長存。

趙純孝：深年來幾度從遊，承教良多，自問平生真有幸；

驚夢醒一朝永訣，含悲曷極，長懷國義世無儔。

蔣偉之：憂患久相從，何幸能逢知遇感；

大星遠隕落，含悲慙負故人情。

廖兆駿：黨事現生機，瘁力群聽此老聾；

匪耗傳旦夕，蓬瀛驚見大星沉。

衛式賢、張叔鳴：是黨士學望所歸，永重德徽黃仰式；

當世運剝復之際，何堪風雨失師儼。

郭京：書生報國，最後尚求盡宮實；

聖哲存心，臨終還欲濟時艱。

張伯倫：壯志未酬，海角空餘家國恨；

長才遽逝，天涯無限故人悲。

黎衍慶：擎天志業追曾左；

擲地文章失卯博。

劉永濟：世欽道範：山斗同尊，千古仰公忠，風雨同舟兼幹濟；

每爽春風，殷勤勉我，霎時悲梁木，艱難何處覓知音！

陳存孫、馮可編：卅載潮追隨，晦益時裁，祇服雍容能煦物；

千秋垂典範，公忠永在，願祈靈爽佐中興。

熊福亞：功垂邦國，學重士林，憂樂兼蒼生，一代公忠黃典範；
星沉海澱，哀同同仇，艱難紫靖獻，八方靈秀失先型。

李養式：平生道義相期，久坐春溫，回首前程悲若夢；

此別七容而後，長懷悵冷，傷心何處覓高風。

錢煥文：爲國家盡忠言，爭民權，除暴賊，真知灼見耀宇宙；

謀吾黨求再造，齊奮勉，佈公道，邦瘁人亡哭元良。

陳善新：史筆淵藪，合英咀華稱不朽；

憂時憐屈子，美人芳草誓深愁。

朱坤三、鄭葆真：國大耆英，黨傷導師，鞠躬盡瘁思諸葛；

文能傳世，功在廟廟，慷慨悲歌近放翁。

傅汝樑、吳昌岐：齒德並尊，霽月光風，成歸天上；

音容頓渺，清操碩學，永垂人寰。

蘇子：碩學匡時，領導青年，令譽永垂千載後；

蓋棺期復國，消除赤焰，傷心未見九州同！

王勳、孫育才：碩望重振，回首前程多士範；

沈荷捐館舍，傷心未見九州同！

陳貽廷：大春秋一統之義，斧鉞聲威，足爲良史；

推邦社不二之愛，淵默淨峙，允稱完人。

包國新、吳再智、鄭國榮、潘善夫、陳履安、陳子元、解耀琛、譚兆祥；

樽酒昔追陪，燭剪西窗，猶憶襟懷磊落；

人琴今已杳，樵殘東閣，祇餘月影橫斜。

柴 毅、李錦春：遺言猶在耳，精誠團結期容忍；

復國未忘懷，收拾江山待大公。

鄒人孟：爲國爲民，君子偶然亦黨；

論今論古，通儒何必成家。

辛植拍：我們一定戰勝共產主義，請安息吧；

吾儕必將振起立國精神，斬默佑呢。

胡繼翰、孫祺經、李克榮、蔣楚良：學究天人，望重朝野，

名垂宇宙，氣冲蒼冥

李楚莊、余漢樑、南沛：爲國盡畢生精力，大名垂宇宙；

愛黨欽無限辛勤，團結足千秋。

侯象麟：神州狼突冢冢，屬縑心猶天下念；

椽筆匡時載道，遺篇能作後人師。

熊 愷：團結切萌，老成遽喪人心震；

反攻在望，賢哲云亡天數奇！

元茂昌：忠誠愛國，鞠躬盡瘁，名垂青史；

立德立言，淡泊明心，痛失導師！

張 泉：治史兼三長，並通於論政；

反共逾卅載，可補乎正時！

劉百驥：合力挽狂瀾，幾重國家，喚起全民，重整山河，橫著五強憤素願；

等身推著述，史精近代，闡發時勢，變動皆繫，學成一代仰高風。

胡汝修：吾黨賴重造，先生當與國家共垂不朽；

大陸未光復，英靈豈能就此瞑目甘心。

鄧中龍：三楚仰鄉賢，念幾番煮字療饑，獨從天下關憂樂；

廿年親教澤，權數度挑燈論政，空負胸中富甲兵。

譚均宜：一代仰高風，爲人宗師，學堪淑世，勁節孤忠撞靖獻；

千秋留典範，國尊先覺，黨重元勛，曾老碩德著清微。

甘棠：道德文章，先生不朽；

私交公誼，賤子難忘。

陶元珍：黨實有才，曾左已亡存胡李；

國實爲政，常何既逝仗陳余。

黃鳳池：無門庭分別之心，愛國只純誠，議論低徊深服我；

有朱陸異同之辨，析微難納鑿，危言傑業太慚公。

戚光烈：先生去矣！想當年受業阿前，最難忘反共宏論；

吾道非耶？嘆此日鞠躬盡右，從此失救國元良。

冷彭：報關有諍言，當之不愧；

遊仙正落木，黯然生愁。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

劉雅聲：反共溯元功，愛國憂時，羣瘁鞠躬欲靖獻。

卓行垂世範，仁民煦物，高風亮節仰耆賢。

向大藩：素志迥出恆流，謀國向來關大計；

青史定書盛業，立身原不愧儒修。

陸崇仁：著歷史亦欲變更歷史；

教青年並能領導青年。

俞康：反共以匡時，矢志追隨無怨悔；

私情兼公誼，招魂痛悼有餘哀！

沃耐珊：瀟瀟接高風，教益頗承，平生風義兼師友；

憲壇昭碩望，老成昭逝，不朽言行煥典型。

顧南蘭：爲一代學人義女，克近慈顏，方幸此身多教誨；

矜于言溫謙而別，遽隨噩耗，那堪隔海淚滂沱！

康正禮：七十歲又晉八齡，道範長存，方喜樽俎叨茂庇；

二三子同來一慟，音容頓杳，興歌薤露動餘哀。

展恒舉：德望重華夷，政治文章推泰斗；

勳名垂國史，高風亮節足儀型。

郭紹宗：志士書生兼學者；

團結奮鬥救中華。

連毅君：反共愛國實民，五十年如一日；

博池濟時立說，三不朽足千秋。

胡協盛、王子貞：誼厚苔岑，深欽德業；

風淒台海，痛喪耆英。

方彥儒、謝馮、陳煥華：論史有遺言，一哭至爲天下慟；

渡河存壯志，但道不見九州同。

李滿康：淪落走渝州，糾襟託庇欣安枕；

縱橫睨日本，肝膽照人好印鬚。

陸立生：黨中領導，滬上追陪，志同道合兼師友；

碧海潮空，黃山月冷，思舊念賢泣老成。

治喪委員會：政教耆經驗，望重嚴廊，護靈蓋懷惻煥發；

風光鬪爽菊，哀深驚瘴，飾終令典勉同承。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聲譽燁序，績著政壇，領導青年推巨擘；

疾染香江，星沉灤海，贊襄大計失耆賢。

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處世重清名，道德文章振衰敗；

平生立正論，邦談黨道察忠忱。

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統一委員會：學識貫中外，民主導師推巨擘；

功勳在國家，馨香俎豆弔斯人。

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援古證今，認暴政必亡，凡我學人咸仰止；

著書立說，垂大名不朽，薄官殺世宛如生。

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黨事建殊勳，幾度風濤資砥柱；

文章傳史乘，一生活節重靈山。

中國青年黨中央評議委員會：爲生民典範，是憲政元勳，卓犖仰風誼，至德嚴廊尊大老；

乃史學宗師，亦士林冠冕，清高存士節，盛名天下重醇儒。

中國青年黨香港東南亞總支部：求才若渴，攻錯若石；

國爾忘家，憂而忘身。

上海知行學院全體學友：書生報國，矢智矢誠，可憐力竭精能，易賣猶虞三黨異；

弟子繼謀，亦趨亦步，忽焉山頽木壞，傷心不見九州同！

新中國評論社同仁：自學會而政黨，原期建設新中國；

爲民主與反共，志切光復舊山河。

鮮鋒雜誌社：議論誇言，近代文章追左史；

內除外抗，平生志業在中興。

左劉名聲：君胡踽踽獨行，倘幸獲仙緣，畢竟是福；

我亦垂垂衰老，縱苟延歲月，抑又何歡？

左宗矩、左宗憲、左宗明、左宗楷、左宗權：客歲問訊，室冷吟哦，祇手澤猶溫，觸目親情萬縷；

幼失追陪，長虧孝養，痛深恩罔極，傷心血淚千行。

左宗華：插架已蒙塵，留千百卷廢稿遺書，可憐寫作半生，未享終期清靜福；

溼髮猶在抱，積四十載偏憐寵愛，最痛招扶累月，獨欠臨危訣別情。

張煥華：泰山其頽乎？痛一水天涯，紅板寒鳥啼永夜；

哲人竟萎矣！撫頰年手澤，鴻文議論足千秋。

左宗燧：當年香港待居，正咄咄書空，午夜話興亡，弔憐太傅時乖，三閩運蹇；

逐日榮民探病，祇慨慨如夢，名醫割藥石，頓使言壇星黯，萬竹樓寒。

左宗銘：想當年畫虎誠嚴，玉樹交親切厚愛；

痛此日飛鸞去渺，竹林揮淚有餘悲！

左光燁、左光燧：萬里飄悲風，父逝逾三年，又自遙天哀叔祖；

千秋仰垂蔭，家傳剛四代，忽驚舉國喪元良。

七、致送輓軸花園花籃台銜

嚴家淦、蔣經國、張實樹、孫科、李嗣聰、謝冠生、陶希聖、陳大慶、李國鼎、徐晴嵐、賴名湯、許孝炎、蔣鼎文、王世杰、劉峙、馬超俊、郭奇驥、鄧文儀、李彌、余漢謀、張厲生、陳譚祥、林挺生、俞國華、秦孝儀、陳訓愈、端木恆、杜均衡、羅孟武、關吉玉、葉翔之、錢穆、任覺五、董彥平、江一平、凌鴻勳、張其昀、李崇實、顧孟餘、陶百川、林崇墀、夏松、朱世龍、齊世英、吳梅邨、湯元吉、李揚敬、袁夢鴻、王德芳、方東美、郭鴻章、王德溥、顏澤滋、李緞、羅奇、董德、郭虞裳、吳康、葉秀峯、楊麗清、唐祖培、潘康方、周昌發、陳鏡鈺、周樹聲、成開助、程文熙、謝漢儒、廖毓存、劉中一、羅英才、孫毓秀、孫世貞、何芝軒、金安一、湯志先、顧竹祺、李詠南、潘少夫、顏廷鈞、陳一萍、余拯、黃顯靜、冉寅谷、馬木齋、吳鑄人、李文齋、陳介生、胡靖又、錢劍秋、水祥雲、劉兼吾、楊粹、湯智元、連斌豐、翁存霖、李潔、嚴慶齡、姜渭河、李悅義、馬亮、蘇國英、潘君南、耿汝冰、陳倬、曹行夏、王志導、張潤蒼、趙強、梁棟、王子野、張子揚、張志智、周光煜、陳飽梅、王培基、

趙公管、羅揚輝、周存節、徐秀蘭、黃祖華、黃慧英、龔浩、林伯雅、武斌、沈怡、崔萬秋、劉英男、鄭進福、袁道豐、鍾華壽、周昆田、張聖恩、盧學禮、張錦富、蔡聚程、張仲華、向先良、向李蘭、韓克溫、鄧謙、蕭炳星、張岫嵐、陶桂林、李大超、邵殿甲、逢化文、谷焘、劉康克、吳麟、林大進、李偉樑、劉澄清、蕭新民、沈德亨、陳紹平、邱開基、孫仁、鍾超如、楊澍齡、鄧聲棟、劉行之、毛蔭、胡晶心、宮秀華、韓春暄、祁英立、趙鼎三、黃光學、李康、李頌啓、包天放、丁德隆、梁興義、崔宗棟、薛漢光、張樂民、張玉賢、曹麟根、王國南、汪寶璋、左鄧恩澍、瓊瑤、翁心山、董耀宇、劉文騰、矯捷、項世端、金之玉、龔弘、胡希汾、趙純孝、戴桂茹、伍根華、方德也、陳松年、劉一標、李秋生、王成龍、羅儉銘、張嘉源、王孟明、唐日新、洪繼會、翁蕓荊、顧昌柱、顧昌柱、顧昌炎、林霖、盛蕊珍、虞日嶽、吳英布、雷愛珍、侯蘇峰、蔡水勝、馬鍾良、嚴欣淇、王桂星、劉敏誠、萬雪貞、關維矩、甄靈台、徐英德、劉顯九。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中華民國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國民參政會在台灣仁聯直會、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臺北府暨旦大學同學會、淡江文理學院夜間部工商管理學系第廿一屆畢業同學聯誼會、育英中學、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南研究區、空軍官校第十四期全體同學、文海出版社、民主憲政雜誌社、三民書局。

左舜生先生追悼會記實

岳 壽

左舜生先生追悼會於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在新亞書院禮堂舉行。當天三點鐘以前，客人已經坐滿了新亞書院禮堂。禮堂懸掛輓聯應有兩百幅，尚有許多實在無法懸掛只得放在桌子上。禮堂中間放着左先生之放大遺像，圍以花牌，下面放着蔣總統褒揚令，有一幅輓聯集了褒揚令中兩句「立身無改儒素，愛國出乎至誠」，放在上面特別引人注目。

追悼會開始，先由名詩人亦青年黨黨員王世昭先生讀祭文，然後由李璜先生致詞。李先生與左先生自民國三年在震旦大學同學起，相識已五十五年，是同學是好友又是同志，談起左先生的生平，確有許多令人永遠懷有敬意的。由於與會人員入場時，籌備會均發給一張印就的行狀，對左先生生平已有詳盡介紹。故李先生雖是報告生平，均選擇重點發揮。當時提出四點：

第一點，李先生指出左先生是一個讀書人，他的好學基於天性，而且廣求新知，至老不改，所以七十幾歲還請日本人補習日文。至於左先生學問得力處，則主要在漢書，他們在震旦讀書時，左先生就日日讀漢書，細批細註，到了在重慶重聚一起，看見他日日讀的還是漢書。他的文章，因此也就胎息班氏。

第二點，左先生是一個中國讀書人，中國讀書人不同於外國讀書人之處，是中國讀書人不僅要致力於學問，還要砥礪品行注重倫理。左先生一生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朋友信，對子侄慈愛，處處都表現出中國讀書人的崇高品質，非一般普通讀書人可及。在此處，李先生舉出一些事實，左先生在上海中華書局任職時，特地從湖南故鄉把父母接到上海奉養，每天早晨問安，侍奉週到，因為老太太愛打牌，有了時間，左先生一定請幾位朋友陪老太太打牌。左先生住處不大，只有一個小客廳，卻經常留朋友下榻，李先生就住了成年，此點已不容易。更難得的是當一批朋友去了法國、德國留學，大家寫了稿寄回上海發表，左先生負責代領稿費，代購書籍，代匯款，有時還代轉家用，既不厭，亦不倦，其中為音樂家王光祈服務時間最久，前後達四年時間，此一友道，當今之世實不易多睹。（李先生只談到左先生的忠、孝、友，實際上左先生對子侄輩之慈愛，亦為人不及。據筆者所知，數年前在臺北逝世的國大代表左幹忱，即左先生之胞侄，左先生也把他帶到外面作事、教書，終能自立。）

第三點，李先生指出左先生並不熱心作一個政治家。他最初確無心於政治。當黃（琦）李（二公）初創青年黨時，他雖然被邀加入，卻並不熱心，直到後來他主編「醒獅週報」，面對共黨的刊物（筆者按，此指李大劍所辦之「嚮導」，李先生當時未說明）予以口誅筆伐，左先生看見共產黨的窮兇極惡，不由得想起林文忠公則徐所說：「終為

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遂下定決心，要從反共而反俄。因此，就捲入了以後的政治漩渦。所以說左先生入了政治這一行，既不是爲作官，也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受到愛國心的驅使。

第四點，左先生是個烈士型的人，遇到義所當爲的事，確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當民國三十四年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青年黨推出代表五人，最初原推定左先生。他堅辭不就，黨主席曾琦再三相勸，左先生認爲他同傅斯年等訪問延安之後，眼見毛澤東除去蠻橫之外還加上一個無知，所有共黨大小頭目皆得一個「陋」字（按：此點筆者聽到左先生講過不下十次，他認爲中國事必壞於毛澤東之手，毛澤東必然失敗，基本原因就因爲毛澤東太陋，不肯吸收新知，終日抱着幾本舊小說自我陶醉，其所想的皆不可能成爲事實，卻偏不信邪硬要變成事實，結果自然天下大亂，共產黨整個滅亡。觀乎大躍進時胡亂吹牛，目前的赤腳醫生可治萬病，益覺左先生之觀點爲不易真理。）決不肯開誠佈公，共謀國是，談判只是手段，我們何必費這個精神？故堅不肯出席。直到後來談判情況對反共一方不利，馬歇爾又介入袒共，左先生始投袂而起，參加談判，與共產黨又展開鬭爭，這時已遷至南京、上海，其中最重要一次是出席制憲國大，就當時來說，民、青兩黨及社會賢達均未決定出席，希望表商討，希望尋出一個解決辦法，使共產黨能出席國大。就當時來說，民、青兩黨及社會賢達均未決定出席，希望共產黨能答應，大家一同宣佈。誰知一見面，周恩來、董必武一味狡猾；李維漢表演張飛的角色，拍案大罵誰參加國大，誰就是叛徒。別人還未開口，左先生拍案而起，說道：「青年黨一定參加制憲國大。」莫柳忱、胡政之也起身叱李維漢：「參加國大何以變成叛徒，叛誰？逆誰？」說過大家皆拂袖而去。出了門李先生問左先生：「我們的黨並未決定參加國大，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左先生悍然答道：「你看今天情形還有選擇餘地嗎？」由此青年黨就參加了制憲國大。左先生這種精神，確不可及，左先生過去從未提過。近十年來筆者同左先生談天時，對於共產黨的情況，共產黨人的性格，談過不少，但是對於他自己這一偉大表現卻隻字不提，若非李先生說出來，根本就無人知道。此等處確有古風，非常人也。筆者聽到李先生報告時，抬頭看看左先生大像，覺得這一個平凡的外貌，實在

包裹着一個高貴的靈魂。

接着是中國文化協會主席黃麟蕃先生致詞，黃先生指出左先生是一個史學家，政治家，也是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當年由他代表青年黨致函國民黨蔣總裁，奠定兩黨共同合作抗日的基礎，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奉行此一路線，由抗日而反共，兩黨始終一致。左先生雖逝，左先生遺志仍待後死者發揚。

黃先生的話言簡意賅，語重心長，但對這一段史實，當時未加解說。黃先生當然認爲出席追悼人士，除去年輕朋友外，大部份人士對於這件經過都知道，所以輕輕帶過。在此筆者必須加以詳細註解，因爲萬人雜誌讀者青年朋友多，可能不了解這一重大史實。

在七七抗戰（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前，中國當時由國民黨執政，自從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實行訓政，規定一黨執政，禁止其他政黨活動。雖然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真正禁止活動的是共產黨，對青年黨已視爲友人。二十三年蔣委員長且邀請左先生到廬山會晤，共商國是。但在表面上，此一禁令並未解除，直到了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左先生以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身份，致書國民黨蔣總裁，表示青年黨願與國民黨共患難的立場，函稱：

「敬啟者，國難尚在極嚴重之階段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但在目前，則尙不敢即以輕望之心，遽弛其戒懼之念。國民黨最近所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苟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與國家有益。中山先生遺教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民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爲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相符合，願表示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

人等夙昔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始終不渝，補偏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為陳述。總之，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外此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外此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踐，耿耿之懷，敬候明教，此頌勳安！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啓。」

國民黨蔣總裁即於四月二十四日覆函如下：

「舜生先生惠鑒：展誦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切欽佩。並承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相符合，抑示擁護政府之赤誠，願為抗戰建國而盡最善之努力。誠擊坦直，矢共艱難，備誦之餘，彌深感慰！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與期望，已具詳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所旁貸，而實踐之功，必資羣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念職責之艱鉅，尤望集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斷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聞電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其誠款，即維鑒察，祇候台綏！蔣中正謹啓。」

此一項函件一向不太為人注意，實則意義巨大。因為有這一項來回函件之發表，確定了青年黨的合法地位。以後國社黨主席張君勛亦致函蔣總裁表示同樣態度，從此結束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中國政治步上憲政之途，左先生是促進憲政的第一人。後人修中華民國憲政史，一定要鄭重記載此事。其次也就從那時起，確定了國民黨與青年黨共患難的精神，歷時三十一年並無改變，左先生奠基之功，尤不可沒。

接着是史學家羅香林教授致詞，羅先生指出在香港多年，尤其是在聚會聚會時（筆者按：兩公均係香港中國筆會理事，羅先生且任兩屆筆會主席），與左先生談話甚多，獲益非淺。直到最近一次是在臺北會晤，當時左先生去主持青年黨大會，羅先生出席漢學會議回港道經臺北，見面時看到左先生精神已不如前，當時羅先生還提出兩個問

題請教左先生：第一，受任公於戊戌政變前在長沙活動情形。第二，黃公度在湖南的情形。左先生答以說來話長，回港再談吧。誰知此後一別竟隔人天，再也沒有領教的機會，羅先生言下不勝唏噓！

第四位演講的是大律師胡鳴烈，胡氏是左先生弟子，曾聽左先生講課達兩年，記憶中左先生當時教課對學生三要是教忠教孝，左先生特別愛講方苞著「左忠毅公遺事」——左光斗與史可法之間師生的情誼，左先生當時講課不僅講書，主要是教學生怎樣作人。左先生自己未必有心以左光斗自居，但中央政校的學生經抗戰、戡亂兩大戰役，倒真的出了不少小史可法。鴻烈兄接着又提到左先生特別佩服左宗棠與譚嗣同（按：筆者所知也是如此，爲了譚嗣同我同左先生魂發生過爭執，當蘇明駿兄創辦「現代雜誌」時，約我襄助，創刊前我特地跑去請左先生寫蔡鐸年譜，左先生自認材料不夠，只肯寫譚（嗣同）、黃（興）、宋（教仁）、蔡（鐸）四先生評傳，我當時就指出譚怎能與宋黃蔡相比？左先生大不高興，談了很多有關譚嗣同的事，結果仍是照他的意見去寫，借乎此篇未能完成）。此兩人對左先生影響至深。

當天在追悼會上，發現到會的人包括各個階層，各個黨派，許多平時觀點有歧異的人，不約而同前來弔祭。以出席人數而論，不算太多，但以包羅範圍之廣，在港卻是空前的，不由得想起湯化龍輓蔡松坡聯：「無友無敵，無新無舊，異口同聲，名滿天下，謗即隨之，此例遂爲先生所破。」以之輓左先生，倒也當之無愧了。

附錄祭文及輓聯如左：

祭 文

維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主祭李瑛、張發奎、黃旭初、林冀中、黃麟書、許孝炎、徐季良、沈亦珍、唐君毅、胡鴻烈等，謹以香花鮮果不腆之儀，致祭於左舜生先生之靈曰：

蓬迷風雨，南天隔熠熠之星；海嶽同悲，萬里奏離離之曲。山頹木壞，哀並尼丘；實落材亡，憂隨晉惠；天何

奪我公之速也！

嗚呼！廿載棲遲，共喪失路；百年籌策，計乏興邦。憂古傷今，同茲耿耿；寒來暑往，徒坐勞勞。老去廉頗，動髀肉復生之感；渡江劉石，乘間鷄起舞之思。千里家山，望陴嗷而勿過；百重雲水，每緬顧而增歎！

公以耄耋之年，抱瓊瑤之器；東遊西向，北顧南馳；成竹在胸，有條不紊。耻鴟夫之專制，張六伐七伐之文；重唇齒之交親，作知彼知己之計。舉比坐擁，名重兩東；大筆如椽，聲揚域外。盈庭唯唯，謗語鳴嚶；一代柄槩，恍然威鳳。仰長竿於默替，遠赴石於修文；天下失所瞻依，國家喪其賢輔。飾珍之典既崇，衰竭之令以佈；電窅安於圓鏡，著述載在名山。同人等誼切朋讐，還教宿好。或屬患難之交，或居望學之末；或因重寄於腹心，或以及門而戴德。撫棺之痛無從，追悼之忱永在。爰擇吉日，宜祭辰辰，不腆羅前，伏祈冥鑒！哀哉，尚鑒！

輓 聯

張發奎：萬竹寫蒼涼，空餘報國文章，其奈鼓浪風沉，海峽寒潮吹不起；

三湘毓俊秀，未展斯人懷抱，堪歎憐才星隕，洞庭逝水去難回。

黃旭初：史壇政海名俱顯；

復國還鄉願竟虛。

林翼中：本色是書生，齒德俱尊，報國尚餘忠愫在；

文章大手筆，玉筯不朽，遺徵長仰斗山高。

黃麟書：論政事文章，一代雄才尊大老；

腹渡河家祭，畢生遺恨望中原。

許孝炎：附驥益深親炙，去邪同際艱虞，亦姻婭，亦至交，靈光燭人，海嶼憶懷驚惡計；

治學舉重備林，出仕聲蜚館閣，是番生，是國士，謠言名世，湖湘從古美多才。

徐季良：參政多諍言，論中外史家，堪稱魁楚；

農林留治績，數古今人物，奚讓先賢。

羅香林：政績自他山，蒐討國聞，萬竹紀遺編，考史應推才學識；

交遊共心素，聆聆議論，三湘尊老宿，傳芳遠數德功言。

翁照垣：憂國傷時慙我在；

生天成佛讓公先。

張嘉璈：鯨海久揚波，國是朝暗，獨以謠言扶正氣；

鶴原猶抱痛，秋風蕭瑟，又揮老淚哭先生。

甘家聲：匡時本匹夫心，肝膽報國，議論縱橫，傷懷幾度買生淚；

持節爲士林表，憂樂無私，風度光霽，遺憾祇念黨人碑。

丘國珍：救國惟存近代史；

悼公已作古時人。

龔從民：異代問興衰，自有文章傳斗嶽；

哭天嗟不整，歌成高苑失陽秋。

曾后希、王世昭：論助業文章，自胡曾左李而還，一代霸才傷遇合；

眞法家拂士，當與滅繼絕之世，畢生肝膽付輪函。

涂公遠：斯人已寂寥，書籤藥屐封蛛網；

高才日陵替，水盡玉玕縣清秋。

周煥文、徐孟英：辛勞謀國，著作等身，此老學生無虧德；

公誼難忘，私交彌篤，長朋頓失有餘哀。

華則仁、林大庸：問芝草醴泉，藥石無靈，我慚元化；

論平生志業，文章有價，望重山邱。

池正、池方：天下事浪滾滔滔，何時可了；

千秋業今今古古，歸諸名山。

周異斌、劉茂華：奮道德能文筆，乘晦庵鑿齋之誠，用以經世；

爲民生主農稷，薄陳相許行之意，不日並耕。

李任齋：學而治經史，仕而相農林，才氣縱橫，濟世濟時存大願；

私以哭鄉賢，公以傷國士，河山破碎，秋風秋雨有餘哀。

李桐廬：左邱動筆，舜水清操，風概古今同，澗泊衛生存本色；

政聞區編，費壇講學，謠言朝野重，澗零耆友憶追懷。

汪振華：崇民主書生問政，明辨是非排俗議；

爲反共筆伐口誅，鞠躬盡瘁復神州。

侯成章：講學辦報從政，始終書生本色；

愛國反暴民主，古今完人典型。

胡家健：大雅云亡，留得報國文章垂奕世；

青年繼起，且看揚鞭禹域拯斯民。

徐 訂：吹笛過黃墟，樓榭悲風號萬竹；

哀時思國老，歌傳楚些吊三闕。

李金碑：議論久欽，斯人憂樂關天下；

高風安仰，四海青年失導師。

張叔干：學行貞純，近代史家尊上首；

江山搖落，老成人輩益凋零。

羅水揚：語重心長，垂後文章猶憤世；

氣吹聲應，加強陣線爲興邦。

陳經國：政事關當時，餘雨抽清風，一腔孤憤；

才華自曠世，兼謝安高蹈，荆國驚歎。

王嗣生：羣倫領導元老，奔走經營得力殫，身後榮名跨李杜，筆端崇論失歌韓。豈甘岳麓遊塵世，欲託湘流弔鳳

鸞，節義文章雙砥礪，霞門詞哭語悲酸。

呂偉東：(一)木壞山顛事可傷，先生作古趁重陽。廿年香島留鴻範，一病臺灣葬鳳岡。報國文章知有價，救民心願竟

難償。悼懷看舊悲無已，淚寫哀詩弔沉湘。

(二)九月涼秋夜降霜，哲人其萎斷人腸。王師未親移旌節，國士何堪沒病瘍。舜帝騎龍憐二女，生公說法往

西方。哀公騁聘終黃土，搔首幽窗問彼蒼。

黃達道、黃福鑾：風雨近重揚，忍着大星沉寶島；

交期湖卅載，永言仰止到長沙。

伍藻池：一代力名歸史筆；

百年大計定中原。

郭亦園：才氣自縱橫，謝安石兼王安石；

文章重今古，賈長沙與左長沙。

胡森：望隆斗嶽，志在聖賢，天下咸尊大老；

功存典策，學紹馬莊，德業歸諸名山。

許定襄：勳業文章真命世；

風流儒雅亦吾師。

陳煥華：無愧爲書生，爲報人，爲政論家，學問文章不朽矣；

寧堪失賢哲，失耆壽，失領導者，後生小子何述焉。

蔡頌平、王子南：曠代問才華，有安石風流，太冲妙筆；

論交兼師友，慣曲江令聞，叔度濟濟。

查伯衡、梁週年、陳謀煊、李一飛：從政問新猷，青史流芳，贏得勳名垂不朽；

願晉傳遠道，哲人凋落，毋分遐邇有餘哀。

廖蘭堂：聆誨感當年，每仰賢聲彰百世；

招魂悲此日，惟餘議論足千秋。

楊一飛：衡岳雲橫，千古是非存史筆；

瀟湘水咽，百年忠義寄江花。

關三廷、歐陽傑、關中：謀國本忠誠，廣志而修，跡近南陽諸葛；

著書甘寂寞，抱仁安處，心問石室昭山。

江茂森：大筆如椽，寫就中興鼓吹；

其德不遠，長留謀國楷模。

楊整庚：莫然有閒公獨去；

弔竊若是我三號。

柏冰洋：奇香書墨落雨乾，舊事總難忘，忽訝福星隕地下；

讀詩卷聲光並茂，深情猶未報，爭傳德業在人間。

樓文毅：追隨近州載，嘉談共仰，滿腹經綸謀祖國；

送別幾三週，驚傳噩耗，一天風雨泣先生。

冷定菴：議政最熱心，每發議論驚四座；

論史惟公正，行看事業足千秋。

黃白強：昔年瓊樓煮酒，縱談古今論豪傑；

今朝海角揮淚，懷念先用英魂。

馬興國、馬煥然、陳傑三：史事如數家珍，況胸蘊豪情，雄辯清談，語妙天下；

憂樂當關國是，惜世崇實力，空拳赤手，身在江湖。

響霖典、霍鳳傳、羅續表：上蒼不與年，愛國書生又弱一個；

偏安將廿載，懷才志士徒淚兩行。

林既聞：以學人而先天下反共，昔年醒獅報，聲震寰宇；

念元老竟憂國事辭職，今日蓬蒿歌，淚酒同胞。

黃華表：救世具雄心，論說縱橫，齊楚之間擊異轡；

讀書有特見，貫穿今古，史文當代號專家。

曾兩飛：勸俗正時，言論足爲世法；

蓄頤立儒，文章自有風規

許衍重：先生憂國不憂貧，識度宏深，遺規表率青年黨；

當世史才兼史筆，波瀾壯闊，立論尤稱一代雄。

吳澈深：滄江一臥海生榮，風雨話危舟，垂老猶思起衰敝；

客邸重逢人沉醉，去來傷異路，九秋攬涕哭先生。

余鑑明：形式團結易，精神團結難，語重心長垂炯戒；

陸軍寓於農，海軍寓於漁，瞻高邈遠見遺誤。

胡柰人：家國警安危，更有遺篇奉後學；

老成日凋謝，何堪垂淚話河山。

何漢華、黃承業、張慶鑑、毛華：

九月逢二豎爲災，厥疾非寧歿寶島；

一生幹國家大事，此心終古懷神州。

陳克文：大慙未除，公去應難瞑目；

老成凋謝，我來悟覺傷心。

註：公常以要眼見毛賊死亡日期，今先去，寧非遺憾。公九月十四離港赴臺就醫，擬別惠和園，不勝依依

，詎成永訣，肅對遺像，倍增悲憤，並此誌哀！

陳德遠：論政論史論人物，著作已等身，遺憾未成巨椽錄；

愛國愛黨愛後進，高風空仰止，愧懼怕過惠和園。

梁友衡：道合志同，親敵佩如仇，爲消赤禍思君子；

□ 誅筆伐，奈文章情命，更惜青年失導師。

周明新：亦友亦師，十載追陪失梁木；

爲黨爲國，一生獻替動朝堂。

鈕植滋：經世繁才懷雅範；

等身史學仰宗風。

黃同仇：志業足千秋，文章百世留；

九泉如有恨，未見兩京收。

張葆恩：筆底風雷，盡是自由民主；

胸中丘壑，全在復國興邦。

林伯雅：畢生秉筆平民意；

幾段遺言國士心。

文曼山：龍門史筆千秋重；

絳帳聲華四海欽。

陳再思：(一) 一世讀書教書著書，不愧書生本色；

平生論政參政從政，允稱政界全才。

(二) 與毛潤之共戚共鄉，想當年鬪獨延安，暢談紅樓水滸，終不免相見疆場，未竟全功身先死，公心豈能甘

乎；

乃左文襄同宗同道，曾立志苦學長沙，精研史記春秋，奮起而組黨救國，顛沛一世志難酬，天命其可知耶。

張正一、李蔭蓮：海上憶趨庭，仁厚時叨長者訓；

遼東問華表，笑騎鷹隼老人星。

趙國基、陳嘯天、吳樹柏、黃拔予、趙成君、趙善利：猶記離違江灣，規古論今，勗我輩玉振金聲期復旦；

那堪招魂海角，撫時感事，哀吾師擊鸞跨鶴不重來。

王友浩：尚德譽古人，知公蔚然開朝；

論交兼師友，愧我忝列門牆。

張海清：抗建憶陪都，耿耿精忠，巫峽啼猿數行淚；

英靈護寶島，悠悠鄉國，衡陽歸雁幾封書。

何慈華：國仗離宮，方廊廟雅音，何竟騎箕天上；

民須良史，待瘞殘纒緝，遽驚絕筆人間。

袁方錫：力疾致青年黨於復興，座上記遺宮，團結重在精神，成功要靠自己；

舉生信民主化之政治，樞府傳妻令，立身無改儒素，愛國出乎至誠。

何天然、張遠意、雷衍文、鄭世勳：忠心爲國家，幾經險阻艱難，聲名昭昭著寰宇；

扶病赴大會，呼籲精神團結，正氣凜凜照乾坤。

張鐵生：秦斗早欽敬，海隅隨侍，散木樗櫟猶見譽；

小極遠歸神，嶽麓山頽，滿園桃李盡含悲。

馬紹政、孫淡寧：學尊秦斗，黨重元魁，涕淚滿重洋，同悲國老；
蒞次關陸，業傳韓恨，墓廬雖三載，未盡心喪。

陳鳳翔：業獲歸歸風，七六成考終存娶一夢；
程門曾立雪，萬竹樓重過心喪三年。

黃開華：公姓左宮行非左，廿年國事蝴蝶，孤憤天涯人老去；
忘意高德業亦高，一世風流淑慝，成歎海隅氣長存。

蔣炳：著述等身，文章驚海內；
反共到底，理論儼羣魔。

殷士杰：史學自成家，名世文章驚海內；
書生能報國，繫人情思在臺灣。

王任述：亮節高風。
海外全體同志：求才若渴，攻錯若石；

區爾忘家，憂而忘身。
追悼會籌備會：立身無改儒素；

愛國出乎至誠。
中國文化協會：報國在文章，燕許應尊大手筆。

他山能攻錯，東南今失老人星。
香港中國筆會理事會：兼陣張吾軍，鐵馬秋風，奮憤應憐陸務觀；

文壇尊北斗，歸魂湘水，傷心同吊賈長沙。

香港出版人協會：治學辦報，始終書生本色；

愛國反暴，完全志士風概。

國立復旦大學香港同學會：念年鬱鬱吞島樓連，去楚遊秦，一士獨行復海角；

當日循循杏壇講學，執經問難，師徒踈澗憶江灣。

友聯研究所、出版社：少年遊學會友，青年組黨救國，中華書生表表者；

中歲參政理農，晚歲治史成家，新亞名士聲聲哉。

華僑書院第二十一屆同學：絳帳尊經，幸列門牆沐時雨；

丹心謀國，尙留型典穆清風。

左舜生先生紀念集書後

王師曾

左舜生先生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病逝臺北。海內外各方人士，陸續發表悼念左先生的文章，經周寶三、黃欣周兩兄收集五十餘篇，將連同治喪紀要，彙印成冊，分贈友好，以資紀念。寶三、欣周邀我參預編纂事宜，我對這些悼念左先生的文章，有的是曾經看過而再看一遍，有的尙係初次看到，看完之後，感不絕心，請略抒一點感想。附於紀念集末端，以表達我對左先生懷念的心情。

左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產生的讀書人，總統褒揚令評語，主要是：「綜其生平，立身無改儒素，愛國出乎至誠，謀猷獻替，功在國家。當外患日深之際，矢志團結，同赴國難，迨赤氛既熾，清標益彰。」李幼樁先生在香港追悼會致詞，最精要的話是：「左生是一個讀書人，好學基於天性。是一個中國讀書人，不僅要致力於學問，還要砥礪品行注重倫理。左先生一生對國家忠，對父母孝，對朋友信，對子姪慈愛，處處表現中國讀書人的本質。左先生

並不熱心作一個政治家，只是受愛國心的驅使，是個烈士型的人，見到義所當爲的事，確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程潛波先生的悼念文章，很感慨地說：「我看左先生，他是一位逸才，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而且是清末民初式的士大夫。集合士大夫組織的政黨，被環境逼迫走着犧牲奮鬥的路，其中的磨練閱歷，却是十分可以珍貴的。這回到我聽他的聯語：『淒涼感身世，山林鐵鼎，巨本布衣。』山林鐵鼎，對一個讀書人而言，到頭來是無關宏旨的，數十年的奮鬥，千萬言的著作，最後要保持我們的本來面目，還我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是士大夫立身大節的第一義諦。左先生今天是歷史上的人物了。左先生一生是努力想保持着讀書人的本來面目，他還是一個布衣。」

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上，讀書人的抱負是要從政的，所謂學以致用，學以經世，就是要本其所學，施展於實際政治方面，其目的在福國利民。如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便是一個讀書人的榜樣。從儒家宗師孔孟起，讀書人之著書立說，是在不能取得政權以後，才退而作此立言以傳世的工夫，這不是他們原始的心願，唯一的心願。一部中國廿五史，讀書人雖然不少，但在政治上能暢行其志者則不可多得，其根本原因，是在君權政治之下，讀書人從政的先決條件是得君主的賞識及信任，那是一種談何容易得到的際遇，因而讀書人在政治上往往是失意的。這種君權政治時代的陳跡，自民國成立之後，讀書人的出處，自然要隨政體的改革而與往昔有所不同。這即是說：在君主政治時代，讀書人要想取得政權，成爲一個政治家，首先必須獲得君主信任；在民主政治時代，讀書人要想成爲一個政治家，首在爭取民家的擁護，爭取民家擁護之道，必須要有個政黨爲運用的中心。在君主時代要想得君誠然不易，在民主時代要想辦黨更是有大困難，常燕生先生在他所著「學人與政治」那篇文章裡對於此點愷乎其言之說到：

「究之民主政治云者，所求者在多數民家之了解以至擁護，欲求民家之擁護，則必須人人而說之，且且而晤之，昔之所說者在一人，今之所說者在人人，一己之口舌勢有所不能周，則必有黨，於是又須先求黨家之了解以至擁護。人與人之意志不同，利害不同，滿意於此者或失意於彼，政治家欲求多數之擁護，勢不能不委

曲求全，調節人與人間錯綜複雜之利害關係，而有以彌縫之，籠罩之，幸而有成，其本來志業已折扣過半矣；況匯結多數之民家於一爐，需人，需財，又需時勢，又不能不造就於此三者，則其本來志業又折扣一半之一半。是以民主時代之政治家，在取得政權以至保持政權之間，其艱難困苦，隱微難言之苦痛，更非君主時代之政治家所能夢見者。」

常燕生先生這一段言詞，確是有所見和有所感而云然。民國成立以來，國民黨之外，讀書人毅然而起組織政黨，希圖把國家納入民主政治、政黨政治軌道的黨魁，有梁任公、蔡元培、張君勱等三位先生。梁任公先生於民國二年組織進步黨，曾蔡韓先生於民國十二年組織中國青年黨，張君勱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組織國家社會黨，嗣於三十五年改組為民主社會黨。進步黨的壽命不長，梁任公晚年與建集於中於學和著述，對於實際政治已不願過問。張君勱自謂其興趣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對於實際政治只是作原則性的干預。蔡韓先生之組織力強於梁任公、張君勱，而無強烈的政治權勢感，其志趣可以說是在要著書立說，可惜因受時勢的牽制和奔命的限制而發志以歿。梁會張三位先生的平生志業，充分地顯現了中國讀書人的本色。他們一方面基於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毅然起而組織問政；一方面又浸潤於優遊學境的境界，淡然於政治權位之爭取。像他們這樣既想實行其政治主張，而又不肯積極爭取能夠實行其政治主張的權位，似乎是有點矛盾的，其實不然。他們篤定理想重於現實，原則重於手段，品格重於權位，因是決不肯作出不惜拋棄理想，違背原則，損傷品格而但求獲到政治權力的事情。讀書人所以受人崇敬者在此。政治家與政客最顯明的區別亦在此。

左先生和梁會張三位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同一典型人物。左先生於民國二年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時年二十二歲，和曾嘉韓李幼樁兩先生是同班同學。據左先生自述，那時候他就看到嘉韓先生有點矯矯不羣僅個領袖的樣子。他並且自譯地說：嗣後不知道嘉韓先生是看中了什麼，一定要把他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世人對青年黨元老人物，習慣於以曾左李連稱，誠如李幼樁先生所言，曾左李這個連稱，可以說是從震旦大學讀書時就開始有了。曾

蔡韓先生於青年黨成立後之翌年（民國十三年），從巴黎回到上海，照預定計劃，創刊醒獅週報，展開對共產黨的理論鬥爭。其時蔡韓先生辦報的兩大助手，一個是左先生，一個是陳啓天先生，左先生在醒獅週報所擔當的任務，是相當於總編輯兼總經理的任務。醒獅週報發行之第二年，左先生正式加入青年黨，從此和蔡韓先生走上了並肩創業的征程，以青年黨為中心，從事於反共產反極權反侵略的政治運動。左先生自民國十四年加入青年黨至五十八年逝世，在這四十四年之間，他對國家，對本黨有很多貢獻，其最大的兩件史實：一是開創青年黨與國民黨合作的局勢，一是促成青年黨團結。前者左先生在他所著「蔣介公總統八十壽辰」文章裡有如下敘述：

「二十三年春天，我接着蔣先生從杭州發出的封電報，約我本年暑假，到廬山和他見面，我才正式把經過告訴蔣公（琦），並徵求他的意見。蔣公說：「一個在野黨人和執政黨的當局見面，這是再尋常沒有的，你儘管可以去。」我說：「萬一因我和蔣先生見面，演變到青年黨與國民黨合作，你的態度怎麼樣呢？」蔣公答復得更乾脆，他說：「現在國難如此嚴重，日本軍閥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為時必不在遠，最後我們除抵抗以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到時候，全國無論任何黨派或個人，都非與國民黨共患難不可。我們是一個國家主義的黨，當然必須與國民黨一致，你先去做一個底子當然更好。」我說：「你既贊成我去，而且主張與國民黨合作，我便有三個原則必須堅持：一、我們信仰國家主義，愛國第一，我們主張民主憲政，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這個基本立場，不容動搖。二、我自己是一個書局的編輯員，同時在大學教書，對實際政治無經驗，也無興趣，假定蔣先生要我擔任什麼純政治的工作，我必須婉謝，這是我的身份，必須保持。三、聽說國民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們真要走上與國民黨合作的路子，我主張只能以整個國民黨為對象，決不參加他們派系的角逐，以避免無謂的糾紛。你對我這三個原則，即團體不失立場，個人不失身份，不參加國民黨的派系角逐——看法又怎樣呢？」蔣公考慮了一下，答覆我說：「你這三點大體妥當，我完全同意。」這是我在見蔣先生以前對青年黨的一個交代。」

左先生決定應今總統蔣公電邀，前往廬山謁見，其政治性的意義，就是青年黨和國民黨謀求合作之開始接觸。這是青年黨的一件大事，因是左先生遷取得當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于復先同意函件，然後啓程前往。寫到這個地方，須將青年黨這一件大事的前因後果加以解說：

青年黨於民國十二年成立之時，明定宗旨爲：「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這即是標明，青年黨是革命的政黨。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權操在北洋軍閥之手，革命的對象當然是北洋政權，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和國民黨是一致的。但青年黨反俄反共，其時國民黨則聯俄容共，因是青年黨除了在理論上行動上和中共匪黨作生死鬥爭之外，還因國民黨聯俄容共之故而反對國民黨。自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間，中共匪黨滲透在國民黨內黨政軍各機構，利用職權假借名義以打擊青年黨，無所不用其極。十六年國民黨消共之終，國青兩黨本來是可以謀合作反共之道的，但其時國民黨執着於所謂「黨外無黨」的觀念，不承認國民黨以外政黨的政治地位，對於青年黨仍是採取防範和壓迫的態度，所以青年黨對國民黨仍是站在反對立場，堅決主張實行民主憲政。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青年黨提出政黨休戰共赴國難的主張，並沒有得到國民黨多大的反應。在民主國家裡，執政黨稱爲在朝黨，在野黨稱爲反對黨，在朝黨負執行政治責任，在野黨負監督政治責任，所謂反對黨和執政黨之對峙，本來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其時中國的情形則不能與這種民主國家的常情相比擬，國民黨並未承認青年黨的政治地位，青年黨還是一個革命政黨的組織。青年黨成立後八九年之間，在秘密培養和吸收軍事幹部方面的成績，不能算是很大，也不能算是很小。當初青年黨在大專學校肄業之幹部同志，很多進入國內外外的軍事學校，並在校內吸收同志，建立組織。其先後從雲南講武堂，金陵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四川各軍所辦的軍事教育機構，以及日本士官學校和各兵種專門學校等國內外軍校出身，而散佈在全國各地各軍的青年黨同志有一千多人。其大多數是分佈在非中央政府權力所能徹底控制的地區，非中央嫡系軍官所能確實掌握的部隊裡。這可以總括的說一句：其時青年黨已經具有一股潛在的武裝力量。

左先生於二十三年秋天謁見今總統蔣公之後，接着會蔣韓先生於二十六年春初到奉化謁見蔣公，左先生壽蔣公文章提到此事經過說：

「蔣韓有信給我，說年內可以南來；但希蔣先生有一信給他，比較合式。某一天，我在蔣先生處催他寫這封信，他立即上樓，匆匆寫了兩紙交我，『書被催成墨未乾』，語意甚為隆重，我即掛號轉寄蔣韓。在蔣韓二十六年未到奉化與蔣先生見面以前，這封信便已發生作用，蔣韓在北方聽說蔣先生有前往西安與張楊開會之說，他知道北方的空氣，東北軍的心情，關心蔣先生的安全，即有一函托李幼樞到洛陽轉達蔣先生，勸不必前往。可惜幼樞到洛陽時，蔣先生已動身前去，致使命未及完成。這件事我以前未曾談過，現在事過境遷，已成陳跡，我想公開也不妨了。西安事件結束後，蔣先生回奉化休息，我和幼樞即陪同蔣韓到奉化與蔣先生見了面。」

會蔣韓先生和今總統蔣公懇談之後，青年黨與國民黨合作開始，接着會左手三位先生於二十六年夏間應蔣公之邀請參加廬山談話會，蔣預對日本全面抗戰決策，隨即參加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二十七年四月，左先生代表青年黨和國民黨總裁蔣公交換函件，左先生固極懇切地說到：「同人等睹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蔣公覆函極懇切說到：「誠懇坦直，矢共艱難，備誦之餘，彌深感慰。苟斷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同勉勵者也。」這兩封函件之交換和公佈，蔣公是代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表示承認青年黨政治地位，左先生是代表青年黨表示擁護國民政府和與國民黨合作。並且這是象徵中國政治將由一黨獨行其是的割政走向各黨共行其是的憲政，因是中外輿論頗為重視，如當時的大公報等，立即以社論闡述這一事件之重大的政治意義。自此以後，青年黨停止並且是結束了軍事方面的組織，而於三十四年在重慶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把青年黨宗旨改定為：「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則，內求統一與自由，外保安全與獨立，以建設全民福利的現代國家，並促進平等合作的和平世界。」青年黨從此由革命政黨變為和平政黨。

二十七年國民參政會成立，網羅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於一堂，通過抗戰建國綱領，達成舉國一致抗戰的局面，經八年苦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抗戰勝利之後，中共匪黨在蘇俄共產帝國支持之下，相與裡應外合，擴大叛亂，民主同盟份子從而推波助瀾，甘於為虎作倀，益以國際共產侵略的陰謀得逞，影響了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致使我政府反共戡亂的戰事陷於不利，整個大陸淪入鐵幕。在這時間內，國民政府於三十五年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三十六年國青民三黨及社會賢達簽訂共同施政綱領，成立準備行憲的聯合政府，卅七年舉行大選，實行憲法，民主憲政基礎於以奠定，是亦反共復國民主建國最大的憑藉。從制憲到行憲的過程，不必在此詞費，但可以概括地說一句，就是：青年黨與國民黨之合作，實在是推進民主憲政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初國民黨青年黨合作所以順利達成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國家情勢需要，一個是今總統蔣公提舉。由於國難嚴重，執政的國民黨需要擴大政治局面謀與在野黨派合作，在野的青年黨需要共赴國難謀與執政黨合作。蔣公高瞻遠矚，親身謀與青年黨領袖人物接洽，開闢兩黨合作途徑。蔣公對青年黨之關切，數十年如一日，其扶持在野黨的氣度，較諸凱末爾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當時有此兩個足以促成國青兩黨合作因素的形成，左先生得着機緣首先去與蔣公晤談並繼續接洽，憑他讀書人的風采和不失團體立場不失個人身份的態度，對國青兩黨合作的進行作了一個好的開始。「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不僅是青年黨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左先生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青年黨中央不幸自隨政府遷到臺灣以後發生分裂，左先生住在香港，對本黨分裂自然甚為痛心。他時常對同志說：如果是為了政見不同而分裂，那是不失其為光明磊落的事，如果是為黨氣之爭或為利益得失之爭而分裂，那就簡直是無聊，青年黨人豈可作無聊的事情。左先生自然早就希望本黨能够團結，但是他尤其注重的是同志們是否肯多讀書，肯研究問題，他對老同志在學問上有進步有成就者，衷心予以讚揚，如對沈翼龍兄，他在口頭上和文字上，都稱讚發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創見有勝過他本人的地方。對於黨內團結問題，他深感困難很多，所以在過去一段時期裡，他並不想勉強促成團結。他感覺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青年黨能否團結與國民黨的態度有關。五十七年夏

天，左先生來到臺北，某次總統接見他的時候，懇切表示希望他促成青年黨團結之盛意，在座者有國民黨中央黨部重要負責人員。左先生深為總統盛意所感動，並認為這是促成本黨團結最有利的時機，於是一改他平日不大過問黨內糾紛的態度，作積極推動全面團結的工夫。五十八年七月，青年黨在臺北舉行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辦清過去分裂時期的一切組織，重建統一的中央黨部，黨內外同慶本黨團結成功。青年黨從民國十二年建黨至五十八年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這四十六年的歷程，前一段時間能在艱苦奮鬥中壯大起來，對反共，抗日，制憲，行憲都有相當貢獻，留下可貴的史實。但自從來到臺灣不幸發生分裂，歷時將近二十年之久，內而黨務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外而黨譽日見低落，似此情形如任其推演下去，則青年黨將發生能否存在和存在的價值問題。因是凡屬愛黨甚切之同志，莫不渴望團結，維護團結。青年黨團結達成的根本因素，就是同志有此共同的願望。左先生自數年前在香港在美國治療胃病之後，身體並未完全康復，但他意志堅強，絕不介意健康問題。五十七年他來臺灣推動全黨團結之時，他的身體很現衰象，因是他的精神更令同志感動。在五十八年七月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在香港已是舊病復發而相當的重，他仍不得不扶病來臺參加大會，大會前後的辛苦，是足以加重他的病情的。果然他於回到香港才幾天就病倒了，他在青兄村度他的病已屬不治，但仍存着萬一有奇蹟發現的希望，勸他來臺灣治療。奇蹟那裡會有，左先生終於在榮民總醫院，熬撐一個月零兩天而與世長辭了。左先生在醫院中，猶殷殷以本黨團結後的情形為念，一再致意同志，精神團結重於形式團結，勉勵大家要切实做到精神團結。青年黨在臺灣鬧分裂太久，已經由混亂而到了衰微地步，左先生力疾推動團結從而達成團結，為青年黨建造一個可以中興的機運，這是左先生對本黨一個很好的交代。至於青年黨今後能否做到中興，那是後死者的責任，以左先生凡事提得起放得下的個性，即使九原有知，也就不願過問了。

